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

(1931—1949)

〔美〕入江昭　孔华润　编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 汪熙 主编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中、美、日三国历史学者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主持下，围绕着二次大战的火星为什么首先在东亚爆发，东亚的局部冲突为何会导致世界战争等问题，进行了数年探讨。

复旦大学出版社

序　言

本书是国际合作编纂历史的一些尝试。书中包括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的论文。它们集中讨论了 1931 年至 1949 年这个时期的历史。作者都是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专家，都发表过关于这个时期美国—亚洲关系的著作和论文。他们对探讨历史，以及向美、中、日三国读者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读者传达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怀有共同的兴趣。1931 年到 1949 年这个时期对于他们承担这项任务似乎特别合适，因为这是一个冲突、战争、革命和内战的时期；而且，来自这些国家的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个多事年代的学者尤其有能力来比较和甄别有关的研究成果，并对历史现象进行反思。

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六位美国历史学者、两位中国的和两位日本的历史学者得到了亨利·鲁斯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使他们能够在 1982 年至 1985 年定期会面。在这三年中，美国的参加者经常碰头，而来自两个亚洲国家的参加者访问了美国，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以出席小组会议，并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所有十篇论文都在小组会议上逐一宣读和讨论；在收集出版之前，又经过了几次修改。参加者并非总是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他们对这段历史解释的重大分歧仍然保留在他们的论文中间。本该如此，我们并不力求对过去的事情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而是通过共同研究各种有关的问题，比较各种观念和方法，谋求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事件——其中大多数是不幸的事件。而且，我们始终坚持我们的目标，为不同国家的读者提供美、中、日三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思想，达到进一步促进国际间学术交流的目的。

书中的四篇文章论述了从九·一八事变（1931 年）到欧洲战争爆发（1939 年）的 30 年代的美—亚关系。其间，日本侵占了东北、华北，最终侵略了整个中国。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实际上首当其冲地单独受着日本的侵略，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任何实质性援助，也没有得到美国的任何帮助。美国是否可以作出某种行动，以影响这些事件的发展呢？这个问题经历了长期争论。孔华润和汪熙直接讨论了这个问题。孔教授认为美国应该听从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的告诫，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仅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秩序。孔教授对史汀生的看法与众不同。史汀生常被描述成为教条主义的捍卫者和干涉主义者，他在美国利益没有直接卷入的情况下，不惜冒同日本交战的危险，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而孔教授把史汀生看成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知道太平洋两岸的对峙迟早会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并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同意他的看法。孔教授指出，罗斯福的海军扩展计划很明显就是为了同日本保持平衡而制定的。史汀生—罗斯福方式最终导致了集体安全体系的出现。这一想法在 1937 年罗斯福的“免疫讲话”中已经有了表述，那年年底，“班乃号”轮在南京沉没后，加速了其准备工作。到 1938 年，罗斯福总统已经决定采取除了战争之外的一切措施，使美国再次卷入国际事务之中去。孔教授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是新方式的“最先得益者”。

汪熙不同意孔教授对罗斯福的看法，尤其是对 30 年代中期罗斯福的表现感到失望。汪教授的论文集中论述了 1934 年白银购买法案，他认为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困境漠不关心的一个例子。他论述到，美国应该、而且能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而美国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它只考虑其国内利益，尤其是只考虑追逐利润而不顾白银购买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罗斯福逆来

顺受地接受了白银政策，这种做法比对中国索性无所作为的危害还要大。汪教授认为，如果美国在这一方面不采取任何动作，就不会人为地引起白银价格的上涨，这样，中国抵抗日本的有效能力也许不会被削弱。亚洲的权力平衡也许能够维持下去。这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得益远远超过了白银购买政策为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带来的暂时的好处。在这一点上，就像孔教授的论文中描述的那样，美国面临着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孔教授着重点是维持国际秩序，而汪教授的分析则注重区域间的权力平衡。然而，两位作者一致同意，若能早一点帮助中国加强抵抗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细谷千博和臼井胜美的两篇论文揭示了日本在 30 年代也有一种选择。就像细谷教授指出的那样，当 1933 年罗斯福成为总统之时，日本政府对探索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很有兴趣。日本自侵略东北后，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受到孤立。东京渴望获得华盛顿的某种谅解，重建亚洲秩序。然而，在这里细谷同意汪熙的观点，30 年代中期美国的政策是考虑美国国内利益的产物，而不是长期的深谋熟虑的产物。因而，他们对日本的表示没有系统的反应，也没有援助中国的全面规划。1933—1934 年的棉花和小麦贷款，使美国摆脱 5，000 万美元剩余产品的这笔交易，使美国同日本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更加无望。然而，这个计划并不比白银购买法案对中国有更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逐步深入。细谷写道，即便如此，一些日本官员对日本在中国的单独扩张感到不快，继续谋求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和英国合作。臼井教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论点。他把佐藤尚武的国际主义和近卫文麿的反国际主义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前者坚持日本的基本需要是经济上的，因此，它的出路只在于同西方国家合作，恢复开放的和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秩序。

作为一位职业外交家，佐藤在 1937 年担任外相后，有机会试验一下他的设想。但是，他的在职期间实在太短了。他的观点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东京的大多数文官所接受，更不谈为军界人物所接受了。他们旨在声称日本的特点是一无所有，按照他们的观点，作为一个空间和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日本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向其邻国扩张和开发，即使这样做必然会排斥西方利益，也该如此。同自然资源丰富的西方国家合作是没有意思的，除非他们愿意同日本共享其空间和财富。近卫及其同事坚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上述四篇论文揭示了美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中美合作反对日本；美日在中国合作；日本独霸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或者是某种包括三国和欧洲列强的的国际共管，以维持表面上的区域秩序。然而，第三种方式，即日本控制中国，美国不进行实质性的干预，是 1931 年到 1939 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这些论文还揭示了一些幕后的更为复杂的动向。这都表明需要更多的有关中国想法和政策的资料。汪熙的论文主要依赖于美国和日本的资料即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档案需要进一步开放，对中国政策的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另一方面，高家龙的文章显示了富有想象力地使用少数可供使用的资料，也能对 30 年代的中国政治作出深刻分析。高家龙集中论述了政麻-企业关系，指出了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家庭——荣氏家族，是反对日本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此，汪熙教授或许不能同意——但高家龙争辩道，这与其说是抽象的民族主义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对保护家族利益的关心。所以，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荣氏家族拒绝迁往年地的命令，继续留在上海，并在战争期间兴哑一时。这种“企

业重于政治”并不一定是典型的，但这里提供的证据却是无可挑别的并对中国民族主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种简单的描述进行了矫正。与此同时，高家龙对南满铁路的论述中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的激烈的利益冲突和观点分歧。在控制华北的经济政策中，该铁路由最初抵抗军人控制到最终向军人投降，这个过程用单一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容易使人误解。这正如美孚石油公司在消除华南炼油企业的中国竞争中，成功地谋取了华盛顿的支持一样。高家龙文章末尾所描述的这一过程，使得美国卷入（或没卷入）中国事务的图像更加复杂了。

高家龙在其文章中确实也指出了 30 年代后期美-亚关系的主要变化。当中国政府机构作许多企业迁往年地之后，日本军队控制了占领区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更多地卷入了保护在中国的美国利益免受日本侵略的事务之中。这个阶段被看作是日本同美国的对峙阶段，美国开始日益增加对中国的支持。

瓦尔多·海因里希论述了罗斯福总统拒绝“同日本携手合作，在中国追求和平并解决问题的机会”。这种政策或许能使美国集中精力，对付欧洲 1939 年战争爆发后的局势。海因里希认为，罗斯福拒绝接受那种战略，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平洋局势同大西洋局势在发展中的连锁关系。1941 年以后，这种联系变得更加明显了。海因里希表明，当该年 4 月美国海军冒着同德国交战的危险在大西洋巡逻时，出于慎重，美国表示了某种愿意同日本人谈判的姿态。但在 6 月 22 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之后，任何同日本的妥协都会被看作鼓励日本从后方攻击苏联，其结果不仅对苏联来说是灾难性的，对英国和美国也是灾难性的。海国里希指出，由于这种原因，罗斯福时日本的立场变得十分强硬了。他首先考虑的是让苏联抵抗住德国的进攻，他试图以把日本军队拖在中国和事实上的石油禁运来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顾后一项措施可能引起日本的南进。罗斯福宁愿看到日军南进，也不愿日军北进。这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能够使得我们将苏联、大西洋、中国和太平洋局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东南亚在加里·赫斯的观点里有了新的意义。赫斯教授将美-亚关系放置到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的大构架中来具体论述。他指出，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在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卷入越来越深，更不提它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了。赫斯认为，到 1940 年美国已是这个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而日本向南扩张却对此形成威胁。1941 年美国同东印度地区的贸易已经超过了日本，华盛顿甚至考虑向泰国提供军事援助，抵抗日本可能的进攻，尽管最后没那么做。正如太平洋战争使得日本军队进入了这个地区，它同样也使得美国在亚洲这个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扩大和加强。赫斯追述了战时美国制订的有关东南亚前途的计划，尽管由于战后新的反共产主义战略使这项计划有了某些修改。有趣的是，在菲律宾和泰国，美国同那里的精英们紧密合作，甚至包括那些同日本合作过的人，但对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美国对英国和荷兰分别施加影响，准许它们独立。相反，在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倾向支持法国的立场，这使得美国在早期就同那里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形成对立。虽然，美国对于东南亚各国的解决方法各不相同，但是，这场战争却使得美国作为列强出现在东南亚地区。

同美国势力在亚洲扩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灾难。日本在 1941 年发现自己被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包围”了。按照日本的

观点，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从这种状况下解脱出来的孤注一掷的挣扎，这场战争导致了以后数年中日本在陆地上的扩张，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彻底失败了。入江昭的论文概述了这一过程。入江昭又回到了细谷千博如臼井胜美的论文所讨论的题目，他认为“包围”并非是唯一的发展方向。如果日本设法在30年代末回到“华盛顿会议体系”，同美国和英国合作，某种区域秩序或许能够得到恢复。日本由此得到的它所期望的经济利益比选择军事方法所能得到的更多。入江昭提出，除了在战争中出现的华盛顿体系之外，还有其他的国际体系，如由美、英、苏、中紧密合作的想法——开罗会议的方式——或美苏协约——雅尔塔会议方式。人们同时探索着这几种可能性，但至少对日本来说，美国的“复兴”战略意味着回到多边贸易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想法中去，这种政治合作为华盛顿会议体系提供了基础。

然而，那种体系应该不是强权政治的概念，而是建筑在列强们自愿进行裁军的基础之上。但是1945年以后，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而苏联将其势力伸展到其邻近国家，强权政治从未消失过。事实上，它还支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或上，罗伯特·麦瑟论述了从罗斯福的“在战后亚洲从复兴、同化的方式对付苏联”到哈利·S·杜鲁门总统的“反苏、反共和遏制为特征的竞争与好斗主义”的转变。杜鲁门为何抛弃前任总统的雅尔塔构架，而代之以遏制的冷战政策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题目。麦瑟通过考证某些新的证据，阐明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杜鲁门对日益明显的美苏竞争十分警觉，并决心阻止苏联势力在亚洲的扩张。同样的权力竞争感引诱他在日本投降后立刻派军队到朝鲜和中国去。这些步骤不是“雅尔塔会议的结果”而是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虽然，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主要集中在欧洲，但杜鲁门企图保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并且“重新使”中国和朝鲜成为反苏势力的桥头堡。

这种看法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却是权力政治思想的必然结果。权力意味着统治，无论对日本、苏联或美国都是一样。罗荣渠教授在观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时，以“东亚的国际权力结构”的方法，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美-亚关系。他认为，在30年代，美国在其“政治战略”中，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其次才是中国。由于美国不能也不愿单方面地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它首先寻求同日本达成谅解，谋求保持某种平衡。这种企图失败后，美国才转向中国，反击日本的扩张。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把维持中国抗战看作是头等重要的。然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不愿执行这项任务，因为他们在准备同共产党最后摊牌。由于美国的“越岛战役”降低了中国在同日本作战中的重要性，战争将近结束时，苏联势力的增长使美国感到必须将一个统一的中国带入“美国控制的世界轨道之内”。虽然，美国没有始终如一地执行这项政策，因为它优先考虑的是在欧洲同苏联的权力之争，但是，1950年美国对朝鲜的干涉意味着美国在采取最后步骤争夺这个地方的“世界霸权”。这同战后世界的“各民族和国家的合法愿望”格格不入，因而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现点至少反映了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种重要流派。它给人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印象，实际上，罗教授的说法同赫斯、麦瑟及其他作者的观点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总之,这十篇论文广泛地概括和提示了30年代互40年代美-亚关系动荡历史时期中的具体课题。在这个时期中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和灭亡、中国的革命和内战、西方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和美、苏势力的扩张。这些论文

从三国各自的观点来研究这些发展进程，反映了当今的学术发展趋势，证实了国际间合作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编者和作者希望本书的出版将会促进类似的合作，以加强世界范围的学术交流。

编者衷心感谢亨利·鲁斯基金会对本项目提供的资助，并真诚地感谢九位同事为本书所作出的共同努力。1982 年至 1985 年，当项目参加者定期在芝加哥大学开会之时，他们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助理秘书阿列克塞·罕德的热情款待。朱昌峻教授出席了几次会议，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本书稿件的定稿得到了孔华润和雷尼·弗德逊的帮助。

入江昭

（陈锡镖译）Contents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美国学术资源出版公司（ScholarlyResourcesInc.）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的中文版。书中包括十篇由历史学家们所撰写的论文，其中两篇是中国学者写的，两篇是日本学者写的，五篇是美国学者写的，还有一篇是我本人的文章。因而，本书可以说是三国学者同心协力的成果。

编纂这本著作的想法在七年以前就产生了。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获得了鲁斯基金会的一笔资助，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研讨班，广泛、深入地研究从 1931 年至 1949 年这个时期的美、中、日三边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多事的年代。我们觉得，有中国和日本学者参加是十分重要和非常有益的。我们很幸运地请到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四位著名历史学家到美国参加这个研讨班。十位学者在一起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每位学者通过论文交换了各自的意见。

本书中十位学者的论文，都经过了修改。尽管我们的讨论会是几年前举行的，但是这些论文仍然具有新鲜感。它仍然能够反映我们在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和严肃的讨论中所产生的那种兴奋感。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生动的讨论。尽管我们彼此的思想观念和国家背景不同，我们还是十分愿意相互交流看法。通过交流，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和繁荣。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获得了成功。本书中的十篇论文无论在史实或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都取得了某些新的成就。然而，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他们共同拓展了认识那些多事年代的视野。

今天，美—中—日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之间的不受教条主义和政治干扰的学术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那个战争年代的重要教训，也是我们对过去重加探索时的指导原则。

我十分感激复旦大学出版社承担本书的出版工作，感谢汪熙教授在项目进行期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本书的中文翻译者。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的作者如此耐心地等待本书的出版。

入江昭

1987 年 7 月

（陈锡镖译）

主编前言

20 世纪的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世界上多事的年代。30 年代初，日本明目张胆地侵吞了中国的东北地区；随后，又试图一举侵占东北平原。1937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国大陆。两年以后，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帷幕拉开；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使整个太平洋地区几乎没有一片宁静的土地。一场史无前例的真正的世界大战载入了人类史册。为什么这些不幸的年代都交汇在这一历史交叉点上？为什么战火常常首先在东亚爆发？这场人类浩劫可以避免吗？这种从局部冲突发展为世界性的战争可以推迟吗？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它的东亚政策是否明智，其成功、失误或错误之处在哪里？人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回顾与反思的重任落到了历史学家身上。

在入江昭教授组织下，美、中、日三国的历史学家经过几年研讨，形成了这本论文集，试图回答我们在上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美、中、日三国学者会聚在一起，以不同国家的背景为基础，共同讨论它们都曾一度深深卷入的历史，这还是首次。尽管历史学家们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运用了丰富的学术知识，对这一段历史作出了各自最佳的论述和分析，但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共同之处，也有分歧之点。这正是这本书的特点，也是它的可贵之处。

入江昭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特别致力于东亚关系史的研究，曾两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是 1988 年度美国全美历史学会的会长，现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组织这样规模的学术讨论是一项很艰巨的学术工程，感谢入江昭教授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日、中学者的通力合作以及翻译者的辛勤劳动，终于使这本论文集的中译本得以问世。鲁斯基金的慷慨资助，使这一项目能够贯彻始终。我们表示感谢。

本书将在中、日、美三国以各自的语言同时出版发行。书中各篇论文的观点只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不代表出版社、美国研究中心或主编的观点。

多国学者聚议一堂，可以扩大视野与思路，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我们期望有更多这一类的学术交流活动。

汪　熙

1989 年 7 月于复旦校园

内容提要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明目张胆地侵吞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又公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直至自取灭亡：美国则从奉行名义上的不干涉主义开始，最后引火烧身，被迫参战：而中国则在被侵害、被蹂躏的困境中，始终坚持抗战，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中、美、日三国历史学者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主持下，围绕着这次大战的火星为什么首先在东亚爆发，东亚的局部冲突为何会导致世界战争，这场人类浩劫能否避免等问题，进行了数年探讨。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上述问题。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合作研究历史的做法无疑会促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已出版

一辑　　汪熙编：《中美关系史论丛》
二辑　　王邦宪编著：《贸易保护主义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
三辑　　屠传德著：《美国特使在中国》
四辑　　〔美〕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五辑　　汪熙、〔美〕霍尔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
六辑　　汪熙编：《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决策》
七辑　　〔美〕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
八辑　　〔美〕迈克尔·罗素著：《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
九辑　　张任著：《美国对华直接投资（1980—1991）》
十辑　　〔美〕韩德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前的美国与中国（1784—1914）》
十一辑　　项立岭著：《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十二辑　　汪熙、〔美〕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
▲十三辑　　汪熙、〔美〕杜恩主编：《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
十四辑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
十五辑　　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
十六辑　　吴心伯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将出版
十七辑　　汪熙、〔美〕段志煌主编：《市场经济与中国农业：问题与前瞻》
十八辑　　〔美〕特克著：《尘埃中的模式：中美关系与承认之争论》（朱立人译）
十九辑　　胡涵钧著：《坎坷中的发展——中美贸易 25 年（1972—1997）》
二十辑　　鹿锡俊著：《日本对华对美政策与中日美关系的演变，1937—1991》
二十一辑　　汪熙、〔日〕田尻利主编：《中美关系百年书目》（中、英、日文）

（目录中带▲的书在美国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或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英文版。）

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

美国领导人与东亚（1931—1938）

孔华润（warren Cohen）①

（一）

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杰出的国家。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而又有证据表明，美国海军将领所指挥的舰队比他们的英国同行所指挥的素质更佳。美国拥有第一流的金融实力和海军力量。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虽然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它越来越多地卷入了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开发市场和原料资源方面。然而，到 1929 年 10 月，美利坚帝国的基础开始动摇了。数月之后，美国的经济崩溃了，与经济力量不相协调的军事力量急剧下降。美国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它的领导人和人民大众忘记了威尔逊和胡佛关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幻想而拼命将精力集中在恢复经济上。要把一个失业人数高达 1500 万并且还有数百万人面临饥饿和绝望的国家称为帝国和世界强国似乎是不切合实际的。在 30 年代，对美国来说，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民主是否能够克服本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使国家幸免于难？

美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的黄金年代里，对东亚的事态很少显示出有多大的兴趣。在萧条期前后，任何国际事务很难在

美国人心中占什么地位。对于美国来说，东亚显得格外遥远，又不那么重要。它仅能引起少数美国人的兴趣，至多不过那么百来个人，他们毕生的事业是以中国或日本为中心的。简言之，在 30 年代的政府内外，很少有美国人关心亚洲的事变，而且即使关心太多也是出于被迫，因为太平洋彼岸的危机所造成的压力不会消失。

（二）

美国领导人对包括东亚在内的国际事务负有责任。1931 年夏天时，他们对美日关系十分自鸣得意。美国人同币原喜重郎打了近十年的交道，对他非常尊敬。日本在他的领导下所实施的遏制政策受到了赞赏，如果说美国外交官们对此估价甚高，那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已经把好斗的日本军界控制住了。然而当日本于 1930 年在伦敦海军会议上同意了英美联合倡议之后，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仍然对此估价太高了。在经济方面，日本可望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它无疑是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银行家们急切地希望借钱给日本政府，摩根公司甚至设法防止国务院对贷款进行阻拦，而那些贷款将能使日本加强对满洲的控制。整个 20 年代是日美合作和亲善的典范时期，只有少数几件不愉快的事是例外，如：美国 1924 年的移民法和 1928 年日本军队在山东的不轨行为。威尔逊执政时期最后几个月的那种战争恐慌已被抛进了古代历史。 [1]

另一方面，中国问题仍然是令美国失望和棘手。抽象地说，美国人对中国人极为爱慕，但是 20 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使他们恼火。中国人不断地提出不现实的要求。他们不断地破坏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和法国人于大战后辛辛苦苦在东亚建立起来的秩序。尽管于 1927 年创建的国民党政府作出过允诺，但是中国人仍然需要统一。国民党与共产党依然不共戴天，而国民党内

部的派别活动不断威胁着南京蒋介石政府并且有可能脱离它另立政权。在华的美国人几乎和其他列强在华人员同样地蔑视中国人。［2］

在关东军进攻沈阳前夕，当预示事态的隆隆炮声传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耳中时，他迅速将情报传递到了华盛顿。美国驻华公使一直在为因满洲问题而引起的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伤透脑筋。然而，在华盛顿，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和他的总统赫伯特·胡佛却被国内的经济困境弄得心事重重和不知所措。在满洲，美国很少有实质性的和显著的利益，而美国政府并没有一个应变的计划来对付那里出现的危机；结果也就拿不出任何对策。当日本发动进攻的消息打破了胡佛政府的沉闷空气时，史汀生同情中国，胡佛却偏袒日本，但是他们两个都希望息事宁人。谁都不欢迎这种令人心烦意乱的事，因此他们都带着一种在绝望中产生的信念，即相信这只不过是一个孤立事件，而且币原很快就会自行克制的。［3］

史汀生和胡佛是制订美国政策的关键人物，他们都既主观又固执，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不愿倾听和接受与自己直觉相左的建议。他们都曾在东亚逗留过几年，并且在该地区游览过，史汀生在菲律宾，胡佛在中国，他们自信对亚洲文化和史汀生所谓的“东方精神”十分理解。尽管史汀生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K·霍恩贝克关系密切，而胡佛偶尔也向曾任驻日大使的副国务卿威廉·R·卡斯尔请教，可是他们两人对亚洲问题专家的建议都不十分相信。

史汀生是把美国当作中国的支持者这一神话的典型牺牲品。在他的想象中，美国是唯一支持中国人民的国家，并且认为中国人也是那样看待美国的。他对中国未来的设想是，它将按照美国提供的模式并在无私的美国人的指导下实现现代化。有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在中国的危难时刻给它支援。有时他指出，不援助中国将使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亲善关系毁于一旦，并且将损害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位。而在更多的时候，史汀生对他的国家在维持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使命的看法与伍德罗·威尔逊的观点非常相似，即新秩序决不能容忍像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那种野蛮侵略。［4］

霍恩贝克，一位罗兹学者[①]，曾在中国教了几年书，结果赢得了亚洲问题权威这一学术荣誉。1928 年，他辞去了哈佛大学的研究职位，进入了国务院并一直受雇至 1947 年。他不赞成史汀生对中国采取家长式作风的主张，而是对中国人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所作的努力抱疑虑的态度，因为这些条约保证了美国和其他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他对日本存有更大的疑心，因为日本使美国失去了在东亚的良机并且显示出了可以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造成威胁的力量。虽然霍恩贝克与史汀生的关系从不密切，但是霍恩贝克强化了国务卿的观点，即把日本人侵满洲看作是对战后形成的条约体系的破坏，因而是企图动摇国际新秩序的一种威胁。霍恩贝克还促使史汀生加深了自己的忧虑，即英国或国联将会把解决正在冒头的东亚危机的责任强加于美国。［5］

尽管胡佛让史汀生充分发挥主动性，但是他对于中国、中国人和美国在亚洲的使命的想法比史汀生实际得多。他在中国的岁月因义和团运动而结束，这使他对中国人持有偏见，同时对那个国家的困境也丝毫不予同情。他

[①] 获得过罗兹奖学金的学者。罗兹奖学金是根据英国政治家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I John Rhodes）的遗嘱于 1902 年设立的。——译者注

对于分裂与混乱状态缺乏耐心。另一方面，他对日本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方式极为赞赏，并且认为他们的做法证明他们是一个力求上进和高效率的民族。此外，由于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迹象使他忧心忡忡，他就接受了如下意见：日本的侵略遏制了共产主义。他与史汀生最大的分歧或许就在于他们对这一危机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危害这一问题的根本看法各不相同。胡佛决不会为国际秩序的抽象概念、也不会为对美国人民的自由和经济前景没有直接威胁的任何东西去冒险进行战争——同时他在东亚事态中并未发现诸如此类的危险。［6］

卡斯尔仅当了几个月的驻日大使，但是他回国时却坚信，日本在东亚称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将会维持秩序并且阻止共产主义。他很早就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是无可非议的，并且坚持说，日本要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就必须防止共产主义威胁。在他的概念里，“共产主义”威胁似乎包括中国人民为维护自身权利和恢复国家主权所作的任何努力。随着危机的加深，卡斯尔想到了总统的观点，于是便设法去约束史汀生那种为中国人着想的冲动，去抑制他对日本的怒火，同时又支持总统不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想法。［7］

史汀生了解币原，并且深信他具有和平的倾向，故而决定给日本外相和他的首相若槻礼次郎一个停止军事冒险主义和重新恢复原状的机会。他担心，美国或其他列强如果作出强硬反应会促使日本走上沙文主义道路，而那样只会使日本军界的极端分子得益，使日本民间的温和主义者受损。最初他反对国联秘书长所提出的关于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去满洲的建议，而主张向中国和日本政府发出一份措词温和的照会，要求它们停止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东京作出了保证，即日军将尽快撤至铁路地带。9 月 30 日，国联理事会接受了日本的保证，并且决定先对事态发展作为期两周的观察，然后再进行讨论。此时，只要币原能够控制住军队，危机将会消除。然而他没有这个能力。

10 月 8 日，日本飞机轰炸了远离铁路线的锦州，这表明军方不再理睬东京政府，而是企图将所有的中国军队赶出满洲。史汀生不得不重新关注东亚的事态。此后不久，他说服了胡佛，让驻日内瓦总领事普伦蒂斯·B·吉尔伯特去参加国联理事会——这是第一个以官方身份参加国联讨论的美国人。17 日,美国和国联提请中国和日本政府注意它们对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所应负的责任。19 日，胡佛内阁被迫发表了声明。

史汀生和胡佛仍然不打算放弃对币原的依赖。可是，美国已经面临抉择的地步了，即如果日军不理睬若椒政府而占领了整个满洲，美国该如何作出反应。史汀生、胡佛和他们的主要顾问都意识到满洲对日本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体会中国的抵抗惹得日本多么恼怒，但是甚至连胡佛也认为关东军的行为是残暴和不道德的。日本人违反了他们根据 1922 年的九国公约和 1928 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所作出的保证。另一方面，并没有人指出美国在满洲的重要利益受到了威胁。此外，要与日本对抗，显然缺乏军事力量。

1910 年，在相似的情况下，西奥多·罗斯福曾力劝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要与日本人对抗。罗斯福坚持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满洲的利益却“不致于使美国人民甘心情愿冒战争风险来进行争夺。”［8］美国缺乏在满洲对日本挑战的力量，故而最好还是听之任之。而

塔夫脱的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却不能接受罗斯福的看法。诺克斯坚持认为，满洲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支持者，因此不应该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默许的态度。他必须在开战还是放弃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可是，面对日本日益猖獗的侵略行动，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在塔夫脱的时代，未能寻得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胡佛毫不动摇：他不准备诉诸武力。美国对中国无需承担任何义务，美国无需发动战争或冒战争的风险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他排除了可能导致战争的任何经济制裁措施。然而，无论胡佛还是史汀生都和诺克斯一样，决不会无视关东军的所作所为。10 月，他们同意让美国与国际联盟合作，共同开展一场道义劝告运动，同时又要防止国联设法把领导责任推卸给美国。21 日，国联规定 11 月 16 日为日军撤至铁路地带的最后期限。［9］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而一切迹象都表明日军打算无视国联的最后通碟。在美国国内，战后在对外政策问题方面一直左右着美国公众舆论的和平运动分子非常活跃，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以及以和平体制的威胁。史汀生和胡佛同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一样，绞尽脑汁仍找不到制止日军的办法。11 月初，胡佛提出了一个想法，即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承认日本所占夺的中国领土。政府内外都曾有人产生过类似的想法。结果并未采取行动。［10］

华盛顿仍然固执地将希望寄托在币原身上，以为不管怎样他总会占上风，因此美国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但是随着 11 月份一天天地过去，日军的行动在满洲不断扩展。客观事实迫使史汀生逐渐认识到，无论九国公约或是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都不能遏制日本,同时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成员国的义务放在眼里。史汀生想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一暴行。他有时考虑采取经济制裁，但又怀疑日本是否会屈服于这样的压力，还担心这样做是否正当，要冒什么风险。而胡佛坚信，经济制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因而此事不可尝试，这又加深了史汀生的疑虑。在日本政府于 11 月底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而国联理事会决定派遣后来被称为“李顿调查团”的时候，那种因美国软弱无能而产生的绝望情绪才稍稍有所缓和。史汀生赞扬了理事会的工作，保证美国将尽力支持，并且满怀希望地重新开始等待。但是，12 月 1 日，若椒内阁辞职了，币原的外交时代从此结束了。新的政权很快便同意了军方的计划：占领整个满洲和处于内蒙古的邻近省份热河。［11］

到了 1932 年 1 月的第一个周末,日军已经把中国军队赶出了满洲并且占领了长城边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山海关，同时也作好了继续入侵华北的准备。美国公使馆所在地，旧都北平，距之不到四百公里。中国军队能够阻挡住日本人吗？史汀生在绝望中再次想到了不予承认这步棋。1 月 7 日，美国政府分别向中国和日本政府发出同文照会，宣称它拒绝承认满洲局面的合法性，并且不准备接受那里所作出的任何有损于美国及其公民受条约保护的权利的安排，“包括那些有害中华民国之主权、独立或领土与行政完整有关的安排。”后来这被称为“史汀生（或胡佛-史汀生）主义”，这个照会成了美国领导人的一帖良心安慰剂，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无所作为，不愿采取更大胆和更有效的行动来援助中国。三个星期之后，日军进攻上海。［12］

日军对上海的进攻，迫使美国和平力量强烈要求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对于此举的作用，运动的组织者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同样感到没有把握，但是他们比总统具备更大的紧迫感。如果允许日本违反它参加国联时自愿承担

的义务和践踏它在九国公约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上的签字,和平体制将遭到破坏。和平组织领导人还担忧，若不能制订出一项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方案就会被视为软弱无能，其结果将对那些坚决主张加强美国军事力量、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支精锐的美国军队的人们丧失影响。主张参加国联对日经济制裁行动,参加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字国对侵略者联合经济制裁和美国对日货进行抵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和平运动的领导人是所有这些运动的先锋，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的多萝西·德策尔、国际联盟协会的克拉克·艾克尔伯格、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的雷·牛顿以及世界和平基金会的雷蒙德·里奇。 [13]

受大萧条折磨的美国公众很少关注满洲事态，而与此相比上海危机则大大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美国在华人员绝大多数居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轰炸这座城市将对美国公民和他们的财产造成直接威胁。而这一点在日本军队开始撤离沈阳时，几乎没有人想象得到。甚至连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W·拉蒙特——日本在美国商界最有势力的朋友，也不愿意宽恕日本对上海的进攻，尽管他曾经认为满洲危机的责任应由中国承担。当拉蒙特对币原、并上準之助和团琢磨将掌权主管新日本一事丧失信心之后，他就准备与史汀生合作，而不是像 9 月以来那样一直在暗中破坏国务卿所作的一切努力。 [14]

然而他们能做些什么呢？拉蒙特通过自己的渠道警告日本领导人，而史汀生则直接提出抗议。当然，史汀生对美国甚至世界公众舆论的作用不再抱有很大的信心。他竭力主张在上海加强美国舰队的力量，并且派遣海军陆战队，一方面去保护那里的美国人，另一方面向日本表明，美国不准备放弃其统治太平洋的抱负。而美国海军将领们则忧心忡忡，担心日本一旦袭击它们，美国海军并无抵抗的能力。卡斯尔甚至在上海危机中也对日本人的抱怨表示同情，并且坚持认为，对在华美国人员的安全来说，中国人是更大的威胁。史汀生的立场得到了美国驻华公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间接但有力的支持。约翰逊警告说，如果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人就可能发起一场义和团式的运动，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外国人。胡佛支持了史汀生的要求，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部队开进了上海。 [15]

日本人在继续进逼，对西方政府和国联的抗议不以为然，对国外的愤怒指责虽感恼火却又无动于衷。美国民间为组织对日经济制裁所作的努力未能赢得足够广泛的公众支持。在华盛顿，胡佛依然保持着坚决与日本对抗的情绪。由于它未能找到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适当办法以及害怕反日情绪可能导致战争，和平运动渐渐地低落了。史汀生还在继续努力，试图探寻出一种既能使自己问心无愧、又能不姑息日本侵略者、还能在两次大战之间维护和平体制的途径。

1932 年 2 月 23 日，史汀生改换了方针。经胡佛同意，他给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提请人们注意，日本同英、美一样，在 1921 至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所精心达成的几个条约上签字时曾经同意承担各项义务；另外，有关各国曾经签订过关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长期协定。他呼吁所有国家同美国一起拒绝承认由违反这些协定而作出的一切安排。史汀生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违反了尊重中国领土的条约款项，美国就不必再遵守对海军规模的限制和不对它的太平洋岛屿加强防御的诺言。 [16]

史汀生未曾从国联理事会成员国，特别是英国获得过他所希望的支持。

欧洲各国首都也充斥着不愿意为共同利益承担风险的人。许多人同情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恼怒，此外大多数人知道日本有力量在东亚称霸而且显然想凭借这种力量来夺取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包括币原，都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人认为，为了维护他们的民族在满洲的利益，美国人有必要冒同日本交战的危险去帮助中国人。总的情况是，与西奥多·罗斯福向塔夫脱和诺克斯所提出的建议极为相似的一种现实主义十分流行。尽管如此，到了 3 月份，国联还是认可了史汀生与胡佛提出的不予承认的政策，然而这样做已经太迟了，而且也不足以阻止日本建立满洲国傀儡政府。

可是到了 5 月，日军撤出了上海，与其说这是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倒不如说日本军方首领本来只不过想血染一下那座城市以吓唬那里的中国人，因为他们胆敢破坏日本人在上海的利益。中国人意外强烈的抵抗使日本军方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延长了原来可能只是一场小小的惩罚性远征，而这场远征的初衷只是想提醒议会：日本海军也在保卫帝国的荣誉。要是日本人另有打算的话，根据他们在满洲战役中的表现，看来史汀生的威胁或者国联的温和行动都不可能阻止他们。史汀生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是否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胡佛和卡斯尔很快就澄清了这一问题。

到了 5 月份，胡佛行事时总把眼睛盯住 11 月的大选。他从来就不愿意用武力或者进行经济制裁，因为他相信了那将导至战争的劝说。史汀生的讹诈使他感到不安，于是在 5 月份，当史汀生在国外时，他就授权卡斯尔明确扼要地声明，美国人民和日本人都可以放心，美国将只通过公众舆论这一道德力量来支持胡佛-史汀生主义。胡佛唯恐他的旨意还不为世人所理解，便提出进一步削减美国海军力量，希望此举能促使日内瓦世界武器控制会议获得成功，并且进而使他赢得诺贝尔和平奖。 [17]

日本从上海撤军有效地中止了危机。日本对满洲实行了全面控制。大多数日本人，不论是军方的还是民间的，均感满意。帝国的统治看来是稳固的，只有少数空想家要求进一步扩张。甚至在军方加紧对国内的控制，屠杀和威吓反对派领导人的时候，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已经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经济，至多是欧洲事态等比较一般性的问题上去了。有些人安于不惹事生非，还自我安慰地认为到一定的时候日本人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几乎只有史汀生一个人依然郁郁沉思。

由于出现了新的棘手情况，胡佛不可能把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东亚事务上。当然，卡斯尔和拉蒙特自然是想劝说他朝相反的方向行事。史汀生不想触犯日本人，他从美国新任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的报告中很清楚地了解到，甚至那些对美国最友好的民间领袖中也产生了愤怒情绪。但是，如果违反条约的行动不受惩罚，侵略者不担心遭到报复，在这样的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呢？他是否能设法放宽 1924 年的移民法以便向日本人民表明,美国人反对的是侵略行为，而不是日本人呢？他怎样才能对日本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呢？如何在战争和绥靖之间作出抉择呢？如果不教训一下日本军方，对日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呢？如果美国人不尽力帮助中国人，还有什么能使中国朝美国式的民主发展呢？ [18]

史汀生继续指控日本人破坏了和平体制，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希望成为泡影。他成功地设法使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作出保证，让他继续进行以往的探索，然而实际上他所取得的成功主要是表面上的。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们逐渐开始对史汀生持批评态度了，这特别表现在日本侵

占越南后针对美国的自我吹嘘、伪善作风和家长式统治所作的嘲讽之中。分析家们对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和根据慕尼黑事件所进行的推理深表怀疑。他们坚持认为，对日本侵略者的惩罚行动看来并不能威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前有些作家认为美国卷入东亚事务是一大失策，他们经常涉及的主题又重新引起了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幻想在亚洲冷战中破灭了。克里斯托弗·索恩的《权力的限制》一书是对东亚危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此书断定史汀生是错误的，同时对英国的政策也进行了些批评，但是却明显地赞赏英国人的慎重。沃尔多·海因里希最后指出，“看来无论什么人都不会马上出来为亨利·史汀生辩护。”[19]

显然,美国在冷战中滥用权力的事实促使新一代学者去推翻40年代的定论。人们不赞同史汀生关于一个大国有责任为和平解决各种争端而进行活动的观念，不欣赏他因美国未能援助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而抱有的强烈内疚感，也不喜欢他认为必须使日本军队信誉扫地的想法，相反谴责他是迪安·腊斯克的先驱者。现在，赫伯特·胡佛成了新的英雄，他认为美国并不值得为在亚洲的利益而开战，并且竭尽全力来降低军事开支。

（三）

1931年1月，史汀生与当选的总统罗斯福会面时，要求罗斯福赞同他指控日本的政策和号召世界舆论反对日本侵略的尝试。罗斯福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表示，他同史汀生与胡佛一样，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非常愤慨，而且确认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对日本进行谴责。他声称，日本的对外扩张似乎是一名哈佛大学的日本学生1902年对他略述的一份行动计划相吻合。他对日本存有疑心，而且热衷于援助中国。[20]

史汀生离开海德公园时兴奋不已，认为罗斯福比胡佛更支持他的做法。针对那些力图使美国不卷人东亚事务的助手们，罗斯福概述了他与中国之间存在的、亲属般的关系，可能正是这种关系注定了他要对中国的困境持同情态度。虽然他并不想冒与日本开战的风险，但是他发现除了支持史汀生之外别无他择。作为总统，他也将实行同样的方针。[21]

可是，与胡佛在1931年的处境一样，罗斯福有着比满洲的命运更为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而满洲问题到1933年3月似乎已经妥善解决了。国际接受了它派往满洲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尽管报告基调温和并且对日本能容忍种种指责的态度表示欣赏，但是日本还是退出了国联。当新总统一心推行他的“新政”以结束大萧条时期和拯救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东亚的一切显得十分平静，至少对美国公众来说是如此。他丝毫不想与日本发生什么纠葛，而且连续几年不愿意援助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相反，他在白宫的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偏向于采纳他的亲戚特迪的方针，对日本进行绥靖而不是对抗。

整个罗斯福时期的社会环境与美国在满洲事态前夕的背景不同，因此总的来说对日本是持否定态度的。若槻内阁之后的日本军方政府和文官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使得由币原和井上在20年代所赢得的信誉丧失殆尽。很少有美国人为日本人在中国、甚至在日本的行为辩护，一旦有谁这样做，就会被怀疑是接受了日本人的贿赂。然而在30年代中期，中国人也难以赢得美国人的同情和尊敬，而部分的原因只是美国人自己困难重重，无暇顾及中国。那些对

中国事务有着职业兴趣的外交官、军事人员、商人和学者对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内乱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别争斗感到沮丧。中国方面多次表示，美国有义务援助他们，而他们本身却几乎不作任何努力来进行自救，这使美国负责监督中国事态的官员，例如霍恩贝克和约翰逊，越来越感到恼火。中国在面临日本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四分五裂，这比中国的衰弱更令人蔑视［22］。

如同 30 年代初期一样，30 年代中期，除了各种和平运动组织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外交事务。但是，它们的领袖已经丧失了对中国或其他任何遭难的国家进行援助的兴趣。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体制未能阻止日军的暴行，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幻灭，而使另一部分人感到惊恐。到了 1933 年，使美国成为战争局外人的决心代替了对维持世界和平这一责任的关注，这可能是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更为有限的目标，和平运动领导人，特别是防止战争全国委员会的德特塞尔和弗雷德里克·J·利比，感到有必要软化潜在敌人的形象，同时玷污那些有可能吸引美国救援的国家的形象。就东亚的情况来看，这就意味着闭口不去批评日本。而 1931 年和 1932 年，德特塞尔在批评日本的时候表现得无所顾忌；同时则要集中注意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如何不值得信任。正如赫斯特和海军联盟的宣传那样，日本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被一笔勾销了。由于南京政府的腐败和独裁，中国希望获得同情的要求被吞决人。［23］

在 30 年代中期，罗斯福无暇去仔细研究萨姆·德拉诺浪漫的中国之行。或许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怀着对中国的同情，然而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对制订和执行政策有任何影响。相反，他明确提出，中国人必须在美国政策对他们不利的时候能够保护自己。他既不对中国人耍家长作风，也不承诺美国将成为中国的后台。无数迹象表明，他对日本的疑虑日益增强。他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任助理海军部长时形成的观点又重新占了上风，而这种观点与史汀生的十分相似，即美国与日本总有一天要开战。［24］

总之，在对外政策方面要作出决定时，罗斯福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少数几位可信赖的朋友的建议。他并不尊重他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很少与级别低的东亚问题专家们接触。格鲁与总统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认识的，他至少可以直接写信给总统，不过他对总统却没有特殊的影响。但是，罗斯福对于日本军队的实力了如指掌，并且表示要尽快加强美国海军。1933 年，他开始实施自 1916 年威尔逊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扩建项目，对于其他问题，他几乎没有兴趣，于是便让赫尔和霍恩贝克去处理东亚事务，直接事态的发展使他相信东亚事务的重要性已经到了非他过问不可的时候为止。

赫尔对于中国或日本了解甚少，然而对于如何适当处理国际事务却经验丰富。不过，由于日本的军事优势令罗斯福十分担忧，赫尔不得不放弃威吓日本的念头。赫尔非常信赖霍恩贝克，而霍尔贝克于 30 年代中期对日本违反条约义务和破坏国际秩序的暴行似乎并不关心，当时他十分倾向于设法使日本在中国陷入困境的主张，并且认为那样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想从令人不愉快和不可救药的现实中创造出实在的利益。

大萧条问题、广大民众和社会名流的情绪、总统应优先考虑的事项、对美国相对虚弱的感觉以及政府主要官员的想法全都表明美国为何对日本在华的帝国主义行径采取默认的态度。在 30 年代中期，亨利·史汀生保持缄默，

可是没有耶利米式[1]的人物会站出来警告美国人：如果他们置之不理的话，国外的事变将给他们带来危险。

1934 年初，美国对东亚的政策是根据“天羽主义”而制订的。“天羽主义”是日本政府发布的一项宣言，它声称，日本对该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因而反对任何外来的对华援助，无论在资金上、军事上、还是技术上的。英国要求日本对宣言以及宣言与《九国公约》的关系给予澄清，这就迫使犹豫不决的赫尔不得不敷衍地发表一项保卫美国在华利益的声明。尔后赫尔求助于霍恩贝克，请他为

贯彻避免与日本进一步摩擦的政策制订一项方针。经总统同意，国务院此后就以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主要宗旨是避免与日本冲突。美国政府将不再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而将仅仅通过中国银团向中国提供贷款，而日本在银团里具有并且始终可以执行否决任何贷款提议的权力。美国人在中国充当军事顾问会感到十分泄气，同时对华武器与军火的出口也将受到严格的控制。新的技术援助项目将经过检查以确保它们不会激怒日本人。在援助中国方面，美国不会做任何有损于日本的事。［25］

日本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反应使史汀生感到十分忧虑。罗斯福向史汀生保证，他将一如既往赞同史汀生的看法，即日本野心勃勃，必须在日本企图控制整个西太平洋，甚至西太平洋东部边缘的墨西哥与秘鲁之前将它制止住。但是，总统仍然忙于处理国内问题，而更确切地说，他认为只有等美国海军力量大大加强之后才能与日本对抗。［26］

然而，罗斯福坚持要等待美国海军的强盛，这很可能是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总统显然决心要加强美国海军以便能与日本海军相互较量。在国内，有两种人反对他增加政府支出，有些人认为削减政府预算能摆脱萧条局面；另一种人是和平运动参加者，他们继续在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中起着支配作用。在战术上，他支持裁军，这是与 1921—1922 年华盛顿会议后开始执行的《限制海军条约》相一致的。可是，在整个 1934 年中，他怀疑日本会抛弃那项条约。1934 年 12 月，日本一旦这样做了，发起军备竞赛的罪责就落到了东京头上，而罗斯福于 1935 年初成功地为海军争取到了一大笔拨款。如果日本想要对抗，罗斯福政府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总统甚至正在考虑横跨太平洋来扩展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等问题了。［27］

罗斯福的反应虽然是针对下列情况的：日本日益加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日本施展权势的能力也不断在加强，它的权力不仅仅局限在东亚，而且已经在向夏威夷和阿留申群岛等美国属地的方向发展。而他对日本继续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行为不作任何反应，尽管他可能会注意观察那里的事态发展，但是目的只是为了测定日本扩张行动的时间安排。

1934 年，紧接着天羽声明发表之后，罗斯福对美国白银政策的处理最能说明他为何对中国的困境漠不关心，而且，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日本抛弃了《限制海军条约》。尽管有人曾警告说，如果《购银法案》获得通过的话，将会吸干中国的货币储备并且损害中国的经济结构，而这一立法通过高价收购大量白银，仅仅是为了取悦国内的白银集团，可是国会还是于 1934 年 6 月通过了该法案，并经总统签署使之具有法律效力。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此事在中国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中国银元跨越太平洋向东滚滚流去，

---

[1] 耶利米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希伯莱预言者。——译者注

造成了通货膨胀，信用紧缩和严重的衰退。［28］

中国政府恳求美国进行援助，同时关心南京出现反美情绪的报告也传到了华盛顿。赫尔和霍恩贝克力图作出友好的反应。他们尽管不想冒犯日本，但是也并非一定要采取反华政策。他们呼吁总统停止或者减少对白银的购买。然而，这个问题也牵涉到财政部，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比赫尔更容易接近总统。摩根韬和他的僚属们建议，为避免与白银集团发生矛盾，就借钱给中国进行货币改革，而这项政策很可能会激怒日本人。为了使中国避免遭受损害，美国是否甘冒与国内白银集团或日本对抗的风险呢？总统必须作出抉择。罗斯福选择了既不冒犯日本，也不得罪白银集团的政策，这就意味着继续执行有害于中国的政策。他宣称，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他们完全能够阻止白银外流，只要他们确实想这样做……不能仅仅因为中国人无法保护他们自己而要我们改变政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坚决抵制与他相反的意见，甚至坚持认为白银采购政策也已经使日本受到了损害。［29］

1935 年底以前，中国被迫放弃了银本位制，而罗斯福对中国所采取的那种温和态度之所以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仅仅是由于包括白银国有化在内的货币改革方案取得了暂时的成功。摩根韬劝说总统允许财政部大量购买中国的白银以帮助中国稳定新的通货。当时正值改选时期，罗斯福盼望组成一个比较倾向于“新政”计划的最高立法机构，并且清洗民主党中的不忠诚分子。中国无法赢得他的注意。而他对日本人也只是略加注意而已。

1935 年和 1936 年，日军继续蚕食中国领土。东京的那些空想家正做着如下的美梦：通过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日本将把中国及其南部邻国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争夺出来，并把它们并入日本帝国。而美国人对这一切装着视而不见。中国人对事态的发展一清二楚，并抱怨美国不给予支持，甚至是道义上的支持也不给，这使得约翰逊和霍恩贝克恼怒不堪。他们表示，该为中国做的事已经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由美国自己来确定，而其内涵远不止援助中国一事。［30］

1936 年 12 月，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当那里的战争加剧时，美国认为至少可以有限地表现出更多的同情。蒋介石针对毛泽东率领的向陕西省进军的“长征”部队加紧开展反共运动。一心想把日本人从家乡赶走的满洲部队却被派去与共产党作战。十分明显，共产党关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应该共同抗日的观点会使他们动摇。关于蒋介石军队和毛泽东军队暗中往来的传闻使得蒋介石飞往西安给部下打气。蒋介石抵达西安后不久就被要求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将军们软禁了。在谈判过程中，蒋在同意建立联共抗日统一战线之后才获得释放。中国出现了统一的迹象，而美国外交家们都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对中国进行有效援助的前提。这件事至少掩盖了美国曾经明显地为自己不采取行动而文过饰非的事实。或许中国人准备自己起来战斗了。

当北京附近一场小规模冲突于 1937 年 7 月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争时，美国的反应仍然令蒋介石、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美国朋友大为失望。美国政府被和平运动吓倒了，因此不敢采取任何有利于中国的行动。整个美国充满了中立和反战的情绪。许多美国人，可能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介人世界大战是错误的，而 30 年代中期的保持中立的立法反映了他们不愿意重蹈覆辙的决心，未能阻止日本占领满洲所产生的幻灭感，影响了对 1937 年事态发展的预测。

罗斯福仍然想帮助中国和遏制日本。他对中国的不幸感到遗憾，并且可能把日本的侵华行动看作是日本控制东亚计划的另一个方面。他怎样才能在既不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对又不激怒日本人的情况下向中国提供援助呢？他怎样才能打击日本但却避免遭到灾难性的反击呢？他一度考虑过用扩大美国领海的手段来阻止日本的东太平洋捕捉蛙鱼。最后，他寻得了一个温和的、不会触怒双方的办法：他将那些不向交战双方销售武器和军火或者不让交战双方延长贷款以及不用美国船只与交战双方进行贸易的中立法束之高阁。罗斯福认为，这样他就能援助遭到日本突然袭击的中国人了，因为他们与侵略者不同，十分需要从国外购买战争物资。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勇敢地面对和平组织，并且没有屈服于他们的攻击。 [31]

罗斯福不得不集中关注东亚事务，但是正如史汀生在 1931 年和 1932 年那样，他对无法在承担风险还是默认日本的侵略之间作出抉择而感到苦恼。他和史汀生一样，也曾冒出过实行经济制裁的念头。而与史汀生不同的是，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日本政府抱有良好的意图。正如欧洲的和平希望黯淡时，中国的战争又日益升级了，这就使罗斯福和其他人不得不考虑美国所面临的危险。显然，正如胡佛于 1931 年所论证的那样，美国在满洲、继而在华北、埃塞俄比亚，或者西班牙，以及如今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有限的实际利益并不值得承担战争的风险。但是战争暴行正在蔓延，必须采取行动来阻止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由于国联未能妥善处理 PGN0019.TXT/PGN>满洲危机，集体安全的主张一度声名扫地，可是当时又重新涌现出来了。

当罗斯福同那些渴望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渴望回到一个像 20 年代那样国际秩序貌似安全的时代的人们交谈之后，就决定发表他那著名的有关“隔离问题”的演讲。他想提醒美国人民警惕他所意识到的危险，并且希望他们支持政府使用非交战手段来惩罚日本人。面临着“肆无忌惮这种全球性瘟疫”，对染上这种瘟疫的人实行隔离或许能够保护全球社会。他没有什么计划，而当人们问及他的话有何言外之意时，他则以特有的含糊其词来作答。不管怎样，这次演讲得到了集体安全的鼓吹者的喝采，甚至像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这样有影响的和平主义者也受到了鼓舞，认为有可能用和平的手段来制止日本了。尽管罗斯福的演讲得到了公众强烈的支持，但是他却后退了，因为他提不出任何方案，既可以避免战争的风险又强硬得足以制止日本，他是这样劝说自己的，即公众支持使用强制性手段来抗击日本与公众坚持避免与日本作战是互相矛盾的，而随着风险的增加，人们将不再支持使用强制性手段。[32]

史汀生要求罗斯福带头抗击日本，理由是中国正在为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利益而战。总统告诉赫尔，他同意史汀生的意见，但却仍然表示无法寻得恰当的方案。英国期望美国能起更积极的作用，而罗斯福于 1937 年 11 月的布鲁塞尔会议前夕对伊登的警告使这种期望破灭了。他说：他不会允许英国把美国推到前面。显然，他担心自己已经冲出得太远了。布鲁塞尔会议的与会者讨论了日本的行径对《九国公约》签约国的影响，但是并未寻得任何对策。罗斯福的注意力又转回到国内问题上去了。[33]

12 月，日本人故意击沉美国“帕内号”，制造了一起极端挑衅性的事件。当时罗斯福正在国内忙于对付动摇自己统治的种种威胁，而这一事件迫使他不得不抽出身来。他怒火冲天地与内阁讨论了采取经济制裁、甚至讨论了动用海军等问题。他坚持认为，英美联合进行封锁将在一年内使日本屈服。但

是，民意测验表明，他的人民要求用战舰来教训对方，以便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结果，日本人很快就作了道歉和赔偿。事情就这样过去了。[34]

然而，对于罗斯福来说，“帕内号事件”似乎是一个转折点。他下令开展一场运动，对美国人民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特别是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对美国人与美国财产的侵犯是蓄意的行为，而不是在对华作战中偶然发生的。罗斯福要国务院在美国人或他们的利益在中国受到损害时，不断地提出抗议，在这一点上他与史汀生非常相像。美国政府竭力反对日本在东亚建立新秩序的要求。同时，罗斯福一直在寻求一种既不明显地触怒日本人而又不引起美国人民担忧的途径来援助中国人。[35]

事实证明，1931 年的情况基本上是令人十分沮丧的。日本人在中国不断推进，轰炸平民百姓，来不及逃走的人遭到残酷的虐待，而罗斯福却不知如何行动才好。在不引起恐战情绪的前提下设法唤起对中国的同情的任务主要是由美国抵制日本侵略委员会去完成的，而该委员会是一些曾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于年中发起和组织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在那些一心要想方设法惩罚侵略者的集体安全拥护者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促使美国舆论集中在要求停止对日本销售战争物资的问题上。美国人被指控为日本侵略的伙伴，因为他们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物资，这使美国人民感到震动。民意测验显示了上述委员会的工作是有效力的，而罗斯福、赫尔和霍恩贝克也对其成员给予了鼓励。然而，在 1938 年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罗斯福都没有准备对日本实行禁运。如果日本决定交战，美国将会卷入一场边缘战争，而且无法对希特勒德国日益增强的威胁作出反应。[36]

但是，在年终以前，中国人、摩根韬和罗杰·S·格林（前外交官，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于 12 月担任美国抵制日本侵略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项计划，并且得到了罗斯福的热心支持。1938 年中期，格林结束了中国之行，带了一项计划回到美国，这是一项为中国争取贷款和对日本实行战争物资禁运的计划。霍恩贝克和财政部的同僚们向他保证，罗斯福确实想采取行动，但是格林必须动员必要的公众支持。8 月，格林见到了罗斯福，他强调必须贷款给中国以发展其交通事业，而罗斯福则将格林留给他的备忘录传递了下去。摩根韬和中国谈判代表一起拟定了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将借钱给中国去购买卡车及有关的运输设备，以便能帮助中国建立起格林认为所必需的防御设施，因为中国政府已向西南撤退。贷款将以中国生产的桐油作为抵押，桐油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有效的干燥剂和防水材料。[37]

12 月，罗斯福批准了桐油贷款计划，尽管赫尔因担心国内和日本的反应而表示反对。罗斯福甘冒激怒日本人的风险，因为他正确地估计到，日本决不会愿意为一笔数目不大的、以抵押为担保的贷款而与美国翻脸。他准备向日本打个招呼，同时也急于给中国人一些微小的鼓励。或许最重要的是，到了 12 月，罗斯福已经相信，由于格林和他的伙伴们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美国人民会承认这笔贷款既是对中国人的合理援助又不带有挑衅性。随着世界局势的日益恶化，特别是在欧洲，罗斯福开始对国外的威胁作出了更大的反应，而到了 1938 年底，他更自信地认为，美国人民会同意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任何手段去援助被侵略者。而中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受害者，成了第一个受益者。

（四）

从 1931 年到 1938 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生死攸关的。沈阳事件只是暂时地分散了胡佛、史汀生和一小部分美国公众对压倒一切的大萧条问题的注意。同样地、

东亚事务——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战斗——在 1937 年底和 1938 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罗斯福、赫尔以及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上层人物集中注意的中心问题。但是，即便一场重要的战争在中国进行着，罗斯福依然不断注视着由希特勒在大西洋彼岸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怒了许多美国人,而于 3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科学的民意测验又显示了对中国的巨大同情和对日本的厌恶。但是，使罗斯福和舆论界领袖感到震惊的问题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他们日益感到日本和德国正在不断破坏一种世界秩序，而这种世界秩序正是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得以发展的保证。在有关“隔离问题”的演讲中，罗斯福与史汀生一样，也在寻求一种能阻止侵略者的和平手段。在整个 1938 年之中，罗斯福、舆论界领袖——包括和平运动的杰出领袖们——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断定，必须在某处划定最后的界限，而良心和美国利益都要求：对于中国要给予一些援助，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要作出一些反应。从桐油贷款开始，美国，不管多么有节制地，仍然采取了行动。

注　释

[1]诺伊（Charles E，Neu：《动乱的遭遇：美国和日本》（The Troubled En-cou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纽约，1975 年版。这是一篇杰出的评述，特别参见第 102—159 页。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与中国的联系：罗杰·S·格林，托马斯·w·拉蒙特，乔治·E·索科尔斯基及美国同东亚的关系》（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 Green，Thomas w. 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纽约，1978 年版，第 148—160 页。

[2] 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to China），纽约，1980 年第二版，第 124、136 页。

[3] 弗雷尔（Robert H. Ferrell）：《大萧条中的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纽黑文，1957 年版，第 120—137 页。

[4] 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外交政策的范围：西方，国联及 1931—

1933 年的远东危机》（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League of Nations，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纽约，1973 年版，第 55、85、115 页。

[5] 汤姆森（James C. Thomson）：《国务院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载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和岡本春平（Shumpei Okamoto）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日美关系，1931—1941 年》（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纽约， 1973 年版，第 81—82 页。孔华润（Warren I.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第 130—

131 页。

[6] 威尔逊（John Hoff Wilson）：《赫伯特·胡佛：被忘却的改良主义者》（Herbert Hoover ： Forgotten Progressive ），波士顿，1975 年版，第 204—205 页。索恩（Christopher Thorne） ：《外交政策的范围》（Limits ofForeign Policy）第 53、162 页。威尔逊（Joan Hoff Wilson）：《美国的商业与对外政策》（American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1920—1933），波士顿，1971 年版，第 219 页。

[7] 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外交政策的范围》（Limits of Foreign Poli-cy），第 86，157 页。威尔逊（Joan Hoff Wilson）：《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第 204—205 页。卡斯尔致胡佛函（Castle to Hoover），1930 年 8 月 1 日，693． 1115／36，国家档案馆。

[8] 罗斯福致塔夫脱函（Roosevelt to Taft），1910 年 12 月 22 日，载莫里森（Elting E. Morison）等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Letters ofTheodore Roosevelt），第 8 卷，坎布里奇，1951—1954 年版，第 4 章，第 190 页。

[9] 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外交政策的范围》（Limits of Foreign Poli-cy），第 161—162 页。

[10] 弗雷尔（Robert H. Ferrell）：《大萧条中的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第 155 页。

[11] 出处同上，第 138—149 页。莫里森（Elting E.Morison）：《混乱与传统：

关于亨利·史汀生的生活与境况的研究》（Turmoil and Tradition：A

Stud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Stimson），纽约，1964 年版，第 312—315 页。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外交政策的范围》（Limitsof Foreign Policy），第 195—199 页。

[12] 弗雷尔（Robert H. Ferrell）：《大萧条中的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第 150—159 页。孔华润（Warren I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 ’s Response to China），第 131 页。

[1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私人集团在美国的作用》（The Role ofPrivate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载博格（Dorothy Borg）和岡本（Shumpei Okamoto）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 asHirtory），第 421—429 页。

[14] 孔华润（Warren I. Cohen） ：《与中国人的联系》（Chinese Connection），第 181 182 页。

[1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 ’S Re-sponse to China），第 133—134 页。

[16] 出处同上。

[17] 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外交政策的范围》（Limits of ForeignPolicy），第 277、299、306、319、323 页。

[18] 出处同上，第 352—353 页。

[19] 海因里希斯（Heinrichs）：《中国的岁月，1900—1945 年，以及关于美国宽宏大量的东亚政策的问题》（The Middle Years， 1900—1945，

andthe Question of a Large U.S.Policy for East Asia）：载孔华润（War-ren I. Cohen）编《美国-东亚关系的新领域》（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纽约， 1983年版，第98页。

[20] 达利科（Robart Dallek）：《F·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Franklin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纽约， 1979年版，第29—30页。伯克（Robert L. Burke）：《F·D·罗斯福与远东，1913—1941年》（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Far East， 1913—1941），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密执安州立大学，1969年版，第72页。

[21] 达利科（Robert Dallek）：《F·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FDR an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第29—30页。

[22] 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ponseto China），第136—138页。

[2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私人集团的作用》（The Role of PrivateGroups），第429—432页。

[24] 达利科（Robert Dallek）：《F·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FDR and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 75 页。伯克（Robert L. Burke）：《F·D·罗斯福与远东》（FDR and the Far East），第 79 页。

[25] 博格（Dorothy Borg）：《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l938—1938）坎布里奇， 1964年版，第75—88页。

[26] 伯克（Roberi L. Burke）：《F·D·罗斯福与远东》（FDR and the FarEast），第72页。

[27] 出处同上，第77—78页。

[28] 博格（1）Dorothy Borg）：《美国与远东危机》（US and the Far EasternCrisis），第121—122页。

[29] 出处同上，第122—137页。

[30] 出处同上，第315页。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第141页。

[31] 博格（Dorothy Borg）：《美国与远东危机》（US and the Far EasternCrisis），第346 —350页。伯克（Robert L. Burke）：《F·D·罗斯福与远东》（FDR and the Far East），第95—96页，第101—102页。达利科（Robert Dallek）：《F·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146—149页。

[32] 博格（Dorothy Borg）：《美国与远东危机》（US and the Far EasternCrisis），第368—398页。达利科（Robert Dallek）：《F·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FDR and American Foreigh Policy），第149—151页。孔华润（Warren I. Cohen）：《私人集团的作用》（The Role of Pri-vate Groups），第435页。

[33] 达利科（Robert Dallek）：《F·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FDR and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150—153页。

[34] 出处同上，第154页。

[35] 出处同上，第157页，第193—194页。

[36] 孔华润（Warren I. Cohen）：《私人集团的作用》（The Role of PrivateGroups，第435—442页。

[37]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与中国的联系》（Chinese Connection），第213、217页。达利科（Robert Dallek）：《F·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193页。

（张任译任孟超校）

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1934—1937）

汪熙 30 年代在东亚是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从 1931 年起经过周密的策划，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四省，随即越过长城威逼平津，以武力为后盾肢解中国的华北。日本侵略势力所及之处，西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都遭到排斥，这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严重挑战。但是正在这个时刻，美国实行了白银政策。 1934 年白银政策的实施，就其重要性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的范畴。一时间，白银不仅是伦敦和纽约市场上投机的热门货，而且是美国国内政治交易的“筹码”、是东亚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的“武器”。从外交政策的效果来看，美国的白银政策是与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白银政策促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从而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削弱了中国同日本抗争的力量，因而为日本在东亚实行门户关闭政策创造了条件，这正是日本侵略者求之不得的。无怪乎美国的财政部长摩根韬最后承认美国的白银政策正合乎日本人的意图，他甚至认为自己在被日本人当作工具在使用。他说：“假使我是被日本花钱收买的，那末我一直在挣着我的工钱。”[1] 美国的白银政策使我们看到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产物，但是它的影响常及于千里之外的地区，使那些地区发生难于预测的变化。人们（包括美国人自己）常常只有在事后才能清楚地看出这种影响的利害得失和它的作用的广度与深度。更重要的是白银政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那就是美国战前在东亚的一个基本政策——门户开放政策，当它一旦受到国内外因素影响时，常常是非常脆弱和无所作为的，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具有威力或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

白银问题在当时的美国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在 30 年代美国资本虽然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六和白银冶炼的百分之七十七[2]，但在美国国内的生产并不占重要地位。1934 年以洛基山脉为中心的美国七个产银州的人口总数仅占当时美国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受雇于白银工业的工人不到三千人[3]，白银的年产值仅 3，200 万美元，其金额小于花生与马铃薯的产值，当然更不能与小麦与棉花的产值相比了[4]。但七个州在参议院中有十四个人，占表决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而且拥有像毕德门及汤姆斯等这些极富于政治斗争经验的强有力的民主党参议员[5]。这些议员是靠白银做政治资本的，他们能否再当选为议员，就要看他为白银卖力的程度，以白银议员为核心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白银集团的统一战线。白银大亨们迫使政府给予生产白银的大量补贴也被其他的金属生产者（如锌、铅和铜等）所分润，因为一部分白银是来之于生产这些金属中的副产品，因此他们的利益与白银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此外当时颇为盛行一时的通货膨胀派也理所当然地与白银集团结成了天然的联盟。因此，以白银集团为核心而形成的利29PGN0029.TXT/PGN>益集团的声势颇为浩大，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

---

①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白银集团的先生们在为白银的利益进行斗争中，却选中了“中国市场”这个题目，作为他们鼓动舆论，抬高银价的重要论据。他们的“理论”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使用白银为货币的国家，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中国的对外购买力，就会为美国商品开辟一个广阔的市场，美国也就会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30 年代初犹大州的前参议员佳能就宣称由于银价由 1．30 美元下跌为 0．35 美元，“使中国的购买力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因而，几乎摧毁了中国的购买力”[6]。接着，参议员金氏在广播中告诉听众们说，这就意味着失去了“伟大的中国市场”[7]。参议员毕德门断言，如果银价提升，中美贸易可以增加十倍。他认为中国经济通过提高银价而振兴，可以立刻销掉美国过剩的汽车与小麦，从而会使对白银的需求超过全世界银矿可能供应的数量[8]。他们通过报纸、广播、国会讲台、牧师的宣道坛……狂热地鼓吹这个道理。他们这种喧嚣实质上是在为白银集团（包括白银投机者）谋取集团利益。颇具影响的《商业周刊》就曾经这样指出，这些宣传只不过表明“一小帮人，抱成一团，制造喧闹，就能为一些不重要的投机者争取政府的补贴”[9]而已。但是问题还不仅于此，问题在于他们的经济“理论”（姑名之为“购买力学说”）牵涉到“拯救”美国太平洋对岸的中国，而且又反射过来，起着把美国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的神奇作用。白银大亨的经济“理论”却没有为经济学家所接受。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购买力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能力以及出口销售能力，而不取决于它的货币价值。就在白银集团运用它们的理论对罗斯福总统施加压力时，美国经济协会百分之八十五的会员投票反对提高银价[10]；经济学家全国委员会也提出书面建议，主张停止收购白银，他们认为提高银价对美国国内工业和对外贸易都没有好处[11]。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爱尔特及布莱特都指出白银集团所宣传的“购买力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给美国国会作证的信中指出，人为地把银价提高，只会导致中国的经济紧缩。世界银价的提高若不伴随着其他商品价格的提高，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迫使中国只有输出大量白银才能弥补这个差额[12]。（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恩斯的预见不幸而言中，而且比他想象的更糟）。

对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批评，白银大亨们置若罔闻，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假使批评者具有合理而健全的论据的话，那么白银大亨却拥有政治权力和进行货币实验的条件”[13]。1932 年的总统选举，是“权力”与“条件”会合的好机会。这一年的大选，两党都想讨好白银集团，在它们的竞选纲领里都有拯救白银危机的诺言。罗斯福对白银大亨们特别殷勤，为了争取这一部分人的选票，他在竞选时就许诺过“要为白银做点事情”；当选总统以后，慑于这一集团在议会中的势力，更是不敢得罪他们[14]。罗斯福特别害怕白银派议员在参议院的联合抵制会使他一系列的立法方案频于流产。白银派议员当然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政治上的优势。第一个摊牌的是参议员毕德门，当他一再迫使罗斯福提高对白银生产的补贴未能如愿以偿时，他就以不对中立法采取立法行动加以威胁，迫使罗斯福同意增加对白银生产的补贴。罗斯福也以此来换取毕德门对中立法的支持（毕德门是当时参议院很有权威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15]。为了讨好毕德门，罗斯福委派他为 1933 年 7 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这位美国代表，在伦敦会议上为

他心爱的白银没完没了的发言，搞得其他代表们都昏昏欲睡。在会议期间，他曾经手持长刀在他所住的克拉琪旅馆的走廊里忿怒地追击一位被他认为对白银不够热情的美国代表团顾问[16]。拿长刀挥舞的把戏，后来在美国当然没有重演，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确实在国会走廊里不断地挥舞着“白银大棒”，成功地迫使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长摩根韬持续地提高银价。罗斯福总统虽然坚定地否定 31PGN0031.TXT/PGN>

了强制性的白银立法，但是终于从政治考虑，还是同白银大亨们妥协了，它的结果就是 1934 年 6 月 19 日公布的“1934 年白银收购法案”。[17]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美国的行政当局决定采取这一步骤时的完全理解到它可能在国际上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的。但是国内政治因素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罗斯福对白银集团的屈服终于使美国采取了一个严重损伤中国经济，因而也严重损害东亚国际平衡的政策。

根据购银法案，财政部长或者把收购白银的数量达到相当于货币准备金的四分之一；或者通过收购把世界白银价格提升到每盎斯一元二角九分美元的水平。由于黄金储备量在不断地增加，所以构成四分之一的白银储备也相应地增加。从购银法案通过以后（6 月 19 日）到 1934 年底，由于黄金储备量的增加，白银准备的量也增加了 104 倍（由 120 万盎斯增加到 12500 万盎斯）[18]， 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购买白银的压力也不断的增加，也注定着世界银价要不断地上涨。接着罗斯福总统根据购银法的第七款发布了白银国有令，把美国国内银价定为每盎斯 50 美分[19]。与此同时，美国在海外大量收购白银，于是世界银价像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白银投机者像是在同美国财政部比赛，看谁更有能力把银价抬上去。到 1935 年纽约每盎斯的银价已相当于 1932 年的 2．3 倍[20]。当时的评论家以及今天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种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主要是美国人为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两件事：第一，一个仅仅为国内某些利益集团而发生的行为常常会影响、制约、有时甚至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历史的记录表明，白银集团的大亨们为了维持银价或抬高银价，他们的手伸得很长，压力很大，干预的范围也很广。经罗斯福总统同意派遣罗杰斯对远东金融状况的调查，可以因为白银集团的反对而归于无效[21]；中国政府为解决白银危机派代表去到美国进行会谈的建议，也为毕德门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只得作罢[22]。这些出访与来访本来会客观地沟通情况，也许有助于美国调整它的白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的。但是白银集团估计到这些活动可能会阻止银价上涨，千方百计地使它们没有成果或不能实现。毕德门虽然代表美国参与签定了以稳定银价为主要目的的伦敦白银协定[23]，但促使银价猛烈上涨，直接违背国际白银协定精神的也是毕德门。总之，在白银集团看来，白银就是一切，其他都是次要的。尽管从美国的整个国家利益来看，在东亚遏制日本的扩张应该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但是正如我们下面所要谈到的，白银大亨们却忽视了这个重要的政策，而用白银拖垮了中国的经济，从而剥弱一个可以同日本抗衡的力量。罗杰斯教授在亲临中国现场以后，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是一个“不负国际责任”的政策，并且认为“白银集团不久就会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活灵活现的画中小丑”[24]。当然，要说参议员毕德门一点也不关心美国在东亚的门户开放政策，那也是不公平的。1936 年初，他就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激烈抨击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地危害了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演讲。其激烈的程度，甚至使

国务卿赫尔在私下声明毕德门对日本的激烈抨击是同他没有关系的[25]。问题是，毕德门参议员没有意识到，当然也没有人敢直言告诉他，正是他的心爱的白银政策纵容了日本人的侵略，最后使美国利益受到威胁。第二个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白银问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却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白银涨价，调动了很多国家围绕着中国——当时世界上几乎是唯一用银作为货币的大国，采取行动，这些行动都直接关系到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是令人惊异的是，美国当局对白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的严重性采取那么冷漠的态度和反覆无常的政策。 1934 年 11 月 31 日，当白银价格猛升时，国务院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费认为罗斯福“对他自己的行动对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显然漠不关心”。专门研究过罗斯福的新政与白银 33PGN0033.TXT/PGN>政策的作家埃瑞斯特认为“总统本人大概还没有弄清楚提高银价对中国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提高金价之于美国，两者是截然相反的”[26]。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罗斯福在美国的白银政策影响东亚的国际关系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举棋不定的政策，听其自然的做法，都证明赫伯特·费的评论不是没有根据的。而这不能不对当时东亚的时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的困境与美国的反应

由于美国政府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造成世界银价猛烈上升。自 1934 年 9 月以后的半年，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 2，400 万盎斯，到 1935 年 6 月 30 日为止，整个财政年度收购了 29，400 万盎斯。此外还收购了美国银矿中开采出来的 3,100 万盎斯及根据白银国有令收归国有的 11,200 万盎斯[27]。这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投机者与美国政府在抬高银价上面互相竞争的局面。世界银价由美国实行白银国有时的每盎斯 50．0 美分，节节上升，到 1935 年 4 月 27 日最高达 81 美分（伦敦市场达三十六又四分之一便士），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盘旋在 70 美分左右。[28]

世界银价的上涨对中国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仅有的几个实行银本位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银国。从 1931 年到 1933 年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运往中国的白银占这些国家白银输出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五。 1933 年底上海白银的存货（43，934 万盎斯）要占这一年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二点六九倍）[29]。白银是中国通货的基础，流通的筹码，世界白银价格的上升，自然促使中国银价与汇价的上升。但是由于美国的持续收购和国际金融市场投机者的活动，使世界银价上升的速度与幅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因此，中外银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到 1934 年 10 月中旬，每一个中国银元（含银量 0．7555 盎斯），所含的白银价格在国外比国内高出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即使在 1934 年 10 月 15 日中国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仍不能消除中外银价的差额。到 1935 年春，国外银价超过国内银价的幅度已达百分之五十[30]。据 1935 年 3 月资力雄厚的交通银行在各分行的通函中指出，当时白银出口每千元可获利三百至四百元[31]。利之所在，狂澜难挽，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白银外流高潮。当时的白银外流与复杂的国际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中国政府虽然三令五申加以制止，但外商银行因为享有治外法权，并且对白银出口的暴利特别敏感，所以构成了白银外

流的主要渠道。1933 年底止上海外商银行的白银库存是 27，570 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 50．4%。随着世界银价猛涨，外商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 1935 年 9 月只占上海白银总库存的 12．7%了[32] 。所以当时在上海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政府公债价格稳定（华商银行投资的主要对象），而地产价格大跌（外商银行投资的主要对象）、外国银行的资财都尽可能转变为白银流向海外去了。

第二，在 1934 年中国白银出现了先由内地向上海集中，后来又由上海向内地分散的方向相反的两次移动。移动的方向虽然相反，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公开或私运白银出口。这也都是利用治外法权的结果。1934 年 1—8 月，内地白银大量向上海集中（总计 2，969 万元），然后又流向海外追逐高价；但 9 月以后，白银流向突然逆转，从 9 月到 12 月，白银由上海流向内地达 8，897 万元[33] ，比 1933 年内地流向上海的全年总额（8，189 万元）还要多。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 10 月开征了白银出口税，白银开始流向内地，转向日本势力范围影响下的华北，依靠治外法权大量走私出口。

第三，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量白银走私。白银走私的地区主要在北方。走私的路线是偷运出长城，进入伪“ 满洲国 ”境内的东罗城，在北宁线的万家屯车站装运至沈阳或大连，运往日本[34] 。35PGN0035.TXT/PGN>

走私者 95%为日、韩人[35] ，他们首先在银行挤兑现银，并在边境“ 设机关四处专为收买关内现银 ”，然后私运关外，每天私运数约十五万元左右，每月约四百余万元[36] 。据日本自己的统计，仅万家屯车站 1935 年 1—8 月就私运出白银 2，700 万元[37] 。尽管当时中国政府的行政院认为这一猖獗的白银走私情况“ 实属骇人听闻[38] ，也无可奈何，因为整个华北已属日本武装力量控制的特别区域，再加以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奈何他不得；即使抓获走私犯，无非引起“ 严重交涉 ”，一放了之。1935 年 5 月 2 日在北宁线的军粮城车站查获日本人走私银元 8，250 元，虽将人财一并移交给当地海关，仍然引起日本驻天津领事川越茂的强烈抗议，除要求中国方面立即交还拘获的走私人员及现银外，还警告不得“ 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39] 。当时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向行政院抱怨说，遇到这一类事“ 发还[白银] 则有违部令，扣存恐引起纠纷 ”[40] 。真是进退两难，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白银大量外流。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东亚国际均势的极度不平衡。除北方以外，日人在华东沿海（崇明、海州）也从海路组织走私，其数量曾一度达每天二十万两。[41]

在中国白银大量走私出口的同时，日本输往伦敦和纽约的白银猛烈地增加了。若以 1933 年日本白银的净出口额（7，7557，468 日元）为基数，1935 年的白银净出口增加了 29 倍（225，334，664 日元）。同时期，在总额中输往英国的白银净出口增加了 29 倍，输往美国的增加了 71 倍[42] 。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 1936 年才有所下降。日本是一个不产银的国家，1933 年国内仅生产白银 8，037，277 日元[43] ，但 1934 年以后，白银净出口额竟以几十倍的幅度增加，这是一个很异常的现象。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在 1935 年 11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过去三四年间日本每年白银出口只在六百万至九百万盎斯之间。而 1935 年头九个月，他们却输出了六千万盎斯。这些白银只可能是由中国走私到日本的。 ”他认为日本人是在中国银行每盎斯 40．5 美分与世银价 65 美分之间投机牟利[44] 。摩根韬的评论只对了一半。日本白银出口的猛增（1934—1936 年）肯定是在中国有组织的大量走私的结果，这

是对的。但若认为日本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投机牟利，那就不完全了。正如我们下面所要谈到的，日本的这一行动是它对抗西方，削弱中国，实行东亚门户关闭政策的一部分，是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中国的白银通过公开和走私的渠道流向海外的数量是惊人的。从 1934—1936 年中国白银通过海关的净出口额达 42，711 万盎斯，加上这几年走私出口的 21，820 万盎斯，两者共计 64，531 万盎斯[45]，它的去路主要是美国。统计表明，从 1934—1935 年美国海外购银约有 70%来自英国，而英国进口的白银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中国本部或经过日本与香港）[46]。1935 年是美国历史上白银净进口最高的一年（33，600 万盎斯），也是中国历史上白银净流出的最高的一年（21，854 万盎斯）[47]。起杠杆作用就是 1934 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所造成的世界银价猛涨。

美国购银法实施以后，中国白银外流的总数（64，500 万盎斯）约占中国当时白银流通量（128，000 万盎斯）的一半，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原来已经失去平衡的远东局势更加复杂化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白银为交换手段的，一直到 1935 年 11 月以前中国还是一个银本位的国家。白银的减少立即从三个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是由于银价上涨而导致的物价下跌；二是由于白银枯竭导致了信用紧缩，从而促使了利率上升；三是由于货币升值（银价上涨）而带来的中国货币外汇率的上升，窒息了中国的出口。其结果是中国突然面临着一个通货紧缩的危机——工商业调敝，金融衰败，进出口减退，农村破产。全国批发物价指数在 1934 年下降 6.5%，到 1935 年再下降 2.5%。农产品价格 1934 年下降 6.9%，1935 年再下降 3.7%[48]。白银准备的流失迫使银行提高利息，紧缩信用，收回贷款。市场利率在 1934 年 7 月为 5%，到 9 月已达 12%[49]。银价上涨哄抬了中国货币的对外交换价值，因而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出口货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1934 年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出口量只有 1930 年的 21．8%。出口货的价格普遍疲跌。这一年上海输出物价指数狂跌到 71．7%（以 1926 年为基数）[50]。1935 年在物价下跌、利率上升交相打击下，上海一埠工商业倒闭了 1，065 家；全国银行倒闭或停业的 20 家；全国华商纱厂（当时中国规模最大，雇工最多的行业），以纱锭计算，停工的达 60%[51]。由于工厂对原料的需求减少及出口减少，再加以水旱灾荒，农业频临破产，占中国人口 80%、占国民生产总值三分之二的农业产值，由 1931 年的 244 亿元下降到 1934 年（白银开始大量外流的一年）的 131 亿元，下降率在 46%以上[52]。当年，美国的议会里有些钟爱白银的议员们为了“拯救中国”，力主提高银价，有一位议员甚至声泪俱下地描绘出银价下跌的可怕图画，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可怕情景是无法描述的。他们仅有的通货白银立刻贬了值，促使贸易停顿，并在整个省份造成饥馑与千百万人的死亡”[53]。还有一位当时很有影响的鼓动家康克令神父，通过他所控制的有一千万听从的“无线电联盟”不断地鼓吹白银涨价，高喊“美国应当恢复东方的购买力”[54]，1934 年 4 月间他以他的秘书的名义囤聚了五十万盎斯以上的白银。（后来摩根韬经过调查发现，康克令神父所领导的“无线电联盟”的司库柯苓小姐，原来竟是一个白银投机贩子，财政部把她列入白银投机者的名单在报上公布了）[55]。白银集团的先生们为了“拯救中国”，也为了把美国从经济恐慌中拯救出来，总是把银价，购买力、美国货的销路作为无比例的关系联系起来，认为只要银价上涨，中国人的购买力就会提高，美国货就会在中国有更好的销路。为了

争取选票或其他的目的，这的确是很鼓动人心的理论。但是，事实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他们的“理论”却常常与事实背道而驰。1926 年到 1931 年由于世界经济恐慌，世界银价在纽约和伦敦分别下跌 58．8%和 49．7%[56]。但中国是一个银本位的国家，银价下跌，实质上起了一个货币贬值的作用，因而有利于出口，限制了进口。同时，吸引了大量侨汇及白银进口，增加了中国的货币储备，形成一个轻微的通货膨胀的状态。1932 年世界经济恐慌正处于谷底，世界物价指数只有 1926 年的 73%[57]。但同时期内，中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在各地都分别上升了 53%（广东）、25．5%（华北）、26．5%（上海）[58]。在危机的年代，中国进口指数基本与 1926 年相等，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59]。由于中国白银外汇的下跌的程度更低于世界物价的水平，因此银价下跌在当时构成了一个保护中国经济的积极因素，使它避免了一场世界经济危机的灾难。事实证明银价下跌并没有出现白银大亨们所渲染的那种恐怖情景。恰恰相反，1934 年美国白银收购法促使世界银价猛涨以后，中国的“购买力”并没有“十倍地提高了”，而白银大量外流却使中国深深地陷入了经济危机。对外贸易若以 1933 年为基数（12，560 万海关两），1934 年下降为 79．9%，1935 年再下降为 76.3%。进口下降的幅度更大，这两年分别下降为 76．5%和 68．3%（这些数字都不包括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60]。美国对华输出也没有遵照白银大亨们的“理论”办事，1931 年银价下跌时美国对华输出为 9，800 万美元，但在银价猛涨的 1935 年，美国对华输出却下降为 3，800 万美元（下降 38．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是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不受银价上涨的影响，所以同期内美国对日输出额却增加了 30%（由 15，600 万美元增至 20，300 万美元）[61]。由银价上涨而引起的中国经济困难，使美国在华企业也难逃厄运。1935 年 5 月美国在华三家企业：美国东方银行、美国东方财务公司及亚洲地产公司宣布歇业。5 月 24 日东方银行的总裁瑞芬说：“总之一句话，这种情况只能归因于美国的购银计划。这一措施把中国的白银搜刮殆尽，没有白银可以作交易了”。[62]到 1934 年 12 月，美国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工业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对华贸易受到白银政策的严重影响。《华尔街 PGN0039.TXT/PGN>日报》在 1934 年 12 月 17 日的社论里说，不久以前白银集团的“慈善家”们还在“催人泪下地”表示他们关心这一个拥有世界一半人口的国家的购买力，但是他们劝说美国政府采取的白银政策，实际上是给中国服食了一帖大剂量的“经济紧缩的药剂”[63]。十天以后，该报又一次评论说，美国的白银政策，并没有像白银集团的先生们所描述的那样，既能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又会增加美国的对华贸易；相反，这个政策却把中国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拿走了。社论责问，为什么白银集团的“奇妙的理论”会产生与他们宣传的相反的结果[64]。曾在中国担任货币改革顾问的凯末尔公开抨击白银政策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白银集团的人们极力反对美国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却“对贫困中的中国人民洒下那么多的鳄鱼眼泪”，把一个货币紧缩政策强加于中国。[65]。

看来美国白银大亨的“白银经济学”是很浅陋的，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但是他们所制定的白银政策却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人们不禁迷惑不解，他们的动机究竟在哪里？中国一家很有资力的专门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中国银行，在它 1934 年的业务报告中，分析了美国高价收购白银“使中国人民购买力降至极度，与美国参议员所高唱的增加东方人民购

买力之主张，不啻背道而驰”以后，这个银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鼓吹提高银价对中国有利的人“是否完全昧于中国白银所占之地位及中国之经济实体而作此理想之谈？抑明知其非是而持此说以惑生产者，贯彻银派之主张？或者藉此以抬高中国货币值，使中国之工业与出口贸易减其竞争之能力，以增进美国生产品之出路，饵美国之民众耶？”［66］不能说中国银行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白银大亨们在鼓吹提高银价时的一个理由就是要借此打击中国工业，削弱中国工业品与美国商品的竞争。参议员毕德门认为低银价降低了中国购买力，因而中国人转而只买中国本国的便宜货，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减少了美国货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具有破坏性的竞争者”［67］。另一个银派参议员惠勒说，提高银价会增加中国货币的价值，增加中国的工业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工业家与农民［68］。但是这些自利的动机都是掩盖在“道义”的旗帜之下的，毕德门对国会的专门委员会说，美国与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关系，中国“对美国人民比对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为友好”，美国“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唯一信得过的国家”，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刻来帮助中国是美国“道义上的责任”［69］。这些都是政治家的语言，它使人们对白银大亨们的动机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但是历史学家是不容易被迷惑的。一位对这一问题深有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评论说：“白银大亨们是从复苏美国国内的白银工业这一愿望出发而行动起来的。他们涉及中国的议论出于自私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福祉的真正关怀”［70］。就中国而言，美国的白银政策，不仅动机值得怀疑，而且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同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东亚政策）很不协调。

在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的时候，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处境困难，在国际政治上的处境也是困难的。所以，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对美国的白银政策还庆该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考察。

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的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大举侵略的时期。日本在 1932 年 3 月建立了伪“满洲国”以后，1933 年初就侵占了热河省，接着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同年 5 月 31 日由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及热河，并划定了一个“非武装区”。1934 年 4 月的天羽声明［71］，使全世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日本的一个在东亚“门户关闭”的政策声明，也是一个排斥西方列强插手中国事务，进一步独占中国的政策声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认为这一声明的严重性在于它是“直接与九国公约的精神与文字相对抗”的［72］。这当然也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明显的挑战。日本决心要侵略和独占中国，不但已经由其武力行动所证明，而且现在又以政策声明表明它一定要这样做下去。果然，接下来就是 1935 年 6 月 7 日何—梅协定及 6 月 27 日的察哈尔协定，使中国华北五省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形成了所谓“自治”区域。这是日本要把整个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严重步骤。在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以后，日本在中国组织大规模的白银走私，以及后来在中国币制改革时拒交白银，都是这一总的政策的一部分，那就是在以武力威胁肢解中国的同时又从经济上搞垮中国，削弱中国的力量以达到不战而胜，迫使中国就范的目的。一位深入研究摩根韬日记的作家布勒姆认为由于世界银价猛涨，日本从中国组织大量白银走私，“不但为了牟利，而

且是把这一活动当作是削弱中国政府的有效办法”［73］。诚然，美国的白银政策促使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这一点是完全符合日本的意愿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白银政策已经远远不再是一个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也不仅是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东亚国际局势的问题。白银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一部分，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了。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1934—1936 年），美国环绕白银问题的东亚政策，却是一个“听其自然”的政策，相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来讲，则是一个“妥协政策”或“绥靖政策”。它的特点是“无所作为”、“内部扯皮”和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形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两种势力：一、白银集团的影响；二、天羽声明的压力。这两种势力的“影响点”不同，白银集团压力的影响点在财政部，而天羽声明的影响点在国务院。这就形成了这一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不协调性，表现为决策部门之间的矛盾与争吵。

也许从下面的简述中可以使我们理解，这两只看不见的手（白银集团的影响和天羽声明的压力）是在怎样起作用的。

世界银价上涨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危机，中国的银行界早就估计到了。还在美国国会辩论白银问题时，中国银行公会及上海中外商会就打电话给罗斯福说：白银上涨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给“我们的亿万人民造成灾难”［74］。在白银纷扰中，首先向美国政府建议限制银价上涨并贷款给中国进行币制改革，以免在中国爆发一场经济危机的，是 1934 年 4 月在中国考察的耶鲁大学教授罗杰斯。罗杰斯因为一向不主张提高银价，所以他的出访中国早就被白银大亨们横加指责，这已经对罗斯福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而国务院远东司长亏百克也反对借款，因为日本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对中国的“政治借款”。因此，罗杰斯的建议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就夭折了［75］。1934 年 7 月美国开始大量收购白银，银价猛涨，中国的白银出口，不到三个月就增加了七倍。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向美国呼吁不要把银价提高到超过每盎斯 0．45 美元，或贷款给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环绕这个要求，国务院与财政部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辩。国务院要求财政部改变白银政策，而财政部由于白银大亨们的压力，坚决不同意触动白银政策，提出用贷款方式协助中国渡过难关。国务卿赫尔说，这样就会直接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触犯日本人的天羽声明，因而会造成“在远东担当不起的责任”［76］。国务院认为根本解决办法是停止收购白银。这一点若做不到，另外又搞什么“拯救中国”的贷款活动，都无济于事。他们在 1934 年底的一份备忘录里说：“既抽掉了血，又同时灌一些水进去，是不可能维持一个病人的体力的”［77］。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由于白银集团的压力，摩根韬再次提高白银的收购价格。1935 年初，日本开始利用中国的白银危机从政治上插手，各国都注意到，这时日本的外交活动和关于在东亚的政策声明愈来愈频繁。广田外相声称：要使中国“自国际束缚中获得解放”［78］。外务省也强调要加强“中日经济提携”，并预备在上海建立二万万元的信用制度［79］，并且作出同情中国，要同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美国的姿态，实际上提出了很多使中国经济屈从于日本的建议（如禁止抵制日货、建立中、日、满统一货币、降低日货进口关税等）。当时从南京、北平、东京、伦敦都传来日本利用中国白银危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息［80］。这些消息的来源虽不同，内容也有所差异，但却贯彻了一个精神——日本独占亚洲的“天羽声明”精神。最好的

表述也许是 1935 年 2 月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南次郎的几句话。他说，欧洲人应该为欧洲的和平而工作，美洲人应保障他们那一个半球的和平，东方人应该保护远东的秩序，中国必须放弃依赖欧美并停止对日本的对抗［81］。那就是说，东亚是日本人的东亚，东亚与中国的事务，欧美人不许插手。在白银涨价与日本侵略夹击中的中国政府，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向美国商借一亿美元改革币制，以免经济全面崩溃，成为日本的俘获物。国务院的菲律浦斯也承认美国的“白银政策削弱了中国，却让日本人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82］。但是，国务院对中国政府的要求既不说“是”，因为怕得罪日本人；也不说“非”，因为怕中国人会因此倒向日本，只是建议中国搞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合作［83］。国务院认为这是能贷款给中国而又不致触怒日本的好方法。摩根韬不赞成国际合作，他认为可以作为金融问题，由美国单独处理。财政部向来不喜欢国际合作或由各国派出代表共同讨论，因为这种形式可能会把美国的白银政策作为问题，放在国际讲坛上公开议论或作为靶子来加以攻击。而这肯定会引起白银大亨们的震怒。摩根韬一度想把银价稳定在 0．55 美元，并把这一意图通知了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但是两个星期以后，在 1934 年的 12 月底，摩根韬又通知孔祥熙，说他改变了主意，由于他对银派议员的承诺，他不能把 0．55 美元作为最高银价的限制［84］。看来，摩根韬的态度也是处于一个反复不定的状态。至于罗斯福总统的态度，美国历史学家博格有一个很好的概括：罗斯福一会儿同意国务院的意见，一会儿同意财政部的意见，他想寻找一个既不触犯日本人，又不开罪白银集团的方案［85］。看起来仍然是两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就在国务院与财政部的争吵中，在罗斯福总统的飘忽不定的决策中，1935 年 4 月在毕德门的压力下，罗斯福再度与白银派议员妥协，把国内银价提升到每盎斯 0．71 美元［86］。由于美国国内银价提升，纽约市场的世界银价也由 0．544 美元（1935 年 1 月）猛升到 0．743 美元（1935 年 5 月）。［87］银价猛升扩大了走私的利润，于是在中国再一次兴起了白银走私的浪潮。中国的货币储备进一步枯竭，国内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几乎就在同时，日本把“何—梅协定”、“察哈尔协定”用武力威胁强加于中国，中国的华北事实上已经肢解，远东的局势起着急骤的变化。

（三）门户关闭与联合行动的失败

中国本来想通过中美双边会谈来解决在银价上涨和日本侵略的夹击中所造成的危机，但又恰恰是这两种势力使中美双方接触成为不可能。1934 年底，宋子文的访美，参议员毕德门虽然同意了，但由于宋的抗日色彩较浓，国务院怕得罪日本人，坚决反对［88］。1935 年 8 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派代表来华商谈，摩根韬认为这种访问除了对美国白银政策批评一通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再者，他也顾虑国务院的反对，因为国务院害怕这种访问会触犯日本人，引起外交麻烦。摩根韬曾设想利用到西班牙休假的机会与中国代表在西班牙某地“偶然”会面，秘密会谈，以避人耳目。但终因各方压力太大，未成事实［89］。国务院对中国危机的解决，趋向于联合行动，主要是想把日本人也包括进去，以取得日本人的谅解。而摩根韬对日本有戒心，并且国际联合行动可能会提供一个指责美国白银政策的机会与场所，因此对联合行动不感兴趣。国务院与财政部双方都有自己的“弱点”。其结果是，

国务院只能不断向中国发送一些含糊其词的文件而财政部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抬高和维持银价来安抚白银大亨们，虽然摩根韬本人对美国白银政策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的后果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美国内部决策部门之间相持不下之时，英国采取了主动，英国之所以采取主动，是由于它迫切想摆脱在欧亚两个地区的困难处境。1934 年底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和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都是英国的燃眉之急；而白银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局势及日本乘机对中国的咄咄进逼，又使它在东亚的商业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英国急于在远东创造一个较稳定的局面，以便有更多的力量对付欧洲问题。欧洲是英国决定政策的基础。但是稳定东亚局势，中日关系是一个关键。尽管日本的“天羽声明”已使英国逐渐明白，要把东亚的国际关系再纳入华盛顿会议的体制之中已不可能，但仍然希望在英、美、日的海军谈判中力图使日本海军等级能恪守华盛顿会议的格局。英国对日政策的幅度是：既不要过分地激怒日本，也不要与日本亲密到如此程度，把俄国赶进德国的怀抱。基于这些考虑，英国的策略是运用英、美、法、日的联合贷款解决中国的货币经济危机，引诱中国承认“满洲国”的既成事实，借此讨好日本，为海军谈判创造良好气氛，并促使日本暂缓对中国的侵略进程，维护英国在中国日益颓败的商业利益。很明显，这个方案的构思是以国际联合行动打破日本“天羽声明”的关门主义，也缓和一下中国的经济困难，而中国付出的代价是正式牺牲它在满洲的领土与主权。英国想以这个方案使中国的经济不致因白银危机而垮台，使日本的侵略行动有所收敛。在东亚谋求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1935 年 3 月，英国就以这个方案分别向中、日、美三方试探。日本不允许西方插手中国事务，理所当然地表示不赞成［90］；美国国务院赞赏英国在联合行动问题上起带头作用，但对其可行性持谨慎的怀疑态度［91］；中国虽然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表示欢迎这一建议，但迫于日本的压力，却对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说：“并无向英美借款问题之事实”［92］。中国对英国建议有极大的保留，因为它不希望联合行动中有日本参加，又顾虑人多口杂，事机不密，反而引起市场震动，因而没有向英国说出自己真正的设想与计划［93］。所以英国联合行动的方案在第一轮的试探中实际上是流产的。但是英国在欧亚两个地区的困难处境不允许它像美国那样在犹疑不决的政策中拖时间，它承担不起事态老样子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它决定同有关方面直接接触，促进联合行动方案的实现。这就是 1935 年 8 月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爵士著名的环太平洋访问。李滋罗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这一次出访，实际上是半官方性质的，他有意识的把加拿大作为第一站，试探美国的态度。国务院对会见李滋罗斯很起劲，因为他的国际联合行动很合国务院的心意。摩根韬则反对（他对英国人有戒心，对日本人有反感，并且怕在国际性会议上触及美国白银政策这一敏感问题）［94］。因此，李滋罗斯在北美受到的是冷遇。他的第二站是日本，在这里他尝到了日本“门户关闭”政策的味道。

李滋罗斯在日本分别同广田外相和重光葵次长先后会面两次，（其间同藏相高桥是清、日本银行总裁深井光五及正金银行总经理儿玉谦次也会谈过，但内容不详）［95］。在两次会谈中，他们只在一个问题上取得共同意见，即：“美国白银政策是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没有共同语言。李滋罗斯虽然想以推动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来换取日本的合作，但日本并不领情，广田告诉他，对于“满洲国”的存在，“中国

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在几次会谈中，每当李滋罗斯提到“满洲国”问题时，日方都回避了。重光葵甚至明确说，“满洲国”的问题是一个应该由中日两国直接处理的问题，第三者介入会对局势不利，并表示日本外交部并没有邀请李滋罗斯来讨论这一类问题。所以英国想以“满洲国”的财政收入为抵押，搞国际联合贷款，改革中国币制，解除中国货币危机的建议，遭到日方严厉的拒绝。当然，想使中国货币与英镑联锁的愿望也变成泡影。在会谈中，当李滋罗斯说：“英国和日本是处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结果招致了重光葵的反驳：“英国一方面说和日本利益一致，一方面却招引美国、法国，企图建立尽量广泛的国际性组织”，表示很不满意。李滋罗斯退而求其次，提出只搞英日两国的合作，重光葵也婉言回绝了，说：“对中国的财政援助，我觉得为时过早”［96］。李滋罗斯只得以“日本方面的意见使我失望”这句话来结束了同重光葵的会谈［97］。从李滋罗斯在东京谋求英日单独合作一事来看，摩根韬对英国人的怀疑与戒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而国务院对李滋罗斯一行寄予很大的希望，未免太天真了一些。但李滋罗斯对广田明白表示，必要时，英国准备对中国的币制改革“不惜给以贷款”［98］，传递了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这一点在当时西方的东亚外交政策上，英国超过了美国态度暧昧、模棱两可的水平。日本的“门户关闭”政策使李滋罗斯亚洲之行没有达到英国预期的目的。

在美国白银集团与日本天羽声明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既不能同美国进行双边会谈，又无法通过国际合作（包括日本）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货币危机。白银继续外流，物价继续下降，工厂继续倒闭，经济面临崩溃。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终于在 1935 年 11 月 3 日公布了货币改革令，宣布白银国有。这是一个冒险行动，在当时来讲，也是一个在最坏情况下的最佳选择。由于华北的白银走私活动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仍在进行，（在货币改革的前夕，上海与伦敦白银的差价仍达 23%）除了采取货币改革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99］。从现在已知的历史资料看，中国的这次货币改革与李滋罗斯的中国之行并无直接的联系，也不是在李滋罗斯的参谋和怂恿下才采取的行动。在联合贷款的方案中，中国一直想排斥日本而力争美国参加。一直到 9 月 24 日孔祥熙还对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表示希望美国能派代表参与李滋罗斯的联合贷款行动［100］。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原因，这一要求未能实现。到 10 月 28 日孔祥熙通知李滋罗斯，中国已别无选择，只有断然实行币制改革了［101］。李滋罗斯曾极力建议中国政府推迟行动，但经济全面崩溃的危险已迫使中国政府无法再犹豫和迟疑了。货币改革法令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法定货币），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银，违者全部没收，并法律制裁；公私机关及个人持有的银币、生银等全部交给国家指定银行兑换法币；为了稳定法币外汇价格，上述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同时将白银平衡税由 6．75%提高为 57．25%（后又提为 58．51%），使白银出口无利可图。［102］这一货币改革的重要性在于中国从此脱离了银本位制，采取了一种近似“管理的外汇本位”制，使中国的货币币值与白银脱离了关系，并能较有效地制止白银外流，从而有可能从金融体制（也是较根本的一方面）克服经济困难［103］。但是这一币制改革包含了很大的风险，它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新货币的汇价能否稳定，也就是币制能否稳定，取得民众的信任。说到底就是中国政府有没有实力“无限制”地按一定的汇价买卖外汇；第二，各银行（特

别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银行）能否将它们所持有的白银移交给中国政府。这一点办到，第一点也就较有把握，新货币的币值就能稳定，币改也就基本成功了。因此，中国的币制改革也涉及到各国的远东政策问题，英、美、日三国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

如人们所预计的，日本对中国币制改革采取了明显的否定态度。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在币制改革后的第四天就发表声明说：“中国币制改革，唯将中国四亿民众〔置〕于灭亡而已”［104］；接着，日本外交部就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表明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反对态度［105］。日军中央部也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币制改革“忽视具有安定东亚势力之日本，扰乱东亚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国决断乎排击之”［106］。三天以后，日本外务省抨击中国币制改革没有事先“与日方充分协议”，应要求“日方之协力后方可实行”［107］。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南次郎认为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后，日本应加速促使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他说，币制改革“从根本上破坏了帝国根本方针——即以日本为盟主确立东亚和平的基础——的危险”。日本应该“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府而自行独立”［108］。日本一些民间经济学家如高桥龟吉等也估计中国的币制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很大［109］。日本把中国的这一次币制改革看成是对日本的“挑衅”，也看成是日本同英美力量在远东的一次较量。1936 年 1 月 15 日，他们正式退出了伦敦的海军谈判，除了加紧侵略华北以外，并采取了一切可能办法来破坏这次币改，想以此证明，左右远东局势的“盟主”是日本而不是别人。因此，日本破坏中国币制改革的政治意义是深远的，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些经济活动。日本对中国币改的破坏，归纳之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禁止白银南运。在日本控制的华北地区禁止白银南运，主张“就地保管”［110］，削弱中国政府掌握白银的力量。据统计，当时大约有 4，000 万盎斯的白银因无法南运而不能真正集中在中央银行加以运用［111］。第二，日本银行拒交白银。在币制改革实行的当天，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就密电若杉参事官，认为日本在华银行可以利用治外法权拒交白银给中国政府［112］。正金银行总裁也分别密电上海、青岛等分行并转发在华各分行，指示“一定要拒绝移交”白银［113］。在华北的正金银行则想利用华北“自治”政权的特殊地位，拒交白银［114］。截至 1936 年 1 月 11 日为止，在上海的外商银行，除日本银行外，其他各行都同意将所持白银移交给中国政府［115］。第三，搞外汇交易的突击，日本银行知道中国外汇存底有限，正金银行在 11 月 12 日及 12 月中旬曾先后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116］，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它无法维持汇价。这一点崩溃了，新币制也就垮台了。第四，施加政治压力。日本把当时中国的币制改革作为中国政府反日措施的重要一着，横加威胁和指责。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币制改革后两次会见蒋介石，威胁道：中国实行白银国有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反感与顾虑”，蒋向他作出“抗日运动决不会发生，本人根本不抗日”的保证［117］，日本参谋本部认为，中国的币制改革是“自力更生的第一步，企图由此增加国富，报复外侮”［118］；广田外相在 1936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十八次议会上，宣称中国若“利用第三国的老一套，走与东亚的安定相反的道路，是对日本不友好的行动”［119］。这句话若翻成明白的语言，就是假如中国联合英美反对日本侵略东亚的活动，那是对日本的不友好的行动。这个“不友好的行动”，当然包括了中国的币制改革。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英国的态度最明朗，它带头克服了中国币改法令由于治外法权不能施加于外国人的障碍。在中国政府宣布币改的同一天，英国外交部批准了英国驻华大使馆颁布的“国王规章”，禁止在华的英籍公民使用白银，并必须遵照中国的币改法令办事，违者依法惩处［120］。在币改实行的第二天，日本驻华大使就威胁李滋罗斯，谴责中英合作排斥日本，并威胁说要“对中国提出严重警告”。但李滋罗斯的回答是，英国将按照中国法令以一（法币）对一（银元）的比价移交白银给中国政府［121］。英国的态度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英商银行所拥有的白银要占上海外商银行白银总额3，963万元的44．9%（日本银行占24．8%，美国银行占13．1%）［122］，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银行的态度，如前所述，是坚决反对交出白银的，美国银行的态度处于英国与日本之间。在1935年11月7日上海外商银行讨论移交白银问题时，英商麦加利银行主张应将白银移交给中国政府，日本正金银行坚决反对，美国的花旗银行同日本人站在一边，也反对交银，但它的理由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要求中国政府补偿中外白银的差价损失［123］。一直到1936年3月26日，日本鉴于大势所趋，想一度以日币代替法币在市面流通的企图又归于失败，才勉强同意移交白银。但青岛以北地区的日本银行的白银仍拒绝移交［124］。各国银行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当时这些国家在远东政策的基调。

通过币制改革，中国政府集中了约50，000万盎斯的白银［125］。这就为稳定新货币提供了物质条件。但运用储存的白银稳定汇价还必须经过一个以银易金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美国的东亚政策开始有所转变的迹象。

这个转变是与美国力图迫使中国货币一定要与美国联锁的态度的转变一致的。摩根韬在一开始就认为在东亚存在着一个日元、美元、英镑的“货币战”。他认为这些强国都想使中国货币与它们各自的货币发生联锁关系，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在这一场货币战中赢得优势［126］。李滋罗斯出访中国带有很明显的使中国货币与英镑挂钩联锁的意图［127］，而日本一直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货币在内的日元集团［128］，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这都加强了摩根韬在这个问题上的疑惧和焦虑。因此，摩根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利用中国货币危机来迫使中国货币与美元联锁。1935年10月28日在中国币制改革前，由于银价上涨而导致经济十分困难时，中国曾向美国要求出售两亿盎斯白银，以渡过财政金融难关［129］。摩根韬认为这是乘人之危的好机会，对罗斯福说：“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假使他们〔中国〕淹沉得差不多了，就用美元把他们钩起来，免得他们去攀附英镑”［130］。这个设想同罗斯福也想用这种办法在中国保持一个“立足点”的想法不谋而合［131］。在中国币制改革的前夕（11月2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再次商请美国收购白银并给予贷款协助。孔说：“管制外汇是否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出售大量的白银（以增加外汇储备）［132］。摩根韬的购银条件是中国货币一定要与美元联锁，而且要在中国成立一个稳定货币基金的三人委员会，在三人中，美国人要占两个［133］。11月6日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再与摩根韬会晤，商谈购银与贷款问题。摩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明确表示：“我不会投资六千五百万美元来让你们的货币同英镑发生联锁关系”［134］。对于美国提出的条件，施肇基在11月上旬（11月4日及8日）两次受命向美国表明，与美国联锁及委员会中美人三占其二的要求，中国政府

受外部的压力（主要指日本）难以接受［135］。正在这时（11 月 7 日），英国政府通知美国，假使中国放弃银本位，香港也将放弃银本位，港币将采取与英镑挂钩联锁的纸币管理本位［136］。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美国面对两重困境，一方面是亚洲最大的使用白银的国家与地区将放弃银本位（这是与白银集团愿望相反的）；另一方面，在世界高银价的哄抬下，中国与香港的白银走私只会有增无已。联系到远东局势，摩根韬估计日本人正在从大量白银走私中积累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元币值，而且他还怀疑，英、日是否暗中勾结在伦敦海军会议上对付美国［137］。摩根韬在与顾问们反复商量后得出一个结论：降价。只有降低世界银价才能制止日本人从白银走私中攫取巨额资金，增强它的国力；也只有降低银价才可以避免香港在世界银市场大量抛售白银。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降低银价会使中国政府把出售的白银的渠道从世界银市场转向美国，因而可以控制中国货币与美元联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时摩根韬心目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形势逼人，当香港提出放弃银本位约一个星期以后（11 月 13 日）。正当中国币制改革处于成败关键时刻，日本正金银行突然向中国外汇基金冲击，大量套购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骤然下降（只剩下 3，500—4，000 万美元外汇与黄金储备）。新币制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同一天，施肇基向摩根韬紧急求援，要求美国收购一亿盎斯白银，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应付日本人破坏性的套购外汇的突击活动，以维持新币的信用。摩根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立即与罗斯福磋商后，同意收购五千万盎斯的白银。在这次交易中，摩根韬可能鉴于中国财政金融的全部崩溃，也并非是美国之福的考虑，没有提到他过去一再坚持的美元挂钩联锁的先决条件。只是要求售得的美元必须专用于作为稳定货币的基金并存于纽约的银行。他对施肇基说：“我把这件事为中国尽可能办得简易一些，因为我希望看到你们早日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我愿就凭我们双方口头上的诺言，一言为定，去履行这个协定，我不会再对它有所更改了，……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同你们作对，而我们这次不要求任何贸易特权”。［138］

当然，摩根韬态度的变化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而引起的日益恶化的远东局势有关。1935 年 12 月 11 日南京政府在日本军事压力下被迫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华北五省三市“虽承认南京政府宗主权，但在外交、内政、经济等方面保持自治”［139］。1936 年 1 月 13 日日本政府发出了“处理华北纲要”，详细列出了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步骤与策略［140］。眼看着“满洲国”事件就要在关内重演［141］，摩根韬不能不考虑美国的白银政策究竟帮了谁的忙？它究竟是否明智？1935 年 12 月 8 日，他就回顾说：“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的白银收购政策似乎越来越愚蠢。现在很清楚了，除了收购银矿中新开采的白银以外，我们的政策只是从两个管道把白银从中国吸出去了——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英国”［142］。几天以后（12 月 12 日）他再次检讨了白银政策，说：“在公众眼中，我们的白银计划是我作为财政部长唯一无法解释或证明其为正当的财政金融政策”［143］。可以说，事实教育了摩根韬，使他认识到美国的白银政策，除了讨好国内的利益集团外，还应该从更广阔的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摩根韬仍得非常小心，避免触怒白银集团。因为仅仅在半年以前（1935 年 4 月）参议员毕德门还在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严重抗议，反对中国实行币制改革，脱离银本位制。”［144］

为了扭转美国“愚蠢”的白银政策，经罗斯福同意，美国不再支持世界

银价，于是银价逐渐下降。1935 年 12 月 11 日世界银价开始由每盎斯 0．65 美元下降为 0．61 美元，在以后的 40 天中再下降为 0．45 美元［145］。世界银价下降固然有助于刹住白银走私风，但对中国来说，由于银价下跌，以银易金以增强新币制外汇储备的力量也削弱了，因而又遇到同样紧急的新困难。这就迫使中国向美国提出售银与借款以充实外汇基金的一揽子交易。中国的请求，促使华盛顿建议邀请中国派遣代表访美，直接磋商，这是美国远东政策逐步转向主动的一个步骤。尽管国务院仍然是非常小心翼翼，生怕走错一步，引起日本的激烈反应。中国派赴美国的代表人选，原来拟定是宋子文或王正延，但遭到国务院的反对。因为这两人的政治色彩都太浓厚，怕触犯了日本人。再者，蒋介石也不同意宋子文为代表［146］，最后选定了银行家陈光甫。尽管摩根韬这时越来越感觉到应采取措施加强中国实力，即使因此而得罪日本，也在所不惜。但为了避人耳目，陈光甫仍以中国银行董事的身份访问美国。当然，白银大亨们还要求中国代表在美会谈的内容都应该让他们知道。所以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招待陈光甫一行的宴会上，当时显赫的白银参议员如毕德门、金氏、惠勒等都是座上客。金氏还专门同陈光甫单独会谈一次，弄清楚了陈氏此行不是来损害白银利益的，他们才算放心了。

1936 年 4 月 8 日陈光甫第一次与摩根韬晤谈，经过将近一个半月的紧张会谈，5 月 28 日双方达成正式协议。在第一次会谈时，摩根韬就表示：“我感到从长远来看，帮助你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认为帮助中国加强它的货币对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来讲这也是问题的全部中心……。讨论这件事情时，我们不是别有用意地怀有私心的”［147］。由于美国把支持中国应付日本侵略的困境这一东亚的严重局面同美国的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所以美国在谈判中并没有提出和坚持中国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如中国货币一定要同美元挂钩等）；同时，也由于中国急切地有求于美国，基本上接受了美国财政部提出的方案，所以谈判虽有严峻的时刻［148］，但进展还是比较顺利［149］。根据协定，美国按市价向中国购买 2，500 万盎斯白银（1936 年 6 月前购买 1，200 万盎斯，然后每月购 500 万盎斯，直至 1937 年 1 月 15 日）［150］；中国同意继续鼓励铸造银币，其成色是 0．720（而不是像英国那样的 0．500），白银储备须为银币流通量的四分之一，并放宽白银在工业和艺术品方面的用途［151］；中国保持币制独立，不与任何国家货币挂钩，但将改进外汇汇率挂牌方式，以免看起来好像是在同英镑挂钩［152］。协定的秘密条款是纽约联邦准备银行以南京政府所存的 5，000 万盎斯白银为抵押，提供 2，000 万美元的“美元外汇”（避免使用“贷款”字样）［153］。据参与这次谈判的当事人顾翎群的回忆，通过谈判，中美之间还达成一种“默契”（understanding），即“今后中国向美国谋求更多、更好的贸易及更多的合作”［154］。日本理所当然地对这次中美谈判表示了极大的关切。4 月 22 日日本的一位商务、财政代表富田洋太郎专程由伦敦来到华盛顿，由日本大使陪同与摩根韬会晤，想摸清一些底细。富田洋太郎说：他认为中国币制改革是失败的。摩说：以他之见，“中国币制改革进展顺利”，并说，其他在华外商银行都把白银移交中国换取法币，唯独日本银行拒交白银，其总数约 1，000 万美元。富田洋太郎说，日本银行“还没有拿定主意”。在这个当口，陪同会见的日本大使把题叉开了。［155］这一次中美白银谈判，在美国方面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中国的白解危机与日本加紧侵略东亚的局势问题。4 月 13 日会谈正在进行，罗斯福在与摩根韬工作午餐之际，详细询问了

会谈情况，特别关心陈光甫的政治态度——是否反对日本侵略。摩根韬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肯定答复，并说：“假使希特勒在欧洲能保护他自己，因而在〔东西〕两面边界都将不会发生冲突，他很可能会联合日本袭击苏联”。罗斯福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摩根韬认为中国情况很糟，除非日本由于同苏联冲突而分散了力量，中国几乎无法抵御日本的攻击。他说中国的虚弱促使他制定了向中国每月购买 500 万盎斯白银的计划。（如上所述。后来购买数量增加了——作者）。对此，罗斯福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156］。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摩根韬有意识地把它作为单纯的货币金融问题来处理，签署协定的是双方的财政部而不是两国政府，而且尽管避免使用“贷款”、“信用”这一类字样，而代之以提供“美元外汇”这一类意义含混的字眼，这就避免了国务院的插手与干预［157］。由于中国同意继续铸造银币并使用白银作为货币准备的一部分，也安抚了白银集团，使他们不致从中作梗。事后，国务院与白银议员对协定都未表示异议。这一协定实际上使美国能对中国进行单独贷款，这是与国务院一直坚持的所谓诸国“联合行动”的政策相抵触的。即使摩根韬本人在 1935 年 11 月时也还不敢有此设想。这一切都表示了美国东亚政策已有正在转变的迹象。

当然，摩根韬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他最关心的还是美国在华的利益。正如他自己说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援助中国就是援助美国自己。他所坚持的售银所得必须存储于美国，使美国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外汇基金。协定进一步促使中国货币疏远了同英镑的联系，这一点也使摩根韬特别满意。美国在这场列强角逐的“货币战”中显然赢得了优势。他积极促使白银协定的签订，当然远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

1937 年 7 月 8 日孔祥熙在伦敦参加了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之后到达华盛顿，又向美国出售了白银 6，200 万盎斯［158］。自币制改革后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向美国出售白银 18，835 万盎斯，约含美金 9，442 万元［159］，充实了外汇准备，对稳定币值，度过经济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施肇基给孔祥熙的报告，在白银协定正式会谈以前，摩根韬曾对陈光甫说：“美国唯一关切的就是帮助中国，美国并不想寻求商业利益〔以及〕铁路或其他的让与权”［160］，表示了美国的善意。就在孔祥熙同美国签订出售白银协议之日（1937 年 7 月 8 日）的前一天，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从此展开了持续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美国在白银集团阴影覆盖下迟到的善意，与日本迫不及待的挑起全面战争，是不是历史的偶合呢？

（四）结束语——几点历史教训

白银与外交的问题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仍不失为我们今天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东亚政策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为它在以下几方面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典型，即：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如何同它的国内政策交织在一起的；这一个同国内政策交织在一起的对外政策的效果如何？美国战前东亚政策的支柱——门户开放政策的局限性。

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总是同这个国家内部的利益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同它的近期或远期的国家总体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它的国内政策常常受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集团的利益有时可以凌驾于美国的国家的总体利益之上，因而也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脱离常

轨。在两党激烈争夺选票时，特别是在选举年尤其是如此。政治家常常向这种强大的利益集团妥协甚至屈服。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特点。

30 年代美国白银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1934 年购银法案在参议院是以 55 票赞成，25 票反对，16 票弃权通过的，在民主党人占优势的这一届参议院里，民主党人投了 45 张赞成票，占这一类总票数的 81．8%。在投赞成票的民主党成员中，南部产银区的参议员投了 16 票，占民主党参议员赞成票的三分之一以上，这 16 个人的人数虽不多，但结成一团，再加上院外集团的力量，在立法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因此罗斯福对他们必须认真对待［161］。但是，当这种国内集团的压力稍松时，罗斯福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就有较多的回旋余地。事实上，大约在 1935 年中期以后，罗斯福已感觉到，他在议会中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同白银集团相对抗了。1935 年 4 月底，当白银集团继续施加压力迫使银价上涨时，摩根韬颇有迁就顺从之意，但罗斯福说：“这一届议会不必顾虑白银立法问题。我至少可控制 64 票，肯定能击败任何白银法案，所以不必考虑〔银派议员〕会搞更多的白银立法”［162］。诚然，罗斯福当时若倾其全力也许能否决或制止银派议员的白银法案，但这样做会导致立法与行政的严重对立，其结果也许会使罗斯福当时力图摆脱经济恐慌的一套法案在议会中受到抵制而无法实施。这个代价对他来说是太大了。因此，他还是宁愿把银价保持在一定高水平（0.75 美元左右），以便继续安抚白银集团，获得他们支持。到 1935 年底，由于罗斯福的“新政”已取得明显的效果，原来支持白银集团的一些势力（如通货膨胀派、农民等）已开始从这一集团的影响下分离出来，而白银大亨们的内部也趋于分裂，不再像 1934 年那样团结一致了［163］。1935 年 11 月，中国币制改革后，参议员毕德门曾估计世界银价会升到每盎斯 1.29 美元。罗斯福私下嘲笑地说：“这是毕德门荒诞无稽之谈”［164］。这时罗斯福已不再把白银集团看成一个在政治上的威胁力量了。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再加上日本在中国北方的咄咄进逼，罗斯福才开始认真考虑调整美国的白银政策。而在此以前，美国政府在白银集团的压力下，像摩根韬所说的，干了一些“蠢事”，直接帮助了它在远东的劲敌——日本。

在白银集团压力下所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包括人为地猛促世界银价上涨的政策），究竟对美国的总体利益带来多大的好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根据历史学家罗素的分析是，白银政策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从 1934—1938 年美国的白银生产者换取的“白银证书”共值 16，000 万美元，白银工业在美国是一种小工业，一直到 1939 年时雇佣工人还不到 5，000 人，而这一小工业却从 1934 年起连续 15 年向美国政府勒索了 1．5 亿美元。这笔支出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在同期内为支持全国农业而付出的金额。为了解决 5，000 人的就业问题，美国其他的一些推动就业的机构（如“公共工程管理局”等）本来可以较容易地就处理了的［165］。假使把白银政策在国外所起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坏作用考虑在内，即使以美国利益的尺度来衡量，这一政策的效果也应该是负数。但是白银政策起源于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曾经许诺要“为白银做一些事情”，后来他为了结欢于白银大亨们，的确是不断地“为白银做一些事情”，有时甚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白银集团作了一些不必要的让步。以美国纳税人的钱投入大量补贴，支持美国国内银价不断上涨，从而掀动了世界银价的暴涨。1935 年 7 月当世界银价已经成倍地猛涨时，中国的北方正面临着白银走私与国土分裂的危

机，罗斯福在白银集团的压力下，向他们保证说，推行白银政策和白银法案“充满了为我们民族造福，使全世界受益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执行白银法案的）那一责任已经并将要以对于公众利益最为有利的方式来履行”[166]。“使全世界受益”吗？至少罗斯福的助手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就在半年以前，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亏伯克就说：“我们不能照正在做的办法干下去，而同时又成为中国的“好邻居”，因为“我们收购白银快要把中国人的“血抽干了”[167]。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美国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绞连在一起时，它看起来好像是符合国内利益的，但却不符合美国的国外利益或不一定符合美国的总体利益。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所形成的国内政策，常常会影响、覆盖甚至控制对外政策，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正因为是植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因此它可以发生在过去，也可以再现于未来，它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特色。

30 年代是远东的权力均衡失去平衡的时代。20 年代由华盛顿会议建立的远东均势已完全破坏。苏联在日本武力强占满洲后，于 1933 年 3 月就将它在满洲的铁路权益全部让售给日本，脱身而去。不平衡的形势更明显了。1933 年罗斯福总统促使美国政府承认苏联，对日本也没有起什么抑制作用。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后，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力加排斥（如美孚石油公司及英美烟草公司等都相继被日本人从满洲排挤出来）。日本人在占领满洲以后，越过长城，肢解华北，窥伺黄河以北地区的侵略活动，更是对美国东亚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严重的挑战。罗斯福总统原来可以“为东亚的局势稳定做一点事情”，但是由于天羽声明的威胁和白银集团的压力，他既怕开罪于白银大亨们，又怕触犯日本人，想在这个夹缝中制定一个应付方案来。其结果是：对日本采取消极的不行动政策，对白银涨价则采取积极的行动政策。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局势：“日本人以武力的侵略在北方从外部削弱中国，而美国则以白银政策在货币金融方面从内部削弱中国”[168]，使中国腹背受敌，进一步加深了东亚不平衡的局势。执行白银政策的摩根韬最后也把 1934 年的购银法称为是“那个不光采的法律”[169]，并且承认美国的购银政策削弱了中国经济力量去“尽一切可能帮助日本”[170]。应该看到，当时中国并不要求美国做什么，更不是要求美国为中国而战，只是要求美国不做什么——不要人为地提高或过速地提高世界银价。美国若能这样做，可以便白银投机者和日本组织的大规模白银走私活动受到抑制，其结果是从一个方面增加了中国对日本抗争的力量。这无疑是有助于东亚权力平衡，对美国也是利害攸关的事。但是由于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交织在一起，抬高银价好像就成为美国的最高利益。一位曾在中国长期担任财政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评论当时美国受白银集团支配的对外政策时说，这一政策“在美国为时过晚地设法挽救局势以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不光彩的事例之一”[171]。毕德门参议员虽然讲了很多白银政策对中国和世界的好处，但这种“白银幻想曲”的实质是谋取集团的私利。正如著名的《财政与商业》杂志在当时所评论的：“〔毕德门〕参议员在大多数关于白银的演讲中更关心的是讨好他的内华达州的选民，让他的选民们确信他是坚定地支持他们的利益的。这一点超过了他对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关心”。[172]。美国的国内集团利益会驾凌于对外政策的原则与道德规范之上，这也许是美国外交政策在渗入了某种国内集团利益以后的又一个特色吧。

奇怪的是，在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的过程中，日本比美国更高地举起“门

户开放”的旗帜。日本外交大臣在解释，天羽声明时说，“日本本来就支持有关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173]；在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与赫尔秘密会谈时，也强调要保证实现在太平洋的门户开放原则[174]。相反在美国给日本的文件中，反而不提门户开放政策。例如在赫尔为天羽声明给日本人的备忘录中，除措辞谨慎外，只字不提门户开放政策[175]。这可能是一则怕因此会激怒日本；再者，也可能是这一个词已被日本人用滥了，美国政府宁愿不再使用这个词。（虽然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对苏联又使用了这个词）。经过海约翰在20世纪初提出，后来又在华盛顿会议上重申的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与精神，到30年代由于日本大规模地侵占中国领土，早已荡然无存了。在这一时期，日本在东亚的门户关闭主义是占上风的，面对这种形势，美国政策的特点，正如历史家博格所说的，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战略”[176]。美国竭力避免触犯日本人，尽量避免由美国单独对中国进行财政援助，即使一定要援助时也要采取国际联合行动（当然包括日本）。一直到中国实行货币改革，摩根韬对白银政策的危害性看得越来越清楚之后，才将此作为由财政部处理的“纯粹财政问题”。购买中国白银，加强了中国在币改以后的经济地位。由此我们看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常常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影响，有很大的局限性与脆弱性。造成这一情况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国内集团利益的牵扯，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参议员毕德门挥动皮鞭的劈拍声中”[177]，白银至上，其他的原因也就牺牲了。

研究历史是为了探索将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寻找更美好的前程。30年代这一段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历史，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教训。

注释

[1] 引自阿瑟·扬：《1927—1937年，中国建国的努力》（Arthur N. 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

[2] 里昂：《白银：影响它的价格因素的分析》（Y. S. Leong，Silver：A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Its Price），华盛顿，1934年版，第68—71页。

[3] 《银行周报》（上海）第18卷，第33期（1934年8月8日），第11页。

[4] 周伯棣：《白银问题与中国货币政策》，上海，1936年版，第36—37页。

[5] 布勒姆：《摘自摩根韬日记：危机的年代，1928—1938》（John Morton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Years of Crisis，1928—1938），波士顿，1959年版，第183—184页。

[6]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与中国的商业关系（U. S. Congress，Senate，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Eoreign Rela-tions，Hearings，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第71届国会，第2次会议，1930年，第173页。转引自罗素：《美国白银政策

与中国，1933—1936》（Blaine Michael Russell，American Silver Policy and Chi-na，1933—1936），1772 年伊利诺大学博士论文（1980 年国际大学缩微胶卷）1980 年版第 10 页。

[7]《美国国会记录》（U. S. Congressional Record），第 72 届国会，第 1 次会议，1932 年，第 75 卷，第 3 部，第 2628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1 页。

[8]《1930 年 10 月 8 日参议员毕德门在商会午餐会上演讲词摘要》（Synop-sis of Address to be Delivered by Senator Key Pittman at the Chamberof Commerce Luncheon, October 8，1930）国会图书馆毕德门文件，第 141 盒。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1 页。

[9]《白银与货币》(Silver and Money)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34 年 5 月 19 日，第 32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43 页。

[10] 布瑞兰：《白银与第一次新政》（John A. Brenan： Silver and the FirstNew Deal），内华达大学出版社，1969 年版，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43 页。

[11] 同上。

[12] 美国参议院铸币、重量、量度委员会听证会：《当前银价跌落的原因与影响》(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Present Depressed Value ofSilver），1932 年第 437—438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5 页。

[13] 罗素前揭书第 16 页。

[14] 罗素前揭书第 252 页。

[15] 达勒克：《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Robert Dallek，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35），纽约，1979 年版，第 190—191 页。

[16] 同上书，第 50—51 页。

[17] 布勒姆前揭书第 186—187 页。

[18] 同上书第 188 页。

[19] W·Y·林：《中国的新货币制度》（W. Y. Lin， The New MonetarySystem of China），上海，1936 年，英文版，第 14 页。

[20] 郑友揆：《中国的国际贸易与工业发展》（Yu-Kwei Cheng，Foreign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康涅狄克，1978 年第二版，附录三，第 262—263 页。

[21] 博格：《美国与 1933—1938 年的远东危机》（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 21 页。

[22] 博格前揭书第 124 页；阿瑟·扬前揭书第 225 页。

[23] 汤良礼：《中国的新货币制度》，《T ’ang Leang Li， China ’ s New Cur-rency System），上海 1936 年英文版，附录甲，第 116 页。

[24] 阿瑟·扬前揭书第 205 页。

[25] 格鲁：《在日本的十年》(Joseph C. Grew， Ten Years in Japan），纽约，1944 年第三版，第 164 页。

[26] 阿瑟·扬前揭书第 206 页。

[27] 阿瑟·扬前揭书第 208 页。

[28] W·Y·林前揭书第 14 页。

[29] 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编：《中国银价物价问题》，上海，1936 年版第 100 页。

[30] 阿瑟·扬前揭书第 217—218 页。

[31] 《交通银行致各分行指令》（1935 年 5 月 11 日）藏第二国家档案馆第 398（2）卷第 2407 号。

[32] 郑友揆前揭书第 79 页。

[33] 汤良礼前揭书第 73 页（表 6）。

[34] “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山海关■於■■白银密输情况》，调查材料第 B4 号（1936 年 2 月）第 12、14 页。

[35] 《交通银行河北分行致总行函》，1935 年 5 月 8 日，藏第二国家档案馆第 398（2）卷，第 2407 号。

[36] 《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呈行政院函》（1935 年 5 月 24 日）藏第二国家档案馆第 2（2）1026 号。

[37] “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前揭书第 25 页。

[38] 前揭《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呈行政院函》。

[39]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致北宁铁路局局长函》（1935 年 5 月 24 日）第 29 号，藏第二国家档案馆第 2（2）1026 号。

[40] 《铁路部长顾孟余呈行政院文》（1935 年 6 月 2 日）第二国家档案馆，第 2（2）1026 号。

[4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通报》（1935 年 5 月 8 日），第二国家档案馆第 3（2）222 卷。

[42] 〔日本〕内阁统计局：《第五十六回大日本帝国统计年鉴》，东京，1937 年版，贸易篇，第 135 页。

[43] 汤良礼前揭书第 73 页。

[44] 布勒姆前揭书第 196 页。

[45] 郑友揆前揭书，附录 3，第 262—263 页。关两系按下列兑换率折合成盎斯：1 海关两＝1．588 元＝0．755 盎斯白银。

[46] 汤良礼前揭书第 72 页。

[47] 美国统计局：《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现在》（The United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States，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纽约，1976 年版，第 884 页。

[48] W·Y·林前揭书第 34 页。

[49] W·Y·林前揭书第 58 页。

[50] 谢菊曾：《一九三五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历史研究》1965 年第 2 期，第 90—92 页。

[51] 谢菊曾前揭文第 90—92 页。

[52] 刘大中：《中国的国民收入，1931—1936》，第 10 页。

[53]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纽约 1978 年第 3 版，第 282—283 页。阿瑟·扬前揭书第 202 页。 [54] 入江昭前揭书第 202 页。

[55] 布勒姆前揭书第 187 页。

[56] W．Y．林前揭书第 175 页。

[57] 郑友揆前揭书第 213—215 页。阿瑟·扬前揭书第 196—198 页。

[58] W．Y．林前揭书第175页。

[59] 郑友揆前揭书第258—259页。阿瑟·扬前揭书第196—198页。

[60] 郑友揆前揭书第258—259页，附录1。

[61] 美国统计局前揭书第903—906页。

[62]《美国对交关系文件》，（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theU．S．）1935年第3卷，第589页。

[63]《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34年12月11日，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97—98页。

[64]《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34年12月27日，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98页。

[65]《商业与财政记事》(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第79卷第2部（1934年12月22日），第3886—2887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98页。

[66]《商业周报》（上海），第18卷第11期（1934年3月27日），第1页。

[67]《美国国会记录》（U．S．Congressional Record），第73届国会，第1次会议，1933年第77卷，第118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12页。

[68] 美国参议院铸币、重量、量度委员会听证会：《白银货币》（Silver Cur-rency），1933年第72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67—68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12页。

[69] 同上注《白银货币》第37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13页。

[70] 罗素前揭书第22页。

[71]《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东京，1955年版，第2卷，第284—285页。

[72] 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3年第3卷，第143页。

[73] 布勒姆前揭书第205页。[74]《上海银行公会致财政部长孔祥熙函》1934年10月12日）藏第二国家档案馆第220号，次目第11号。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4年，第3卷，第424—425页。

[75] 博格前揭书第82页。阿瑟·扬前揭书第203页。

[76] 达勒克前揭书第92—93页。

[77]《美国国务院备忘录》，SDA卷第893·515／372号。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93页。

[78]《国闻周报》，第12卷，第9号（1935年3月11日），第11页。

[79]《银行周报》（上海），第19卷，第7期（1935年2月16日），第5页。

[80] 罗素前揭书第10页。

[81]《威尼斯·柏克致国务院函》（Willys Peck to the State Department）南京，1935年2月5日。SDA卷第893·515／466号。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110页。

[82] 博格前揭书第125，583页（

注释

20）。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5年，第3卷，第45页。

[83] 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5年，第3卷，第593页。

[84] 《小亨利·摩根韬日记》（Henry Morgenthau. Jr.，Diary），第三部分，第 53 页。《小亨利·摩根韬文件》，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4 年第 3 部分，第 457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02—103 页。

[85] 博格前揭书第 28 页。

[86] 布瑞兰前揭书第 141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35 页。

[87] 汉第与海门：《1934 年白银市场年度回顾》（Handy and Harman，An-nual Review of the Silver Market for 1934），纽约，1935 年版，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36 页。

[88] 《霍恩贝克回忆录》（Hornbeck Memorandum）1935 年 3 月 1 日，第 SDA 卷 893·515／388 号。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04—105 页。

[89] 《施肇基致孔祥熙函》（英文），（1935 年 8 月 8 日）《中央银行档案》，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90] 日本对联合行动明显地表示不感兴趣，日本驻美大使明确地通知华盛顿，说日本不会参与可能会导致“国际控制中国”的活动。《杜门回忆录》（Dooman Memorandum），1935 年 2 月 28 日。SDA 卷第 893·515／510 号。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29 页。

[91] 前揭《霍恩贝克回忆录》，1935 年 3 月 1 日。SDA 卷第 893．515／436 号。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24—125 页。

[92] 《汪精卫会见有吉明时的谈话》，1935 年 3 月 7 日。载《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02—103 页。

[93] 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是在 1935 年 3 月 8 日将英国的联合行动设想通知中国外交部的，中国于 3 月 18 日复照表示原则同意，但要求首先解决中国经济与货币困难。但在 4 月 29 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致驻美大使施肇基函电中说，中国政府在答复英国照会中没有向英国提出自己的计划，因为事涉各国共同行动，消息容易外泄，会导致市场上的剧烈震动。（1935 的 3 月 8 日贾德干致中国外交部函；1935 年 3 月 18 日外交部复英国大使函；1935 年 4 月 29 日孔祥熙致施肇基电。《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94] 博格前揭书，第 526 页。

[95] 野沢豊：《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东京，1981 年版，第 277 页。 [96] 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东京，1955 年版，第 2 卷，第 300—302 页。

[97] 重光葵：《重光葵外交回想录》，东京，1978 年，第 158—159 页。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 2 卷，第 300、302、303 页。

[98] 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 2 卷，第 300 页。

[99]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35 年 11 月 3 日的货币改革法令的原稿中关于“银价仍继续上涨”等字样，由财政部长孔祥熙亲笔删掉。这可能是由于不愿开罪于美国的白银大亨们。《1935 年 11 月 3 日货币改革令初稿原件》，藏中国国家第二档案馆第 3（2）196 号。

[100] 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5 年第 3 卷，第 619—620 页。 [101] 《李滋罗斯致费休函》（Leith-Ross to Fisher）（1935 年 10 月 28 日）上 海。英国外交部“中国卷”第 6767／6／10 号。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92 页。

[102] 周伯棣前揭书，第 155 页；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5 年第 3 卷，第 631—632 页。

[103] 作为先决条件，国民党政府在币改以前就加强了对三个最大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的控制，这就为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垫定了基础。货币改革使中国货币脱离了银本位，货币发行不再受白银准备的约束，这又为后来恶性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这些问题需要专题论述，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104] 《满洲日报》1935 年 11 月 11 日。

[105] 《克莱弗致外交部》（Clive to Foreign Office）（1935 年 11 月 10 日）东京。英国外交部“中国卷”第 F7044／6／10。转引自前揭罗素书第 220 页。

[106] 《满洲日报》1935 年 11 月 1 日。

[107] 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 2 卷，第 308 页。

[108] 同上书第 309—310 页。

[109] 野沢豊前揭书第 252 页。

[110] 《天津市长肖振瀛致孔祥熙电》（1936 年 3 月 4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11] 阿瑟·扬前揭书，第 240 页。

[112] 《有吉明致若杉密电》，《日档：支那币制关系杂纂》，第 153／391 号，藏经济经究所（北京）。

[113] 《横滨正金银行全史》，第一卷，第三部（秘密记录），东京，1980 年版，第 436—438 页。

[114] 同上书，第 439 页。

[115] 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6 年，第 4 卷，第 426 页。

[116] 布勒姆前揭书第 216、218 页。

[117] 《有吉明大使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5 年 11 月 21 日），第 1291 号（极秘件），载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 2 卷，第 312 页，前揭《日档：币制关系杂纂，第 153／391 号。

[118] 《日中战争（现代史资料-8）》，东京，1976 年第 4 版，第 128—134 页。 [119] 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 2 卷，第 325 页。

[120] 周伯棣前揭书，第 184 页，附录 4。

[121] 《有吉明致若杉要函》，1935 年 11 月 11 日。前揭《日档：币制关系杂纂》第（5）153／391 号。

[122] 汤良礼前揭书第 86 页。根据有吉明给广田弘毅的一则电报，日本银行在上海控制的白银总数达 8，926，110 元。（有吉明致广田弘毅密电，1936 年 3 月 26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23] 前揭《横滨正金银行全史》，第一卷，第三部（秘密记录）第 438 页。

[124] 《有吉明致广田弘毅函》（1936 年 3 月 3 日）中央银行卷，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25] 阿瑟·扬前揭书第 241 页。

[126] 《摩根韬日记》，第 9 部，第 32A—32C。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25 页。

[127] 《李滋罗斯致凯德刚函》（Leith-Ross to Cadogan），伦敦，

1935 年 8 月 9 日，英国外交部档 FO“ 中国卷 ”F5195／6／10。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90 页。

[128]《上海大通银行致纽约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Shanghai toChase National， New York)， 1934 年 12 月 10 日，SDA 卷 893·515／369 号。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90 页。

[129] 布勒姆前揭书第 211 页。

[130]《摩根韬日记》，第 10 部，第 180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03 页。 [131] 同上书，第 9 部，第 17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29 页。

[132]《孔祥熙致施肇基函》（1935 年 11 月 1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33]《摩根韬日记》，第 9 部，第 25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06 页。 [134] 同上书，第 9 部，第 19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10 页。布勒姆前揭书第 212 页。

[135] 同上书，第 9 部，第 12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08、212 页。 [136] 同上书，第 9 部，第 33—36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11 页。 [137] 同上。

[138] 同上书，第 9 部，第 155—157 页，转引自罗素前引书第 155—157 页。

[139] 前揭《中日战争（现代史资料-8》，第 128—134 页。

[140] 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 2 部，第 322—323 页。

[141] 1936 年 4 月 4 日根据美国［在中国］的海关人员的分析，美国人几乎肯定日本会在华北搞一个事件，发动一个像 1931 年在东北那样的战争。布勒姆前揭书，第 222 页。

[142]《摩根韬日记》，第 13 部，第 89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21 页。 [143] 同上书，第 225 页，转引自同上书第 221 页。

[144] 阿瑟·扬前揭书，第 233 页。

[145] 布瑞兰前揭书，第 149—150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33 页。 [146]《陈光甫致朱杰牧函》（1936 年 2 月 19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47] 布勒姆前揭书，第 223 页。

[148]《访问顾翊群谈话记录》1969 年 6 月 24 日，台北。转引自罗素前引书第 237 页。

[149]《银问题与中美银协定之缔订》，1936 年（原件无月、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50]《席德懋（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致孔祥熙函》（1937 年 4 月 13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前揭《摩根韬日记》第 24 部，第 120—121 页。布勒姆前揭书第 226 页。

[151]《孔祥熙致施肇基函》（1936 年 2 月 13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阿瑟·扬前揭书第 243—245 页。

[152] 前揭《摩根韬日记》第 12 部，第 48—49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37 页。

[153]《席德懋致孔祥熙函》（1937 年 4 月 13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54]《访问顾翎群谈话记录》，1969 年 1 月 24 日。台北。罗素前揭

书第 237 页。

[155] 《摩根韬日记》第 22 部，第 44—45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35 页。布勒姆前揭书第 225—226 页。

[156] 《施肇基致孔祥熙函》（1935 年 11 月 3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布勒姆前揭书第 224—225 页。

[157] 同上。

[158] 阿瑟·扬前揭书第 240 页。

[159] 《席德懋致孔祥熙函》，第 1937 年 8 月 2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阿瑟·扬前揭书，附录 15。

[160] 《施肇基致孔祥熙函》（1936 年 4 月 3 日）《中央银行档》，藏上海金融研究所。

[161] 野沢豊前揭书第 142 页。

[162] 《摩根韬日记》第 5 部，第 28—29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135 页。

[163] 埃弗瑞斯待：《摩根韬。新政与白银》。（Allen S. Everest，Morgen-thau， the New Deal， and Silver），纽约，1950 年版，第 56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08—209 页。

[164] 《摩根韬日记》第 11 部，第 21—22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08 页。

[165] 罗素前引书第 251—252 页。在分析中，罗素曾参阅以下两本书：前揭布瑞兰书第 153 页；斯莱辛格：《罗斯福时代：卷 2：新政的来临》（Arthur M. Schlesinger，Jr. The Age of Roosevelt：Vol. II：TheComing of New Deal），波士顿，1958 年版，第 252 页。

[166] 阿瑟·扬前揭书，第 234 页。

[167] 同上书，第 224 页。

[168]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Warren I Cohen， American ResponsetoChina），纽约，1980 年第 2 版，第 139 页。

[169] 阿瑟·扬前揭书，第 207 页。

[170] 《摩根韬日记》，第 2 部，第 194 页。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83 页。

[171] 同上书，第 21 页。

[172]《参议员毕德门与本地美国商人》,(Senator Key Pittman and the Lo-cal American Merchants ），载《财政与商业》（Finance andCommerce），第 19 期（1931 年 1 月 21 日）。转引自罗素前揭书，第 24 页。

[173] 前揭《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 2 卷，第 285 页。

[174] 博格前揭书，第 92 页。

[175] 前揭《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1—1945 年，第 1 卷，第 231 页。

[176] 博格前揭书，第 524 页。

[177] 此语出自英国外交部浦瑞特爵士（Sir John Pratt）。 1935 年 1 月 9 日浦瑞特记录，英国外交部档“中国卷”第 F233／6／10 号。转引自罗素前引书，第 109 页。

（张姗姗译 董幼娴校）

30 年代中期的美国与东亚——棉麦借款

细谷千博[①]

1933 年 3 月 27 日，当日本正式退出国际联盟的时候，日本的外交便进入了一个变幻不定的时期。一方面，这一举动使得日本人感到满意。松冈洋右在国联发表了一篇夸大其辞的讲话之后，即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国联大会，因此，他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民族英雄”，成了在外交事务中要求推行一种新方针的“民族情绪”的象征。另一方面，许多日本人又为日趋恶化的国际环境而感到不安，并开始寻求重新规定其外交政策的一些方法。4 月间，当印度取消两国之间的商业协定时，他们感到格外震惊。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日本将加快孤立于世界的步伐。

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外务省的官员们也开始考虑种种方式来改善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并将此作为缓和国家孤立形象的一个步骤。4 月中旬，他们在欧美事务司（the Bureau of European andAmerican Affairs）司长东乡茂德的指导下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关于在退出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后果情况下我们对欧洲和美国政策的指导方针”[1]。这份备忘录论证道，为了“眼下满洲和蒙古的局势”，日本应该通过表明继续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来争取获得美国的支持。日本还应该表明它对中国本土并没有“领土与政治野心”，它的目的在于“与英美合作重建和发展中国”。备忘录进一步建议，为了缓和日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两个国家可以缔结一个仲裁和调解的协定。

认为有可能部分改善同美国关系的这种私下的乐观想法反映出日本人对即将在 3 月 4 日就任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希望。日本人民对西奥多·罗斯福在日俄战争中的亲日态度仍记忆犹新。如同日本作家鹤见祐辅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民普遍相信另一位罗斯福也一定是亲日的[2]。前共和党政府，特别是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在日本极不得人心，日本人希望新的民主党政府会大幅度地修改史汀生政策。约瑟夫·C·格鲁大使在他的日记中也写到，日本人看来是欢迎罗斯福在 1932 年 11 月大选中获胜的。[3]检验这种乐观主义的第一个时机于 5 月下旬来到了，当时以石井菊次郎为首的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日本代表团途经华盛顿，并同新总统交换了意见。日本代表们在参加伦敦会议之前忙于同他们的美国对手进行预备性会谈，大概是预料到有可能同罗斯福会面的缘故，石井才被挑选担任代表团团长；石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任驻华盛顿大使，并曾经同当时任助理海军部长的罗斯福见过面。而且，作为 1917 年兰辛-石井协定的签订者之一，他一直被看成是日美在满洲问题上相互谅解精神的象征。

尽管抱有这样的希望，然而 5 月 24 到 26 日石井与罗斯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下举行的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效[4]。原因之一是石井在启程之前，他曾会见了外交、国防、海军等部的官员，这些官员叫他不要就满洲问题提出新的建议，由此他的手脚也就被束缚住了[5]。但是石井在同罗斯福的会谈时仍然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满洲问题。罗斯福对他说，唯有拖延时间方能解决这一争端，而且迟早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但至

[①] 日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少日本人将其理解为具有不同于史汀生方式的意思［6］。正如石井在他向东京的报告中所陈述的那样，美国看来不像要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联合英国共同指责日本，或采取单独行动来解决亚洲危机［7］。他在同罗斯福会谈中得出的那些“印象”与美国会承认满洲和蒙古尚有很大差异，而外务省可能希望从这些会谈中得到的是美国承认满洲和蒙古的现状。石井在同总统谈判有关日货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遭到抵制时指出，经济的抵制会对所有国家造成共同的威胁，因此必须禁止这种行为。他希望在伦敦会议上列强如果能同意保证遵循“经济安全”这一原则，那么这件事便可得到解决。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然而在另一方面罗斯福更易于接受。当石井提及有无可能洽谈一个仲裁和调解协定作为第一个步骤来消除两国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之时，总统回答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姿态，确实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举动”。参加会谈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也强烈地予以支持。［8］尽管石井-罗斯福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却产生了一种合作的气氛。日本方面认为这象征着两国关系的缓和，并对此表示欢迎。特别使石井感到高兴的是，美国政府尽量给予代表团“自始至终的热烈欢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为代表团提供一辆专车，把他们从旧金山一直送到首都。在华盛顿的一次午宴上，总统谈到了一段插曲，他曾祖父的轮船曾在中国海上营救过一位年轻的日本渔民中浜万次郎，并把他带到美国后送进马萨诸塞州的学校。罗斯福回忆说，中浜万次郎后来担任了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翻译——这显示了罗斯福家族与日本之间的历史渊源。这给日本客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罗斯福很明显地是想要通过新闻机构把他的讲话广为传播。这段象征“日美友好”的轶事在日本也曾流行了一时。格鲁大使在 6 月份也曾报告说，两个国家的关系正出现明显的改善［9］。在日本，甚至还有一些人鼓吹，日本和美国应达成一项反对英国的协议。虽然“日美友谊”的议论是极为天真和肤浅的，但是《东洋经济新报》（Oriental Economist）的一位国际版编辑石桥湛山却把整个一期杂志都用来讨论有关改善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10］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另一件事正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它对那些对日美关系持任何乐观态度的人不啻泼上了一盆冷水，这就是中美棉麦借款协定的签订。

就在石井访问华盛顿之前，中国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参加伦敦经济会议的途中也来到了美国首都。在 5 月份的下半月中，他在许多场合同罗斯福进行了会谈，5 月 29 日，宋子文同财政复兴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签订了一笔价值为 5 千万美元的棉麦贷款。根据这项协定（于 6 月 4 日宣布），财政复兴公司将向中国提供 5 千万美元的信贷，其中 4 千万美元将用来购买美国的棉花，其余的可以购买美国的小麦和面粉。中国政府将在中国出售这些物品，从中所筹集到的资金则用于中国的基本建设，诸如水利、公路和铁路等等。当然，就像在下面将要提到的那样，中美两国政府的官员们都看到了这笔借款还具有另外的政治目的。

有些促成这笔借款的美国官员将它看成推销过剩农产品的一个良好途径；国会中来自出产棉花和小麦诸州的压力尤为明显。农场贷款署（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署长亨利·摩根韬对这一方案也表现得格外热心。认为，“即使这笔借款永远得不到偿还，然而出售这批棉花将会提高国内的棉花价格，美国国内棉花库存的价值即可以增加 1 亿美元”［11］。但另一方面，国务院却提出异议。首先，国务院的官员们争论说：“中国人正用其关税收入来支付当前的支出，而不去偿付拖欠美国公民的债务”。而且，“向

中国贷款可能会触怒日本，对美国来说，日本是其棉花的最大主顾 ”［12］。总统最终驳回了国务院的反对意见，批准了借款协定。在同宋子文开始会谈之前，“ 罗斯福曾请摩根韬帮助进行意在承认苏联的会谈 ”。换言之，总统似乎一直将苏联看作是“ 反对日本入侵东方的一个潜在的同盟 ”。从这件事实中，约翰·M·布卢姆推断出，罗斯福批准借款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面不是经济上的考虑［13］。对于罗斯福来说，棉麦借款可能会表现为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另一种方式。（当然，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因素，即希望苏联市场能够吸收美国过剩的棉花。）不管怎样，这一事件暗示着日本人希望通过罗斯福所谓亲日态度来保持与美国之间的“ 友谊 ”是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的。他不仅仅是在感情上更多地倾向于支持中国抵抗日本，而且他还将日本看成是一个海上的竞争对手；因此罗斯福刚刚就任总统就立即决定加强美国海军舰队的政策［14］。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怀疑日本的贸易政策旨在“ 为了赚取其他国家的金钱而不惜压低价格将商品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去 ”［15］。

有一位名为清沢洌的日本记者对罗斯福的亚洲政策作了一个现实的评价。他在 1933 年 3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在日本出现的对于美国新政府外交政策充满乐观主义的情绪提出告诫。他论证说，罗斯福很可能继续其前任的亚洲政策，而且他还可能考虑承认苏联。清沢洌还认为，尽管华盛顿政府过于专门致志于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不能在亚洲实施一种果断的政策，但是如果日本要决定关闭亚洲市场的话，那么美国的这种摇摆政策将可能从不干涉主义转回到干涉主义。他警告说，这种新的干涉主义“ 可能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 ”。［16］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石井之前于 6 月 4 日抵达伦敦，在他参加世界经济会议期间，他还与一些伦敦的金融家会谈，目的是要获得借款和信贷，以便使中国能够购买棉纺机器、铁路设备、船只和其他设备。据斯蒂芬·恩迪科特的观察，宋子文“ 还说起组织一个类似四国银行团的国际合作机构，目的是为了排除日本 ”［17］。然而宋子文在英国的会谈失败了，因为宋子文不能对金融家们提供可靠的保证，他们意识到中国已经拖欠了现有的借款，而且还因为宋子文“ 对英国所认为的默认满洲国政权对中国有利的看法无动于衷。 ”［18］

接着宋子文又去了巴黎，在向法国试探有无可能贷款的同时，他亦同样提出了成立一个新的“ 顾问委员会 ”的建议。这个委员会将由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中国的专家组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意见。宋子文希望琼·蒙内特乐于担任主席。很明显，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西方新的贷款，在政治上建立一个不包括日本在内的新组织。这样，该委员会将是替代现存的国际银行团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国际银行团中美国和英国的成员托马斯·拉蒙和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开始时都支持宋子文的这个计划，他们相信通过秘密途径能够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甚至连在华盛顿的国务院远东司也不反对成立顾问委员会的这个想法，尽管他们一直强烈反对棉麦借款计划。［19］日本自然是竭力反对这个计划的，当国际联盟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将这个建议通知日本驻伦敦大使松平恒雄的时候，这位大使即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意见。这位日本官员认为，宋子文正企图利用所建议的组织来加强他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并助长反日运动。他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写道：“ 这个委员会的建立将标志着国际控制（中国）的开始，而日本则被排斥在外 ”，结果只会使其他国家联合在一起向日本施加压力。

基于这些原因，松平敦促东京政府尽力使其计划破产。［20］外相内田康哉是用不着别人挑唆的。7 月 15 日，他向松平大使下达了一道措辞强烈的指令：

“日本同其他国家一样热心于对中国的复兴提供友好的援助……，但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援助应该通过日本或是与日本合作来提供，没有日本参加是绝对不行的……。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确切情报，十分清楚，策划成立这个委员会是要用它作为反日行动的一种工具，或至少是用它来发展一个政治运动以反对蒋、汪、黄和其他人主张与日本谈判解决的努力”。（他提到的是蒋介石、汪精卫、黄郛这些被认为倾向于同日本谈判的中国领导人。）

十三天以后，外相在给驻南京公使有吉明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立场：

“有人主张我们应该争取使拉蒙和其他人保证该委员会最终要把日本包括在内。这样的一个方针就等于是对蛮横无理保持沉默……，并且，它对我们将来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时与中国和列强的交涉中都具有不利影响……。我们必须竭力阻止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但如果委员会不顾我们的反对而成立的话，我们则应在其活动中设置种种障碍，要使中国和列强都认识到，我们的观点是不容漠视的。”［21］

面对着日本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艾迪斯改变了支持宋子文计划的初衷，拉蒙立即也跟着改变了主意。宋子文同年夏天返回美国，8 月 7 日，他拜见了罗斯福总统。显然他是想得到总统对顾问委员会计划的赞同，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未能成功。［22］然而，这并不就意味着宋子文的积极努力都是毫无成效的。日本官员们十分怀疑宋子文的活动，并且试图获得有关他在美国活动的情报。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任职的一名特务显然曾经接触过宋子文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通信［23］。这些文件的内容证实了日本的怀疑。例如，根据所谓宋子文在 5 月 17 日致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一份报告，在这一天宋子文受到了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接见，胡佛对宋子文说，他赞同国际制裁日本的想法。他说：

“日本人已经违反了各种协定，侵犯邻国领土，而且我们似乎毫不在乎在太平洋地区挑起危机，对抗国际公理……。你们当然是第一个受害者，但美国和苏联也同样受到威胁，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组织一个联盟来共同制裁日本……。一旦俄国人变得更加强大，或者美国为了扩充海军而从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的复苏，那么我们的经济优势和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加上苏联陆军和海军，则足以压倒他们的嚣张气焰。”［24］

宋子文还报告了 5 月 18 日与罗斯福会谈的情形。尽管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见，但是参加会谈的有国务卿、财政部长、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以及总统特别助理雷蒙德·莫利。根据宋子文向国内的报告，这次会谈共商定了六点意见：

“1．首先，促成在华北的中国和日本军队实现停火，恢复和平，并恢复两国的商业和经济关系；

2．在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签订一项协议；

3．缔结一项永久性的互助条约；

4．尽可能增加对中国的贷款，以便帮助中国复兴；

5．在两年之内促成缔结一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空协定；

6．增加中国的海军实力。”［25］

宋子文回国之后，随即参加了于9月6日至8日在庐山举行的一次中国领导人会议。根据一名日本特务获得的文件，宋子文在会上兴奋地汇报了有关他推进中美合作的成功访问。他说：

> “美国政府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关心我们的复兴前途。因为在关于亚洲贸易和太平洋一般事务方面，美国的立场同日本的立场针锋相对，所以美国对我国保持着极为友好的态度。在我此次访问美国期间，我受到了最为热情的接待。以我同美国政府领导人的多次谈话为依据，我得出如下结论：为了中美合作的利益，美国热切希望美国、苏联和中国结成一个三国联盟，用以制止战争；只要财政状况许可，中国就应该尽量扩充其武装力量，首先建立四十个师的正规军；至于海军，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通过建造四十或五十艘潜水艇来增强其实力应该是容易办到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在长江上游的某一秘密地点，由美国派遣工程师并提供原材料，建造一家造船厂；关于空军，我们首先应该缔结一项航空条约，然后建立一支足以保卫国家、抵抗敌人入侵达半年之久的空军力量。”［26］

如果这份文件是令人可信的话，虽然在宋子文报告的许多内容中很明显带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但他希望在国际上孤立日本的想法并不是完全没有外国支持的。例如，宋子文在欧洲为通过由美国、俄国和中国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来促进反日计划进行活动时，根据威廉·C·布利特——美国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于7月8日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宋子文和苏联大使李维诺夫都同意，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在宋子文会见李维诺夫以前，他就对我说过，他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俄国的话，这对于遏制日本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7］。布利特认为，这样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他在给总统的电报中写道：“我认为我们不仅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外交代表，在俄国也应该有同样的代表，因为这两个国家今后在他们的对日政策上将有着密切的关系”［28］。布利特似乎同宋子文和罗斯福怀着同样的看法，即“苏联能够成为一个反对日本对外侵略趋势的堡垒”［29］。11月16日，当美国承认苏联政府之时，宋子文必然会振奋精神。他一定会认为，这将是在策划孤立日本的国际战略上的第一次重大步骤。在欧洲的每一场合，宋子文都重申这一话题，正如他对美国驻罗马大使布伦肯瑞基·朗所说的那样：“日本怀有吞并整个中国和俄国沿海省份的野心，随着日本在这些地区地位的稳固……那时日本就将着手他（宋子文）所认为的控制全世界的野心”。因此，宋子文真诚地希望“有一个反对日本的世界同盟”[30]。1933年底，他可以感到满意的是各国均已向这个方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这期间，日本并没有等闲视之。当然在开始时，外务省对美中棉麦借款还是持中立的态度。例如，亚洲司第一科在6月15日即表示，棉麦借款与其说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扩张的一个例子，还不如说是考虑美国国内问题的一个产物，即是解救因大萧条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工业的一个措施。这份备忘录还认为，虽然这一协定有可能加强宋子文和其他中国的亲美派系成员的力量，并可能阻挠自塘沽协定后开始出现的亲日势力的努力，但这一切对日本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这笔借款仅仅是暂时给中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宋子文的地位还不可能强大到使“中日关系进一步倒退”。而且，美国和其他国家看来也不会继续向中国提供类似贷款。因而对于日本

来说，最好不要急着去反对这项借款。［31］

然而，当宋子文在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活动日益为世人所明白的时候，日本的态度也就变得强硬起来了。特别令日本感到不安的是宋子文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取代四国银行团的计划，和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推动对中国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这个委员会任命路德维格·格西曼为其技术代表更使日本感到不满，因为日本人认为他特别敌视日本。这些活动以及宋子文和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会谈的报告都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东京的官员们意识到，在各种借款计划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结果，日本政府对棉麦借款不再那么处之泰然了，并决定向华盛顿转达其反对态度。早在 8 月间，宋子文同罗斯福会谈之后不久，出渊胜次大使即拜访了国务卿赫尔并对他说，美国“出售棉花和小麦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日本”。他表示希望美国政府“会记住这点，并在采取任何将要或有可能影响日本利益的步骤之前，会先同日本进行磋商”。［32］

9 月下旬，根据借款协定，首批货船装载着 1．2 万包棉花抵达上海。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年中国的棉花获得了大丰收。棉花价格下跌，国内所需的原棉已经供过于求，棉纺厂正不得不缩小其生产。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进口美国棉花的质量要比中国原棉高，为此不太适用于中国的棉纺厂。此时中国政府才发现在中国工厂中分配新近到货的美国棉花是很困难的。作为摆脱困境的一个方法，中国官方转向在上海的日本棉纺厂，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棉花。当时这些工厂对这个建议是完全接受的。日本工厂生产的棉织品在满洲和华北的销售量已经上升，棉纺厂正以全力进行生产，而且，当时因为日本正在抵制印度棉花，因此，购买从美国运到上海的棉花可能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选择方案。基于这些原因，日本在上海的棉纺厂表示有意接受中国的提议。

然而东京政府却对这个想法感到不快。此时广田弘毅已经取代内田就任外相，而且有关宋子文活动和庐山会议的报告正陆续到达。因而，东京的官员们毫无心情与中国合作来实施美棉借款。根据外务省于 10 月份准备的一份内部文件称，让日本的工厂接受中国的提议以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作出补偿，诸如抑制反日活动，或在关税事务上予以让步，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办到的。然而，以帮助中国人摆脱他们在美棉问题上的困境。来换取这些微不足道的让步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有少量美棉运到中国，使得中国不可能通过销售美棉而获得大量钱款的话，那事情还好办得多。事态如照此发展的话，中国和美国都会后悔不该签署这项考虑政治因素的借款协定。这一结果将使宋子文丧失信用，并且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内亲美派失去政治影响。日本甚至乐于考虑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使棉麦借款完全失败。［38］

这一强硬立场遭到了有吉明公使的反对，他反映了在上海的日本工厂界的观点，他辩解说，不购买美棉的这个政策将是无济于事的，而且还可能产生消极的反响。“一个明智的民族政策不是迫使只有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作出牺牲”，倒是应该允许他们在没有官方干涉的情形之下去处理棉花问题［34］。然而外相广田却不接受这个劝告，并饬令有吉明将东京的政策告知在华的日本工厂主。广田说，如果美棉比其他种类棉花便宜得多，劝说这些工厂不去购买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应该在“政治上引导”他们，以便“在事实上中止”棉麦借款［35］。广田还打电报给驻华盛顿的出渊大使，表示“我们的希望是事实上消灭这一借款计划”［36］。在上海的日本工厂主并没有气馁。

1934 年 1 月，他们委派前外交官船津辰一郎为代表，前往东京提出申诉。有吉明公使也对广田的政策感到不满。他争论说，对于日本来讲，最好的策略是应该使中国人认识到，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合作，他们的复兴任务就不会成功；日本应该更积极地向中国提供合作，以免逼迫中国完全转向西方列强，而留下日本阻碍外国援助中国的这个印象［37］。但是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禁止日本工厂购买美棉的这一政策已付诸实施，外务省的官员们对船津说，棉麦借款是一项政治借款，是宋子文派系计划排斥日本而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的一个产物。日本的政策决不会屈从于中国人想让列强自相残杀的那种诡计。［38］

在短期内，这个政策似乎是成功的。虽然最初价值 4 千万美元的美棉——相当于中国棉纺厂一年半的正常消耗量——已经规定装运，但是到 1934 年 3 月底为止，购买的美棉仅仅只有 450 万美元，或大约 9 万包。毫无疑问，这是由于日本棉布商拒绝购买的结果。嗣后，美棉信贷缩减到 1 千万美元，但这仍意味着中国还必须另外再承受价值 550 万美元的棉花约 11 万包。至于小麦，中国人能够花费价值 600 万美元的信贷，其余的 110 万美元则用于购买美国的面粉。换句话说，棉麦借款的数额从 5 千万美元减低到 1．71 千万美元，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日本政府阻止购买从美国来的棉花和小麦的政策无疑获得了成功。

广田选择这一时机宣布日本政府对于外国在中国活动的政策并不是偶然的。所谓天羽声明是由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在 4 月 17 日根据广田于 4 月 13 日致有吉明的训令而公布的，这一训令中声称日本政府试图反对外国在中国损害日本利益的活动。这项政策肯定是部分针对棉麦借款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发展的计划。在这之前，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已经在一些场合中对棉麦借款表示不满。但国务院对此抗议却不屑一顾，他们争辩说，国务院对财政复兴公司的活动没有发言权。当时，日本人曾企图向财政复兴公司施加某些影响，但他们意识到，在美国人的主要兴趣是要解决过剩棉花问题的时候，要想做出一些有影响的事是很困难的［39］。以亲日面貌著称的摩根公司（Morgan Company）的托马斯·拉蒙特曾向出渊大使保证说，棉麦借款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40］。但实际上日本人很清楚，拉蒙特和他的同事没有被找去商量有关借款的事，这笔借款主要是通过罗斯福和摩根韬而进行的［41］。总而言之，借款这一事件，加上“顾问委员会”计划、拉西曼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的活动以及宋子文谋划成立美、苏、中三国协定，无疑都是天羽声明出笼的背景。

这一声明在国外被看成是“亚洲门罗主义”的象征，它反映了日本政府企图“关闭中国的门户”。外务大臣广田获悉后大为吃惊，他连忙向外国政府保证说，日本反对的仅仅是其他强国将日本排斥在中国之外的联合行动，而并不是反对为中国经济发展而提供的国际间合作或是门户开放本身这个原则。不过这一事件暴露出在日本仍然有一些人对西方援助中国的计划持怀疑态度。这些势力当时在日本政治上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强。

到 1944 年的秋天，美国借款计划的失败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中国当局觉察到全部承担由美国运送来的棉花是很困难的，遂同中国棉业公司经理张公权打交道，让他同日本厂方合作，共同购买进口美棉。有吉明公使劝说接受这个新的计划，他认为这将会打开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道路［42］。广田赞同这个意见，正如他对有吉明公使所说的那样，日本在消费美国进口棉花

问题上可以同中国合作，因为它将会向中国人表明，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帮助，中国人就永远不能期望将此计划付诸实现。广田接着说，必须向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中国企图再次玩弄“不正当”的外交手段，那么日本将不仅会撤销这个合作计划，甚至还要破坏这一计划［43］。就这样，原先策划促进加强两国之间关系的美中借款协定，到头来却怂恿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干涉。

显然，这是由于美国政府经办不当的一个实例。同样，1934 年付诸实施的那倒霉的购银法案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见罗斯福政府的早期对华政策反映了国内的经济利益；总统对于国会内压力的敏感常常取代了国务院的意见。其结果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缺乏连贯一致的理智和分析，这便使得亚洲的国际事务趋于更加混乱的局面。对中国的政策也是这样。宋子文的心计只是帮了倒忙；棉麦借款不能说对中国的经济毫无裨益，但却使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态度。尽管宋子文关于建立美、苏、中协定的计划在中日战争爆发后最终正式成立，但这并不能说是他想象力的一个产物。

在日本有一些人对于这些发展的趋势感到不快。这些“温和派”打算同美国和英国保持合作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例如，大藏相高桥是清就认为日本应该参加顾问委员会［44］。大藏省次官津岛寿——也希望在中国与美国和英国合作。这种情绪在以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和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为中心的日本财政界中一直是十分强烈的。在外交官中间，有吉明公使的温和观点也已经引起关注。但他并不是孤立的，其他一些外交官诸如东乡茂德、吉田茂和佐藤尚武也具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日本应该与美国和英国合作以促进中国的发展。然而棉麦借款这一事件却预示这种看法将越来越不被重视，以致日本制定政策的选择面将越来越窄，直至日本发现它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太平洋战争的可能性。

注释

［1］东乡茂德：《时代的一面》（An Aspect of An Era），东京，1952 年版，第 97—98 页。

［2］鹤见祐辅在《中央公论》（Chuokoron）上发表的文章，1933 年 4 月。

［3］约瑟夫·C·格鲁（Joseph C. Grew）：《使日十年》，（Ten Years lnJapan），日译本，东京，1948 年版，第一卷，第 76 页。

［4］“伦敦经济会议：华盛顿预备会谈”（“The London Economic Conference： Preliminary Talks in Washington”），〔日本〕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5］同上书。

［6］同上书。

［7］同上书。

［8］同上书。

［9］前引格鲁一书，日译本，第一卷，第 125 页。

［10］《东洋经济新报》（Oriental Economist），1933 年 6 月 24 日，第 25—53 页。

[11] 约翰·M·布卢姆等（John M. Blum，ed.，）：《摘自摩根韬日记:危机的年代， 1928—1938》（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The Years ofCrisis， 1933—1938），波士顿，1959 年版，第一卷，第 53 页。 [12] 同上书。

[13] 同上书，第 53—54 页。

[14] 斯蒂芬·佩尔兹（Stephen Pelz）：《向珍珠港前进》（Race to Pearl Harbor），坎布里奇，1974 年版，第 75 页。

[15] 埃德加·B·尼克松等（Edgar B. Nixon，ed.，）：《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对外事务》（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纽约，1969 年版，第一卷，第 277 页。

[16] 清沢例（Kiyosawa Kiyoshi）发表在《外交杂志》（Revue Diplomatique）上的文章，1933 年 3 月 15 日。

[17] 斯蒂芬·L·恩迪科特（Stephen L. Endicott）：《外交和企业》（Diplomacy and Enterprise），坎布里奇，1975 年版，第 35 页。 [18] 同上书，第 35—36 页。

[19] 多萝茜·博格（Dorothy Borg）：《美国与 1933—1938 年的远东危机》(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坎布里奇，1964 年版，第 91 页。

[20] 1933 年 7 月 13 日（收文时间）松平恒雄致内田康哉函，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21] 1933 年 7 月 15 日内田致松平函，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Archives）。

[22] 参见三谷太一郎:“国际财政资本和亚洲战争”(“International FinanceCapital and the War in Asia”)载《近代日本与东亚》(Modern Japanand East Asia），东京。1980 年版，第 135—141 页；安·特罗特（ANNTROTTER）：《英国与东亚》（Britain and East Asia），伦敦，1975 年版，第 66—67 页。

[23] 1933 年 9 月 21 日日高信六郎致广田弘毅函，外务省档案（ForeignMinistry Archives）。

[24] 宋子文致汪精卫、蒋介石函，1933 年 5 月 17 日，（日本）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25] 宋子文致汪精卫、蒋介石函，1933 年 5 月 18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Ministry Archives）。

[26]“关于庐山会议的报告，1933 年 9 月 6—8 日”(“Record of the LushanConference， Sept．6—8， 1933”），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Archives）。

[27] 前引尼克松一书，第一卷，第 292 页。

[28] 同上书，第一卷，第 294 页。

[29] 前引布卢姆一书，第一卷，第 56 页。

[30] 前引尼克松一书，第一卷，第 319 页。

[31] 亚洲事务局第一科拟定之备忘录，1933 年 6 月 15 日，（Mome by firstSection， Asian Affairs Burean），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Archives）。

[32] 《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3 年，第三卷，第 508 页。

[33] 外务省备忘录（Foreign Ministry Memo），1935 年 10 月 13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34] 有吉（明）致广田（弘毅）函，1933 年 10 月 18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35] 广田（弘毅）致有吉（明）函，1933 年 10 月 21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Ministry Archives）。

[36] 广田（弘毅）致出渊（胜次）函，1933 年 10 月 23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37] 有吉（明）致广田（弘毅）函，1933 年 9 月 28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Ministry Archives）。

[38] 广田致有吉函，1934 年 1 月 12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Archives）。

[39] 武富（敏彦）致广田函，1934 年 1 月 19 日，外务事档案（Foreign MinistryArchives）。

[40] 拉蒙特与出渊会谈备忘录（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LamontandDebuchi），1933 年 11 月 10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Archives）。

[41] 近卫（文麿）致木户（幸一）函，1934 年 6 月，木户文件，（KIDOPapers），东京，1966 年，第 157 页。

[42] 有吉致广田函，1934 年 9 月 17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 MinistryArchives）。

[43] 广田致有吉函，1934 年 9 月 29 日、10 月 5 日，外务省档案（ForeignMinistry Archives）。

[44] 参见三谷太一郎前引文章，第 139 页，亦参见伊豫谷登士翁："美国的对华棉麦借款与日本"（The Cotton and Wheat Loan and Japan），载小野一郎、吉信肃编《两次大战期间的亚洲与日本》（Asia and Japen Between the Wars），东京，1979 年版，第 97—122 页。

（郑会欣译汪义明校）

日本在 30 年代的对华政策——两种选择

臼井胜美在 20 世纪的 20 和 30 年代,亚洲的国际事务曾受到华盛顿会议体系的影响；特别是九国公约就是它的直接结果。该公约规定：日本、英国、美国及其他几个国家共同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并且不在中国谋求任何特殊的权利。结合国际联盟盟约（1919 年）和其后巴黎非战条约（1928 年）的惯例，九国公约规定了中日关系运行的国际环境。

所有强国均承认中国和日本在地理和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关系；可是华盛顿会议曾显示了一点：就是日本必须决定其是否保持并进一步加强或者减弱以致最终结束此种特殊关系。虽然此种决定在局部上受制于其他国家的压力，但最终抉择则必须由日本自己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是在政友会首脑原敬为首的首届政党内阁领导下准备参加会议的。不幸的是他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在东京被一名右翼青年分子暗杀，耐人寻味的是，在他被刺的当天（1921 年 11 月 4 日）他曾对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说：今后日本必须自谋出路，其方法不是通过领土扩张，而是通过发展贸易［1］。日本参加会议的主要代表加藤友三郎海军上将在 1921 年 11 月 19 日一次专门讨论远东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曾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据他声称：日本无意在中国任何地方“扩张领土”，并表示“无条件和无保留”地信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诸项原则。日方需要中国的原料和粮食，但不谋求特权，而且欢迎“公平与诚实的竞争。”［2］这些正是九国公约的主要原则。可以说，至少当时日本是明确表示接受并支持这些原则的。本文将就日本如何逐步改变其立场以至在 30 年代后期全部背弃这些原则的情况，进行分析。

1931 年 9 月“满洲”事件的爆发自然是第一次严峻的考验。9 月 22 日在日本关东军侵占了南满的几个重要城市以后的第四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即告诉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出渊胜次，军事行动不但影响了中日关系，而是对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所有签字国来说，都是一件严重的事件［3］。美国作为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发起者，表示其关切当然是很自然的事。当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国联理事会通过采取解决争端的步骤时，华盛顿派出观察员到达日内瓦。不过只有在日本无视国际联盟会议于 9 月 30 日和 10 月 24 日做出敦促停火的决议，把军事行动扩展到北满洲以后，美国才作出明确的表态：认为日本违反了这两个条约。史汀生在 11 月 19 日告诉出渊，日本军队进攻并随即侵占远离南满铁路地域几百公里以外的齐齐哈尔是违反了九国公约和视战争为非法的巴黎条约［4］。不过由于某种原因出渊未能将这一信息传达给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其后于 1932 年 1 月初日本军队侵占锦州时，史汀生通知中国、日本及九国公约的其他签字国，宣布其“不承认政策”，声称美国不能承认通过违反这两项条约而形成的任何事实或条约［5］。从此九国公约便开始变成为美国与日本之间的主要争论点。

日本采取了坚守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的市场。如日本政府在 1 月 16 日递交给美国驻日本大使卡梅伦·福布斯（CarmeronForbes）的一份照会中声称日本的远东政策是以信守门户开放原则为其“主要特征”的。然后在履行九国公约的进程中必须考虑到中国事态的动荡局势是签约时所始料未及的。不过照会强调了日本从未怀疑九国公约的继续有效；此条约仍然完全有效［6］。

---

① 日本奥布林大学历史学教授。

2 月 16 日当国联理事会要求中国和日本信守上述条约时，日本持相同的立场。日本政府在 2 月 23 日的复文中断然声称：“ 中国已不再是符合国联所规定的一个有组织的国家 ”，把中国说成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是虚构的。然而照会却声明：“ 日本完全信守其对九国公约的全部义务。 ” ［7］ 自从 3 月 1 日“ 满洲国 ”在日本占领下建立以后，像这样明确的表态则变得比较困难了。那时犬养毅的新内阁已经在东京掌权，新内阁不得不承认“ 满洲国 ”的成立违犯了九国公约，特别是违反了维持中国行政完整的主要原则，它宣称这一“ 新国家 ”的产生是“ 顺乎自然的 ”，以此来为自己辩护［8］。新内阁还迫使这个“ 新的国家 ”“ 保证尊重各项既存的条约并宣布其将遵守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 ”。犬养毅内阁希望通过这类措施可使“ 满洲 ”事态的进展不致被看做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其他的国际条约。

然而在 1932 年 5 月 15 日犬养毅被暗杀，后继者海军上将斋藤实的内阁则明显地放弃了这种谨慎的姿态。新外相内田康哉以前曾是南满铁路的董事长，与关东军有紧密的合作。上届内阁决定暂时对“ 满洲国 ”不予外交上的承认。而内田却坚持尽早予以承认。他认为：这是解决“ 满洲 ”问题的唯一办法。日本方面的态度趋于强硬得到英国的充分理解，英国驻东京大使林德莱（F. Lindely）于 6 月 23 日对日本外务次官有田八郎说：“ 九国公约也许不会阻止“ 满洲 ”宣布独立，但公约确实对各签字国规定了不帮助这种行动的义务 ” ［9］ 可是内田拒绝了此种解释。当 7 月 12 日国际联盟调查团团长李顿爵士访晤了内田外相，询问日本对有关“ 满洲 ”问题是否会同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进行协商时，内田答复是：“ 满洲国 ”是通过当地人民自决而建立的一个新国家，九国公约对之不适用。因此对于承认“ 满洲国 ”一事，日本不认为是违反了该条约，并无意与其他签字国进行磋商。 ［10］

这个观点得到了日本国际法权威人士之一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立作太郎的支持。他与外务省关系一直很密切。他的《满洲被承认的问题》一文发表在 1932 年 9 月出版的《中央公论》杂志上，他辩解说：只有某个强国“ 意图 ”侵犯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时，才算是违反了九国公约。立作太郎文章认为当中国丧失其主权和行政的完整是由于某一地方人民的自决行动的结果时，所有条约的签字国没有责任去帮助中国收回失土。综上所述，文章认为如果“ 满洲国 ”的独立是当地居民自由意志的产物，则外国没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中央政权镇压其独立；相反，对此新国家在外交上予以承认是完全正当的。立作太郎的基本论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当一个国家采取行动行使其自卫权时，所有条约的责任义务都会失效。 ”他继而宣称，“ 满洲 ”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值得一提的就是李顿在 6 月告诉内田说：只有在中国采取了冒犯日本的行动，以及这个新国家是由人民行使自决权所建立的情况下，承认“ 满洲国 ”才是正当的 ［11］ 。李顿调查团的结论否定了上述情况的存在。在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承认“ 满洲国 ”17 天以后，该调查团于 10 月 2 日提交了报告［12］。该报告指出，第一，日本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和此后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自卫行动 ［13］ 。第二，“ 满洲国 ”不能够被视为是当地人民自愿意志产物。它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存在 ［14］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根据调查团的调查，导致“ 满洲国 ”建立的日本的行动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国际联盟在原则上接受了此报告，致使日本于 1933 年 3 月底退出了这一世界性组织。虽然如此，值得一提的是，东京继续坚持

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并未超出自卫的合理范围，而“新国家”的建议是出于当地居民的愿望，因为日本没有违背国联的条约、九国公约、巴黎条约以及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日本在退出国联时提交的照会上坚持认为：日本退出国联的理由是它与国联在有关条约和协定上观点严重分歧。换言之：日本仍然认为这些条约是有效的，日本的所做所为只是阐明了这一论点：日本对条约的解释与调查团的不相一致。［15］虽然如此，另外一种思想很快在日本成为主流。它们认为现存的各项公约和条约其本身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日本在退出国际联盟的同时，著名记者清泽冽指出：事实上所有日本关于“满洲”事件的评论都表明了自己是正当的，并断言：日本是绝对正确的；而国际联盟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封锁无碍于这个国家的生存，而日本的退出将削弱国联［16］。这种思想表明，当日本在全世界处于孤立时，需要在国际关系中推出一种新观念，从而摆脱由国际联盟、九国公约和巴黎协定所形成的一战后和平格局，从理论来为日本的行动辩护。

首先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是当时贵族院副议长近卫文麿。这位青年很快就被看作是日本政界的明星。1933 年 2 月正当日本退出国联时，他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改造世界的现状》的论文［17］。文章中的观点在其早期的“抛弃英美为中心的和平原则”一文中已有所表述［18］。正如他过去所说的那样，他声称像日本这样富有活力和开发力的国家却一直局限于狭小的领土而不得不承受低生活水平的痛苦，而像澳大利亚那样的国家虽然只有极少的人口，而却赋予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国际关系现象中固有的不公平。“如果和平与公正是基于试图永久维持建立在这种不合理基础上的现状的话，这又算什么和平与公正？总之，世界大战就是满足于维护现状的各发达国家坚持和平，反之，反对现状的国家则成为侵略者。把这种冲突称之为正义与暴力间的斗争，乃是伪善的说法。”同样西方列强想以和平的名义来反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或把日本称为和平与正义的敌人是属若谬。

1933 年 6 月近卫文麿出任贵族院议长，1934 年 5 月在著名的天羽声明发表后一个月，他首次访问美国。在临行前他告诉记者：日本必需设法使其他国家理解，日本饱受人口过多之苦。人口需要有出路，而且其廉价货物因高关税在海外市场上受到排挤。使日本遭受损失［19］。他访美时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其中他特别要会见的人物之一就是爱德华·豪斯上校（Colonel Edwardm. House），他曾听到说豪斯是一位倾向于日本的美国人［20］。近卫文麿于 8 月 1 日返回日本。虽然人们认为他与豪斯的会谈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他对 1935 年 9 月出版的《自由》杂志中豪斯所发表的题为“在国际间需要一个新政”一文甚感兴趣。按近卫的概括，豪斯在该文中述及日本领土狭窄而人口膨胀，有权谋求出路。所以如果日本能被允许开发世界上还未被开发的大片地区以增进其生产力，未必不是件好事情。在近卫看来，豪斯认为世界是无法稳定的，除非地大物博的国家与地少物贫的国家分享某些财富，该文给近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于 11 月 22 日用同样的论点发表了公开演讲［21］。和豪斯一样，他声辩战争的原因是国家间资源和空间的分配不公平；只要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盛行于世，就没有一个类似于国际联盟那样的国际组织能维持现状，保持和平。所以日本过去信守这种按照英美意向旨在维持现状的条约——诸如九国公约，巴黎条约等国联的协议实为错误。只要日本受这些条约束缚，就无法为其在满洲的行动辩护。因此，“我们应该准备超越基于维持现状的这些和平原则。”

近卫的外交政策新概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当时（1933 年 5 月至 1936 年 4 月）任外交次官的重光葵对近卫的主张作了详尽的发挥。他在 1935 年 8 月 1 日所写的一篇以《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为题的备忘录的第二章“维持现状还是打破现状”中说道：

> 在世界大战以后维持和平被定为国际政治的原则目标……和平是通过国联的机构和巴黎条约来维持的，但这仅只是变相地为了维持现状的一种表面和平……最积极承担维持现状义务的国家都是胜利者，特别是那些地大物博的国家，其资源和土地占地球所提供的大部分。因为资本主义者惯于主张维持现状，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他们也照此惯例……这些国家已经得到了他们能得到的一切，于是就谈起维持现状来。这种论点在今天正在失去其合法性……这种维持现状即等于和平的观点，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了。［22］

显然重光葵的话反映了近卫的思想。他们都强烈鼓吹打破现状，并设想创立一种能为日本在“满洲”的行为进行辩护的思想体系。

因此维持现状等于是国联、九国公约、巴黎条约的同义词，所以如果日本要破坏现状，它就不得不对这些条约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特别是九国公约必须废弃。它被视为实行日本新外交政策的障碍。1936 年 3 月在以广田弘毅为首的新内阁成立后不久，举行了高级外交官员会议，并且通过了日本最终将废弃九国公约决定。然而公开坚持认为公约的不合法性，会不必要地激怒世界舆论，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所以最好是暂时秘而不宣。但也不再确认日本会遵守这些公约［23］。4 月 2 日，有田八郎出任外相，他继续执行其前任的外交政策，宣称日本将实行单方面外交。他对参加太平洋关系协会的第六次会议的美国代表团说：如果会议涉及到日本在亚洲的政策或日本基本生存权利的问题时，代表团应该准备退出会议。［24］

不过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在 1936 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东京在与南京谈判稳定两国间的关系中提出苟刻的条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中国外长张群的谈判，因关东军在内蒙古的鲁莽行动而遭到破坏；但即使是没有这种行动，只要日本坚持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谈判也会毫无结果。正如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指出的那样，广田的外交特征是遮遮掩掩和自以为是［25］。在这一年年底所发生的西安事变，即是中国不可避免地对广田外交作出的反应。在这一事件中，国民政府中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队对蒋介石的扣押和最终的释放，表明了反日情绪的增强。针对这一事态的变化，近卫曾于 1937 年 1 月 1 日在《朝日新闻》撰文宣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野心。同时批评中国人继续依赖于美国和欧洲。他写道：日本和中国之间真正的友谊不是“几百次的谈判或几千次的宣言”，而是两个国家的“独特联合。”他所谓的联合是指由中国提供取之不尽的原棉、煤、铁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与日本第一流的技术间的联合，如此则双方有利。“由于缺乏能力而使天赐的丰富资源未能得到开发，这无异于亵渎圣灵。而协助开发这些资源乃是一种友好的行动。”令人惊异的是，直到那时近卫还会认为这种观点将为中国人所接受。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近卫的观点，在日本驻法大使佐藤尚武 1936 年 1 月 27 日的一次演说中就可以找到相反的观点。他在巴黎一次外交事务研究小组上的讲话中谈到“日本的工业化和人口问题。”［26］他阐述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四种可供选择的设想：对外移民，农业改革，工业化结合扩展贸

易以及控制生育。他认为除第三项外，其他的都是没有效果的。一项对外移民计划旨在解决每年增长的一百万人口是不可能实施的。农业改革由于日本可耕地有限，最多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至于生育控制只能在遥远的将来可能有效。所以只有促进工业和海外贸易才可以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使其能够丰衣足食。可是对于像日本这样一个原料贫乏的国家来说，工业化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原料资源，所以日本将坚决反对任何阻碍其得到资源的企图。在这一点上佐藤部分同意了近卫的观点。和近卫一样，这位外交官承认自然资源在各个国家中的分配是不均的，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面临着前景未卜的处境。不过佐藤指出某些海外的观察家正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例如，他引用了豪斯的文章和在 1935 年 9 月 11 日国际联盟全体大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的讲话。这位英国官员指出在各工业国间保证必需原料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借此可以消除对一些国家完成垄断原料的恐惧。

佐藤说豪斯的论文同样表示了对日本资源和人口问题的理解，强调要研究不会引起战争或引起其他强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指出，佐藤对豪斯一文的理解较近卫的好。因为豪斯明白表示对日本退出国联和废除海军裁军条约感到不安。他认为日本有两派人：军国主义分子和像牧野伸顕的温和派。他并对前者影响的加强感到不安。豪斯想鼓励温和派重新掌权，他相信这样可能不通过战争使许多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近卫只是断章取义地说明其对原料分配的不平均的论点，却忽略了豪斯文章中的前提。相比之下佐藤采取了比较深入全面的观点，并考虑到豪斯的建议对发展一个避免战争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一种有益的贡献。这位日本外交官辩解说，除了原料以外，确保世界市场的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没有国家可望能促进其工业发展。因为自第一次大战后，自由贸易的道路上已障碍重重；关税壁垒，限额和易货制度已成为常规，所以国际贸易的增长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对日本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原料和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不用战争而取得上述东西，建立各种国际协商和协议制度将是重要的。这种强调避免战争并且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的观点接近于豪斯的本意。

1937 年 3 月 1 日，在上述讲话发表一年多以后，佐藤大使回国休假，随即十分出乎意外地被林铣十郎将军为首的新内阁任命为外相。林铣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所以佐藤的任期也是极为短暂的。不过他仍然尽其所能为日本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开拓了新的局面。与其前任采用高压手段相比，他谋求对中国平等相待以使双方外交关系正常化。除了其他一些努力，他还试图改变日本使华北分裂出中国的政策，转而促成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统一。当然佐藤独自一人是不可能完成此种改变的，但幸运的是军界中有一批人也想修正对华政策。自满洲事件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努力，佐藤想鼓励军界的这种行动，而且幸运的是国民党政府也表示欢迎佐藤的主动行动。虽然满洲问题仍有困难，但中日双方好像正在共同避免双方关系的极度恶化。［27］在此期间佐藤不失时机地谋求实现其基本目标：从海外得到资源和打开市场。在 5 月 6 日所举行的一次国外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他表明日本无意重新划分殖民地，但坚持原料的公平分配与其出口的公平待遇［28］。那一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告诉各县长说：日本政府坚持要求“恢复无限制的国际通商与资源的开放。”这是国家存亡的必要条件［29］。他深信唯有实现上述要求方能避免战争。在 5 月 24 日东京的自由贸易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声称：

我们外交的出发点是要避免战争。战争决不会带来利益，不论最后结局如何，战争总是造成灾难。如果战争作为获得领土和扩大势力范围的手段得以废除，那末解决人口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取得和开发海外的原料和资源，以及通过消除海外市场的各种限制。”日本将坚持上述条件；如果其他国家接受这些条件，这是“消除战争建立和平”的一条最好的道路。

此种设想并非不现实或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例如，在 1936 年 10 月国际联盟的一次全体大会上曾提出建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原料问题。”这个决议指出考虑在所有国家间，不管是否是国联的成员，进行原料商业交易的时间已经成熟。该委员会于 1 月 26 日正式成立。有 17 个国家派了代表，其中有瑞士、比利时、荷兰、阿根廷、葡萄牙、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苏联、日本和南非。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美国两个非国联成员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德国和意大利则拒绝参加。该委员会于 1937 年 3 月 8 日至 12 日、6 月 6 日至 25 日、9 月 1 日至 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三次会议，并于最后一次会议上起草了一份报告。会议从一开始就把议题限制于各类商业问题，而不愿涉及到政治上敏感的事情；如现有殖民地的重新分配或原料的禁运以阻止侵略。这个委员会的产生就已经显示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国际事务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在首次会议上英国代表为李滋罗斯（Federick Leithross），他曾为重整中国财政做过许多工作；日本首席代表为首藤安人，此人曾任日本驻柏林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国际经济委员会的成员。他指出了日本特别关切的三个问题［30］：第一，日本谋求一个协议，不管是临时还是长期的协议，以消除日本在取得原料的途径上的障碍；

因为日本以工业化解决其人口问题需要原料。第二，应该接受在不发达地区中居民和外国人的同等待遇的原则，其中包括资本、技术、劳工的自由流动。第三，所有有碍自由贸易的障碍，均应排除。我们可以看出佐藤外相的高明手腕。在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有关这些要求均有所反映。举例言之，报告指出：像日本这样一个只有靠进口原料才能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保证其得到原料并将其工业制品销售到海外市场是绝对重要的，虽然没有提出实现这些保证的具体建议，但至关重要的是委员会认识到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的重要性。报告还指出：这个问题与扩军问题紧密相关。军备竞赛已使对原料的需要增加，因而使原料紧缺而价格高涨，同时，为了进口原料，势必耗竭外汇。［31］虽然上述这些考虑未能实现，但日本参加了该委员会就已意味着在佐藤的领导下日本重新肯定了国联和其他条约所规定的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结构，而且为了避免战争设法用友好的方式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虽然不幸的是，佐藤外交只持续了三个月，但它的重要性同币原外交不相上下。自从 1931 年 11 月币原卸任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第一次在恢复其真正的自主性。对佐藤来说深为遗憾的是，他的继任者广田（6 月间近卫文磨内阁中，他再度出任外相）没有认真考虑继续他的政策，佐藤离职前夕在议会一次演说中告诫说：选择战争还是和平均在于日本。诚然如此，近卫新内阁很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华战争。近卫出任首相时，发表了一项声明：保证他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国际主义的真正和平，和基于社会公平的国内政策。”据他私人备忘录所载：他深信其内阁有着缓和各敌对集团间冲突的使命。在国际事务中设法消除“穷国”与“富国”间的敌对。他认为国际正义要求各国间平均分配世界的土地，但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另一个解决危机的

良方则是保证在全球范围自由取得原料和市场。但是这也面临许多困难，因为在经济中的民族主义在盛行。在这种环境下，日本应该如何选择？“作为一个‘穷国’，我们必须为自己保留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利以待国际正义成为现实。我们的大陆政策是要保证此种权利。只要世界上不存在国际正义，该政策就是公正的。”［32］这种思想是先前提到的近卫观点的延续，即让中国人掌有其自然天赋资源，而不让日本人作为友好的表示帮助其开发是违背上帝的大罪。

7 月 7 日芦沟桥事件爆发，迅即在上海地区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8 月 15 日近卫内阁发布了一项措词强硬的声明：宣称日本将对中国政府鼓动其人民反对日本作出强烈的反应。近卫暗示：根据“保障生存权利的大陆政策”这些措施都是正当的。中国方面对此做出反驳；并于 8 月 15 日通知国联：日本的行动侵犯了九国公约，国际盟约和巴黎条约。9 月 13 日中国正式请求国联采取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在 9 月 10 日国联召开了第九十八次会议，三天后随即召开第十八次全体大会。日本反对国联的干涉，当时外交部发言人河相达夫宣称日本并非国联的成员，所以，它无意受国联的制约。

河相进一步宣称：日本的军事行动意在促使中国人放弃其反日政策，这完全是正义公正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出于自卫。不管怎样，争端只应由两个国家自行解决而不必通过国联的插手干涉。［33］

对中国的呼吁，国联方面的反应是把这事情委托给 23 人顾问委员会负责处理，该顾问委员会系由 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一项决议而建立起来的。美国这时已是其成员之一，但在 1937 年 9 月 21 日的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决定邀请日本、中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参加。中国和澳大利亚应邀与会，但其他两国则拒绝参加，日本重申中日间麻烦的公平解决，只有通过当事双方的协商，才可能实现，在 9 月 27 日该委员会的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控诉日本军队进行不人道的空中轰炸。英国的克兰伯恩（Cranborne），苏联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法国的伊冯·德尔博斯（Yuon Delbos）及其他代表一致通过一项谴责日本对不设防城镇进行狂轰烂炸，屠杀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中国公民的决议。该项决议同样在 9 月 28 日举行的国联全体会议上被一致通过。这样日本乃处于被全世界谴责的地位。

随后该委员会相继于 10 月 5 日及 6 日向大会提出两份报告并均被通过。第一个报告指出：日本军方大规模的陆、海、空的军事行动已远远超出了触发危机的地方事件的范围，这不能被认为是正当自卫。日本因此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所承担的义务，［34］。鉴于日本不遵守其条约义务，第二个报告建议大会召开同为国联成员的九国公约签字国的特别会议［35］。为响应这些提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 10 月 5 日在芝加哥作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号召孤立破坏和平的国家［36］。次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项重要声明，美国已得出同国联相一致的结论；那就是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

日本授权由外交部发言人河相发表声明作答，他辩解说：按照“穷国逻辑”日本的政策是正义的：

> 世界是全人类的。诚实、勤劳的人民有资格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幸福生活。然而事实上懒惰的人民基于他们过去的累积仍然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而一些诚实、勤劳的人民却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还能有任何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近五十年来日本人口增加了一

倍，一直不得不为其狭小的本岛寻求出路。但日本移民遭到各国的禁止。美国拒绝接受我们的移民是违背人类的天然原则的，日本人民对这一种族歧视已经表示最严重的遗憾。然而世界上“穷国”与“富国”间的固有矛盾的事实依然存在。对资源和原料分配不均的抱怨正在不断上升。如果分配不均不能得到纠正，如果“富国”拒绝穷国分享生存的权利，那么也许只有战争能解决这一矛盾。[37]

以上观点确切地反映了近卫的观点。这些观点早在其出任首相之前就已经发表过。虽然如此，日本外交部仍在河相的声明中，申述日本并无领土野心，也并未违反现有条约。

在此同时国联的布鲁塞尔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开会，10 月 20 日广田弘毅外相接到正式邀请。可是近卫内阁拒绝了邀请，并于 27 日通知了比利时驻日大使巴松皮埃尔（Bassompirre）。该通知又再一次声明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对中国的极端反日政策和挑衅行为的报复；因此九国公约条文对此不适用。所以日本不能参加由一个谴责日本违反条约的国联决议所组成的会议；如果由一些对亚洲不大感兴趣的国家来共同试图解决中日间的争端的话，那将只会使事态复杂化。 [38]

尽管日本不妥协，19 个国家于 11 月 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这次会议。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巴斯克（Paul-HenrySpaak）在其开幕词中解释说此次会议并非一个审判日本的国际法庭，他希望日本能对其拒绝参加会议重加考虑。然而日本人仍持反对立场，于是与会代表不得不决定如何最好地开好会议。中国代表要求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积极援助中国，但被其他与会国家拒绝。最后在 11 月 25 日 15 个国家通过了一项宣言——意大利反对，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弃权——对日本不出席表示遗憾，并批评了日本关于争端由当事国自己解决的论点。宣言指出：鉴于日本军队侵占了大片重要的中国地区这一事实，无法期望日本的这种立场能够产生公平和永久的解决办法。最后宣言的签字国表示他们准备考虑对日本反对条约的行动以及反对条约国的观点采取一个共同立场。11 月 24 日在只有意大利反对的情况下与会者通过了这个宣言和报告，开了三周的会议遂告结束［39］。当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表了一项声明，对会议没有什么积极成果表示不满；他说：对严重形势的反应仅仅重新确认各项原则是不会有效的。近卫文麿于 11 月 26 日在去西部城市的列车上告诉新闻记者说：“果然如我所料，九国会议无多大结果。”他接着说：“最终我们必将废除那些条约，不过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我们将不允许欧洲人和美国人干涉远东的事务，这已是我们几年来的一贯立场。从这个观点看；或许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果断的步骤了。”［40］由一位首相如此明确提到要废弃九国公约实属不寻常的言论。

12 月 13 日日本军队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但战争仍不可望及早结束。近卫内阁开始对侵占地区作长期管理的计划并在中国筹建一个伪政权。前任外相佐藤对这些做法感到不满。他对汤浅仓平内大臣说：日本应从中国撤军并筹划尽快结束战争［41］。但当时很少有人会听取他的意见。 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政府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将不再同蒋介石政权打交道。战争正进入一个旷日持久的混乱局面。

可是佐藤一直未放弃其观点。5 月 26 日字垣一成代替广田出任外相，并任命佐藤为外交顾问。6 月间佐藤在其母校：东京商业大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原料问题》的讲话。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显示了他对于自然资源的关

切毫未减弱。佐藤在这次演说的结束语中解释说：“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时刻，谈论在和平时期保证原料的问题，好像显得不合时宜。但战争迟早是要结束的，所以应该考虑寻求在战后促进贸易的最佳途径，这是缓解战时人民所遭到的财政困难并将国家财政恢复到正常情况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原料问题可能仍是日本最关键的问题。”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必须在国际领域里积极活动，面向全世界。满足于在东方一隅成为强国，将使你们不会很好地应付战后世界局势。只有面向全世界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充实力，国家的基础才能变得巩固。”[42]

可惜的是宇垣任职时间不长，9 月底即行卸任，佐藤因之亦失去所有影响。有田八郎重任外相，对西方列强恢复了其早先的敌视和挑战态度。10 月 6 日当美国政府谴责日本在其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违反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时，有田八郎给了尖刻的反驳：

> 日本政府坚信当今在东亚新情况正在发展之时,如果企图用适用于事变前主要情况的概念和原则不加变动地应用于现在和未来的情况，那丝毫不会有助于解决当前迫切的问题。[43]

这十分清楚地表明要废弃九国公约。近卫文唇首相选择了这一时刻发布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重要宣言，决不是偶然的。

本文试图以两位主要的外交官近卫和佐藤为焦点，研究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抉择。他们所面临和所做出的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包括作者在内的全体日本人所面临的选择。

注释

[1]《日本对“满洲”和蒙古政策的几个方面》(Aspects of Japanese policytoward Mancharia and Mongolia)，东京，1966。

[2]《日本外交文件》(Japanese diplomatic documents 简称 NGM) 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第 10—14 页。

[3]《“满洲”事件》（The Mancharia incident），NGM 1．3：第 3 一 6 页。

[4]《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FR） 日本，1：45

[5]《“满洲”事件》，《NGM：“满洲”事件》，1．3：第 101—103 页。

[6]《FR：日本》，1．第 76—77 页。

[7]《NGM：“满洲”事件》2．2：第 96—99，121—122 页。

[8] 附有主要资料的《日本外交年表》(Chronology of Japanese diplomacy，with principal documents；以后简称 NGN）2：第 204—205 页。

[9]《NGM：“满洲”事件》2．1：第 543—545 页。

[10] 同上书，2．1：第 956—957 页。

[11] 同上。

[12]《NGN》2：第 215—223 页。

[13]《NGM：“满洲”事件》附录卷，第 71 页。

[14] 同上书，第 97 页。

[15] 《NGN》2：第 268—269 页。

[16] 《中央公论》，1933 年 5 月号。

[17] 近卫文麿：《直言》（Straighi Talk）东京：1936 年版。

[18] 同上书。

[19] 矢部负沼《近卫文麿》东京：1952 年版，1：第 252—253 页。

[20] 同上书，1：第 264—265 页。

[21] 近卫文麿：《直言》。

[22] “重光大使关于欧洲的报告”外交部档案。

[23]《九国公约与我们的中国政策》（The Nine-powers Treaty and OurChina Policy）条约局备忘录，1937 年 12 月，同上书。

[24] 《论太平洋关系协会》（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卷九，同上书。

[25] 《中央公论》，1937 年 4 月号。

[26] 佐藤尚武：《论日本的人口与工业化问题》（On Japan’s Problems of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日本国际事务协会出版，无日期。

[27] 见拙著：《论佐藤的外交》一文：载入江昭和有贺贞编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外交》（Japanese Diplomacy between the wars）东京，1984。 [28] 《朝日新闻》1937 年 5 月 7 日。

[29] 同上书，1937 年 5 月 18 日。

[30] 首藤安人：《论在资源和人口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国联联盟组织世界原料的会议》(Our Position on the Resourees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Raw Materials Sponsored by the League ofNations），日本外交政策协会出版，1937 年 5 月。

[31] 《原料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itee for theStudv of the Problem of Raw Materials） 日文译本，日本国际事务协会出版，1998 年 4 月。

[32] 矢部负沼：《近卫》，1：第 387—389 页。

[33] 赤松拓之：《1937 年中的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l937），日本国际事务快会出版，1938 年。

[34] 《FR：日本》1：第 384—394 页。

[35] 同上书，1：第 394—396 页。

[36] 同上书，1：第 379—384 页。

[37] 见注解第 33。

[38] 同上。

[39] 《FR：日本》1：第 417—423 页。

[40] 《朝日新闻》1937 年 11 月 27 日。

[41] 佐藤尚武《我八十年的回忆录》，东京版，1963 年，第 385—388 页。 [42] “佐藤在《外交杂志》中的论文”1938 年 10 月 1 日。

[43] 《NGN》2：第 399 页。

（张秀杰译汪义明校）

企业、政府与中国战争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1931 年至 1949 年间影响东亚-美国关系的主要事件是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亦即开始于 1931 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满洲、结束于 1949 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系列国内外军事冲突。对这一或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外交史学者一般都从中国之外的领导人，即美国、苏联、英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高级官员的立场去评估它的意义。这种研究途径当然重要，但是若要全面地分析，我们还必需考虑到在东亚-美国关系中扮演非正式角色的中国的非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

外交史学者也许会怀疑，这种缺乏官方地位的非正式集团是否值得注意，但是近来对本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却披露了这些先前被忽略的非官员组织的重要性，并且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它们中间有：中国的走私网［1］、日本的宣传队［2］、美国的秘密军事行动单位等［3］。这些发现表明对非官方集团同它们各自政府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事实上，如果说研究这一课题的新近论著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因为它们表明了这些研究将为我们开拓广阔的空间，以探索东亚与美国在正式和非正式两个层次上的关系。

上述以及其他非官方集团和非正式机构对于官方的外交关系有什么影响？目前，当研究者仍不断地发现非官方集团的新的事例时，这个问题还不能获得全面、确切的答案，但是本文将以大企业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4］。通过探讨 1931 年至 1949 年间中国、日本和美国在华的最大的工业企业与它们各自政府间的关系，也许能从中看出这些企业对东亚与美国之间的官方和非官方关系的影响。

（一）一家中国大企业与蒋介石政府间的冲突，1931—1945

年本世纪 30 和 40 年代，申新纱厂是中国工业的最大企业之一。其厂主在抗战时期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却持有不同的态度。这些企业家，即荣家成员，决心保护他们的财产并促进他们公司的发展。当时这家私人公司拥有资本 61.8 百万元（其中四分之三为荣家控制）和 10 家工厂，雇佣 31717 名工人——其规模超过 30 年代国内任何其他中国人的公司。［5］荣家认为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在中日关系发展的两个阶段中，他们都对蒋的政策持有异议：1931 年至 1937 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和解政策；1938 年至 1945 年（日本将占领区扩大到实际上包括整个人口稠密的中国东部），他们不服从蒋介石从日本占领区向西撤退的政策。

在第一阶段，即 1931 年至 1937 年，荣氏敦促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而代之以对日本企业实行经济报复的政策——这些日本企业中有些正是荣家在纺织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1931 年 9 月中旬，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仅几天，申新董事会董事长，即荣家首脑荣宗敬，就直接写信给蒋介石，建议政府支持“国货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有利于中国制造商抵制日本人对中国市场的竞争。 1931 年 10 月，在蒋介石接受“提倡国货”的口

---

① 美国康乃尔大学历史学教授。

号，但并未对日本企业采取强硬政策的情况下，荣宗敬开始在国民党其他高级官员中间游说，他向一名官员抱怨说：“我们需要宣传，但更需要行动。”他向另一名官员尖锐地指出，“商人了然于何者为国货，何者非国货。［任何人］不提倡国货，不抵制非国货，皆为不爱国。”照顾到高官大吏的尊严，他择词谦恭委婉，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楚：“任何人”一词意味着任何一个国民党官员（当然也包括任何其他中国人）如拒绝参加国货运动，就是不爱国。［6］

荣宗敬以国货运动的名义，敦促国民党在30年代初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反对日本——其中包括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加重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的课税，以及给予抵制日货运动以官方的支持（这一抵制运动是由中国人发起以抗议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等等——但是他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许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他为取得美国棉麦借款而进行的活动。在争取这一借款的活动中，荣宗敬同国民党内部批评对日妥协政策的最高级官员宋子文结成同盟，后者在1928年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荣宗敬力陈美国棉麦借款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能打击其日本的竞争对手，他使宋子文相信，棉麦借款必将增强中国的抗日斗争（这是宋子文所倾向的），而非加强国内的反共内战（那是蒋介石所倾向的）。［7］从1931年到1933年，荣宗敬为了从美国获得棉麦借款而奔波不懈［8］。1931 年秋，他向国民党政府抱怨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及长江下游的严重水灾，使来自这两个地区的原料供应中断，而像他自己这样的上海工业家则要严重依赖于这些地区的原料供应。1932年6月，他筹划购买40万包美棉，此举获得宋子文认可，由国民党政府给予财政担保，但是美国国会却阻止出售。荣宗敬并未灰心，他于1932年10月向美国政府的“财政善后银公司”用荣氏的私人票据和工厂押契作担保取得一笔用以购买1亿包棉花和1亿蒲式耳小麦的三年期贷款，他知道这些剩余农产品是萧条时期美国农村恢复的累赘，因此“财政善后银公司”急于将它们抛售。但是由于美方要价过高，他在初步谈判之后就放弃了。由于几番交易未成，荣宗敬便转而恳求国民党最上层的官员助其一臂之力。在 1933年春季与宋子文的一次会晤中，荣宗敬终于得到了宋子文的承诺、宋子文答应在不久即将启程的美国之行中，他将寻求一项棉花和小麦的借款。

1933年4月宋子文一到华盛顿，便立即提出借贷棉花和小麦的要求，在以后整个借款谈判中，他倚重荣宗敬的建议。宋子文最初的建议促使美国政府的“财政善后银公司”（在新当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领导下）提出向中国提供一笔可用于购买价值4000万美元棉花和1000万美元小麦的借款的反建议——远远超过了宋子文最初拟议的借棉花和小麦各500万美元的计划。——为此，身为中国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转而要求查询荣宗敬如此巨额的棉花是否会造成浪费。结果宋子文收到中国财政部的回电，电文引述荣宗敬的话说，中国目前库存棉花“仅足供一月之用”，然而仅荣家企业“12个月内每月就要用棉5万包”，——这就是说，来年需用棉花总数将为60万包。荣宗敬提醒宋子文，必须尽早取得棉花借款，因为只有依靠这种借款，才能使中国人的纺织公司得以生存，并能在同受日本政府资助的日本工厂的生死搏斗中获胜。得到荣宗敬的肯定后，宋子文便于1933年5月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借贷数额，在双方同意以4000万美元购买60万包棉花的谅解下，签订了借款合同。

荣宗敬在棉花借贷谈判中施展影响所带来的弊端几星期内便为有关各方

所察觉，自然宋子文本人也痛切地体会到了。荣宗敬的建议本不应轻率予以接受，这一醒悟最初出现于 1933 年 6 月，亦即贷款签约后的仅仅一个月，当时宋子文收到财政部电报，警告说上海通常一年耗用进口美棉不及 30 万包。宋子文表示怀疑，他答复说，据他所知，仅荣家就要求 60 万包；因此宋坚持财政部 30 万包的数字一定是搞错了。宋子文的部属则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推托手法，回答说："荣宗敬确实说过可以用 60 万包，但是我们对他的话并未加以认可，仅仅承担转达的责任而已。"因此，宋子文开始隐约意识到他所作的借贷棉花的外交决定过分偏信了商人荣宗敬。

然而荣宗敬对误导宋子文之事毫无歉疚，他继续为压低棉花价格而活动。1933 年 9 月，他竭力劝说国民党政府给他以及其他中国实业家以优惠条件购买借贷美棉。他解释说，因为中国遇上棉作物丰收，比正常年景增收 20%，所以他们在这个季度购买进口棉花比通常少。几个月后，棉花供过于求，国内棉价下跌，结果在中国的所有购棉者 1933 年和 1934 年购入进口美棉的总数只有 60 万包，——仅及荣宗敬最初提出的他个人购买数量的 10%。

棉花借款的余波不仅影响荣家企业，也影响中国对外关系。就荣家而言，正如荣家所希望的，他们的申新纱厂在 1931 年至 1933 年间迅速发展，超过了它的日本对手——其部分原因便是棉花借款引起棉花供应过剩而带来的棉价下跌。就中日关系而言，它造成了中日政府和企业间的相互对抗。这一借款一宣布，日本官员就攻击说它是用以支持中国在军事上对抗日本。此后，当国民政府财政部力图将过剩的棉花售给任何国籍的买主时，日本军方阻止日本工业家购买任何贷棉，理由是国民党将以获利用于反日的目的。棉花借款除了使中日关系恶化外，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无力吸收美棉，使得罗斯福总统抱怨说，在刺激美国商品价格上升方面，棉花借款未能发挥它所预期的作用；而中国官员承认预先考虑欠周到，也使得美国官员极为不快。1934 年春，双方终于同意将棉花惜款从 4 千万美元削减到 1 千万美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后果也是同荣氏家族的愿望相悖的，它直接导致宋子文于 1933 年 10 月下台。 1933 年秋，宋子文在国民党内的政敌攻击他的棉花借款无端制造中日对立，并且将它列为宋子文破坏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最新例证。棉花借款事件也许不是宋子文辞职的唯一原因，但它毫无疑问加深了他同亲日派（特别是蒋介石）之间的龃龉，后者终于将宋子文撵出了政府。

宋子文辞职后，荣家继续提倡国货运动，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像荣宗敬介人棉花借款谈判那样有力地影响国民党此后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宋子文的帮助下，他们曾在短时期内推动了背离国民党不抵抗总政策的国货运动和其他抗日措施，但是一旦宋子文下台，他们对国民党对外政策的制定，就难以施展影响了。

在 1937 年和 1938 年，当蒋介石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开始向长江上游撤退时，荣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即 1937 年至 1945 年间，尽管荣家对国民党对外政策的制定没有发挥什么影响，但是他们也公然抵制了国民党的一条极为重要的训令，即将中国的实业家和技术力量从日占区撤向国民党统治区。在爱国名义下敦促中国实业家随同蒋介石于 1937 年从上海撤往汉口，接着于 1938 年至 1945 年继续撤往重庆的大内迁中，荣家作为中国一个最大企业的所有者，便成为这一宣传攻势的主要目标。

但是荣家对这一壮举却毫无热情。

申新总管理处和它所属十家工厂中的八家都在上海，因而荣家坚持拒绝撤离上海。国民党第一个宣传活动于 1937 年 7 月，即日本进攻上海前仅一个月，匆匆忙忙开始。荣家对于这次宣传的反应是，申新不西迁一个人、一台织机和一枚纱锭。相反，他们将一些设备运人上海公共租界，并且挂上美商和英商的招牌（英、美尚未对日本开战）。他们用这种方法，将申新名义上的所有权给予非中国人的战争中立国，而他们自己却保留了实际上的所有权，以应付日本的法律规定。此事，荣家坚持将这些工厂留在长江下游地区，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在这日本占领区里继续做它的纺织品买卖。也许是效仿申新为榜样，上海六千家现代工厂中有 95%也滞留原地，只有 5%随蒋介石后撤到汉口。［9］

国民党领导人于 1938 年一到汉口，就再次要求荣家内迁，这次他们坚持申新的汉口分厂应进一步内迁到重庆。政府最初派出一批官员和外国顾问，由蒋介石夫人带领，视察申新汉口分厂，劝令员工内迁。然后，当厂方人员（根据荣家从上海申新总管理处发来的电令）拒绝内迁后，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通知申新人员，根据政府的焦土政策，所有未西迁的设备将由国民党军队予以毁坏。慑于这些强硬手段，申新汉口厂人员于 1938 年 8 月被迫将纱机和纱锭西迁，其中三分之一运往重庆，三分之二运至陕西宝鸡。然而即使西迁之后，厂方也毫无向国民党屈服之意。一旦申新的设备在重庆和宝鸡重新安装完毕，厂方就利用许多不太光彩的手法——贿赂官员、伪造帐目、以不同户名在银行开户，虚报战争损失，以及隐藏囤积物资和原料，在整个战争时期继续与政府对立。［10］

同时，在上海，荣家企业在日本占领下就像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兴旺发达［11］。1937 年至 1941 年这段时期中，用一位申新会计的话来说，是公司的“黄金时代”，它在上海的一个工厂竟发展成为当时亚洲唯一最大的纺织厂。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申新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财产（和所有英、美财产一样）为日本人所接管，但是不久就发还给荣家。到 1942 年一年中，申新在上海和无锡的所有工厂一都回到荣家手中。通过黄金投机和出售纺织品，到 1942 年 5 月他们终于偿付过去的所有债务——其中包括一些自 30 年代初以来就一直使他们头痛的债务。其他生产消费品的中国实业家也许由于持续战争而遭受损失，而荣家企业的利润却仅在 1942 年末至 1945 年中这段短暂的时间内稍有下降。

由于坚持留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荣家忧虑战后国民党也许会将他们当作汉奸，并将他们的企业作为“敌”产而予以没收。为避免这种危险，荣家的一个成员于 1944 年 9 月，战争结束前一年，从上海申新总管理处飞往蒋介石战时首都重庆，安排申新正式登记为国民党合法管辖下的中国人企业。1945 年 8 月，战争刚一结束，此人再度飞赴重庆，亲自得到官方确认，无论在敌占区或非敌占区，申新所属各厂在法律上都属于他本人和其他中国法人，而不会被国民党政府接管。［12］

这样，从 1931 年至 1945 年，荣家始终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唱反调。他们也许在思想上有所动摇——一方面在 1937 年前批评国民党不爱国，另一方面在 1937 年后却又对它的西撤呼吁无动于衷［13］——但无论荣家在思想上如何前后不一，他们致力于他们的经营利益以及符合这些利益的对外政策的态度却是始终不变的。1937 年以前，他们敦促国民党支持反日的国货运动，

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公司的发展并抑制日本竞争对手；1937 年以后，他们拒绝追随国民党的撤退政策，因为这一政策要求他们放弃若干工厂和其他财产。他们将经营利益置于政治之上，除非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他们并不使自己卷入外交舞台。从整个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初期，他们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直接经济利益。

（二）一家日本大企业与日本军方的竞争，1931—1945 年

在中国，日本人最大企业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它同本国政府内的军国主义者在 30 年代也发生过矛盾。然而，与申新不同的是，满铁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府机构，它的股票有一半为日本政府所有，它的总裁由日本首相任命，并对他负责。作为一家半政府的公司，它比申新有更多的机会既影响政府的政策，又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在 30 年代以前，它的管理当局在影响日本政府实施在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比其他在华的日本企业、日本军队、日本领事，或其他任何有关的日本团体都更为成功。直到 30 年代，满铁独占的地位才受到来自日本军方竞争的威胁。

满铁自 1906 年成立以后，它建议日本政府实行的产业政策是在中国东北逐渐进行经济渗透的政策，重点放在运输业（尤其是铁路和港口设施）和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方面。满铁作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在 20 世纪的最初 20 年中，满铁在中国东北获得稳步发展。到 1932 年，它至少占有日本在这一地区投资总额的 60%，拥有价值 2 亿日元资产，雇佣工人达 11 万人。而且，满铁在中国东北有广泛的管辖权。它以辽东半岛尾端的大连为基地，既在“关东租借地”［即旅大租借地——译本］（面积 3462 平方公里，根据特殊条约权利，形式上向中国租赁，但完全由日本统治，似乎它享有全部所有权），又在“南满铁路区”（面积 298 平方公里，关东租借地以外大连——长春线和安东——沈阳线及其支线沿线）行使管辖权。由于拥有对工业、农业、运输和行政方面广泛控制的权力，满铁完全可以称之为“（30 年代）亚洲大陆独一无二的最大企业”。［14］

在 1932 年和 1933 年，日本关东军攫取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国不久，满铁主宰这一地区日本经济政策的地位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威胁。同日本其他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上至外务省、下至知识分子团体——一样，满铁必须密切注视日本军方推行的新政策。特别是，满铁必须面对军方的这种强硬主张，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政策应当从渐进转向激进，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特别是转向具有军工性质的重工业、黑色金属工业和化学工业。但是，和日本其他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不同，满铁在 30 年代初并没有完全听从军方的指令。相反，它力图继续控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政策。

早在 1933 年，满铁不得不反对军方提出的一项在中国东北实行“统制经济”的建议，这一建议将缩小满铁的活动范围，使它局限于管理铁路，将它的其他部门转　公司。　1933 年，军方秘密制定这项计划不久，一家报纸以独家新闻透露了军方的意图，满铁便利用了由此造成的舆论同军方对抗。日本报纸在头版问道：军方是否正在策划一项以牺牲满铁私股和公股的持有者利益，压低满铁股票价值的计划？窘迫于舆论，军方不得不于 1933 年 10 月撤回这一建议。［15］

在以后四年中，满铁继续力阻军方侵占它的领地。例如，1935 年至 1938 年间任满铁总载的松岡洋右（后任日本外相），挫败了军方要将满铁总部由大连迁往长春或哈尔滨的企图。大连位于中国东北交通网和工业区的心脏，而长春或哈尔滨等内地城市则处于较边缘的位置（分别在大连以北 650 公里和 900 公里，且远离海岸线 500 公里以上）。此外，满铁领导人在维护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特别地位时，也抵制军方包揽华北经济发展的企图。例如，1935 年，满铁向日本关东军表示激烈反对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提出的建立称为“新家乡”投资公司的计划，用日本军方首脑的话说，这一投资公司将作为即将成立的华北开发公司的核心……，——而这恰恰是满铁在 20 世纪最初 30 年所曾经执行的职能。[16] 1935 年，满铁不仅反对军方拟建的投资公司，而且集资 1000 万日元设立自己的兴中公司，该公司向各种产业投资（主要是铁、煤、盐、棉、电力和交通），它们全都直接或间接置于满铁的监督之下。几个月后，即 1936 年 12 月，天津军方披露一项以 32600 万日元修建铁路、港口、航空设施、煤铁工厂以及水力发电厂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几乎绝口不提及满铁。八个月之后，1937 年 7 月，兴中公司提出了一项针锋相对的计划作为回击。兴中公司提出的同样是一项五年计划，集资 83200 万日元于交通运输项目，全部直接置于满铁监督之下。[17]

然而，与此同时，满铁却无法阻止军方在中国东北部实施它的“统制经济”计划，其中包括在煤炭、机械、石油和电信等方面实行的新的垄断和半垄断的计划。但是，满铁通过对这些项目的大力投资，仍然能对这些部门施加影响。事实上，在 1932 年至 1936 年间，满铁和“满洲国”政府是这些垄断性和半垄断性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各自持有全部股份的 30%。从 1932 年至 1937 年满铁的利润判断——铁路单项利润即为 26．5%，而全部利润（新投资项目和原有铁路合计）仅为 10%——满铁作出这些新投资，不是为了增加利润，而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决定日本对中国东北经济决策中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是以公司持有的大量股份为后盾的，这一股份超过了 1932 年至 1936 年间日本对满洲国工业投资的 80%，而等于总投资的 68%。[18] 在 1931 年至 1937 年间，满铁便是这样地对日本军方推行的对华经济政策，或予以抵制，或使它转向，或增添内容，只有在极小程度上与军方的企图配合。然而，在 1937 年，满铁的经济优势由于军方两个新行动而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第一，军方拟议与“日产”结成联盟，“日产”是日本的大工业集团，它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重工业[19]；第二，日军人侵华北。第一项行动始于 1936 年末，当时关东军将领石原莞尔说服日产工业集团的首脑鲇川义介出任“满洲国”的经济顾问。几个月以后，1937 年初，鲇川应军方邀请，在东北地区作视察旅行，在年中之前，他同军方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承诺将其业务移到满洲国。1937 年 10 月，日本入侵华北后，这一“日产向‘满洲国’转移”的计划公开化了。[20] 在这项计划中，“日产”和军方的军事事务局提出，通过建立和经营两个大型控股公司以推行日本在华经济政策；这两个公司分别为协调满洲工业发展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和从满洲向华北和外蒙古扩张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预期满业投资为 45000 万日元，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则为 35000 万日元，每一投资中，一半资金来自日产集团，另一半则来自“满洲国”政府。作为对日产效劳的回报，“满洲国”政府将保证日产享有其投资 6%的红利，为期十年，并且将绝大部分国家控制的工业企业从满铁转向日产。[21] 可以认为，有关满业和华

北开发株式会社的计划，旨在使军方能取得对满铁的决定性胜利。如果日本政府批准这些计划，满铁将失去它大部分附属工业企业，它也不可能再掣肘军部在华实施的经济政策。

军方在 1937 年与鲇川义介的谈判已为满铁的领导人警觉，而日军 1937 年对华北的入侵更使他们不安，因为这使军方有了新的和更合适的机会从满铁手中夺取决策权力。因此，1937 年 8 月，日本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后不到一月，满铁总裁松岡洋右便要求日本政府让满铁在华北经济中享有最高权力。他坚持满铁应该管理和控制中国的铁路，应该在发展中国的基础工业方面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而且，满铁支持的兴中公司应获许在全中国扩展投资活动，尤其应准其在华北集中投资。[22]

松岡洋右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表明他的期望很高，然而只有九个月他就开始认识到这是过于奢望。1937 年 12 月，当日本政府内一个计划委员会和内阁正在考虑军方有关满业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建议时，松岡递交了一份修正方案，要求日本政府至少指定满铁单独负责华北的港口、铁路，以及铁路附近的煤矿。但结果连这个要求也被拒绝，此后满铁和军方的所有主要矛盾都以对军方有利的办法解决：比如，满铁曾为建立在它控制下的“满洲——中国”联合运输系统尽了最后努力，然而毫无结果；再如，1937 年 12 月满业建立，接着 1938 年华北株式会社获得批准，经立法认可得以开办；这两家新的公司一经成立，即将兴中公司以及满铁的大部分工业企业转归其管辖，使满铁除铁路及其辅助业务外，别无他权。总之，日本对华经济关系决策的权力已完全由满铁转入军方手中。正如 F·C·琼斯在 40 年代总结这一结果时所指出的：“不可一世的满铁变成不过是关东军开发满洲的几个机构中的一个而已。”[23]

领导权争论如此解决之后，军方立即大规模地将中国经济引向为战争服务的轨道。例如，中国主要工业部门中黑色金属生产份额由 1936 年的 8．5%跃为 1945 年的 26．4%，电力生产份额由 1936 年的 22．1%跃至 1945 年的 50.4%。这些增长必然引起中国消费品生产份额的下降，1936 年消费品生产所占的份额为 30．7%，而 1945 年则下跃至 5．3%。[24] 1938 年至 1945 年间，握有充分权力的军方将领对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如何迅速扩大中国东北以外工业生产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而他们企业界的新盟友、日产集团的鲇川义介也同他们存在着观点分歧。珍珠港事件之后，军方采取新的战时统制，鲇川义介遂辞职。军方在 1937 年至 1938 年对满铁的胜利，是在华日军与日本企图界关系转折点的一个标志。1931 年至 1937 年间，一家独特的大企业满铁在制定和推行对日军占领下中国沦陷区的日本经济政策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在 1938 年至 1945 年间，在争夺对华经济计划和决策的权力方面，无论满铁、日产，还是其他日本大企业，都远非军方的对手。

（三）一家美国大企业与美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合作 1931—1941 年

与中国以及日本这些大企业形成鲜明对比，30 年代美国在中国的一家最大的企业在同其政府的紧密合作中获得了利益。这家企业，即美孚石油公司（美孚），是由两家美国公司即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现称为埃克森）和索康尼石油公司（现称为莫比尔）合股，它并非当时唯一为取得美国外交支持而［向政府官员或议员］游说的美国企业，但美国的外交政策却对它有着最

密切的利益关系［25］30 年代时，美孚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系统，煤油销售遍及全国，它设在青岛和天津的地区公司负责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销售，设在上海和南京的地区公司负责在长江下游地区的销售，设在汉口的地区公司负责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销售，设在广州的地区公司则负责在华南、东南和西南地区的销售。美孚在中国的投资达 4300 万美元，是当时美国企业在东亚各国最大的直接投资。［26］

自 19 世纪末涉足中国市场以来将近半个世纪中，美孚惯常以美国的外交支持为后盾［27］，而在 30 年代它同美国外交人员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也更加有成效。例如，在 1932—1934 年的“煤油战”中，美孚面临中国国产煤油严重竞争的威胁，它便借助于美国的外交支持，在三个层次即华南的地区层次、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国家层次，和华盛顿中国使馆的国际层次，展开活动。

在地区层次，美孚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控诉，一家广东人拥有的企业设立了蒸馏厂提炼煤油，并与美国公司竞销，从而引发了“煤油战”，而中国地方当局却违反中美协议，阻挠美孚采取反措施。美孚还指出，只有向西南政治委员会——由当时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的广东和广西两省结成的地区联盟［28］——登记的蒸馏厂，才可获准在当地生产，而又只有“中国人拥有”的企业才能允予登记。美孚实际上因此被禁止建立地方蒸馏厂，也无法像它精明的广东竞争对手那样，利用进口原油与精炼石油的关税差别来获取好处。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无需进一步敦促，就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了抗议。

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国家层次，美国官方并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来为美孚活动。虽然美国外交人员代表美孚的利益，一直在向南京施加压力，但是这几乎毫无必要，因为国民党财政部十分清楚，美孚缴纳的关税是归于国库的，而美孚的广东竞争对手所纳的税，并不上缴国民党，而是归它的政敌西南政治委员会所有。在南京，美孚的问题在于，无论国民党领袖们如何渴望同美孚公司及美国国务院合作，他们却缺少制服其华南地区对手所必需的政治实力。

在华盛顿的国际层次，美国国务院对美孚问题的反应也很迅

速。仅在美孚向广州领事馆寻求帮助两星期后，当一名美孚董事从纽约来到华盛顿进行申斥时，他发现国务院已经将支持美孚的方案电告南京美国公使馆。第二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公司先是获得向西南政治委员会登记和在华南生产精炼煤油的合法权利，接着又利用削价和事实上的 500 万美元贿赂迫使地方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美国的外交支持便这样帮助美孚在华南击败了它的中国竞争对手。

如果说美孚在华南的“煤油战”中获得美国外交支持并不困难的话，那么在中国东北，为了对抗日本的竞争而赢得类似的支持，就更为容易。事实上，1934 年 7 月，日本建立“满洲国”傀儡政府不久，甚至在美孚还未表露它对日本将在中国东北建立石油垄断的忧虑时，美国和英国在东京的大使就已向日本方面提出警告说，这种垄断将被视为对美国石油公司享有的条约权利的侵犯。

当美孚管理当局意识到美国政府倾向于支持它在“满洲国”的权益时，便决定不失时机充分利用美国政府的同情态度。为此，它故意将两件有可能发生但并无直接联系的事，即日本在“满洲国”

的垄断和日本对美孚在日本业务活动的限制，一并提出来加以反对。因

为如果分别提出这两个问题，美孚将只能抗议日本的石油垄断在“满洲国”、而不是在日本侵犯了它所享有的条约权利，但美孚管理当局更为关心的是日本，因为在那里它的营业额和投资额比在”满洲国”大十六倍。［29］

美孚希望它在满洲以及在日本的利益得到比现有更多的外交支持，因此它的管理当局便共同努力，争取美国外交官员相信美国必须同时抗议日本在“满洲国”的石油垄断和对美孚在日本业务活动的限制。比如，甚至迟至 1935 年 4 月 10 日日本在“满洲国”实行石油垄断后，美孚尚不急于解决它与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端，而是坚持把日本方面侵犯它在“满洲国”享有的条约权利一事纳入它所申诉的日本限制它的日本的营业和投资这一更大问题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由于把这两个问题混合在一起提出，美孚成功地使美国在 30 年代在外交上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如此美孚的营业利益就不仅在“满洲国”，而且在日本都取得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支持。

1937 年日本人侵华北给美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公司看到，如同在华南和“满洲国”一样，美国政府对它所遇到的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外交反应。例如，在日本人侵期间的 1937 年 12 月 12 日“班乃号”事件中，日本飞机炸毁了美孚三个油库事件发生后，美孚公司立即得到美国政府有力的外交支持，为此，日本人不得不连忙道歉，并赔偿 1287942 美元。从 1938 年至 1941 年，当日本继续对中国进行没有公开宣战的战争时，美孚频频向美国驻华使馆投诉日军对它的侵扰。在美国国务院的协助下，美孚暂时避免了日本在内蒙古的石油垄断。同时，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美孚的庞大的销售系统继续运行，这一销售系统虽然有所减缩，但仍保持相当的水平。

在上述所有这些事例中，美孚都得到美国的外交支持，这种支持如果不是直接影响的话，也是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和对日关系。

美国官员对于美孚同国民党的敌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之间矛盾的处理，是采取有利于增进美国同国民党关系的外交行动；对于美孚同日本冲突的处理，是采取不利于美国同日本关系的外交行动。正如欧文·安德森在他关于美孚的出色研究中的结论所说：“我们不能说美国的政策仅受美孚的影响，然而美孚的在华遭遇却增添了美国外交界中对于日本人在中国无视条约规定的沮丧感，同时，公司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它外交支持以遏制日本人对它自由经营活动的干预，也无异于往日益恶化的美日关系火上添油。［30］

（四）中国内战时期大企业对国家的附属，1946—1949 年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几年，各大企业都尽力恢复它们在中国的营业，但是它们已不再可能像战前那样有力地影响政府部门了。正如人们所预料，日本人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于 1945 年交出了所有权。它的日本管理层与战败的日军一起撤走，留下庞大的工厂设备。 1945 年和 1946 年苏军选择一部分运往苏联，接着在 1946 年和 1947 年国民党接收它时，又进一步拆迁了一部分，不久，共产党游击队也搬走了一部分设备，最后，共产党在 1949 年接管了它，并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31］。使人诧异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在华大企业，同样不能避免政府的干预。

几乎在满铁被置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的同时，许多中国大企业也面临相同的命运。战争尚未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就已开始增加它在制造业的投资。例如，1936 年日本人侵华北前夕，它在这些企业中仅拥有 11%的资本，但到 1942 年，它已拥有的资本占国统区的全部工业资本的 70%。然而，在像重庆这样一些战时远离中国沿海的工业城市的投资，远远比不上国民党战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工业部门中中国人企业的控制。国民党通过接收日本人或被怀疑为汉奸的中国人的所谓“敌产”，到 1948 年末它已掌握了中国重工业的 90%、轻工业的 60%，食品加工设备的 50%和进出口贸易的 70%。尽管国民党曾允诺将其中一部分出售，但是直至 1949 年它从中国大陆逃亡时，真正售出的可谓寥寥。［32］由于申新纱厂的中国老板能巧妙地对付所谓国家工业接管的政策（当然还得对付政治动荡和高度通货膨胀），他们的企业避免了被国民党没收的命运，并且在 1946 年和 1947 年全面恢复生产，但是他们的公司最后仍然受到冲击。当 1948 年和 1949 年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地南下而蒋介石的追随者欲逃往台湾时，——正如 1937 年和 1938 年那样——国民党领导人再次敦促荣家企业加入军事撤退，这一次荣氏又予以抵制，他们没有将技术力量迁往国民党的新首都台北，而是从上海将 113600 枚纱锭运到英国殖民地香港，在那里，荣宗敬（逝于 1938 年）的后裔开办了四家新厂，这些工厂是 50、60 和 70 年代以对外出口为导向而蓬勃发展的荣氏企业的基础。在此同时，申新设备的绝大部分（包括 640658 枚纱锭）仍留在中国［大陆］，由荣宗敬 74 岁的弟弟为首的荣家另一支看管，他们的成员在 1949 年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33］

与满铁和申新相比，美国人的公司在 40 年代后期与国民党打交道却较为成功。1946 年末，日本投降后仅十八个月，上海美国商会战前的 126 个会员中 110 多个委员已重新展开了商业活动［34］，他们同以往一样，以美孚马首是瞻，美孚决定恢复营业，重振其遍布全国的销售网，1947 年和 1948 年便投资 300 多万美元，在中国各地修建新的油码头、油库、仓库、汽车修理场和住宅。和中国人的公司一样，美孚在 40 年代后期也深受急剧的通货膨胀、与华工的劳资纠纷、以及内战动荡的影响。但作为美孚母公司全球扩展计划的一部分，美孚在中国的子公司从未放弃重振中国市场的努力，它始终紧紧抓住中国市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前，它从不准备关闭，直到 1952 年 1 月 8 日，在大多数外国公司撤离很久以后，它才撤走最后一名美国代表，并将它的业务正式移交中国政府。［35］

（五）结论：大企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 1931 年至 1949 年间，大企业对在中国的外交关系有过什么影响？这篇论文所作的典型分析为我们比较这一时期三个不同

国籍的大企业同它们各自政府外交活动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三大企业中，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 1931 年至 1937 年间制定并推行了日本的大陆经济政策，因而在对华关系上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那些年中，它的管理当局所坚持的渐进的经济渗透政策和谨慎的工业计划，比军方所主张的宏大而急欲求成的计划占上风，满铁因此成为当时中日经济关系的主要设计者。但到 1938 年，军方的气焰超过了满铁，从 1938 年起直至 1945 年战争结束，满铁至多不过影响政策的贯彻执行，而不能影响政策的制定。

与满铁不同，美孚对于美国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官方决策从未有过直接的影响，但是它的管理当局同战时他国政府的冲突对于美中和美日关系却有着间接的影响。为了保护美孚的权益免受中国地方政府和日本在华地方政府的侵扰，美国官员采取了反对这些地方财政的立场（或者换言之，采取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立场）；当日本采取排斥美孚的政策时，美国外交官员抗议日本侵犯了美国在华享有的条约权利。结果，尽管美国国务院采取了既不愿同日本敌对，也不愿认可日本在 30 年代对中国的侵略的折衷立场［36］，它为维护美孚权益而采取的外交行动，却必然引起日美关系的恶化。

这里所讨论的三个大企业中，中国人的申新纱厂对外交关系的影响最小，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有过一些影响。在 30 年代初，它的老板曾直接影响了国民党的外交政策。他们以游说的方式敦促中国官员支持国货运动，这一运动同蒋介石对日和解的总政策相悖，但有利于中国企业发展而不利其日本竞争对手；他们以顾问的身份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棉花借款一案所表明的，一些政策建议导致了国际协议的签订。然而到了 30 年代中期，申新企业家已不能在外交决策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不过他们在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对于国民党要求从沦陷区撤退工厂决定的消极抵制却削弱了蒋介石对战时资源的控制，从而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间接影响。我们缺乏统计资料准确判定这一不同蒋合作态度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但是蒋介石在 40 年代后期奉行接管中国人拥有的企业的政策表明他已相信，国民党取得中国工商企业的协助对于他的政府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却是对蒋这一观点的一个讽刺，因为他的共产党对手事实上丝毫没有依靠大企业的财政支持，却赢得了胜利［37］。

这些大企业对日本、美国和中国政策的影响提醒我们，一些对外交事务并不正式负有责任的团体和机构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外交关系的进展。所有非官方团体机构（走私网、宣传队、秘密军事单位、企业团体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组织）对于 1931 年至 1949 年中国舞台上官方外交关系的综合影响，必须待我们对这些组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才能作出评估。但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新开拓的研究课题，在未来东亚-美国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中，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注释

［1］伊斯门（易劳逸，L loyd E. Eastman）：《矛盾关系的各个方面：战时走私、傀儡政府和罪恶勾当， 1937—1945 年》（Facets of an AmbivalentRelationship：Smuggling，Puppets ，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1937—1945），载入江昭（Akira Iriye）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政治与文化相互影响论文集》（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 Essavs in Political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普林斯顿，1980 年版，第 275—284 页。

［2］入江昭：《朝向新文化秩序：新民会》（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the Hsin-Min Hui），同上书，第 254—274 页；埃格勒（David G. Egler）：《日本在满洲的民众组织，1928—1945：种族调和的意识》（JapaneseMass Organizations in Manchurial， 1928—1945：the Ideology of RacialHarmony），哲学博士论文，亚利桑那大学，1977 年。

[3] 查勒（Michael Shaller）：《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纽约，1979 年版，第 4 章及散见各章。

[4] 此处所用“大企业”系指垂直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即具有采购系统（以直接购进原料）、制造系统（以成批生产成品），以及营销系统（以直接推销产品）的企业——所有各系统都在单一的所有权之下。大企业的这一定义既包括国有公司，也包括私人公司，但它仅仅涵盖中国经济中的一小部分企业。它不但不包括中型的专业化公司和小工场（1931 年至 1949 年间这些企业一直在中国经济单位中居压倒多数），而且还包括大型和小型的非工业企业（显著的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关于 1931 年至 1949 年间东亚-美国关系中金融机构的作用，参见下列著作：关于美国金融家拉门德（Thomas Lamont）与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见威尔金斯（Mira Wilkins）：《美国商业的作用（The Role of U.S. Business），载苞格（Dorothy Borg）与罔本春平编：《历史的珍珠港：日美关系，1931—1941 年》（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hips，1931—1941 年），纽约，1973 年版，第 353—348 页；孔华润（Warren Co-hen）：《中国联系：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 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cations），纽约，1978 年版，第 7、8 章；关于国民党金融政策及同日本与美国关系，见小科布尔（ParksM. Coble，Jr.）：《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The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麻省，剑桥，1980 年版，第 5—6 章以及散见各章。

[5]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海，1980 年版，上册，第 280—281 页。这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编纂的资料汇集，包括大量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私人通信、财务记录、日记片断、报刊摘录、与前经理和工人的谈话），这些资料大量但并非唯一来自荣家企业的档案。下文引用时作《荣家》。

[6] 《荣家》，上册，第 352—353 页。

[7] 《荣家》，上册，第 262—263、352—353、391 页。关于宋子文偏向于资助抗日，蒋介石偏向于资助反共军事行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见科布尔，第 109—115 页。

[8] 此处关于棉麦借款论述的依据是：《荣家》，上册，第 262、370、388、391—394、594 页；布什（Richard C. Bush）：《国民党中国的棉纺织业政治，1927—1937 年》（The Politics of Cotton Textiles in GuomintangChina，1927—1937），纽约，1982 年版，第 214—225 页；科布尔，第 136—139 页。

[9]《荣家》，下册，第 43—47，97—98 页；齐希圣（音，Hsisheng Ch’i）：《战时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与政治崩溃，1937—1945 年）（Nationalist China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安阿伯，1982 年版，第 221 页。关于国民党军事行动的细节，见伊斯门《战争岁月，1937—1945 年》（The War Years，1937—1945），载伊斯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两篇论文》（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TwoEssays），伊利诺斯，厄本纳，1982 年版，第 103—105 页。关

于中国像荣家那样采用假招牌的其他例子，见巴尼特（Robert W. Barnett）：《经济中的上海：政治上的抵押品， 1937—1941 年》（Economic Shanghai：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纽约，1941 年，第 91 页。

[10] 《荣家》，下册，第 48—67、232、252—264、275、310—313 页。关于 1939—1945 年期间申新虚假利润（向国民党呈报作纳税用）与其（高得多的）实际利润的对比表，见同书，下册，第 214 和 259 页。

[11] 《荣家》，下册，第 63—74、91—92、104—109、188—196 页。1938 至 1940 年间，除申新外其他棉纺企业得益于市场繁荣，但与申新不同，有一些厂家早在 1940 年年中就为销售下跌所困扰。见巴尼特，第 100—105 和 107—111 页。

[12] 《荣家》，下册，第 268、385—386 页。

[13] 这个明显的摇摆也许由于荣宗敬早期影响和他晚期离开：1931 至 1937 年间领导国货运动之后，他在日本侵占期间飞离上海，并于 1938 年逝于香港。见《荣家》，下册，第 24 页。

[14] 引自艾伦（G..C.Allen）和唐尼桑（Audrey G. Donnithorne）：《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Japan），伦敦，1954 年版，第 137 页。亦见琼斯（F. C. Jones） ：《1931 年以后的满洲（Manchuriasince l931），伦敦，1949 年版，第 14—15 页。关于满铁在 1930 年代前逐渐渗透成功的评价，见麦科马克（Gavin Mc Cormack）：《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 年：中国、日本与‘满洲国’思想》（Chang Tso-Linin Northeastern China，1911—1928：China， Japan，and ManchurianIdea），斯坦福，1977 年版，第 5—8 页及散见各页。关于满铁 1930 年以前大量复杂的资产进一步统计，见雷麦（C.F. Remer）：《外人在华投资》（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纽约，1933 年版，第 17 章。关于 1920 年代满铁对日本在华外交影响的分析，见人江昭：《追随帝国主义之后，寻求远东新秩序， 1921—1931 年》（After Imperialism：the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麻省，剑桥，第 173—191 页。

[15] 满铁会编：《满铁最后总裁山崎元斡》，东京，1973 年版，第 495 页。

[16] 同上书，第 498—499 页；中村隆英（Takafusa Nakamura）：《日本经济向华北的猛进，1933—1938 年：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形成》（Japan’sEconomic Thrust into North China，1933—1938：Formation of theNorth 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载入江昭编：《中国人和日本人》，第 226 页。引文引自后者。

[17] 中村隆英，第 224 和 235—238 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十年略史》大连，1937 年版，第 612 和 636 页。兴中总裁十河信二依靠他同中国的联系，帮助他进行投资。特别是他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合作。见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东京，1937 年版，第 90 页。

[18] 中村隆英，第 222 页，注 5，侯继明（Chi－Ming Hou）：《外国在华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 184—1937 年》（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麻省，剑桥，1965 年

版，表 25，第 114 页；长幸男（Cho Yukio）：《美国资本输入满洲问题的探讨：日美关系的评论， 1931—1941 年》（An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ImportingAmerican Capital Capital ihto Manchuria：A Note on Japanese-American Re-cations， 1931—1941），载苞格与罔本春平编：《历史的珍珠港》，第 35 页和表 2，第 394—395 页。

[19] 日产系“新财阀”之一，至 1937 年它对重工业的投资远大于称为“旧财阀”的日本大金融公司。例如，1937 年日产资本的 70%全部投资于重工业，当时三井资本仅 19%、三菱资本仅 27%投资于重工业。与“新财阀”相比，这些“旧财阀”在 1930 年代很少对华投资。见迈耶斯（RamonH. Myers）：《日本在满洲的发展，1932 至 1945 年》（The Japanese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1932 to l945），哲学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59 年，第 63—64 页；中村隆英，第 222—223 和 240 页；艾伦：《近代日本简史》（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Japan），修订第 4 版，纽约，1981 年版，第 159—160 页。

[20] 皮蒂（Mark R. Peattie）：《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Ishihara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普林斯顿， 1975 年版，第 214—216 页；中村隆英，第 242 页。

[21] 琼斯，第 148—149 页；迈耶斯，第 64 和 150—151 页；比森（T.A.Bis-son）：《日本在中国》（Japan in China），纽约，1938 年，第 348—353 页；中村隆英，第 249 页。

[22] 中村隆英（包括引文），第 245—246 页。

[23] 满铁会，第 502 和 653—657 页；中村隆英，第 249—250 页；长幸男，第 392 页；引自琼斯，第 149 页。关于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资本与作用，它的同等机构华中开发株式会社，以及两者许多下属机构，见臼井胜美：《日中战争政治的展开（1937 年—1941 年）》，《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962—1963），陆大卫（音，David Lu）译，载莫利（James William Mor-ley）编：《中国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 一 1941 年》（TheChina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Asian Continent， 1 9331941），纽约，1983 年版，第 326—327 页。

[24] 张长治（音，John K. Chang）：《解放前中国工业的发展：量的分析》（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A QuantitativeAnalysis），芝加哥，1969 年版，表 20，第 76 页。关于 1937 至 1945 年间日军在中国东北工业政策与活动的详细资料，见迈耶斯，第 44—73 和 130—149 页。

[25] 关于 1930 年代这些为美国在华商业活动的说客——尤其是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的福士（W. Cameron Forbes）、上海的法兰奇（C.H.French），以及摩根公司（J. P. Morgan and Company）的拉门德——见苞格：《美国和 1933—1938 年远东危机》（The United Staies and theFar Eastern Crisis of l933—1938），麻省，剑桥，1964 年版，第 9 章；威尔金斯：《美国商业的作用》，第 341—370 页；孔华润：《中国联系》，第 7 和 8 章。

[26] 除注明外，关于美孚的资料均取自小安德森（Irvine H. AndersonJr.）：《美孚石油公司与美国东亚政策，1931—1941 年》（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umpany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tes

East Asian Policy，1931—1941），普林斯顿，1975 年版。关于美孚在中国的投资，见同书，附录 A，第 201—216 页；亨特（Micheal H. Hunt）：《中国市场上的美国人：经济机会和经济民族主义，1890 年代至 1931 年》（Americans inthe China Marke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1890 s—1931），载《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第 51 卷第 3 期（1977 年秋），第 282—283 页；威尔金斯：《多国企业的出现：殖民时代至 1914 年的美国海外商业》(The Emergence of Multi-natioal Enterprise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from the Colonial Erato 1914），麻省，剑桥，1970 年版，第 110 页；威尔金斯：《多国企业的成熟：1914 至 1970 年的美国海外商业》（The Maturing of MultinationalEnterprise：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From l914 to l970），麻省，剑桥，1974 年，第 58 页。

[27] 关于美孚石油公司 1930 年前在华历史，见罗森索尔（John MartinRosenthal）：《中国市场，神话还是现实？美孚事例，1875—1918 年》

（The China Market，Myth or Reality？The Case of Standard Oil，1875—918），硕士论文，康奈尔大学，1980 年；亨特，第 281—284 页。

[28] 贝拉里（Diana Lary）：《地方和国家：中国政治中的桂系，1925—1937 年》(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伦敦，1974 年版，第 160—161 页。

[29] 1934 年美孚在满洲国的投资估计达 448096 美元，相比之下，它在日本投资为 7108587 美元。贝安德森，第 53 页，表III—2。

[30] 安德森，第 199 页。

[31] 琼斯，第 221—241 页；佩珀（Suzanne Pepper）：《中国内战：政治斗争，1945—1949 年》（Civil War in China ： The Political Struggle ， 1945—1949），伯克莱，1978 年版，第 25—26、386—387、390—391 页。

[32] 伊斯门：《战争岁月》。第 163—164 页；伊斯门：《国民党人下的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m under the Nationalists），提交亚洲研究协会论文，波士顿，1974 年，第 3 页；王修伦（音，Siu-Lun Wong）：《工业企业精神与地方特性：关于香港的上海棉纺业者的研究》（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ity ：A Study of the ShanghaiCotton Spinners in Hong Kong），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9 年，第 99—100 页。

[33] 《荣家》，下册，第 399、530、532、540、546—548、555—558、645—649 页。

[34] 塔克（Nancy Bernkopf Tuckey）：《尘埃中的模式：中美关系与承认论争， 1949—1950 年》（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 1949—1950），纽约， 1983 年，第 115 页。

[35]《外国理赔委员会决议：中国项》(Decisions of the Foreign Claims Set－tlement Commission： China Claims Programs），未公布案，美国外国理赔委员会，华盛顿 D.C.，1970 年版，第 7 卷，CN-0294 和 CN-0288 款。

[36] 美国试图遵循这一两全其美的路线，见苞格《美国和 1933—1938 年远东危机》所述。

[37]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期间关于大企业的战略，是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些企业中鼓动罢工和其他示威，地下党在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内成立基层组织。见佩珀，第 112—118 页。

（陈 任译 陈 绛 校）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战争风险

沃尔多·海因里希（Waldo Heinrichs）1939 年 3 月 4 日，阿道夫·希特勒将捷克斯洛伐克并入第三帝国,消灭了这个代表了 1919 年和平缔造者的希望和理想的国家。慕尼黑的愚蠢错误、纳粹德国的巨大威胁，以及对一次大战后的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形成的秩序无法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修改，这一切导致了欧洲的战争威胁日益增长。

当时，美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对德国的遏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们看到美国最重要的利益仍然在于维持欧洲的均势。他们对希特勒的意图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立即试图修订中立法，以便使西方民主国家武装起来，并以此作为对德国的警告。美国对于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同样显示出极大的关心，虽然和欧洲相比，东亚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中心，因此，对这一次要地区的政策应服从于阻止希特勒的需要。与此同时，日趋激化的欧洲危机也影响到东亚，加剧了那里的冲突和动荡。日渐明显的全球性冲突使绝大多数大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美国也毫不例外。

尽管日本在 1937 至 1938 年间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美国对日本的敌视日益高涨，美国政府决定避免激怒日本。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美国在中国并没有攸关重要的利益。他们考虑到日本长期卷入于对中国作战会消耗它膨胀了的力量。苏联和日本之间的紧张状态始于满洲边界上的张鼓峰地区的激烈战斗，这就进一步拖住了日本军队。鉴于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在东亚避免战争危险看来是头等重要的。根据最新的对日作战计划，美国海军应在东太平洋上集结并作好准备，而不是立即出发和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上作战。菲津宾的难于防守和日本海军的力量使总统及顾问们对日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尽管美国始终试图不去激怒日本，但是在欧洲战争爆发前，两国关系在 1939 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欧洲，德国的侵略气焰在慕尼黑会晤之后更加咄咄逼人。德国寻求与日本结盟以对付法国、英国和苏联。同时，法国和英国向莫斯科求援。美国则倾向于英、法等民主国家。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对 1939 年 8 月纳粹德国- 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的看法，美国和日本在政治及思想上均持相互对立的立场。与此同时，日本在 1939 年初占领了海南岛，从而控制了通往印度支那和红河的道路，进而包围中国。该年 3 月底，日本吞并了位于印度支那和菲律宾之间的斯普拉特利群岛[①]。日本这些旨在向中国南部进一步侵略的步骤威胁到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的利益。

对日本威胁的新认识导致了美国政策的两次修改。第一次是和大不列颠一起建立起一个联合行动的基础，在海上遏制日本。在中国发生了“班乃岛号”和“瓢虫号”事件之后，联合行动的建议在 1939 年 1 月伦敦举行的英、美海军秘密会谈上第一次提了出来。两国海军同意，一旦发生日本威胁时，美国舰队应驶至珍珠港，同时，一支类似的舰队也将驶往新加坡。这项建议并没有约束力。1939 年 6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几次秘密会谈进一步发展了这项建议，并使之适应局势的发展：一旦战争发生，美国舰队应立即通过南太平

[①] 美国坦普尔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即我同南沙群岛——译者注。

洋和在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会合，以保卫马来屏障（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些都是临时和非正式的协议，可是它却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基础。1939年3月，英国人正密切注视着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甚至可能侵略希腊。根据他们的请求，美国舰队取消了访问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计划，折回西海岸，以警告日本不要利用这一形势南下。

第二项主动行动是发出对日经济制裁的警告，1939年7月26日，美国按规定在6个月前终止了1911年签订的美日商务条约。1940年1月26日以后，美国可以根据它的意愿不受约束地限制对日贸易。美国公众对日本轰炸重庆（美国“图蒂拉号”炮舰差一点挨炸）和日本士兵侮辱在中国的英国公民甚为愤慨。美国政府还对公众舆论作出了反应。美国人认为，有助于日本侵略的出口贸易是不道德的。国会正忙于讨论禁运法案。可是，国会中对这问题的不同看法也许会给人一种软弱的印象，因此美国政府宁可由它自己采取主动行动。此外，英国人已经屈从于日本提出的涉及天津英租界的要求，看来他们需要更强硬些，当然也需要鼓励中国人。最后，国务院想给日本一个直截了当的警告。国务院希望强有力地提醒日本，它想继续从美国进口物资，包括用于战争的石油、机器和金属，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可以实现的事情。

同时，美国避免把外交活动作为唯一的解决日本问题的手段。就和解而言，1939年并非是个吉祥的年头，那时绥靖主义正开始身败名裂。不过在那年初秋，日本比这10年中任何时候都更愿意谈判。德国和日本的头号敌人——苏联签署的条约对东京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动，导致了轴心国联盟谈判的中止和日本内阁的跨台。同时，日本在满洲边界上的诺门坎城的大规模战斗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废止商务条约特别令日本人不快和深感意外。

1939年秋天，阿部信行将军的内阁开始仔细地研究改善与美国和英国关系的可能性。在新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和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一系列会谈过程中，野村在格鲁的鼓励下建议重新开放长江下游航道以换取美国同意就一项新的商务条约举行谈判。格鲁极力主张接受这个方案，并把它视作使日美关系进入“一个不断发展的、健康的轨道”的开端。［1］华盛顿拒绝了这项建议。美国担心，和日本就一个特殊问题达成协议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华条约权利的更广泛的基础，而且，他们怀疑阿部内阁是否有能力履行这样一个承诺。此外，罗斯福总统那时首先考虑的是，在欧洲的“假战争”仍在进行之时，和日本单独达成谅解可能是草率的。他觉得，坚定地、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人，比冒人民对政府大失所望的风险更要好些，也比通过达成一项可能被认为是绥靖性质的协议而加强了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更好些。美国对日本在美国禁运的威胁之下继续陷在中国感到满意。格鲁把美国的禁运形容为一把“达摩克利兹之剑”［2］。阿部内阁于1940年1月倒台；两个星期后，条约期满。美国方面的举动依然是犹豫不决的，但都是朝着采取恫吓和施加压力，以及诉诸武力的方向发展。

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时节，希特勒相继征服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从而改变了世界的均势，处于被围境地的英国遭受不断升级的空中轰炸，并准备对付德国的入侵。法国舰队的中立、意大利的参战和德国对直布罗陀的图谋严重地威胁着英国在地中海的生命线。罗斯福焦急地注视着、等待着。然而，由于不断地受英国决心继续作战和皇家空军英勇地保卫

自己岛国的精神所感染，总统开始向英国提供援助。9 月，当入侵季节渐渐过去时，他签署了“基地驱逐舰协议”，这一协议确立了两国实质上的同盟关系。

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打通了道路。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时机业已成熟。英国保卫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帝国及利益的能力很值得怀疑。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将被阻断。日本陆海军中的扩张主义者敦促米内 137PGN0137.TXT/PGN>光政海军大将的内阁利用这一时机，和欧洲的新霸主达成协议。当米内内阁踌躇不决时，他们就迫使他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东条英机为陆相、松冈洋右为外相的近卫文唐亲王内阁，这个内阁更具有冒险精神。日本开始为南下夺取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作准备。它对荷兰人施加压力，要他们让日本分享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石油，并强迫法国人同意让日本在东京湾驻军，关闭通往云南和重庆的江河航线。现在日本已经能够迫使英国关闭中国通向西方的大门——缅甸通道。

为了防止日本利用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脆弱地位向南扩张，罗斯福在珍珠港布置了一支舰队。实际上，由西海岸调来的这支舰队早在德国进攻法国之前就行动了。总统关心的是日本人在二、三和四月间对荷属东印度群岛表露出的显而易见的野心，春天德国军队侵占荷兰的可能性，以及日本人采取防护性占领行动的可能性。这支舰队正在夏威夷以西海面举行被日本人称之为“挥舞刀剑”［3］的演习。5 月 7 日，即德国发动进攻的前三天，这支舰队接到命令，留驻夏威夷。它驻扎在那里是作为一支威慑力量；这个信号并未逃脱日本战略家们的注意。

美国在德国胜利之后着手进行了庞大的扩充海军和空军的计划，这对日本来说构成长期的、更大的威胁。 1940 年的“两大洋海军”计划将使新型的快速战舰数目翻一番，并使舰空母舰的数量增加两倍，这不仅仅是大型军舰的数目的增加。虽然，在 1943 年前，上述计划还无法完成。但从长远来看，日本海军将毫无疑问地处于劣势。而从近期来看，双方海军力量依然能维持相对的平衡。

当 1940 年 5 月初美国舰队仍停泊在珍珠港时，一段奇特的外交插曲发生了。在和米内的外相有田八郎会谈时，美国驻菲律宾的高级专员弗朗西斯·塞尔谨慎地提到美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在上一年 12 月或许更早一些，总统在白宫鼓励塞尔在国民党和东京之间继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到了春天，罗斯福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塞尔途经东京拜访格鲁时，见到了北京[①] 燕京大学校长约翰·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蒋介石本人对美国的调停感兴趣。事实上，日本人和国民党之间的接触已经在进行。塞尔认为，美国为了能在最大程度上支持英国对付希特勒，应设法解决东亚的问题，所以他大胆地将司徒雷登提供的消息告诉了有田，有田的反应是鼓舞人心的。当国务院得知塞尔的主动行动后，立即命令他中止会谈，并严厉申斥他未经授权就进行涉及重大政策的讨论。［4］由于德军占领法国，使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忘乎所以了，因此，国务院重新考虑和日本谈判的想法。格鲁接到指示，劝告日本人不要和德国结盟；他明确指出，美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已经起步。但是，改善日美关系自然完全取决于日本是否改变其政策；格鲁未得到允许，可以提出任何让步作为诱饵，来使日本放弃武力扩张的企图，1940 年 6 月和 7 月

[①] 原文如此。北京时称北平——译者注

的格鲁-有田会谈毫无成果。6 月底，英国请求美国给予支援，要么实行全面禁运以遏制日本，并向新加坡派遣一支海军分遣队；要么就解决东亚问题和日本合作。赫尔对这两种选择都拒绝了。因此，英国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同意暂时关闭缅甸通道。

在美国，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压力已经增大。亨利·史汀生作为国防部长和富兰克林·诺克斯上校作为海军部长进入内阁增强了要求石油禁运的鹰派的影响。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争辩道，经济压力在过去曾起过作用。他引证了史汀生提供的材料后指出，1918 年日本夺取中东通道时，美国限制棉花出口和丝绸进口曾使日本接受和解的方案 ［5］。罗斯福和赫尔并不准备沿着这条路走得太远，然而在 1940 年 7 月，日本急于取得航空汽油的举动导致政府跨过了禁运的门槛。根据国防需要的物资需领取许可证的新法案，政府限制了高辛烷航空汽油和最高等级的废钢铁的出口。由于日本能够凑合着利用废钢铁和质量较次的汽油，限制措施除了产生象征性的影响之外，毫无作用。

1940 年 9 月，美国再次施加压力，这次对日本造成了损害。8 月间，在上海的日本人和美国人为了由哪国部队取代撤出该城的英国士兵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9 月 12 日，逐渐对日本的凶狠感到焦虑不安的格鲁一改其和解的态度，转而主张采取经济抵制措施。他的“绿灯电文”认为日本是一个“掠夺成性的国家”，威胁着英美两国在东南亚生死攸关的重大利益，坚信美国作出反应的时刻已经到来了［6］。9 月 22 日，在河内的法国当局屈从于日本的要求，同意给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地区驻军、过境权、建造飞机场和经济特权。两天以后，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任何废钢铁，并于次日向中国提供另一笔贷款。

1940 年 9 月 27 日，使格鲁和国务院大吃一惊的是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公约，保证如果缔约国中任何一方受到目前尚未卷入战争的国家攻击，三国就共同对其宣战。尽管根据和德国大使达成的另一项单独协定，日本保留其确定何种行动为进攻的自由。然而，三国公约显然旨在阻止美国干涉日本在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努力。对美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举动能比此更能显露日本的阴险毒辣的目的了。

危机并未接踵而至。和国务院保持着密切接触的荷兰当局和美国石油制造商仍精明地提出要日本降低对石油需要的数目，在 1940 年 10 月东京让步了。那时日本暂时不愿意冒发动战争的风险。日本在坚持南下之前，需要和苏联达成一项谅解。10 月，英国重新开放缅甸通道和另一笔正合时宜的美国贷款似乎可能使中国能继续开战，尽管日本于 11 月承认了汪精卫傀儡政权。罗斯福和赫尔仍然非常小心谨慎，担忧会激怒日本。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始终优先考虑着攸关重要的大西洋问题。

然而，两国还是开始趋向于对抗。1940 年，美国完成了两个重要的安排，即把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并开始向日本施加缓慢的经济压力。轴心国联盟的裂痕加深了。当东亚和欧洲的事务已连为一体时，美国放弃了在中国保持和平以及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机会，否则它可以缓和太平洋地区的局势，集中精力对付来自欧洲的威胁。美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谈判总带有一点绥靖的味道。它试图在国内外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它是坚决反对侵略的。正如罗斯福在写给塞尔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国家政策的连贯一致以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常常是一个很好的教育”［7］。

美国依赖武力恫吓和经济高压来牵制日本。没有人能确认，这些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在珍珠港布置舰队有点虚张声势的味道，因为这支舰队缺乏其他的辅助力量，除了能对较近的几个受日本托管的岛屿发动袭击外，别无用途。此外，调动这支舰队中任何重要的舰只去增援大西洋地区似乎会削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显示的决心。

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的效果更是难以确认。美国着手实施一项逐步减少对日出口的计划，并最终停止出口石油。当 1940 年晚些时候日本有所收敛时，美国仍无意中止这项计划。恰恰相反，每月一至二次照样定期公布新的禁运货单。罗斯福和赫尔指望通过施加压力来遏制日本，但又怕石油禁运将促使日本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因此他们决定不超越石油禁运的界限，然而，不包括石油这最关键的禁运物在内，禁运的效果也就因此有限，这反映出美国的软弱无力。

在 1940 至 1941 年的冬天，日美关系仍陷于僵持状态。尽管轴心国联盟的形成，使英美关系进一步紧密了。1941 年 3 月 11 日总统签署的租借法案清楚地表明，美国决心支持英国。德国在空中、海上和潜水攻击使英国海军蒙受的损失超过了其自身的补给能力，这就引出了美国为了保证租借法案规定的补给品的运输，将卷入大西洋地区战争的问题。1941 年 3 月 15 日和 16 日，仅在新斯科夏半岛以东五里涅的地方，一支运输船队被二艘德国巡洋舰击沉，这一事件促使美国海军建议，一旦战争发生，立即派遣太平洋舰队增援大西洋地区，并由美国承担运输船队的护舰任务。那时，日本的盟友似乎想把它拖入德美战争中去。［8］相比之下，在太平洋地区问题上英美两国的合作要困难些。1941 年 2 月和 3 月间在华盛顿举行的英美政府官员秘密会谈中，英国强烈地要求美国舰队驶往新加坡。对此，美国拒绝了，此刻，出于首先需要击败德国的战略考虑，同时又需要在太平洋地区设防，美国决定在能应召前往大西洋的区域里布置一支舰队。而且，美国海军非常怀疑新加坡的设施和防御能力，担心向亚洲水域派遣舰队会冒激怒日本的风险。罗斯福并不想参与保卫大英帝国的基地，而使美国和在亚洲的欧洲殖民主义发生关系。结果新加坡基地依然空虚如故，由英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共同保卫马来屏障的计划也搁浅了。虽然保证大英帝国的交通线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同支持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的重要性相比就显得略逊一筹了［9］。

日本人并没有察觉这一战略上的分歧。他们军事研究表明，一旦日本进攻新加坡，美国将进行干涉，而且人们认为，在大西洋地区显著巩固了的英美联盟已扩大到了亚太地区。日本海军的规划官员确信，日本继续在印度支那进军将促使美国实行禁运。这一禁运必然会迫使日本为了取得石油去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这必然会引起和英美的战争。由于受到逐步升级的经济压力，这一合乎逻辑的推断也增强了日本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意识［10］。

1941 年 2 月，日本的军事活动和调停印支——泰国边界的冲突表明，日军的进攻迫在眉睫，很可能要夺取印度支那南部和泰国的基地，也可能进攻马来亚。英国发出警报，强烈要求美国向日本提出警告。美国领导人——正确地说——怀疑日本是否为这样的直接行动作好了准备。总之，他们希望在国会辩论租借法案时，避免发生危机。但是，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采取主动行动，警告外务省说，如果日本威胁英帝国的交通线，那它“将必定会和美国发生冲突［11］。所谓的“二月战争恐慌”平息下去了，然而，到了 3 月，

在松冈外相宣布了访问莫斯科和柏林的计划之后，战争恐惧又重新抬头了。和苏联达成协议将为日本开拓南下进攻的道路，而且日本的南下可能与德国入侵英国同时进行。

与此同时，日美外交史翻开了最奇特的一章。1940 年，天主教马里诺尔传教会的詹姆士·德劳特神父想出了一项推动和平计划的主意，以便摆脱双方外交官的僵硬的立场。在拉拢了有相当地位的日本人和美国人之后，并在其上司詹姆士·沃尔什主教和两位日本人（一位是银行家，另一位是陆军上校）的帮助下，德劳特构划出一份协议草案，并由信奉天主教的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于 1941 年 4 月 9 日呈递国务卿，当然，他还给了暗示，说这草案是近卫公爵本人授意的。4 月 14 和 16 日，赫尔和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海军大将讨论了这项计划，野村早已熟知德劳特及其同伙的工作。赫尔说，如果日本政府批准并提出这份文件，那它就将为开始谈判提供基础［12］。

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一时刻鼓励一群反常的业务外交家呢？原因在于大西洋问题。在这一特殊的星期里，总统和他的海军顾问们正在计划扩大海军巡逻区域，这样，在某种情况下，美国军舰将对德国船只开火［13］。由于对德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接受这一偶然发生的外交建议似乎是稳妥的。4 月 13 日，即赫尔会见野村前一天，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公布，这大大加强了上述的考虑。虽然松冈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绝大部分目标，但苏日条约使日本南下发动进攻时，少了后顾之忧。由此而产生的担忧促使罗斯福修改他的大西洋巡逻计划，以减少战争的风险，并暂缓实施从太平洋地区派遣 3 艘主力舰、4 艘巡洋舰和 14 艘驱逐舰去增援大西洋舰队的计划。l 艘航空母舰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换防仍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因此，松冈外交对美国政策并非毫无影响［14］。

不过，美国决心使遏制日本的努力不要显得犹豫不决。1941 年 4 月 14 日，即苏日中立条约签署后的那一天，美国又公布了一份新的禁运货单。次日，总统授权美国空军飞行员退出现役，以集体形式服役于中国。他们后来被誉为飞虎队。罗斯福又向中国保证它能享受租借法案的待遇。

同时，外交活动似乎是有效的。倘若近卫绕过松冈支持德劳特计划，日本领导层的分裂会更加扩大。总之，如果日美会谈为柏林获知的话，会谈会使轴心国关系变得紧张，事实上已是如此。华盛顿表现出一分的和解态度，可能会有十分的作用使东京三思而行，暂缓发动南下进攻。赫尔恰如其分的警告和适中的条件，包括他著名的四项和平原则，使他出色地维护了他的立场。

这一阶段赫尔-野村的谈判持续了两个月之久。5 月 12 日，日本人对德劳特草案作出了反应，美国人则在 5 月 31 日提出了一项反建议，并于 6 月 21 日提出了一份修正案。在此期间，就字句的修改交换了许许多多的建议。业余外交家的工作产生了一些混乱，但是并未对两国了解双方的基本立场制造严重的障碍。双方存在着很多分歧，然而只有两点是主要的：一旦美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根据轴心国联盟规定，日本的义务问题和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安排问题。美国坚持认为，日本应保证在美国将其防御区域向东扩展到大西洋地区，和德国海军发生冲突而引起战争时，它将不承担加入美德之战的义务。日本没有准备正式宣布放弃履行它对轴心国联盟承担的义务。日本人还坚持，在实现和平之后，日本仍要在华北驻军，而且谈判尚在进行时美国应暂停援助中国。对此，美国拒绝了。这些就是两国关系无法修好的根本

原因［15］。

就分歧本身而言，它们并非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倘若能保证日本得到美国和东南亚的资源，并有解决永无休止的中国问题的办法，它可能会同意使轴心国联盟不起作用，并放弃南进。日本在华北和内蒙古的驻军和维持满洲国的存在并非是不可变通的条件；在德国战败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

解决美日分歧的困难并非在于问题本身，而是这些分歧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与其有关的国际背景。美国官员认为，如果美国想提出唯一的一种日本所能接受的和平方案，这种努力将会使美国人民大失所望，而那时政府正需要鼓励美国人民支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负起责任；这种努力会使中国人泄气，他们会有被抛弃之感；它会使英国人伤心，他们需要看到美国坚定的表现；它还会削弱苏联人，他们早已受到大批德国军队的威胁。美国人和俄国人都担心，一旦达成一项解决方案，日本就能自由地从中国抽出兵力，担心日本会如何利用多余的兵力。日本困在中国显然是有好处的。而且，双方对外交活动都无多大的把握。从 1941 年的特定环境来判断，在此之前和侵略者达成的外交解决办法看来都是失误的，而且代价高昂。在过去 10 年中，没有任何经历能促使美国人相信日本人是可靠、诚实和有和平愿望的。对日本来说，美国似乎是不可宽恕的。

最后，1940 至 1941 年世界力量平衡正在迅速地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使外交处于次要地位。在日本，一连串急速发展的事件引起宿命论的产生。对于无法预测的未来，两个敌对集团都倾向于避免作出那怕是短期的承诺。专注于欧洲的局势使美国避免卷人太平洋问题。在日本，由于德军于 1941 年春天在希腊发动闪电战后是如此的锐不可挡，英国的前景又那么暗淡，而美国阻止德国的能力是如此模糊不清，甚至连倾向西方的日本人都无法摆脱轴心国联盟的保护。

1941 年 5 月 14 日，总统重新审查了耽搁已久的将主力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从太平洋调往大西洋的计划。他之所以重新考虑此事主要是因为得到报告说，维希法国和希特勒达成了在欧洲和非洲进行广泛合作的协议。美国担心德军会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夺取直市罗陀。德国控制直布罗陀将威胁大西洋上的岛屿（亚速尔群岛、绿角群岛和加加那利群岛）和达喀尔，最终将危及拉丁美洲。罗斯福比以往更加确信，大西洋是最关键的地区。“除非希特勒能在那里取胜”，他于 5 月 14 日致函丘吉尔说，“他最终无法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赢得胜利［16］。问题是决定从太平洋抽调多少军舰；按英国人的劝告，“调动多少军舰的应依据既要保留在太平洋的威慑力量，又要在增加美国舰队后能在大西洋起到威慑作用”［17］。美国甘愿冒与德国交战的风险，也将起威慑日本的作用。罗斯福认为，按最初的计划，调动四分之一太平洋舰队将会达到上述目标，就此下达了命令。21 架 B-17 轰炸机飞往夏威夷以部分替代被调走的舰只。

日本于 5 月 12 日对德劳特在 4 月份草拟的谅解方案作出的反应无疑促使了总统实施海军调防计划。由于受到松冈的影响，日本的反应与最初的谅解方案相距甚远，以致能否达成协议十分令人怀疑。但它还是提供了继续对话的希望。日本愿意谈判的意向连同没有立即南下进攻的迹象，使得调防计划显得更为安全。［18］6 月，美国在谈判时发表声明的语气和内容开始有所改变，赫尔强调指出了双方的分歧和他对达成一项长期的而不是“权宜”的

协议的希望。他越来越直率地批评支持轴心国联盟的日本人，特别是松冈。在 6 月 21 日的口头声明中，他提到了有影响力的日本领导人，一旦美国出于自卫而卷入欧洲战争的话，他们决意支持纳粹德国，并拟议“与希特勒并肩战斗”［19］。很清楚，谈判日趋流于形式，一股寒流正在逼近。最能说明这一变化的因素是美国坚信德国进攻苏联迫在眉睫。

从 1 月至 6 月，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如破译的电文，秘密特务，外交使节间的闲聊，新闻报道等，德国人即刻向东发动进攻的迹象增多了。然而，在 6 月初之前，普遍的猜测是希特勒在入侵并击溃英国前是不会发动进攻的。当希特勒并未着手入侵英国时，许多人认为，德国军队的集结旨在恐吓俄国人，迫使他们屈从于德国提出的资源和领土要求，而且预料俄国人是会让步的。一些观察家获得的情报终于使他们深信不疑。希特勒会在任何情况下进攻俄国。英国情报机构在 6 月的第二个星期终于得出了那个结论［20］。到 6 月 6 日，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结论，因为那天他们破译了一份日本驻柏林大使报告他和希特勒以及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会谈内容的电报，大意是说，任何谈判都不会举行，战争实际上已不可避免［21］。

这一预测使与日本达成一项协议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德国转而东进将会给英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国务院的分析家们认为，这也将在日本引起混乱和犹豫，结果会使其南下进攻至少推迟几个月。现在更可能的是，日本会北进而不是南下。日美间达成一项稳定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和其资源来源的解决方案可能会促使日本进攻俄国。美国远东师的沃尔特·阿达姆斯认为，倘若打败“整个侵略势力”符合美国利益的话，它的目标应当是“使日本无法发动诸如对西伯利亚和对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进攻”［22］。虽然这一观点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几天才公开表露出来，但合乎逻辑的推断是，在进攻前几天这一观点已广为接受，那时进攻几乎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希特勒进攻苏联所引起的世界力量戏剧性的变化同时既提高了威慑的重要性，也降低了与日本和解的价值。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前一天，赫尔在和野村谈话时最后说，美国需要“日本给一个更为明确的表示，……［说明］日本政府基本上希望寻求和平”。［23］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使日本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在以后的 10 天里，日本政府内就如何行动进行了紧张的讨论，焦点是应该像德国和松冈迫切要求的那样，日本加入轴心国盟友的行动，从东面进攻苏联，还是实施南进计划。7 月 2 日的御前会议批准了一项含糊不清的决议：如果苏联在以后的一、二个月里到了被击溃的边缘，或者从东部地区撤走其大部分空军和地面部队以抗击德国进攻的话，日本将准备并实施北上进攻。然而，增援在满洲的关东军不应该妨碍同时为实施南下战略而可能与美国和英国发生战争的准备工作。日本将夺取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基地，它们对以后进攻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这一阶段的进军似乎不可能引起战争，但是日本还是准备冒这个风险。日本的重点在于南下。［24］

由于魔术般的电报破译能力，美国的决策者们在 7 月间一直对日本南进计划的发展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日本已经要求得到 8 个空军基地和 2 个海军基地，其中包括位于今天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金兰湾这一最好的天然港口。他们也得知，日本甚至在与维希达成协议之前就派遣军队去接管这些基地［25］。在日本扩张的第二个阶段里，日本人是如此厚颜无耻地背弃了愿意和平的誓言。日本这一阶段的扩张对美国政策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人们几乎已经能下如此定义：日本人就是掠夺成性，口是心非。

富兰克林·罗斯福故意作出十分模棱两可的反应。问题在于是否运用他剩下的全部经济手段——石油禁运，而去冒迫使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的风险。笔者认为，总统拖延了三个月后，实行了石油禁运，但他本人又不公开宣布实行禁运。［26］

对日本出口的石油早已锐减。由于日本大幅度地增加订购美国石油和英国的一再敦促美国在春季着手准备控制对日出口石油。美国已经不让日本获得东海岸港口的石油，悄悄地从对日贸易中撤走了油轮，停止出口整桶的石油，并不再颁发新的石油出口许可证［27］。内阁中的鹰派和新闻界要求实施彻底的禁运，可是，由于罗斯福听从了赫尔和海军方面的意见，以及更主要的是他小心谨慎的天性，他告诉他的内阁，他不想挑动日本发动进攻。他将按和平时期的需要量对日本提供石油，可以随时停止供应。1941 年 7 月 25 日晚上，总统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将两国所有的贸易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他还指示作好准备，降低出口石油制品的质量级别，和把对日供油量限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日本的购油量之内。

临近发布冻结令前，总统召见了野村大使，建议共同保证印度支那的中立。7 月 27 日，东京答复说，这已为时太晚，因为占领早在进行之中，而且无论如何，在日本人对冻结的愤懑平息下来之前，日美间不会达成任何协议［28］。7 月 29 日，助理国务卿卫尔斯（毫无疑问，他代表总统）下令，“在今后的一、二周里”，美国不会对日本申请贷款一事作出答复［29］。8 月 3 日，总统和卫尔斯前往纽芬兰会见温斯顿·丘吉尔。在 8 月 17 日罗斯福返回之前，美国没有就日本申请贷款给予答复。美国官员没有禁止石油出口，但是阻断了用于购买和运输石油的资金出口。相反，他们劝告日本人使用在美国以外的资金。不管怎样，美国正渐渐停止向日本出口任何石油和石油制品，虽然没有明确地那么说。一旦英国人和荷兰人知道美国已事实上实施禁运——而发觉这一点并非易事，他们也着手协调各自的贸易政策，使其与美国一致。在罗斯福从阿金夏湾归来时，日本和除自己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的贸易往来正趋于完全停止。

罗斯福在前往阿金夏湾参加大西洋会议说明他决定破釜沉舟了。他和丘吉尔决定了他们所希望的和平形式，由此定下了美国可能参战的政治基础。他派遣快速护航舰，承担远至冰岛的护航任务，这是美国在大西洋从中立隐约地转向参战过程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与此相似，在太平洋地区暗中的卷人就是既成事实的石油禁运。总统向丘吉尔保证，他十分有意地维持全面禁运，并且允诺向日本提出直截了当的战争警告，告诫它不要在任何地方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英国人由于得到美国警告的支持，也可以自己对日本发出警告，并且给荷兰人明确的保证。这样，在军事方面遏止日本的政治基础就形成了。［30］

为什么罗斯福接受了他先前总认为可能促使日本发动进攻的石油禁运呢？为什么他在进行未经宣战的对德海战并需要在太平洋地区得到一切和平时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呢？毫无疑问，这种强硬的态度说明他彻底丧失了对日本的信任，另一方面，罗斯福在此之前几乎对日本并不那么相信。他也毫无疑义地认识到只有极其强硬的立场和采取各种威慑和施加压力的措施才有可能阻止日本，但到目前为止，单纯一次警告，或施加一次压力都未能阻止住日本人。他也可能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即他还未采取正式禁运这一最后步

骤，因为出口只是暂时中止，而不是永远停止。这能使日本人去猜测石油政策究竟会怎样，尽管出口中止时间越长，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且，罗斯福能够确信。对日本施加压力将会在内阁和全国受到欢迎，虽然他曾在很长时间内固执地拒绝实施禁运的意见。这样，转变的种种理由业已存在，但似乎说不准那条理由是起主要作用的。

看来关键是俄国人对德国入侵的抵抗。美国军事分析家估计，红军只能坚持几个星期，最后两个月。罗斯福在 6 月 26 日写道：如果红军能坚持得更久，那么“这就意味着欧洲将从纳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31］。10 天之后，他对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谈了他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已犯了“第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32］。7 月 9 日，他命令对击败潜在的敌人所需要的全部物资数量作一番研究，这项研究产生了“胜利计划”。到了 7 月中旬，新闻界和外交渠道都报告说，德国人正遇到不曾估计到的十分顽强的抵抗。7 月 19 日，德军暂停前进，部分原因是需要休息和整编，也因为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意见不一致。面临着直捣莫斯科还是北上和南下包围更多的俄国军队的选择时，希特勒犯了致命的错误，选择了后一种路线［33］。7 月 31 日，罗斯福在莫斯科的私人特使哈利·霍普金斯报告了有关俄国人的决心和斯大林认为他能坚持到冬天的信心。总统立即敦促他的属僚赶快提供援助。如果在 10 月 1 日前德国人能一直被遏制住的话，他说，苏联“在春天之前将是安全的”［34］。8 月 7 日，他在前往阿金夏湾的途中收到了一份发自柏林的报告，该报告说，德国人在俄国的进军时间表已推迟，迫使希特勒修改他的目标。该报告还说，德国人突然遇到事先未知的一百个新征的俄国师，显得特别惊慌失措。［35］

在阿金夏湾作出决定的时候，罗斯福相信可以较可靠地断定俄国能生存至 1942 年。现有的军队足以击败希特勒，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也能击败日本，形成和维护这一联盟成了罗斯福的头号目标。日本很可能从后面进攻苏联。在俄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这一威胁对美国利益的危害并不亚于日本的南进。10 月 10 日，罗斯福总统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说，在早些时候他曾劝告斯大林，如果西线战场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的话，他可以从西伯利亚撤走军队。如果日本进攻苏联，美国对此会有所反映［36］。

美国遏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行为的重要手段是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石油禁运的目标不单纯是恫吓日本，更重要的是使日本无法动员军队。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感到自己犹如涸辙之鲋［37］。那句话确切地说明了他们的感受，始终如一的、强硬的对日政策更有利于向苏联，自然还有向中国表明，美国总是一个坚定的伙伴。

罗斯福于 8 月 17 日返回华盛顿，当天就会见了野村，并且敦促恢复外交活动。倘若日本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行动的话，罗斯福就同意再次开始谈判［38］。在与野村的一系列会谈中，他似乎对日本人提出的由近卫文磨提出的建议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这一和解的姿态似乎很不符合他刚刚制定的、施加巨大压力的计划。

事实上，罗斯福的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石油，确切地说所有的贸易仍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罗斯福完全放手让他的属僚们按照他们的意愿工作，而他们让日本人钻进永无止境的官僚主义公事程序中去寻求出口准许。国务院没有，也没有考虑过作出任何让步；它劝告日本根据美国的立场调整自己的政策［39］。倘若这些情况确实的话，那么得出下列结论似乎是合情

合理的，即罗斯福作出更加和解的姿态旨在了解施加经济压力后，日本的立场将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争取时间改善防务和加强威慑力量。如果真的前往朱诺会见近卫的话，那将赢得二周以上的时间来增加兵力。

美国需要拖延时间的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在东亚建立一支远程轰炸空军力量。在菲律宾布置 B-17 飞行堡垒的设想在 1940 年就提出来了。到了 1941 年夏季，美国的飞机制造能力已足够使空军提出筹建基地的计划［40］。在阿金夏湾，乔治·卡·马歇尔将军告诉英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说，这些轰炸机对日本人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是一支“实足的威慑力量”，在适宜进行高空轰炸的冬季更是如此［41］。8 月 14 日，他命令 9 架 B-17 轰炸机取道中途岛、威克岛、莫里斯比港和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开拓通往菲律宾的空中路线。这些轰炸机于 9 月 12 日安全抵达，更多的飞行中队也随后而至。美国计划在 1942 年 3 月前布置 4 个重型轰炸机群，包括 272 架飞机、68 架后备飞机，外加 130 架 P-40 高级驱逐机。安置这些战略装备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由于船只的匮乏，主力地面部队的派遣一直拖到 12 月份才完成［42］。

这支空军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在两洋舰队布置停当之前，它将起临时替代的作用。史汀生致函总统说，由于“有了这支快速、机动的庞大空军，美国自己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的 20 年间的战略能力已经发生巨变”［43］。挪威、英国和克利特岛的战事证明，在没有掌握制空权时，任何海上进攻都不可能成功，这些飞机不仅将阻止或击溃扬帆南下的日本进攻部队，而且能够在一项更大计划中起作用：它们能向北飞行，轰炸日本，在海参崴加油后，可以继续飞往阿拉斯加，然后再飞返菲律宾，马歇尔将军在 1941 年 9 月的一次电话谈话中对这种飞机作了这样的评价：

> 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飞机能从达尔文港［原文如此］和澳大利亚，从新不列颠；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甚至可以从海参崴起飞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布置它们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日本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这］在当前对事态的发展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力。……因为这实际上能迫使日本人后退，并将必然阻止他们进攻马来群岛。这或许能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不敢贸然进攻西伯利亚。而且，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迫使他们退出轴心国。［44］

B-17 轰炸机是全面增援菲律宾的关键部分。当英联邦的军事顾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春季提出一项诱人的新计划时，（实施这项计划对抵御日本入侵菲律宾会起一定的作用）就开始了小规模地增援菲律宾。当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地区时，增援的速度也加快了。总统下令正式成立并训练人数能达到 16 万之多的菲律宾军队，并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陆军司令。在那年秋天，炮兵、步兵、坦克、骑兵和通讯部队被派遣至马尼拉。海军派出 12 艘新式潜水艇，使美国在亚洲的舰队总数达到 25 艘［45］。与此同时，美国的油轮满载石油正通过日本海驶往海参崴［46］。

在美国为保卫荷属东印度群岛提供武器时，美国人尽其所能地加强了他们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防御。英-荷-美参谋长会议并未试图对外保密［47］。1941 年 11 月组成的一支英国东方舰队预期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美国承担了保卫格陵兰和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以阻止德国快艇的海上袭击的任务；“俾斯麦号”被击沉；两艘新的美国战列舰即将派往大西洋；一艘新的英国

战列舰即将编入现役；船舶修理能力的扩大；上述情况使皇家海军得以向印度洋派出 5 艘战列舰、1 艘运输舰和 1 艘战列巡洋舰［48］。根据英国的看法，德国威胁莫斯科以及近卫内阁的倒台需要在东亚采取最严厉的威慑措施［49］。4 艘非常陈旧的战列舰仍停泊在西印度洋，而那艘运输舰在起航前就触礁了。不过，那艘新建的“威尔士亲王号”和“逐浪号”则于 12 月 1 日抵达新加坡。在战争期间，这些战舰将由来自马尼拉的美国驱逐舰护航。富丽堂皇的新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将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丘吉尔于 11 月 2 日致函罗斯福说，我们“并没有能捕获和击沉敌人的军舰”。他断言道：“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定，他们冒险尝试的可能性也就越小”［50］。

和对中国的援助相比较，这些措施似乎是很重要的。从 1938 年至 1941 年年底，美国给予中国 2．01 亿美元的贷款。在此同一时期，苏联给予中国的贷款为 2．5 亿美元。飞机、武器、顾问和志愿飞行员正送往中国，然而在 1941 年年底之前却很少有军用物资运抵。当中国人警告日本将进攻昆明时，中国人被告知，美国所能提供的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加强菲律宾的防务［51］。美国官员对一些有关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之间发生战斗的报告十分关切，然后却只能小心翼翼地向中国官员强调全民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在加速增援步伐的同时，美国外交官们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对话，而日本人对举行一次首脑会晤的希望落空了。8 月 28 日，日本人提出了几项建议，美国人于 9 月 3 日作出答复，9 月 4 日和 6 日日本人作出了反应，美国人于 9 月 10 日提出修正意见，9 月 13 日、22 日、23 日和 25 日日本人又多次提出不同看法，而美国人则在 10 月 2 日再度提出反建议，当时交换看法的地点移到了东京，参与接触的人中包括在其内阁执政最后几天的近卫本人［52］。日本人自始至终主动地提出建议，美国人则一味评论日本人的建议。赫尔很早就明确地指出，在确定举行首脑会晤的时间和地点之前取得一致意见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征得有利害关系的各方——中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同意和谅解。

那年春天，日本显然准备使轴心国联盟成为一纸空文，虽然它并未正式宣布退出。如果在中国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即日本能在中国北部和内蒙古驻扎军队，并能获得美国和东南亚洲的资源，日本也准备从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撤出和从南进占领的地方撤出。为了在中国实现这类和平，美国必须使用中止援助的方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美国并未从其 6 月确定的立场后退。甚至近卫本人保证，他将恪守著名的赫尔原则都没有对美国人产生任何的影响。赫尔有时观望，有时主动提议，使会谈维持到 10 月 16 日近卫内阁辞职。

东条将军的新政府使华盛顿更为忧心忡忡，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灵活些。美国人一直在争分夺秒，只是没有一个最后的期限。现在格鲁大使发出警告，施加经济压力将会使日本垮台。但是，日本远不会就此屈服，相反它将孤注一掷，以夺取资源，使日本不受制于禁运。他告诫上司说，“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也许不可避免地引起日美间的武装冲突，日本的行动可能突如其来，其突然程度既危险又具有戏剧性”［53］。次日，即 11 月 4 日，东条政府在提出内容广泛的新建议的同时，给野村下达的指示警告说，这是日本“可以做的最后一次努力”。若不能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就将破裂。的确，“我们把国家的命运都压在这张牌上了”。这份电报很快就被破译了［54］。11 月 5 日，美国的陆海军重申了目前的战略，建议在继续增强东亚的防御系统时，应避免战争。只有一旦日本进攻英国、荷兰或美国的领土，或者进攻

其他战略地区，如泰国西南地区，这些地区被日本占领将危及盟国领土，只有出现上述情况，军方才要求进行战争。翌日，即 11 月 6 日，总统开始寻求各种能避免发生冲突的方法。

在此之后的 20 天中，心烦意乱的国务院官员们试图制定一项将外交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短期建议，并试图使其得到批准。他们根据总统提出的休战 6 个月的建议和日本人提议的临时协议开展工作。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建议草案都发誓，他们的国家绝不对外扩张，以及日本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其军队。美国的草案坚持以日本人将其在印度支那北部地区的军队减至 2．5 万人为条件，日本草案要求美国保证不采取任何会有损于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的解决方案的行动，实际上要美国不提供任何援助，而美国的草案仅仅声明美国的兴趣在于实现公正的和平。美国草案提出结束资产冻结，允许某些货物出口，其中包括足够供民用之需的石油，而日本的草案则要求恢复贸易和供应石油，数目经谈判决定（根据窃听到的消息，日本人期望从美国和印度群岛获得 500 万吨石油）。日本的草案没有规定时间限制，而美国的建议提出以 3 个月为限。

在其他场合下，解决日本的扩张和美国对日贸易的限制并非毫无可能。但是，在 1941 年 11 月的实际情况下，两国的分歧看来确实很大。一个特别重要的分歧是美国拒绝停止援助中国，以迫使中国接受一项解决方案。如果美国提出反建议的话，日本人是否会接受是很成问题的。美国的反建议之所以没有提出，是因为英国人在临时协定中表现出不太热情的支持和来自重庆的反应［55］。据说，蒋介石认为，这种协议将使中国人彻底丧失对美国的信任。他说，过去和将来所提供的任何数量的援助都将无法弥补中国人的被遗弃之感。在 1941 年，中国的外交并未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在这个问题上，它迫使赫尔收回了这个建议，而向日本人提出了一系列内容广泛，并且缺乏和解诚意的条件，以致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表面文章而已。

美国拒绝妥协有其深刻的原因。美国更为重要的、并且是日趋增长的利益在于形成和维持一个旨在击败德国及其盟国的联盟。对于它来说，比避免战争更重要的，是坚持一个能使公众和友邦遵循的立场。美国对直接援助中国持谨慎的态度，但又决心不做出卖或者看来会出卖中国的事。它宁愿日本依然被牵制在中国，而不愿日本进攻苏联。它宁愿采取目前施加强硬的经济压力以削弱日本，同时加强自己力量与日本对抗，而不相信姑息放纵的做法，那将会再度使日本变得为所欲为。罗斯福总统未能理解日本人的绝望心情和他们的决心。他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过于低估了日本人的能力。但是，他知道他的措施会有冒与日本一战的风险，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他准备接受那种风险。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

11 月 25 日，关于日本军队向南运动的报告开始传来。当对泰国或马来亚的进攻看来已迫在眉睫之时，总统于 12 月 4 日向英国人保证说，一旦他们遭到攻击，美国将和他们站在一起，接着英国人也对荷兰人作出保证。这个日本人一直认为已经存在的联盟终于形成了［56］。日本人既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因此而按兵不动。现在，美国政府预料战争将在东南亚爆发，可能还包括对菲律宾的进攻，它并未预见到日本会对珍珠港发动进攻。

注释

[1] 引自沃尔多·海因里希（Waldo Heinrichs）：《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和美国外交传统的发展》(American Ambassador：Joseph C.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Tradition），波士顿，1966年版，第299页。

[2] 格鲁致哈罗德·M·比米斯上校函（Grew to Capt.Harold M.Bemis），1940年3月13日，约瑟夫·C·格鲁档案（Joseph C. GrewPapers），麻萨诸塞，坎布利奇，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3] 摩利逊（Samuel Eliot Morison）：《太平洋上升起的太阳1931年至1942年4月》（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1931-April，1942），波士顿，1948年，第42至43页。

[4] 塞尔-罗斯福通信集（Sayre-Roosevelt correspodence），1939年12月至1940年6月，第7箱，弗郎西斯，·B·塞尔档案（Francis B.Sayre Pa-pers），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海因里希：《格鲁》，第308页和注（16）；臼井胜美（Usui Katsumi）："战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War），载詹姆斯·W·莫利编（James W. Morley）：《中国的陷阱：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展，1933—1941》(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on the Asian Continent，1933—1941），纽约，1983年版，第406至414页。

[5] 亨利·摩根韬致罗斯福函（Henry Morgenthau to Roosevelt），1940年7月24日，附件摘要引自美国国务院（U. S. Department of state）：《美国外交文件：俄国，1918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 S. ：Russia，1918）［无页码］。

[6] 海因里希：《格鲁》，第316至317页。

[7] 罗斯福致塞尔函（Roosevelt to Sayre），1939年12月4日，塞尔档案，第7箱。

[8] 丘吉尔致罗斯福函（Churchill to Roosevelt），1941年3月19日，PSF：大不列颠，富兰克林·D·罗斯福档案（Franklin D. RooseveltPapers），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以下简称FDRL）；诺克斯致罗斯福函（Knox to Roosevelt），1941年3月21日，第235箱，海军行动指挥部主席（以下简称CNO）秘密通信集，1940年至1941年（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CNO） Secret Correspondence，1940—1941），行动记录组（以下简称RG），第80号，国家档案馆（以下简称NA）："西大西洋上的海上护航""Ocean Escort in the Western Al-lantic，April l941"，关于袭击珍珠港的联合调查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听证会文件》（Hearings），第7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华盛顿特区，1946年，第16部分，第2163页；亨利·L·史汀生日记（Diary of Henry L. Stimson）（由康涅狄克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微缩胶卷），1941年3月24日和25日；罗斯基尔上校（Capt.S.W.Roskill）：《1939至1945年的海上战争》（The War at Sea， 1939—1945），（三卷本，伦敦，1954年版），第1卷，第376。

[9] 卢茨（James R. Leutze）：《为霸权而谈判：英美海军的合作，1937至1941年》（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北卡罗来纳：查普尔·希尔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225页及以下诸页。

[10] 角田顺："海军在南部地区战略中的作用"（The Navy's Role in theSouthern Strategy），由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Rodert A. Scalapino）翻译，见莫利编：《攸关重要的选择：日本向东南亚的进军，1939至1941年》(The Fateful Choice: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1939—1941），（纽约，1983年版），第245、250至251和255页：（Asada Sadao）："日本海军和美国"（The Japanese Navy and theUnited States），载博格和冈本春平（Dorothy Borg and ShumpeiOkamoto）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1931至1941年的日美关系》（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纽约，1973年版），第250至254页。

[11] 引自海因里希：《格鲁》，第327页。

[12] 国务卿备忘录，1941年4月14日和16日，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二卷本，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2卷，第402至410页。关于德劳特一行见布涛（R. J. C. Butow）《约翰·多伊的同伙：1941 年为了和平的后门外交》（The John Doe Assoc-ciaets：Backdoor Diplomacy For Peace，1941），（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74年版）。

[13] 哈罗德·L·斯塔克海军上将致诺克斯的备忘录（Memo，AdmiralHarold L. Stark to Knox），1941年4月14日［第一号西半球防卫计划］，第3项，第一号特别卷，第20箱，理查德·凯利·特纳上将档案（Admiral Richard Kelley Turner Papers），华盛顿特区，海军院，海军行动档案馆（以下简称NOA）。

[14] 斯塔克海军上将致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函（Admiral Stark to Admiral Husband E. Kimmel，Commander-in-Chief），1941年4月7日，关于袭击珍珠港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听证会文件》，第二部分，第5503页；斯特森·康恩和拜伦·费尔柴尔德（Stetson Conn and Byron Fairchild）：《半球防御结构》（Frame-work for Hemisphere Defense），（华盛顿特区，1960年版），第107至108页［第2号西半球防卫计划］。

[15] 《美国外交文件：日本》，第2卷，第411至494页；美国国务院编：《1941年美国外交文件》（7卷本；华盛顿特区，1956年版），第4卷第150至274页。

[16] 罗斯福致丘吉尔函（Roosevelt to Churchill），1911年5月14日，FO371/26148，A 3555/11/45，伦敦，丘加顿，国家档案局（以下简称PRO）；罗斯福致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函（Roosevelt to Secretarv andUnder Secretary of State），1941年5月14日，PSF安全专项：法国，载FDRL；副国务卿起草的备忘录，1941年5月14日，PSF：法国，载FDRL；康恩和费尔柴尔德：《半球防御结构》，第110至114页。

[17] 英国外交部致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使团函（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Military Mission at Washington），1941年5月8日，FO 371／26220，A3153／384／45，PRO）。

[18] 野村递交赫尔的建议书草案（Draft Proposal Handed by Nomura toHull），1941年5月12日，《美国外交文件：日本》，第2卷，第420至425页。

[19] 会谈备忘录，1941 年 6 月 6 日，载《美国外交文件：日本》，第 2 卷，第 466 页；赫尔向野村发表的口头声明，1941 年 6 月 21 日，同上，第 485 页。

[20] 欣思利（F. H.Hinsley）：《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机构，它对战略和行动的影响》（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tsInfluence on Strategy and Operations），（二卷本，纽约， 1979 年版），第 1 卷，第 478 页。

[21] 大岛大使关于他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报告收在美国国防部：《珍珠港的“不可思议的”背景》（The“Magici”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八卷本，华盛顿特区，1977 年版），第 2 卷，A 部，第 A329 页。他关于和希特勒会谈的报告仅见于 SRDJ［日本外交译件集；1939 年 9 月至 1945 年］；柏林致东京函（Berlin to Tokyo），1941 年 6 月 4 日，第 639 号，于 1941 年 6 月 6 日译毕，第 14 箱，第 12034 页，SRDJ，RG，第 456 页。NA。这一内容相同的电报显然成了最后使英国人确信的证据。见欣思利：《英国情报机构》，第 1 卷，第 478 页。

[22] 远东司司长和助理司长起草的备忘录，1941 年 6 月 23 和 25 日，《1941 年美国外交文件》第 4 卷，第 276 至 279 页。

[23] 《美国外交文件：日本》，第 2 卷，第 486 页。

[24] 细谷千博著，伯顿（Peter A. Burton）译：“日苏中立条约”（The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载英利编：《攸关重要的选择》，第 95 至 96 页。

[25]《珍珠港的“不可思议的”背景》，第 2 卷，A 部，第 A411 至 A458 页。

[26] 关于总统打算允许出口一定数量的石油，而官僚们从中作梗，决意彻底禁运的观点，参阅厄特利（Jonathan G. Utley）：“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脱节：1940 至 1941 年的石油出口和日本”（Upstairs， Downstairs atFoggy Bootorm：Oil Exports and Japan， 1940—1941），载《序幕：国家档案馆期刊》（Prologue：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第 8 卷（斯普林，1976 年版），第 17 至 28 页，及小安德逊（Irvine H. Ander-son，Jr.）：《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的东亚政策》（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Pates East Asian Policy） （普林斯顿，1975 版），第 6 章。

[27] 小安德逊：《美孚石油公司》，第 158 至 165 页。

[28] 格鲁起草的备忘录，1941 年 7 月 27 日，《美国外交文件：日本》，第 2 卷，第 535 页。

[29] 国务卿案卷中的备忘录，1941 年 7 月 30 日，亨利·摩根韬档案（Hen-ry Morgenthau Papers），FDRL 摩根韬日记（Morgenthau Diary），第 426 卷，第 19 页。

[30] 英国海军部首席顾问致英国海军大臣函（First Sea Lord to First Lordof the Admiralty） 1941 年 8 月 11 日，首相致掌玺大臣函（Prime Min-ister to Lord Privy Seal）， 1941 年 8 月 11 日和 12 日，首相致外交国务大臣函（Prime Minister to Secretary to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1941 年 8 月 15 日，PREM3／485／1，PRO。

[31] 罗斯福致威廉·D·李海海军上将函（Roosevelt to Admiral

WilliamD，Leahy），1941 年 6 月 26 日，PSF：法国，FPRL。

[32]哈利法克斯致外交部函(Halifax to Foreign Office)，1941 年 7 月 7 日；FO 371129486，N3504／78／38，PRO。

[33] 克拉克（Alan Clark）：《巴巴罗塞：1941 至 1945 年俄德冲突》（Bar-barossa ： The Russian-German Conflict， 1941—1945），（纽约，1965 年版），第 4 章。

[34] 罗斯福致韦恩·科伊函（Roosevelt to Wayne Coy），1941 年 8 月 2 日，PSF：俄国 1941 年，FDRL。

[35] 赫尔致在“奥古斯塔号”舰上的罗斯福函（Hull to Roosevelt abroadAugusta），1941 年 8 月 7 日，PSF 安全专项，大西洋宪章会议，FDRL。同时参阅赫尔致罗斯福函（Hull to Roosevelt），1941 年 8 月 6 日，同上。

[36] 哈利法克斯致外交部函（Halifax to Foreign Office），1941 年 10 月 10 日，FO371／27910，F10639／86／23，PRO。

[37] 布涛（Robert J．C.Butow）《东条和战争来临）（Tojo and the Comingof the War）（普林斯顿，1961 年版），第 245 页和脚注（31）。

[38] 国务卿起草的备忘录，1941 年 8 月 17 日，罗斯福致野村的口头声明和书面声明，1941 年 8 月 17 日，《美国外交文件：日本》第 2 卷，第 554 至 559 页。罗斯福对声明的描述作为参考材料出自野村的报告：华盛顿致东京函，1941 年 8 月 17 日，第 706 号，见《“不可思议的”背景》，第 3A 卷，第 A26 页。

[39] FD 371／27974—27982，RRO；厄特利：“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脱节”；小安德逊：《美孚石油公司》，第 4 章。

[40] 韦格利（Russell Weigley）：“国防部和陆军的作用”(The Role of theWar Department and the Army），见博格和冈本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第 183 至 184 页；科斯特洛（John Costello）：《1941 年至 1945 年的太平洋战争》（The Pacifc War， 1941—1945）（纽约，1982 年版），第 102 至 106 页；哈林顿（Daniel F. Harrington）：“随意的希望：美国空军与日本， 1941”（A Careless Hope： American Air Power and Japan，1941 ），载《太平洋历史评论》，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 48 期（1979 年 5 月），第 217 至 238 页。

[41] 马歇尔、迪尔和戴克斯准将之间的讨论记录（Record of Discussion be-tween Marshall， Dill and Brig. Dykes），1941 年 8 月 11 日，PREM3／485／5，PRO。

[42] 伦纳德·T·杰罗准将致理查德·穆尔少将的备忘录(Memo byBrig. Gen. Leonard T. Gerow for Maj．Gen. Richard Moore），1941 年 10 月 8 日，WPD4561—4563，1920—1942 战争计划数目案卷（WarPlans Division Numerical Files，1920—1942）RG 165，NA；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Memo for Secretarv of War），“增援菲律宾”（Reinforce-ment of the Philippines）， 1941 年 11 月 28 日，WPD 4561—4567，同上。

[43] 史汀生致罗斯福函（Stimson to Roosevelt），1941 年 10 月 21 日；PSF：国防部，FDRL。

[44] 马歇尔将军和斯梅德勃格第三海军少校间的电话谈话（TelephoneConversation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Lt. Commander

W.R.Smedberg III），1941 年 9 月 25 日，OpNav［即海军作战处］电话记录，（OpNav Naval Operations Office Telephone Records），1941—1942，NOA。斯梅德勃格是斯塔克指挥的旗舰的秘书。

［45］杰罗致穆尔的备忘录（Memo，Gerow to Moore），1941 年 10 月 8 日，陆军副官长致军械署署长的备忘录（Memo， Adjutant General toChief of Ordnance），1941 年 4 月 16 日，及杰罗致参谋长的备忘录（Memo，Gerow to Chief of Staff），1941 年 8 月 14 日，WPD 3251，RG165，NA；战争计划司起草的备忘录（Memo by War Plans Division），1941 年 12 月 6 日，关于菲律宾的档案（Philippines Folder），第 11 箱，史汀生保险宗卷（Stimson safe File），RG 107，NA；罗伯特·戈姆利海军少将致达德利·庞德爵士函（Rear Admiral Robert Ghormley toSir Dudley Pound），1941 年 11 月 7 日，“美英荷会议，新加坡，1941 年 4 月至 1941 年 11 月”（American-British-Dutch Conferences， Singapore， April 1941-Nov. 1941），NOA，美国驻欧洲海军司令部记录，1938 至 1947 年（以下简称 COMNAVEU），第 2 辑。

［46］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和国务卿起草的备忘录（Memo， by Couneelor ofEmbassy in Japan and Secretary of State），1941 年 8 月 27 日，《美国外交文件：日本》，第 2 卷，第 568 至 570 页。

［47］斯塔克海军上将致海军上将查尔斯·利特尔爵士函（Admiral Starkto Admiral Sir Charles Little）， 1941 年 10 月 10 日，太平洋-远东通信，第 2 号 NDA，战略计划司记录（以下简称 SPDR），第 7 辑，第 117 箱。

［48］ 1941 年 10 月 17 日会议，NDA，COMNAVEU，第 2 辑 1941 年英国海军部会议记录；丘吉尔致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门茨斯爵士函（Churchill to Sir Robert Menzies，Ph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1941 年 10 月 10 日 PREM3／163-3，PRO；丘吉尔致加拿大总理麦肯茨·金函（Churchill to Mackenzie King，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1941 年 11 月 5 日，同上。

［49］海军部驻伦敦特派观察员致海军作战处函（Special Naval Observer atLondon to OpNav），1941 年 10 月 26 日，NOA SPDR，第 7 辑，第 117 箱，太平洋-远东美国联合参谋部通信，第 2 号。

［50］丘吉尔致罗斯福函（Churchill to Roosevelt），1941 年 11 月 2 日；PSF：大不列颠：温斯顿·丘吉尔，1940—1943，FDRL；戈姆利致庞德函（Ghormley to Pound），1941 年 11 月 7 日，PRO（即护送英国战舰的美国驱逐舰队），ADM 205/9。

［51］ 斯塔克海军上将和马歇尔将军起草的备忘录（Memo by AdmiralStark and General Marshall），1941 年 11 月 5 日，RG80，CNO 秘密通信，第 248 箱，A—16—3（1）；阿瑟·N·杨格（Arthur N. Young）：《中国和援助之手， 1937—1945）（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麻萨诸塞：坎布利奇，1963 年版，附录 2，第 440 页；史汀生日记（Stimson Diary），1941 年 11 月 6 日。

［52］《1941 年美国外交文件》，第 4 卷，第 403 至 511 页；《美国外交文件：日 本》，第 2 卷，第 571 至 689 页。

［53］引自海因里希：《格鲁》，第 355 页。

[54] 引自兰格和格利逊（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未宣之战， 1940—1941》（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纽约，1953 年版），第 856 页。

[55] 同上书，第 890 页。

[56] 哈利法克斯致外交部函（Halifax to Foreign Office），1941 年 12 月 4 日，FO371／27914，Fl3219／86／23，PRO。

（张素平译 汪义明校）

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

加里·R·赫斯（GarvR. Hess）[1]

“几乎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欧内斯特·梅写道，“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令人瞩目的中心，在这一点上，可能只有中世纪欧洲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个例外。”因此，美国对外关系史便成了一门与众不同的学科。美国政府几乎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实体，而美国则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1］。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一戏剧性转变以及它对遥远地区的影响在美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的深远变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二次大战前，美国仅与该地区的一个独立国家泰国有外交关系。此外，它同东南亚有限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英帝国首都伦敦、巴黎和海牙来实现；它自己对菲律宾群岛的殖民政策主要由内政部管理。由于对日作战，美国军事力量伸展到了太平洋彼岸，因而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成为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尽管同欧洲与东亚相比，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是有限的，但是它却大大推动了给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带来独立的非殖民化进程，同时也大大推动了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发展。战后，国务院内部进行了改组，包括设立菲律宾和东南亚司。到 1949—1950 年间，中国时局的变化迫使美国扩大自己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影响。当时美国处于东南亚国际关系的“中心”。

美国影响的出现经历了五个相当明显的阶段：1）1940 年 6 月之前，美国参与并得益于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时期；2）1940 年 6 月、1940 年 12 月 7 日、1941 年，美国成为上述体系的保卫者，与日本的“新秩序”相对抗的时期；3）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8 月，美国抛弃帝国主义体系，成为反对殖民主义斗士的时期；4）战后初期阶段（1945—1949），美国设法使反对殖民主义的原则与欧洲冷战的压力保持平衡的时期；5）1949 至 1950 年间，美国重新确立亚洲政策，从而扩大了经济和军事影响的时期。

（一）美国和帝国主义体系，1898—1940 年

二次大战使美国影响在东南亚得到了扩展，而美国在历史上已经在该地区获得了重大利益。在政治方面，自从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就对菲律宾实行殖民统治了；同时也对泰国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东南亚作为原料产地是十分重要的，美国与该地区的贸易最终超过了同中国的贸易，并且可以同对日贸易量相抗衡。

美国在与帝国主义体系分享利益的同时，却把它的菲律宾政策视作特别开明的殖民政策的样板。美国给菲律宾带来了经济和社会进步，也为它的独立作好了准备——这常被认为是一种创举，可供其他殖民强国模仿。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的确带来了许多现代化的改革，但是它的帝国主义历史记载也明显地表现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不协调。

从最初几年开始，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一直是通过奉行照顾当地上层社会利益的“安抚的帝国主义”来进行控制的。虽然美国的计划明显改善了菲律宾的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但是却置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于不顾，

---

[1] 美国博林格林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而菲律宾的上层社会则厌恶社会改革和不关心经济发展。尽管美国的政策照顾到了上层社会的利益，可是上层人物仍然迫切要求独立。在他们争取获得政治统治的过程中，独立问题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到 20 年代，独立问题已成为菲美关系的关键问题。 [2]

1934 年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虽然解决了独立问题，但却未能解决由怀柔政策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事实证明，1936 年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是无力解决政治权力分配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国防战略不可靠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的。为实现美国本土与菲律宾群岛之间互惠的自由贸易，1913 年通过了“安德伍德关税法”。该关税法的通过刺激了菲律宾经济，于是便去生产并向美国市场出口糖、大麻和椰子油，而反过来则使菲律宾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的消费品，从而牺牲了自己制造业的发展。到 1930 年，菲律宾与美国的贸易占其出口的 79%和进口的 63%。“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的自由贸易一直延续到 1940 年，但是菲律宾对美国的出口是实行限额制的，美国对菲律宾的出口却不受任何限制。到 1940 年，菲律宾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更大了，当时美国市场吸收菲律宾出口的 83%，而美国的出口品占菲律宾进口的 77%。总之，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菲律宾上层社会都没有利用机会使政治上的非殖民地化与实现经济发展和独立同步发展。 [3]

菲律宾的国防既缺乏协调、统一的部署，又得不到必要的支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从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就担任了共和国总统马努埃耳·奎松的军事顾问，继而又被任命为菲律宾陆军元帅。尽管在美国军事战略家们看来，要与日军作战，菲律宾的抵抗将不会超过 6 个月，而麦克阿瑟仍然计划依靠海、空力量和游击队和运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在菲律宾建立起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菲律宾国会都没有为麦克阿瑟的计划提供经费。奎松本人对保卫菲律宾群岛抱着绝望的态度，他与其他一些菲律宾人认为：中立化是避免败在日本人手里的唯一出路。

现在看来，“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显然对菲律宾人是不适宜的。在通过该法案时，一些国会议员和其他菲律宾局势的观察家曾经提出过另一种方案，即美国立即撤走军队。不久以前，又有人争辩道：如果一个独立的菲律宾被日本打败，它因被征服而遭受的灾难或许要少于它从 1942 年到 1945 年所经历的灾难。另外，菲律宾与日本的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不会带有对美国不忠诚的因素，如果对美国不忠诚，到战争结束时就会造成菲美关系紧张。 [4]

虽然美国在自己帝国主义的历史记载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美国对菲律宾的现代化还是作出了贡献。在教育领域中，美国统治在量和质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变化。1898 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入学人数只有 7，000 人左右；1935—1936 年增加到 123，7 万人；1940—1941 年则超过了 200 万人。虽然教育改革有其不足之处（包括太不重视高等教育以及没有提倡针对少数职业进行高水平的训练），但是它的确大大提高了识字率，和对西方化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诞生起了促进作用。同样，公共卫生系统的发展、通讯运输的改善和经济活动的货币化都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 [5]

最后，给予菲律宾独立是发展西方与殖民地亚洲关系的极有意义的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殖民化的迅猛发展冲淡了“泰丁斯-麦克达非法案”作为第一个给予殖民地人民独立的坚实承诺的影响。该法案的通过，部分是迫于来自美国劳工和农业集团的压力。他们要求减少菲律宾的竞争。但

是不管动机如何，整个殖民地世界都感受到了该法案的影响。亚洲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者受到了鼓舞，例如在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领袖们立即提出了要求独立的问题。荷兰及其他西方强国对美国榜样的影响忧心忡忡。[6]

除了菲律宾，在历史上，美国对泰国施加的影响是最大的。美泰关系可追溯到 19 世纪初期，就像当时同中国接触的情景一样，当时的美国是尾随在英国后面的；1833 年的几项协定打开了泰国市场，1856 年的几项协定又使美国获得了治外法权，而上述诸协定都是以更早的英泰条约为蓝本的。

在 20 世纪的头 30 年，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十分广泛。作为维护独立的一种手段，泰王国从不同国家请来了一些外国顾问。从 1902 年开始，有一批美国人，大部分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相继担任过泰国的外交顾问。这些人的任命是在哈佛大学、国务院和泰国驻华盛顿公使的协调下进行的。这些美国人除了给国王和外交大臣当顾问，还充当泰国的外交代理人，参与调停泰国与邻国之间的频繁的边境争端。美国还支持提高泰国的国际地位。由于泰国在一次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边，所以它参加了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大会。应泰国的请求，美国于 1920 年带头放弃了治外法权并且恢复了泰国的关税自主权。泰国政府随后便派遣美国顾问弗朗西斯·B·塞尔去欧洲争取废除其余的不平等条约。以泰美协定为蓝本，塞尔与其他西方国家就条约问题进行谈判，结果，泰国到 1927 年在财政和司法方面取得了实际的自主权。 [7]

1932 年以后，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因素在泰国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对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泰美关系因此日趋紧张。泰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反西方色彩浓厚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出现正好不谋而合。由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政变在曼谷建立起了君主立宪政体。这次革命也导致了以披汶·颂堪为首的军事集团和以比里·帕侬荣为中心的平民自由主义者之间对统治权的争夺。起初后者基本上处于优势地位，直到 1938 年，披汶分子开始占上风。经济国有化削弱了侨居华人和外国公司（包括美孚石油公司在内）的影响。日本的扩张，加上西方衰退的迹象，促使泰国同日本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4 年，在国际联盟大会中，泰国是唯一拒绝投票谴责日本控制满洲的成员国。泰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收复被缅甸和印度支那占据的领土，而日本的支持被认为是实现其上述目标的关键。尽管泰国领导人企图利用这种变化着的国际局势，但是他们对日本仍然颇具戒心［8］。尽管如此，到 1940 年，美国官方对泰国所发表的坚决不受日本控制的声明已经开始怀疑了。

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利害关系虽然无法同它在西欧或西半球的经济利害关系相比，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因为东南亚是橡胶、锡和石油等原料产地。美国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经历了一次大战后 10 年的世界贸易大发展时期、1930 年到 1934 年的急剧下降时期和 1935 年到二次大战爆发的起伏不定的恢复时期。对美国产品来说，东南亚地区并非是有利可图的市场，但是到 30 年代末，美国货在该市场所占的比例比 20 年代略有提高。到 1934 年，东南亚国家进口的美国产品额大致同中国相当，而到 1935 年以后，便大大超过了中国。美国同该地区的主要商业纽带是该地区作为原料产地的价值；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在美国的进口总额中，东南亚所占的比重从 9%增至 14．5%。

美国同东南亚的贸易集中在菲律宾、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菲律宾的殖民地地位使它从美国进口的产品量远远超过了东南亚任何其他国家，而马来亚对美国的出口额却在整个 20 年代超过了菲律宾对美国的出口额，另外 30

年代早期猛烈下跌的橡胶价格一度得到回升，马来亚于 1935 年以后对美国的出口额便再一次超过了菲律宾。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主要向美国提供橡胶和锡；后者也是棕榈和香料的主要供应者。在 30 年代，美国由于从印度支那购买橡胶，结果它同法属殖民地的贸易有了迅猛的增加，而它同缅甸和泰国的贸易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到 30 年代，美国东南亚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美国成了马来亚最大的顾主，它所购买的橡胶和锡占马来亚橡胶和锡出口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对荷属东印度群岛来说，美国是第三大的出口市场，仅次于它的宗主国和马来亚。印度支那的出口贸易集中于法国和其他法属殖地民，而除了法国之外，美国是仅次于香港的购买印度支那产品的最大的顾主。到 1937 年，美国在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的出口额在各自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菲律宾，79．8%；马来亚，44．5%；东印度群岛，18．7%；印度支那，7．1%。

美国在东南亚的私人投资有利于促进商业关系的发展。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公司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野心勃勃地向殖民地世界渗透。在一次大战期间，美国的一些橡胶轮胎公司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进行了巨额投资，从而结束了以往要依赖英国人和荷兰人来获得天然橡胶的局面。在 20 年代，当这些橡胶公司在扩展自己在东南亚的利益时，该地区作为那些美国石油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协力寻求到新的原料来源地之一而变得重要起来了；这些公司努力争夺的成功使美国从国外获得的石油产品的份额稳步增长，因此而受损的则是英荷集团。到 1929 年，美国在东南亚（菲律宾、马来亚、东印度群岛）的投资总额达到 1．7 亿美元，约占美国在亚洲全部投资的 45%。［9］美孚泽西公司打破了荷兰人对东印度群岛石油的垄断局面，这是私人投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由于有国务院和内政部的支持，再加上有针对歧视美国石油公司的那些国家的国会立法，美孚泽西公司战胜了荷兰给予皇家荷兰石油公司（Royal-Dutch OilCompany）的优惠待遇。 1922 年，美国公司在巴邻旁附近发现了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储藏，于是就建立了一家炼油厂。到 1926 年，美孚泽西公司首次在市场销售它在东印度群岛生产的精炼油。到 1933 年，美孚泽西公司联合索科尼真空公司在亚洲和非洲共同生产、精炼和销售石油产品。由此发展起来的、为两家最大的美国石油公司所拥有的名为美孚石油公司的组织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扩张着自己的利益。 1939 年，美孚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占东印度群岛石油总产量的 27%。而另一家美国公司，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也在那里找到了石油，但尚未投入生产。美孚石油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炼油厂是在美洲和西欧以外的仅有的三家美国炼油厂之一。［10］

美孚石油公司广泛的销售活动遍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这使它成为美国在这些地区最大的一家独资企业。到 1941 年，在东印度群岛，美孚石油公司在石油开采和精炼方面的投资达 2．07 千万美元，而它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总额为 4． 61 千万美元。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在东印度群岛有着巨大的投资以及因作为日本的石油供应者而有了显赫的地位，因此它的利益就会直接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始于 30 年代初期的美孚石油公司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Royal-Dutch Shell Oil Company）以及同英、美政府合作的进程，在中日战争的压力之下大大加速了。美孚石油公司力图保证其通往中国和日本市场的渠道畅通无阻，但是不能让日本囤积物资。当东印度群岛的油田逐渐被

认为是日本扩张的最终目标时，美孚石油公司便向美国政府寻求支持，在1940—1941 年间的紧张阶段，公司的代表们同国务院、海军部和财政部一起密切合作，共同制订美国政策。［11］

（二）美国：帝国主义体系的捍卫者，1940—1941 年

1940—1941 年间的国际危机使美国成了维护东南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德国对低地国家和法国的侵略，迫使美国重新估价自己在欧洲和亚洲的利益。随着纳粹德国对荷兰和法国的征服，大不列颠和东南亚的防务便和美国的战略计划紧密相联了。美国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需阻断日本从东南亚获得资源。尽管必须优先考虑欧洲战场，但是美国还是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设法制止日本的扩张。然而当华盛顿遭到日本南进袭击的时候，欧洲的殖民强国，尤其是英国，还有中国和泰国都促使美国在亚洲扩大它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这便增加了与日开战的危险。

从 1937 年“中国事变”开始，特别是欧洲战争爆发之后，英国的亚洲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加强英美合作。而改善同日本的关系是居于次位的重要目标，只能在不影响英美合作的前提之下进行。为此，英国人尽量避免有姑息日本的迹象出现，因为大家认为那将引起美国的反感。同时，英国人还设法刺激中国去抵抗日本以便牵制日本的兵力并且迫使美国在亚洲参战。法国沦陷后，英国对美国的依赖有所增加，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本土承受着巨大压力，还部分地因为丘吉尔首相对亚洲的发展缺乏热情，而比较重视中东。所以，英国在外交上坚持怂恿美国对日采取强硬立场。除了力图利用美国资源来支撑英国在太平洋的地位之外，丘吉尔和其他英国领导人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美国对德参战，这被认为是美日冲突的潜在后果。［12］

对于日本来说，德国对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进军以及意料中的大不列颠的崩溃为它取得对东南亚的控制权提供了机会。以业已在中国建立起来的阵地为基地，日本能够实现它自称的“新秩序”，这样，通过东亚和东南亚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便能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且确保军事上的安全。而为日本所控制的这一集团必需排除西方影响。据信，这种影响将导致一场同英国的战争，但却不一定会引起一场同美国的战争。日本领导人密切注视着美国对以下诸问题的反应：日本的南进、日本为诱使美国接受“新秩序”所采取的手段以及避免战争还是介入战争在费用上的差别。 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 7 月间的日本外交大臣松冈洋右相信，坚决有力的立场将迫使美国接受以日本为首的泛亚集团。 1940 年 9 月签订的三方条约和 1941 年 4 月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因而被视为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手段。当日本的南进遭到英美一致的抗议时，事情便变得十分清楚了，即对英美无法区别对待。日本陆军部、海军部和内阁终于接受了如下事实，即与美国作战是无法避免的。于 1941 年，日本领导人虽然在对美政策的许多方面意见不一，可是他们却一致公认，向东南亚推进十分重要，即使要冒挑起冲突的危险也在所不惜。[13]

在东南亚，西方和日本紧张关系的焦点集中在东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与荷兰之间贸易的实际终止，开放了东印度群岛的市场和资源，而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政府坚决反日，并企图限制日本影响，但是它明白，如果没有英美的支持，要进行持久抵抗是不可能的。它不止一次地谋求英美作出保证，即在它遭受日本攻击的情况下，英美将出面干预；英国

人坚持认为他们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而美国则不顾英荷两国的长期要求，在 1941 年年底之前一直拒绝作出干预的保证。与此同时，在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东印度群岛成了“民主国家的战略资源仓库”。美国进口橡胶的三分之一和进口锡的八分之一来自这一地区。美国从东印度群岛的进口额由 1939 年的 8 千万美元增至 1941 年的 2．41 亿美元；而美国对它的出口额从 1939 年的 3．5 千万美元增至 1941 年的 1．24 亿美元，因此美国取代了荷兰，成为它最重要的工业品供应者，日本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也增加了，但是其增长率不及美国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发展得那么快。日本对东印度群岛的出口额自 1931 年开始一直远远超过美国，可是到 1940 年实际上被美国追平了；到了再下一年，美国的出口额与日本相比超出了 70%。1940 年，美国的进口额是日本的 6 倍，而 1941 年，则是 17 倍，不管怎么说，为了石油，日本十分依赖于东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石油进口的主要供应者［14］。因此，那公认的对付日本侵略最有效的手段，即美国对日本实行的禁止贸易令，便会导致日本南进去获取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资源。

日本每向南推进一步，人们就要求美国发挥更强大的影响，而美国的领导人则怀疑这样做是否能行。当日本人迫使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中断从海防港至昆明的军需供应线时，乔治·卡特鲁总督愿意抵抗但条件是必须获得外援承诺；然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却告知法国大使，美国不会提供任何支持。与此同时，因为日本人提出要关闭滇缅路，英国人要求美国出面采取措施以维持现状。而美国则再一次表示异议。中国政府又重申了英国的立场，呼吁美国发表宣言，赞成维持现状。荷兰驻东印度群岛总督也呼吁美国给予支持以对付意料中的日本进攻。［15］

美国为遏制日本而采取的有限措施毫无成效。日本要求对印度支那北部实行实质性的军事占领，法国再次呼吁华盛顿提供支持，而美国对这些所作出的反应只不过是让约瑟夫·格鲁大使于 8 月 7 日通知日本外务大臣，美国以前对任何改变荷属东印度群岛状态的行动所持的反对立场同样适用于印度支那［16］。当法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时，这种努力也就无效了。

当日本在印度支那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又开始对毗邻的泰国施加压力。美国对泰国的同情削弱了，因为泰政府明显地倾向于接受日益增加的日本统治。此外，泰国还向印度支那提出了历史上的领土问题。试图乘印度支那虚弱之机收回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被法国人占去的领土。当美国官员对泰国的机会主义行动深感愤慨的时候，英国人对泰的处境却持同情态度，并且试图加强泰国的实力以抵制日本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英国的政策认为，应该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来维护泰国的独立和防止日本垄断泰国的锡和橡胶。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则认为，泰国实际上已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因此担心给予泰国的支持到头来只能使日本人得益。

1940 年底，由于法国当局不愿对泰国的要求作出让步，在印度支那和泰国边境就出现了不宣而战的状态，战火广泛蔓延。日本主动提出要出面进行调停，而伦敦和华盛顿的官员们认为，这一行动的结果将使争端的解决有利于泰国，而代价则是日本加强在泰国的影响。美国再次不顾英国的强烈要求，拒绝采取行动。在没有英国人或美国人的任何实质性压力的情况下，于 1941 年 3 月双方争端在日本的调停下获得了解决；正如所料，泰国获得了湄公河以西的大片老挝领土以及三分之一左右的柬埔寨领土［17］。

日本在泰国-印度支那问题上所施加的影响重新迫使美国对南进作出更

加直接的反应。约瑟夫·格鲁大使从东京向国务院提出警告，南亚和东南亚的稳定已面临威胁；他预见到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士气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巴塔维亚和伦敦的荷兰官员支持格鲁的观点，他们除了要求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提供援助之外，还要求美国明确表示不再容忍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也敦促美国向东京提出类似的抗议。英国人于 4 月 8 日提议英美联合向泰国提供开发信贷和供应石油，以减少泰国对东京的依赖。不久，英国人又呼吁荷、英、美三国联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进一步南进的任何行动都将损害三强的安全。［18］

国务院一直在全力寻求美日也许能和平消除两者之间分歧的机会，这种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不愿采取果断行动的倾向。日本在调停印度支那和泰国之间的争端的同时，在外交上摆出一副较为温和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促使日美开始就两国间存在的分歧进行广泛商讨。与此同时，日本却依旧竭力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4 月 13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南进上。4 月 16 日召开的联络会议重申了在印度支那、泰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加强日本地位的目标，不过这要以具备足够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为前提。只有在面临来自美国的、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或者受到美、英、中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包围”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战争问题［19］。

美国虽然谋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但是于 1941 年中期终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东南亚局势。在英国人的催促下，美国同意通过购买泰国的橡胶和锡，向泰国提供商品信贷和供应石油制品等方式来支持泰国。美国对泰政策的转变，部分是迫于英国的压力；但是更主要的也许是出于对东印度群岛的考虑，美国想在当地鼓励人们去抵抗日本的压力，而表示支持脆弱不堪的泰国目的在于使驻东印度群岛的荷兰官员放心。［20］对日本人来说，到 6 月底，看来想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拒绝作出让步，泰国想玩弄拉拢日本打击西方的把戏，而美国则使菲律宾停止向日本出口原材料。此外，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改变了国际局势，减少了英国遭受攻击的可能性，也导致德国迫使日本去武装攻击苏联和新加坡，7 月 2 日召开的帝国会议决定，日本将不惜冒着与美开战的风险，也要在印度支那南部建立基地，坚定不移地推行南进计划。不过，会议并不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与美国的谈判仍将继续下去。［21］

日本在印度支那的推进，加速了日美关系的恶化，促使美国不顾一切地不断设法帮助每况愈下的西方在地位上得到加强。当日本人开始迫使维希政府允许他们在印度支那南部实行军事占领的时候，美国却建议维希政府采取拖延战术。然而不出两周在维希与河内的法国当局已经同意日本有权驻扎军队和出于军事需要而使用公路、铁路、机场与港口。为调停争端，罗斯福总统于 7 月 24 日会见了野村吉三郎大使，建议让印度支那中立化。然而这一建议提得太晚了，日本政府认为它不足以帮助日本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罗斯福与野村进行会谈的时候，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计划已经可以全面付诸实施了。7 月 25 日，大约有 3 万名士兵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作为对此行动的反应，华盛顿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财产和资产。接着，英荷两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这与美国的措施一起实际上形成了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禁运。［22］

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其最直接的后果是日本加强了对泰国的压力，从而也进一步加深了英、美、泰三国在西方援助问题上的分歧。借助经济手

段使泰国脱离日本的计划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并且，曼谷与西方的接触已经激起了东京的强烈抗议。英泰两国的官员呼吁美国保证，一旦他们受到日本攻击，美国便将提供援助。美国的立场，正如赫尔在 8 月 9 日提出的那样，是只有在泰国从事抵抗的情况下才能提供美援。而泰国政府则希望在遭到日本侵略前就能获得支持。由于在美援的时间问题上存在分歧，于 1941 年末，泰美合作便濒临瓦解了。尽管伦敦和曼谷强烈要求，华盛顿还是拒绝提供军事援助。 [23]

美国虽然拒绝支持泰国，但它最终还是同意帮助英国与荷兰在东南亚巩固它们的地位。预料到日本计划在 12 月初采取军事行动，罗斯福于 12 月 1 日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对英国人要求已久的保证作出了承诺，即一旦英国与荷兰的领地受到攻击，美国便将提供援助。对英国人来说，罗斯福总统的承诺消除了英国外交上一个重大顾虑，即欧洲在东南亚的剩余势力将有可能不得不单独同日本作战。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官员曾经不止一次地恳求英国坚定地承担起防卫东印度群岛的责任，但是丘吉尔总是拒绝，因为他相信，美国不得不在太平洋地区承担领袖责任。就这样，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夕，美国才最后承担起英国要求了两年之久的义务。 [24]

在 1940—1941 年间，美国试图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它既能稳定东南亚局势，又不至于牺牲美国在其他地方的特权，也不至于要美国承担什么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留下一连串问题的重大义务。英美两国在泰国问题上的分歧，在战时和战后重新表面化了，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国都改变了原先对披汶政府的态度。法国人不能在印度支那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而美国人又不愿给予支持，这是贯穿战时和战后的一系列法美对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后果对印度支那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尽管英国人与荷兰人对美国最终给予他们寻求已久的承诺——只要他们受到日本攻击，美国将给予支持——表示欢迎，但是他们仍然表示怀疑，即若是美国早一点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否能够制止日本南进并且加强东京政府内部反对采取军事政策的力量。

（三）美国与反对殖民主义，1941—1945 年

战争一爆发，国务院就着手为战后的世界制订全面的计划，而反殖民主义则是美国在东南亚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美国人看来，殖民主义削弱了殖民地人民的抗日力量，因而也是西方反对日本无力的根源，这就使得日本得以迅速地在东南亚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秩序。在一篇题为“新加坡战后的东方”的文章中，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 西方国家现在必须去做它们以前缺乏意志和想象去做的事：它们必须把东方民族的自由与安全当作自己的事业来看待，抛弃那种“白人的累赘”的思想，清洗自己身上那种过时的而且显然行不通的白人帝国主义的污迹。在对战时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领导权必须由美国来掌握。 [25]

1942 年早期，美国的领导人就已经看到战争将带来帝国主义体系的终结；S·韦尔斯副国务卿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将支持民族自决：

> 如果这场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话，那末，它就必须确保世界各民族的主权平等，……随着我们的胜利而来的必然是

各民族的解放。……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所有海洋和所有大陆——切实得到贯彻。［26］

美国对菲政策已有40年历史，国务院以此为样板，期望在殖民地地区建立国际托管制度，通过自治的进步措施向最终的独立过渡。对美国官方来说，根据“大西洋宪章”第二款所许诺的“尊重各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各盟国有义务保证殖民地人民进行自决。［27］

罗斯福也是这些目标的追求者，当由于印度国大党提出先独立后支持盟国打仗的要求造成了僵局而发生政治危机时，罗斯福不止一次地设法劝导英国在印度政策上采取同国大党妥协的态度；可是每一次他都遭到丘吉尔首相的反对，因为丘吉尔对任何干涉英国政策的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28］。1942年6月，罗斯福在会见俄国外长莫洛托夫时，把话题扯到殖民主义行将就木上，并且对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特别关注。在东南亚地区，要求独立的“巨浪”使西方无法长久统治下去，罗斯福在谈到该地区时预见到，在“某种形式的、暂时性的国际共管”下，那里的殖民地人民也许能在20年之内为自治作好准备。［29］

美国对反对殖民主义所作出的承诺，于1942年夏天开始觉得有所保留了，当时它对英国人镇压“撤离印度运动”和逮捕数千名民族主义领袖的行动保持沉默。在此之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7月23日的针对印度危机而作的演讲中声明，美国对各民族争取自由愿望的支持取决于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是“值得”和“有准备”承担这种责任的［30］。更使韦尔斯和其他一些谋求在联合国名义下广泛进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人们恼火的是，赫尔坚持认为国际共管的计划只能限于国际联盟的托管地以及从轴心国中脱离出来的殖民地；在其他情况下，将由殖民地政府自己负责帮助殖民地人民为实行自治和独立作好准备。尽管国际托管的范围受到这样的限制，但是由国务院于1943年初起草的由联合国颁布的宣言草案，提出了通过建立一个“国际义务”体系让所有殖民地人民获得独立的目标，并且要求殖民列强制订出逐步实行自治的时间表。［31］

除了国务院在进行计划之外，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印度支那的前途也十分关切。他竭力阻止法国殖民主义卷土重来，但却力争在印度支那建立国际托管。下列诸因素可以说明罗斯福为什么关心印度支那。首先，于1943年初，他决心证明，美国所承担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义务是一个的确能够实现的目标。没能支持印度民族主义已经使得美国政府大失所望，并且被看作是对“大西洋宪章”信誉的损害。著名的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抨击的浪潮，于是，白宫便不得不对反对殖民主义原则的含义作出解释，因为许多人都在质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亚洲，还是像丘吉尔声称的那样，仅仅适用于欧洲［32］。同采取针对英帝国与荷兰帝国的措施相比，把法国人撵出印度支那的可能性显得更大，同时也更公正。罗斯福自从在印度问题上同丘吉尔发生分歧之后。便尽量避免同这位首相讨论殖民地问题。罗斯福对荷兰帝国持宽容态度；威廉明娜女王于1942年12月所作的演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演说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平息美国舆论，它许诺在战争结束后将给予荷兰帝国的属地以自治权和伙伴地位［33］。此外，罗斯福认为，作为一个殖民强国，法国人的行为十分差劲；他一再断言，法国削弱了印度支那，并使该国的处境比法国统治之前更为糟

糕。罗斯福对印度支那的了解甚少，他对法国统治的猛烈指控还是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提供的情况为依据的。最后，罗斯福对法国人在抵抗德国人和日本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颇为蔑视；在罗斯福看来，法国在战后的世界里不配再享有大国地位。罗斯福与戴高乐将军的关系十分紧张，在罗斯福眼中，戴高乐非常傲慢和专横（当他们在 1943 年 1 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会面时，罗斯福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戴高乐说话的），而这只能增加罗斯福对法国人的反感。［34］

1943 年，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谋求实现国际托管的目标，并且得到了蒋介石和斯大林的支持。这使丘吉尔大为恼火，对丘吉尔罗斯福只想要他接受既成事实。除了英国人持保留态度以外，国务院的决策者们也怀疑，是否能将法国与其他殖民强国区别对待，美国是否可以不顾以前的承诺，即恢复法国在其殖民地的统治。［35］

1943 年底所召开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结束一年之后，美 国在殖民地世界建立“国际义务”体系的目标，导致了它与英国之间的分歧。由英国人指挥的东南亚战区的成立带来了无法与盟国政治目标问题相分离的作战计划。英国外交部对罗斯福一再发表在印度支那实行托管制的讲话表示抗议，但是丘吉尔劝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硬来，他相信，时间将最终证明罗斯福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务院各计划委员会为缅甸、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订出了向自治过渡的计划。根据他们对罗斯福意愿的了解，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们预料，对印度支那的处理与其他殖民地将会有所不同，而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们对此则持怀疑的态度，这样，国务院为印度支那制订计划的工作便陷入了僵局。但是到 1944 年夏天，负责欧洲事务与远东事务的两处官员都表示同意。美国不能允许在东南亚重新建立战前那种殖民秩序。9 月 8 日，赫尔向罗斯福建议，美国应该敦促英、法、荷三国“尽早发表一致的激动人心的声明”，答应让它们的东南亚殖民地获得独立或完全自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订出时间表来。在这建议背后有这样一种设想：考虑到东南亚人民在战时的经历和欧洲殖民强国显然要把“东南亚战区”当作恢复殖民地统治的工具的决心，美国有必要把东南亚殖民地同世界别处的殖民地区别开来。若是不提出这建议，西方国家就将有被该地区人民疏远的危险。［36］

正如 1944 年 9 月 8 日的建议所强调的那样，美国为东南亚制订全面计划，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中心目标，即最终要把政治权力移交给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倾向西方的政治阶层。正如美国把菲律宾的民族主义热情引导到能确保美国与当地领袖人物保持密切关系的道路上来那样，有必要提醒其他殖民强国不要去冒险以免损害在东南亚早已建立起来的影响。就像一份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在东南亚各地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致力于改善那里的环境，而这样做将……在战后捍卫我们在维护远东国家的和平以及政治、经济的顺利发展中所取得的与日俱增的对从属于东南亚战区的法国使团，并且坚持认为，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仍然是“战后的事”［39］。罗斯福于 1945 年 1 月会见英国殖民大臣时曾敦促对方拟订出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非殖民地化的时间表。在雅尔塔会议上，他又设法获得了斯大林对印度支那托管制的支持，但是却拒绝与丘吉尔讨论这一问题。然而，要建立国际托管体系，三巨头必须达协议，这便大大阻碍了罗斯福要在印度支那实现托管制的抱负［40］。由国务院起草、经雅尔塔会议通过的托管计划提出了第三条途径（除托管地和轴心

国殖民地的移交之外），它能使各国成为托管体系的一部分，即由殖民强国自动放弃主权。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们认为，罗斯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走得太远了”，而那第三种选择只不过是“保留面子的极妙台阶”而已。罗斯福在 3 月 15 日的讲话中对自己的立场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他同意法国恢复殖民统治，但是同时指出，法国负有“托管国的责任……并且规定独立是最终目标”。［41］

罗斯福逝世以后，美国的政策朝着更充分地迎合欧洲列强的方向发展。在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官员们向法国保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不会受到挑战。在“非自治领土宣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美国代表团在内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支持把发展“自治”而不是“独立”作为殖民统治的责任。这是对 1944 年 9 月 8 日备忘录所提出的建议的违背，而其背景是，在国务院内部欧洲司势力的日益增加。欧洲司争辩道，美国在欧洲的战后政治和战略利益决定了美国不能在殖民地问题上得罪盟国。［42］

（四）战后在反对殖民主义问题上的妥协

战时的计划未曾料到东南亚到 1945 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缓慢地向自治演进对当地决心立即获得独立的各国人民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战争所带来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因为该地区各国在战前的地位，本来就差别很大，而日本统治的性质又由于各地情况和战时要求各异而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种种方式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对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菲律宾和缅甸的领袖们来说，日本的战败并不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而是标志着独立的实现。［43］

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支那的政治大动荡向美国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两国的民族主义领袖都利用日本统治突然崩溃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状态来谋求国家的独立。8 月 17 日，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当首批英军于 9 月底抵达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在宪法的监督下行使职权了，并且事实上已经赢得了所有政治集团的支持。在印度支那，越盟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控制了越南的主要城市，并于 9 月 2 日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名义宣布独立。接着他们对荷兰与法国的卷土重来的抵抗迫使美国为实现和平解决于 1945 年 10 月提供了援助。由于这两个事情的基本问题都是争夺主权，所以无法进行妥协。结果，到 1946 年底，法国和越盟便兵戎相见了；而在此后的 7 个月之内，荷兰人的“警察行动”导致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全面战争。［44］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里，美国的威望在该地区急剧下降，因为民族主义领袖们曾经期望能从美国获得支持。在印度支那，美国军事人员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还曾同越盟合作，而胡志明则力图利用这一渠道获得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45］。美国虽然竭力制止法国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争端，但由于越盟的共产主义统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选择权看来是受到了限制；美国没有支持“极端陈旧的殖民思想和方法”，但同样无法容忍眼看着殖民地为“受克里姆林宫指示和控制的哲学与政治组织所替代［46］。在印度尼西亚，美国的政策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7 年 7 月基本上顺从英国的领导。美国支持林加查蒂协议所作出的短暂妥协，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同在印度支那的情况一样，美国劝

告荷兰人不要使用武力，但是荷兰人跟法国人一样，拒绝接受劝告。 [47]

在其他西方强国致力于重建帝国秩序的时候，美国却在履行自己允许菲律宾独立的诺言。这一行动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业已在菲律宾树立了如何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榜样。尽管如此，当美国在 1946 年 7 月 4 日移交权力的时候，“ 菲律宾模式 ”这一提法却具有既重要又带讽刺性的新意义，因为菲律宾的独立从几方面来看是带有严重妥协色彩的。菲律宾独立的局限性引起了许多菲律宾领袖的冷嘲热讽以及亚洲其他各地民族主义发言人的批评。

非殖民化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菲律宾的战时的经历所决定的。日本对菲律宾群岛的征服，使得有秩序的政治移交计划变得复杂化了，并且引起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菲律宾和美国军队的败退造成了军事与外交战略上的分歧；共和国总统马努埃耳 · 奎松呼吁美国立即给予独立，然后他将宣布菲律宾中立。罗斯福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他命令奎松和其他高级官员前来美国，而实际上他们在美国行使的是一个流亡政府的职权。与此同时，菲律宾寡头政府的许多官员同日本人合作；后来竟有人以谎谬可笑的理由来为这种合作辩护，说他们这样做减缓了日本统治的严酷性。而美国则主张，通敌分子将在战争结束时受到审判，并且被清除出菲律宾的政治生活。这种对通敌分子的态度得到了抗日游击运动的大力支持，而该运动中最有成效的组织则是深受共产党影响的“ 胡克巴拉赫普 ”。战后，菲律宾上层社会利用共产党支持胡克这一点来损害这一运动的信誉，并且为自己有理由永久掌权辩护。当美军于 1944 年开始解放菲律宾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片千疮百孔的土地——食物短缺、工业生产和运输系统瘫痪、马尼拉的百分之八十遭破坏、疾病蔓延、法律和秩序崩溃。正如一位学者所评论的那样，“ 当世界尚不完美的时候，在菲律宾追求完美是不合时宜的。 ” [48]

美国对菲政策缺乏连贯性，脱离大部分菲律宾人，也损害了菲律宾的独立。杜鲁门政府最先呼吁以塞希奥 · 奥斯梅纳（他是于 1944 年奎松逝世之后继承总统职位的）为首的共和国政府清除通敌分子，但后来突然又不再提及这一问题了。实际上，这意味着对

奥斯梅纳的抛弃。这样，在 1946 年 4 月的总统选举中，奥斯梅纳便被马努埃耳 · 罗哈斯击败。罗哈斯是道格拉斯 · 麦克阿瑟将军与高级专员保罗 · 麦克纳特的亲信，他在战争期间曾留在菲律宾，并且批评过美国处理通敌问题的政策。华盛顿在通敌问题上一反常态的背景是美国与寡头政府重新勾搭上了。彻底执行处理通敌问题的政策有可能助长共产主义的势力——这种风险是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准备冒的。正在形成的冷战意味着“ ……华盛顿把‘ 胡克巴拉赫普 ’看作是共产主义国际阴谋的产物，而无视那非共产主义的、土生土长的、虽然比较激进的农民动乱的性质 ”。 [49]

美国对独立后的菲律宾的贸易关系的规划同样加强了同菲律宾上层社会的联系；这标志着美国决心恢复战前的贸易格局，即鼓励菲律宾出口农产品，并且使菲律宾继续依赖于美国市场。美国一方面把结束世界其他各地的帝国主义特惠体系作为奋斗的目标，而同时又在菲律宾重建此类特惠，这种矛盾的做法使得许多美国官员迷惑不解。不过，“ 贝尔贸易法案 ”规定，菲律宾享有 8 年时间的自由贸易，并且在此后的 20 年里美国将逐步减少特惠；它还规定，在开发菲律宾的自然资源和发展公用事业方面美国与菲律宾享有同等权力。由于该规定是违反菲律宾宪法的，因此，为了实施与美国的贸易协定，

必须对菲律宾宪法进行修改。为了确保菲律宾采取有利于美国的行动，战后恢复问题也与上述贸易法案连结在一起了，而法案规定，美国对超过 100 美元的战争损害赔偿，要在贸易协定生效之后才予以支付。此外，美国为菲律宾的复兴所承担的总金额为 6．2 亿美元——据菲律宾统计，这笔款项大约等于应由美国承担责任的战时实际损失价值的一半。［50］

正如批评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战争结束的时候，正是美国可以借助复兴而从事一场全面彻底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绝好机会；日本在占领菲律宾时期所承担过的那种义务或许能给菲律宾带来深远的、根本性的变化。而美国在 1945—1946 年间那种缺乏远见的做法结果只能使菲律宾继续依赖美国，长久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而动乱必然再起。［51］

美国除了在菲律宾履行自己的诺言之外，还支持泰国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英美两国在把泰国当作“敌国”还是“敌占区”来处理的问题上长期意见不一，这导致了两国在重建英泰关系的条件问题上发生分歧。英国坚持要求长期对泰国实行威胁泰国主权的军事控制和经济限制。而美国则坚信，英国要求泰国人“把他们的路走到底”的目标将损害西方在东南亚人民中间的信誉，因此一再呼吁英国采取温和的解决办法，1946 年 1 月 1 日签订的英泰条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美国虽然在英泰分歧中支持泰国，但是华盛顿却不得不迫使泰国接受法国坚持的条件，即归还 1941 年从印度支那得来的领土。这一让步有助于促使法国支持泰国取得了联合国成员国的地位。使泰国参加联合国是美国的另一目标，因为那样就能进一步提高泰国的国际地位。把领土割让给印度支那，使政府大失民心，因而更加深了内部的不稳定，也动摇了人们对民主效力的信心，结果重新回到了军人掌权的时代。不仅如此，曾经跟日本合作过的披汶·颂堪作为政界领袖又重新抛头露面了。华盛顿一改以往在战后泰国坚决反对通敌分子影响的态度，于 1948 年 4 月决定在外交上承认刚刚由披汶·颂堪担任总理的泰国政府。华盛顿之所以能勉强地接受披汶，是因为相信只有他才能提供为防止共产主义颠覆所必需的稳定。［52］

在毗邻的缅甸，对共产主义的担忧也成了左右美国政策的主要因素。战争结束时，英国的计划是先恢复经济，再继续向自治过渡。但是这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所领导的缅甸民族主义者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国务院竭力劝告英国要认清战争使缅甸民族主义变化和强化的程度。到 1946 年秋，华盛顿迫使英国采取措施以便能早日移交权力。否则，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将失去威信，而得益的恐怕只能是共产党。由于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的政府本身倾向于废除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制度，英国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领导达成了协议，承认缅甸的独立。美国在缅甸的影响和声誉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对于一个独立缅甸的前景所抱的乐观情绪不久便被一扫而光，因为民族主义事业公认的领袖昂山和另外 6 名内阁成员于 1947 年 7 月 19 日被刺，这样，缅甸便失去了它最优秀的领导。美国担心新总理吴努在他的国家于 1948 年 1 月 4 日获得独立后，会倒向左派和苏联集团。另外，吴努要把这样一个被民族纠纷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似乎也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局面正是缅甸共产党所期望加以利用的。尽管美国对吴努领导下的缅甸的前途忧心忡忡，但它仍然把缅甸的非殖民化看作是用和平方式移交权力的又一重要样板。［53］

美国在菲律宾、泰国和缅甸实现自己的目标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样引人注目，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却使美国所承担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义务面临严峻的考验。美国领导人所承受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压力十分巨大。印度尼西亚的事业在国际上赢得的广泛支持，尤是在联合国，苏联坚决支持印尼共和国，而美国则既想迎合荷兰的立场又想照顾印度尼西亚的立场。荷兰在维护一个坚强的欧洲反共联盟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大大限制了华盛顿的行动。结果，情况变得十分明显，即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不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威信构成了威胁，而且似乎必然会为激化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活动提供条件。

荷兰的“警察行动”虽然使它占领了大片领土，但并不能消灭抵抗，反而促使亚洲、中东和苏联集团的国家立即要求联合国出面进行仲裁，但是美国却为建立一个斡旋委员会而努力。美国在这个斡旋委员会中是保持中立的，它是第三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分别代表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由于这个机构没有实权，荷兰官员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然而，美方代表在雅加达领事的支持下，很快便倒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边，并且不断敦促斡旋委员会在充分代表共和国利益的前提下采取措施以解决争端。弗兰克·格雷厄姆为了达成 1948 年 1 月 17 日的伦弗尔协议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一协议在提高共和国地位和加强斡旋委员会作为调停国际争端工具的地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格雷厄姆在斡旋委员会中的继承人柯特·杜波依斯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尽管当时曾遭到华盛顿的反对，但是后来毕竟促使国务院在更高的层次上来重新考虑印度支那问题，并且为杜波依斯的继承人 H·M·科克伦后来提出的建议奠定了基础。 1948 年 9 月，印尼政府成功地镇压了一次准备不周的共产党起义，这就使美国支持共和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然而，荷兰人在 3 个月之后采取了军事行动，问题因此而尖锐化了，这使得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必须在默认荷兰的侵略还是捍卫共和国的完整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尽管美国劝告荷兰人采取温和方针，但是他们于 12 月 18 日发起了第二次警察行动，企图彻底消灭印尼共和国。美国虽然对荷兰使用武力感到忧虑，而它在联合国却再次进行妥协。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与警察行动看上去有所牵连这一点正在损害美国本身的利益，于是到 1949 年 1 月，美国最终摆脱了荷兰政策。最后，由美国倡仪通过了联合国决议，呼吁印度尼西亚成立临时联邦政府，进行立宪议会选举，并且于 1950 年 7 月 1 日实现权力移交 斡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国印度尼西亚问题委员会，负责监督具体过程。在荷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安理会于 1949 的 1 月 28 日通过了这一关键性的决议。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荷兰人继续进行抵制，因此招致了来自美国的更大压力——美国以最终不得不终止经济援助来进行威胁，除非荷兰能真诚地坐下来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别无选择，只得按照 1 月 28 日的决议作出让步。印度尼西亚终于赢得了独立。美国虽然因迟迟不肯与荷兰决裂而损害了它在东南亚和其他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人民中间的地位,但是它在 1949 年 1 月的行动再次重申了美国在反对殖民主义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美国作为唯一能对荷兰施加压力的大国终于迈出了那举足轻重的一步，尽管它同荷兰在欧洲有着共同利益。 [54]

在另一场民族革命中——法国和越盟在印度支那的斗争——美国则坚定不移地倾向于支持法国的立场。对共产党领导的越盟的担心由于共产党在中国的内战中获胜而有所加强；如果美国想在亚洲“站住脚跟”，似乎只有看印度支那了。由于种种原因，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从未像荷兰那样因

为在印度尼西亚采取警察行动而成为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这就大大方便了法国人行动的自由。从 1947 年到 1950 年，法国数次着手建立反越盟政府，结果便导致了“保大方案”的出笼，即由退位的皇帝来重新领导越南政府。但是，实权仍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1950 年 2 月 7 日，美国承认刚成立的保大政府为“法兰西联邦的一个自由邦”。对印度支那局势和美国在法国——越盟冲突中如何选择经过 3 年的广泛观察和思考之后，美国决定赞成“保大方案”。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代表和华盛顿的官员从来没有怀疑过越盟对民众具有的强大的号召力以及民众对法国人与亲法的本地领导人怀有普遍的厌恶情绪，但是，冒险让共产党统治印度支那被看作是为了要与法国人合作。在 1948 和 1949 年两年之中，国务院中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和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在美国是否应该坚持把法国对越南民族主义作出重大让步作为美国承认和支持保大政府的条件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亚洲司的官员们争辩道，只有法国作出有意义的让步，保大才能有机会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而欧洲司的官员们却坚持认为，法国国内在殖民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使得让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此外，美国的承认本身就是提高保大在越南的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采取了欧洲司的战略。保大由于在外交上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便向美国要求军事援助，因而在整个过程中美国在印度支那承担了重要的义务。 [55]

（五）美国政策的重新确立，1949—1950 年

美国在走向跟法国人合作的同时，也在检讨它在整个东南亚的政策。1949 年 3 月 29 日，国务院政策制订参谋机构批准了 pps 的 51 号文件，文件 PPS51 对共产党即将在中国内战中获得胜利的局势作了全面评述。为了美国扩大对东南亚反共产党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文件 PPS51 为以后几个阶段的政策检讨和 1949 至 1950 年间四次向该地区派遣特别使团定下了基调。

根据文件 PPS51 的观点，苏联对东南亚的野心与其说是为了任何直接的战略或经济目的，不如说主要是为了对付美国和它的盟国：

> 东南亚作为包括橡胶、锡和石油在内的原料产地和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自由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克里姆林宫之所以谋求对东南亚的控制权，当然部分是为了攫取东南亚的资源和交通线，但其直接目标，很可能是重要的目标，是不愿意让它们落入我们手中。 [56]

对美国来说，一个为俄国统治的东南亚将对它在整个亚洲和中东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 克里姆林宫将获得的最大利益……是政治性质的。共产党权力在中国的扩张是对我们的惨重打击 如果东南亚也为共产主义所席卷，那末我们将承受一场政治上的大溃败，而它的回响将为世界的其他各地所感受，尤其是中东，以及到那时将被严重暴露的澳大利亚。……中国被共产党征服后，东南亚便成了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上的致命环节。世界这一部分的三个主要非共产党基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南亚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如果失去东南亚，尤其是失去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那末，这三个基地势必陷于彼此隔离的境地。如

果东南亚能保住，这条锁链便将继续在世界这一部分存在下去，并且逐步形成一股相互依存和融为一体的对抗斯大林主义的力量。［57］

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亚洲政策进行了正式的复查，其结果纳入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于 1949 年 12 月相继批准的文件 NSC 48／2，而该文件提出的主要假设与目标实际上和文件 PPS 51 的提法十分相似，于是这方面的政策就此形成了。［58］

最后，对美国政策进行全面观察的文件 NSC-68 把东南亚看作是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相抗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件 NSC-68 是于 1950 年 4 月遵照杜鲁门的如下指令而制订的，即由于苏联在 1949 年 8 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试验，对美国的核武器战略必须重新加以审查。而该文件却超过了上述目标，它为制订加速大规模重振军备的计划提供了详尽的理由。文件 NSC-68 的出发点是，假设苏联人的直接目标是“支配欧亚大陆”，而同时又力图“彻底颠覆或者用暴力破坏”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政府。它争辩道：

>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加上南亚和东南亚其余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为进一步入侵这一危机四伏的地区提供了跳板。尽管共产党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这又可能对苏联经济增加一些负担，但是该地区的自由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很可能为共产主义扩张提供远远大于补偿性的机会。［59］

1949 至 1950 年的美国战略计划——如文件 PPS51、NSC48 和 NSC68 所表明的那样——显然把东南亚看作是美国需要加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地区。虽然这些文件从总体上提出了美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却没有就美国在该地区各个国家所遭遇到的直接问题作出详细说明。对菲律宾、印度支那、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政治局势的周密调查——这是四个专门使团出访该地区的任务——进一步加深了华盛顿复查亚洲政策时所产生的危机感。那些使团以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R·艾伦·格里菲思和丹尼尔·贝尔为首，由约翰·梅尔比和格雷夫斯·厄斯金协助。杰塞普的使团出访东南亚国家，需要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而格里菲思使团接着具体提议向各国提供经济及技术援助。梅尔比和厄斯金对军事需求的分析补充了上述提议，呼吁对各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坚持把派遣贝尔使团作为向菲律宾进一步提供经济援助的一个条件，而该使团对菲律宾政府和经济问题作了全面的调查；最后它建议要对菲律宾政府的财政进行彻底改革，并且制订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这些使团的重要建议很快在菲律宾、缅甸和泰国付诸实施了［60］。印度尼西亚政府一面反对共产党，一面又避免露出依赖西方的任何迹象，但是到 1950 年底，它终究接受了经济和技术援助。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认为这是由莫斯科策划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大大加强了美国对法国人反越盟战争的支持。美国加强对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行动的支持，最终导致了美国、法国和有关各国之间的共同防务协定的签订。

这样，到 1950 年，美国已显著地增加了它对东南亚所承担的经济和军事义务。美国资源的分配对维护西方地位和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扩张似乎是至关重要的。文件 PP351 和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所提出的假设果然不错，东南亚地区逐渐被看作是测试美国的威信、可靠性和决心的关键的试金石。美国官员是在想着中国时局的发展和当时烽火连天的朝鲜战争的情况下来审视东南亚的，到 1950 年底，他们对该地区的重要性已毫无怀疑了。面临的挑战尽

管既困难又复杂，但是却似乎是可以对付的。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法国和越盟的冲突。美国在力图实现印度支那目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从长远来看，势必大大削弱它在整个东南亚的地位。

尽管如此，到 1950 年底，美国显然已经大体上实现了它长达 10 年之久的那些目标，即非殖民化和把权力移交给那些将使该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倾向西方的政治集团。民主制度正在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菲律宾发挥作用。那些非共产党国家分担了美国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忧虑。由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树立了一个榜样，美国的决策者深信，经济和军事援助将确保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

注释

[1] 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当代国际关系》（Writing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History），载《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八卷（1984 年），第 107 页、第 113 页。

[2] 彼得·斯坦利（Peter W．Stan1ey）：《一个形成中的国家：菲津宾和美国，1899－1921 年》（A Nation in the Making ：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9—1921），坎布利奇 1974 年版，第 51—278 页。

[3] 拉塞尔·菲菲尔德（Russell R. Fifield）；《美国人在东南亚：作出承诺的根源》（America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纽约，1973 年版，第 3—5 页；小贝内特·李嘉图与罗伯特·卡西亚（Beni-to Legardo， Jr. and Robert Y. Garcia）：《经济合作：贸易关系》（Eco-nomic Col1aboration：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载弗兰克·格雷（Frank H. Go1ay）编《美国和菲律宾》（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Philippines），新泽西， 1966 年版，第 130—131 页；西奥多·弗兰特（Theodore Friend）：《在两个帝国之间：菲律宾所面临的考验，19291946 年》（ Between Two Empires ： The Ordeal of the Philippines，1929—1946），纽黑文，1965 年版，第 156—160 页。

[4] 出处同上，第 151—195 页，第 266—268 页。

[5] 托马斯·麦克黑尔（Thomas R. McHale）：《转变中的菲律宾》（ThePhilippines in Transition），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 20 期（1961 年 5 月），第 331—342 页。

[6] 弗兰特（Friend）：《在两个帝国之间》（Between Two Empires），第 169—171 页。

[7] 菲菲尔德（Fifield）：《美国人在东南亚》（Americans in Southeast Asia），第 12—15 页；杨格（Kenneth T. Young）：《美国顾问在泰国的特殊地位， 1902－1949 年》（The Special Role of American Advisers in Thai-land，1902—1949），载《亚洲》（Asia）第 14 期（1969 年），第 1—31 页。

[8] 菲菲尔德（Russell H. Fifield）：《东南亚外交史，1945—1958 年》（The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纽约，1958 年版，第 230-234 页；马丁（James V. Martin Jr.）：《二次大战

中的泰美关系》（Thai-American Relations in World war II ），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Asian Studies）第22期（1963年8月），第451—454页。

[9] 威尔金斯（Mira Wilkins）：《跨国公司的成长，1914年至1970年间在国外的美国企业》（The Maturing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mericanBusiness Abroad from 1914 to 1970）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8—9页、第58—59页、第101—102页。

[10] 出处同上，第120—122页、第238—241页。

[11] 安德森（Irvine H. Anderson，Jr.）：《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的东亚政策，1933—1941年》（The Standard- U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States East Asian Policy，1933—1941），普林斯顿，1974年版，第126—231页。

[12] 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同种联盟：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年》（A11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纽约，1978年版，第17—20页、第35—38页；第71—76页；路易斯（Wm. Roger Louis）：《英国的远东战略》（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Fast），牛津，1971年版，第241—267页；洛（Peter Lowe）：《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对英国东亚政策的研究，1937—1941年》（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Pacific War；A Sta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1937—1941），伦敦，1977年版，第14—135页。

[13] 艾里亚（Akira Iriye）：《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内幕史》（Across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纽约，1967年版，第200—220页；艾里亚（Akira Iriye）：《日本帝国主义和侵略：重新考虑》（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Aggresion：Reconsid-erations）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23期（1963年11月），第103—113页；艾克（Nobutake Ike）编译：《日本开战的决定：1941年政策会议记录》（Japan's Deision for War；Records of the1941 Policy Conferences），斯坦福特，1967年版，第3—13页。

[14] 沃尔修斯（Robert K. Wolihtuis）：《美国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外交政策，1937—1945年》（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towords theNether1ands Indies，1937—1945），博士论文，霍普金斯大学1968年版，第13—18页、第37—41页、第80页、第97—100页、第150—73页、汤杜麦查德（Kramol Tongdhummachart）：《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着重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1945—1960年American Policy in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urma，Thailand，and In-dochina，1945—1960，），博士论文，弗吉尼亚大学，1962年版，第20—28页；沃尔夫（Char1es Wolf，Jr.）：《印度尼西亚史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诞生、成长和结构》（The Indonesian Story；The Birth，Growth，and Structure of the Indonesian Republic）、纽约，1948年版，第1—5页。

[15] 洛（Lowe）：《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第139—151页；伍德沃德（Sir

LlewelynWoodward）：《英国在二次大战中的外交政策》（British Foreign Policyin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71年版，第二卷，第92—101页；1940年6月25日弗拉德致赫尔函（Flood to Hull）；《美国外交，1940 年》（FRUS 1940），第四卷，《远东》（The Far East），华盛顿，1955年版，第37—38页；1940年7月12日会谈备忘录（赫尔），（Memorar-dum of Conversation） （Hull），出处同上，第46—47页；1940年6月22日中国大使馆致（美）国务院函（Embassy of China to Dept. ofstate）出处同上，第32—33页；1940年7月10日中国外交部长致国务院函（Chines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 Dept. of State ）出处同上，第45—46页；1940年7月12日约翰逊致赫尔函（Johnson toHull），出处同上，第46页；1940年7月31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of Conversation），巴兰坦（Ba11antine），出处同上，第58—59页。[16] 1940年8月6日法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函（Embassy of France to Dept. of State），出处同上，第63—64页；1940 年8月6日邓恩记录（Memo-randum by Dunn），出处同上，第64—65页；1940年8月7日格鲁致赫尔（Grew to Hull），出处同上，第68—69页。

[17] 弗拉德（E. Thadeus F1ood）：《1940年法泰边境冲突和披汶·颂堪的对日许诺》 （ The l940 France- Thai Border Dispute and PhibunSunkhraam ’s Commitment to Japan）载《东南亚史杂志》（Journal ofSoutheast Asian History）第10期（1969年9月），第304—325页。

[18] 1941年2月7日格鲁至赫尔函（Grew to Hu11），《美国外交，1941 年》（FRUS 1941），第五卷：《远东》（The Far East），华盛顿，1956年版，第62—64页；1941年2月11日哈利法克斯致赫尔函（Halifax to Hull），出处同上，第74—77页；1941年3月6日澳大利亚公使馆致国务院函（Australian Legation to Dept. of State），出处同上，第103—105；1941年2月9日巴塔维亚总领事致伊登函（Consult General Bataviato Eden）FO 436／11；1941年2月20日伊登致哈利法克斯函（Eden toNalifax）FO 436／11；1941年3月1日丘吉尔致哈利法克斯（Churchillto Halifax）FO 436／9； 1941 年 2 月 15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赫尔）（Hull）DOS：711：94／2040；1941 年 4 月 21 日备忘录，英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函（Aide-Memoire， British Embassy toDept of State），《美国外交，1941年》（FRUS 1941），第五卷，第133—134页。

[19] 1941年3月13日格鲁致赫尔函（Crew to Hull），《美国外交关系，1941年》（FRUS 1941）第五卷，第109—111页；奥夫纳（Arnold A. OFfner）：《二次大战的起源：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世界政治，1917—1941年》（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d world Polities， 1917—1941），纽约，1975 年版，第 220—222页。

[20] 1941年6月17日艾奇逊致赫尔函（Acheson to Hu11）《美国外交关系：1941年》（FRUS 1941），第五卷，第178页；1941年4月28日荷兰大使馆致赫尔函（Netherlands Embassy to Hull），出处同上，第140141页；1941年5月6日哈利法克斯致赫尔函（Nalifax to Hull），出处同上，第142—143页；1941年5月27日霍恩贝克记录（Memorandum by

Hornbeck），出处同上，第 160—161 页；1941 年 5 月 2 日英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函（Embassy of Great Britain to Dept. of Stafe），出处同上，第 163—165 页；1941 年 6 月 3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赫尔）（Hull），出处同上，第 165—166 页；1941 年 6 月 3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赫尔）（Hull），出处同上，第 166—167 页；1941 年 6 月 4 日英国大使馆致赫尔函（British Em-bassy to Hull）出处同上，第 169—172 页；1941 年 6 月 3 日会谈记录（Memoradum of Conversation）（韦尔斯）（welles），《美国外交关系：1941 年》（FRUS 1941），第四卷，《远东》（The Far East），华盛顿政府印刷所，1956 年版，第 248—251 页。

[21] 艾克（Ike）：《日本决定战争》（Japan ’s Decision for War），第 77—90 页。

[22] 1941 年 7 月 16 日赫尔致莱希函（Hull to Leathy），《美国外交关系：1941 年》（FRUS 1941），第五卷，第 212 页；1941 年 7 月 19 日莱希致赫尔函（Leathy to Hull），出处同上，第 218 页；1941 年 7 月 24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韦尔斯）（Welles），《美国外交关系：日本，1931—1941 年》（FRUS： Japan l931—1941），华盛顿， 1943 年版，第二卷，第 527—530 页；费斯（Herbert Feis）：《通向珍珠港的道路：美日战争的来临》（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 The Coming of the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普林斯顿， 1950 年版，第 236—241 页；安德森（Jrving H. Anderson Jr.）：《1941 年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官僚主义的反映》（The 1941 De Facto Embargo on Oil toJapan，A Bureau—cratic Reflex）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 44 期（1975 年），第 201—231 页。

[23] 1941 年 7 月 30 日佩克记录（Memorandum by Peck），《美国外交关系：1941 年》（FRUS 1941），第五卷，第 240 页；1941 年 7 月 31 日格雷记录（Memorandum by Gray），出处同上，第 242 页；1941 年 8 月 2 日哈利法克斯致代理国务卿（Halifax to Acting Sec. State），出处同上，第 248—250 页； 1941 年 8 月 4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韦尔斯）（Welles），出处同上，第 254—256 页；1941 年 8 月 9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赫尔）（Hull），出处同上，第 268—269 页； 1941 年 8 月 14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佩克）（Peck），出处同上，第 271—273 页；1941 年 10 月 4 日佩克致赫尔函（Peck to Hull），出处同上，第 306—309 页；1941 年 10 月 15 日佩克致赫尔函（Peck to Hull），出处同上，第 320—322 页；1941 年 10 月 25 日英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函（British Embassy to Dept. of State），出处同上，第 325—326 页；1941 年 10 月 25 日英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函（British Embassy to Dept. of State），出处同上，第 326—327 页；1941 年 11 月 7 日霍恩贝克记录（Memorandum byHornbback），出处同上，第 337—338 页；1941 年 11 月 15 日佩克致赫尔函（Peck to Hull），出处同上，第 342—343 页；1941 年 11 月 22 日赫尔致佩克函（Hull to Peck），出处同上，第 345—346 页。

[24] 洛（Lowe）：《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第 248—250 页；第 269—274 页；伍德沃德（Woodward） ：《二次大战中的英国对外政策》（British Foreign Policy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卷，第 134—136 页、第 178—180 页。

[25]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42 年 2 月 21 日。

[26] 《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六卷（1942 年 5 月 30 日），第 488 页。

[27] 路易斯（Louis）：《绝境中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t Bay），第 88—117 页。关于日本与盟国在殖民地区类似的方针，参阅入江昭（AkiraIriye）：《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年》（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坎布里奇，1981 年版，第 96—213 页。

[28] 赫斯（Gary R， Hess）：《美国接触印度，1941—1947 年》（America En-counters India，1941—1947），巴尔的摩，1971 年版，第 33—59 页；索恩（Thorne）：《同种联盟》（Allies of a Kind），第 233—251 页；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罗斯福的反殖政策）（The Anti-Colonial Poli-ci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载《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Quarterly），第 70 期（1955 年 3 月），第 1—18 页；杨格（LowellYoung）：《罗斯福与帝国主义》（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Imperial-ism），博士论文，弗吉尼亚大学，1970 年，第 295—308 页；加里（GaryR. Hess） ：《罗斯福与反殖民主义》（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nticColonialism），载《印度美国研究杂志》（Indian Journal of AmericanStndios），第 13 期（1983 年），第 23—37 页。

[29] 1942 年 6 月 1 日白宫会议记录（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at WhiteHouse）（克罗斯）（Cross），《美国外交关系：1942 年》（FRUS 1942），第三卷，《欧洲》（Europe），华盛顿，1961 年版，第 578—581 页。

[30] 赫斯（Hess） ：《美国接触印度》（America Encounters India），第 60—88 页；《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七卷（1942 年 7 月 25 日），第 642 页。

[31] 路易斯（Louis）：《绝境中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t Bay），第 175—186 页；1942 年 11 月 17 日赫尔致罗斯福函（Hull to Roosevelt），Dos：哈利·诺特档案，第 13 箱；赫尔（Cordell Hull）：《赫尔回忆录》（TheMemoirs of Cordell Hull），纽约，1948 年版，第二卷，第 1638 页；拉塞尔（Ruth B. Russell）：《联合国宪章史：美国的地位》（A History of the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华盛顿，1958 年版，第 84—86 页。

[32] 赫斯（Hess）：《美国接触印度》（America Encounters India），第 89—96。

[33] 1943 年 7 月 21 日太平洋战争委员会（Pacific War Council），FDR 文件，地图室卷宗，第 168 箱；索恩（Thorne）：《同种联盟》（Allies of aKind），第 219 页；路易斯（Louis）：《绝境中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at Bay），第 29—30 页。

[34] 索恩（Thorne）：《同种联盟》（Allies of a Kind），第

218 页；伯恩斯（James Mac Gregor Burns）：《罗斯福：自由战士》（Roosevelt： TheSoldier of Fredom），纽约，1970 年版，第 319—323 页；太平洋战争委员会（Pacific War Council），1942 年 5 月 23 日、12 月 9 日、1943 年 7 月 21 日，FDR 文件（FDR Papers），地图室卷宗，第 168 箱，1943 年 2 月 22 日会见总统记录（Notes on Meeting with President），诺特档案，第 54 箱。罗斯福印度支那政策总论（On Roosevelt’s IndochinaPolicy Generally），见拉夫伯（Walter Lafeber）：《罗斯福、丘吉尔和印度支那， 1942—1945 年》（Roosevelt， Churchill， and Indchina，19421945），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 80 期（1975 年），第 1277—1295 页；赫斯（Gary R． Hess）：《罗斯福与印度支那》（Franklin Roosevelt and Indochina），载《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 59 期（1972 年），第 353—368 页。［35］194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对罗斯福-蒋介石会谈的简要记录（ChineseSummary Record of Roosevelt-Chiang Meeting），《美国外交关系：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1943 年》（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Teheran 1943），华盛顿，1961 年版，第 323—325 页；1943 年 11 月 28 日波伦关于罗斯福-斯大林会谈的记录（Bohlen Minutes of Roo-sevelt-Stalin Meeting），出处同上，第 482—486 页； 1943 年 11 月 30 日代理首相致丘吉尔函（Deputy Prime Minister to Churchill），PREM3／178／2；丘吉尔致代理首相函（Churchill to Deputy PrimeMinister），出处同上。

［36］1944 年 3 月 11 日丘吉尔备忘录（Minute by Churchill），M-266／4，PREM 3／178／2 1944 年 1 月 31 日—2 月 2 日东南亚计划概要（Sum-maries of Plans for Southeast Asia）DOS：诺特档案，第 153 箱；1944 年 9 月 8 日赫尔致罗斯福函（Hull to Roosevelt），DOS：85／G．01／9-844；赫尔（Hull）：《回忆录》（Memoirs），第二卷，第 1600 页。

［37］ 1945 年 1 月 17 日，259 号文件 CDA 档案 259 号诺特档案，第 125 箱。

［38］ 1945 年 1 月 13 日有关总统的记录（Memorandum for President），《美国外交关系：1945 年》（FRUS 1945），第六卷，《英联邦：远东》（TheBritish Commonwealth，Th Far East），华盛顿，1969 年版，第 1242—1244 页；1945 年 1 月 25 日备忘录，远东事务处，巴兰坦，出处同上，第 1244—1246 页。

［39］ 1945 年 1 月 1 日罗斯福致赫尔函（Roosevelt to Hull），《美国外交关系：1945 年》（FRUS 1945），第六卷，第 293 页。

［40］1945 年 2 月 8 日罗斯福-斯大林会谈记录， （Record of Roosevelt-Stal-in Meeting），《美国外交关系：马尔他会议和雅尔塔会议》（FRUS：The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华盛顿，1955 年版，第 766—771 页；路易斯（Louis）：《绝境中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t Bay），第 422—462 页；1945 年 1 月 16 日罗斯福-斯坦利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Roosevelt-Stanley Conversation），DOS：查理斯·陶西格档案，第 49 箱。

［41］ 1945 年 3 月 15 日陶西格记录（Memorendum by Taussig），DOS：陶西格文件（Taussig Papers）。

[42] 路易斯（Louis）：《绝境中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t Bay），第 512—547 页。

[43] 约瑟夫·西尔弗斯坦（编）论文集（The essays of Josef Silverstein）《二战中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 in World War II），纽黑文，1946 年版，该书提供了政治变化的综合看法。

[44] 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英美外交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再次被占》（Anglo-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Reoccupation of theNetherlands East Indies），载《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二卷，1978 年版，第 1—24 页；赫林（George C. Herring）：《杜鲁门政府和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主权的恢复》（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Restoration of French Sovereignty in Indochina），出处同上，第一卷，1977 年版，第 97—117 页。

[45] 帕蒂（Archmides L. A. Patti）：《为什么越南成为美国信天翁的前奏》（Why Uiet Nam？Prelude to America's Albatross），伯克利，1980 年版，文章详细地叙述了美国情报人员和军事人员同越南人的交往。1945 年秋天，帕蒂作为驻河内的 OSS 的首脑，曾同胡志明和其他越盟领袖有过广泛的接触。

[46] 1947 年 2 月 3 日马歇尔致卡弗里函（Marshall to Caffery），《美国外交关系：1947 年》（FRUS 1947），第六卷，《远东》（The Far East），华盛顿，1972 年版，第 67—68 页。

[47] 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殖民主义和冷战：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为争取独立的斗争，1945—1949 年》（Colonialism and the Cold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1945—1949），艾萨卡，1981 年版。

[48] 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菲律宾在二次大战中的通敌》（Philip-pine Collaboration in World War II），1966 年版，第 122—123 页。

[49] 出处同上，第 143—144 页；弗兰德（Friend）：《在两个帝国之间》（Be-tween Two Empires），第 173—182 页、第 232—241 页。

[50] 1946 年 1 月 7 日安德森致杜鲁门函（Anderson to Truman），《美国外交关系：1946 年》（FRUS 1946），第八卷，《远东》（The Far East），华盛顿，1971 年版，第 861—863 页；1946 年 1 月 18 日麦克纳特致伊利函（McNait to Ely），出处同上，第 863—866 页；1946 年 1 月 28 日伯恩斯（贝尔纳斯）致杜鲁门函（Byrnes to Truman）出处同上，第 868—889 页；《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第七十九期（届）国会会议，第二次大会，第 2753—2754 页、第 2760—2764 页、第 2824—2856 页、第 3533—3540 页、第 4038—4049 页、第 4266 页；1946 年 5 月 2 日国家战时海军协调委员会记录（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Minutes），乔治·马歇尔文件（Papers of George C. Marshall），国家战时海军协调委员会档案；国家战时海军协调委员会行动和决议概要（SWNCC Summary Actions and Decisions），第 276 辑，DOS：SWNCC，第 4 箱；1946 年 4 月 20 日伯恩斯致杜鲁门函（Brynes toTruman），杜鲁门文件（Papers of Harry S. Truman），白宫法案档案；1946 年 4 月 19 日华莱士致杜鲁门函（Wallace to Truman），出处同上，OF 1055。

[51] 阿巴亚（Hernando J． Abaya）：《菲律宾的背叛》（Betrayal in the Philip-pines），纽约，1946 年版，第 21—150 页、第 175—223 页、第 255—270 页；伯恩斯坦（David Bernstein）：《菲律宾史话》（The PhilippineStory），纽约，1947 年版；泰勒（George E． Taylar）：《菲律宾和美国：伙伴关系问题》（The Phil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roblems ofPartnership），纽约，1946 年版，第 109—115 页；弗兰德（Friend）：《在两个帝国之间》（Between Two Empires），第 252—253 页。

[52] 法恩（Herbert A． Fine）：《在泰国的对二次大战的清算》（The Liquida-tion of World War II in Thailand），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 34 期（1965 年），第 65—82 页；纽奇特莱恩（DonaldE．Neuchterlein） ：《泰国和对东南亚的争夺》（Thailand and the Strug-gle for Southeast Asla),艾萨卡,1965 年版，第 52—58 页；1948 年 4 月 13 日马歇尔致斯坦顿函（Marshall to Stanton），DOS： 892·01／4-1348；1948 年 4 月 22 日兰登致巴特沃思函（Landon to Butterworth），DOS： 892·00／7-2948； 1948 年 7 月 29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s），（斯坦顿）（Stanton）。

[53] 1946 年 4 月 22 日阿比致布赖恩斯函（Abbey to Brynes），《美国外交关系：1946 年》（FRUS 1946），第八卷，第 1—3 页；1946 年 11 月 8 日艾奇逊致高尔曼函（Acheson to Gallman），出处同上，第 6—7 页；1947 年 8 月 4 日帕克致马歇尔函（Packer to Marshall），《美国外交关系：1947 年》（FRUS 1947），第六卷，第 40—41 页；1948 年 5 月 28 日赫德尔致马歇尔函（Huddle to Masshall），DOS：845 C· 00／5-2748； 1949 年 1 月 14 日会谈记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 （赫德尔）（Huddle），DOS：845 C·00／1-1449。

[54] 麦克马洪（McMahon）：《殖民主义和冷战》（Colonialism and ColdWar）；卡欣（George Kahin）：《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和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绮色佳， 1952 年版，第 215—414 页；泰勒（Alastair Taylor）：《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联合国》（In-donesi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艾萨卡， 1960 年版，第 385—410 页。

[55] 赫斯（Gary R． Hess）：《美国对印度支那的第一个承诺：对“保大解决法”的承认， 1950 年》(The First American Commitment in Indochina；The Acceptance of the“Bao Dai Solwtion”1950) 载《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 3 期（1978 年），第 331—350 页；科尔伯特（EvelynColbert）：《未走的道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的非殖民化和独立》（The Road Not Taken：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Indonesiaand Indochina），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 51 期（1973 年），第 608—628 页。

[56] PPS 文件《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U．S．Policy Toward SoutheastAsia）（1949 年 3 月 29 日）DOS：PPS 档案，第 2 箱。

[57] 出处同上。

[58] 论 1949—1950 年对东亚政策的检查，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的《艾奇逊、他的顾问和中国，1949—1950 年》(Acheson， His

Advisers，and China， 1949—1950）载博格与海因里希（Dorothy Borg and WaldoHeinrichs）编的《动荡的年代：中美关系 1947—1950 年》（Uncertain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纽约，1980 年版，第 13—52 页；迪加斯（John Lewis Gaddis）：《战略透视："环形防御带"概念的兴衰， 1947—1951 年》（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e Riseand Fall of the"Defensive Perimeter" Concept， 1947—1951），出处同上，第 61—118 页；沙勒（Michael Schaller）:《确保大新月带:占领日本和在东南亚进行遏制的起源》(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Occupied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 ），载《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 69 期（1982 年），第 392—414 页;布卢姆(Robbert M. Blum)：《划界：东亚遏制政策的起源》(Drawing the Line：The Origins of the Containment Pdlicy in EastAsia），纽约，1982 年版。

[59]《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执行秘书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的报告，1950 年 4 月 14 日》（NSC-68：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By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nited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April 14，1950），载《海战学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1975)，第 76—77 页。

[60] 菲菲尔德（Fifield）：《美国人在东南亚》（Americans in SoutheastAsia），第 52—55 页；海斯（Samuel P. Hayes）编：《美国对东南亚援助的开始； 1950 年的格里芬使团》（The Beginning of American Aid toSoutheast Asia： The Griffin Mission of 1950），来克星顿，1971 年版；索斯特尔（Jacques Soustelle）：《印度支那和朝鲜：一条战线）（IndOChina and Korea： One Front），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 29 期（1950 年），第 56—66 页；沃费尔（David Wurfel）：《贝尔报告及以后：外援引起的社会改革的政治问题研究》（The Bell Report andAfter：A Studv of the Political Problem of Social Reform Stimulatedby Foreign Aid），博士论文，康纳尔大学，1960 年。

（黄飞虎译　任孟超校）

日本与四强的对抗

入江昭[1]

1941 年至 1945 年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战争有着不同的名称。对于西方列强来说，这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战区，因而并未冠之以特殊的名称。历史学家仅称之为“抗日战争”。有些人用过“太平洋战争”一词，但这并不是西方政府在战时使用的官方措词。（曾经有过一个太平洋战争委员会，而这只是指与日本开战的太平洋国家代表的集会）。中国人的看法是，这场战争只是 1937 年或者是 1931 年开始的中日冲突的延伸。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包括一些日本作者，采用了“十五年战争”的说法。这与欧洲人用“第二个三十年战争”来指 1914 年至 1945 年这段时期十分相像。至于苏联的官员和作者，则把注意力集中于 1941 年至 1945 年，因为他们的国家当时先是参战抗击德国，然后再抗击日本，并且把整个冲突称为“争取文明的斗争。”

日本政府于 1942 年 1 月正式宣布，战争的名称是“大东亚之战”。其目的在于使之同欧洲战争相区别，以表明这个国家敢于在亚洲执行的特殊使命。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败后这一名称成了一种耻辱，因此也被最常用的“太平洋战争”一词所取代了。可是，恢复使用以往名称的呼声最近开始出现了。他们宣称，在提到那场战争时，日本人应该延用战时使用的名称，而使用“太平洋战争”一词则表现出，他们仍然具有奴才思想，所以才会接受战胜国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任何东西。后一种说法似乎是错误的；不论占领军干过些什么，他们并没有为他们所打赢的这场战争强加上一个名称，不论怎样，这一争论表明，对于这场故争的性质和意义在日本仍然存在着混乱的看法。

我一直采用“日美战争”这一名称。（罗纳德·斯佩克特最近写的一本书名为《美国对日本之战》。）将焦点集中在这两个国家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从 1941 年至 1945 年亚太战区的战斗多数是在日、美两国军队之间进行的；同时，这也暗示了日、美两国对战争目的的定义从根本上影响了这一地区未来的局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作用就不重要。有些人认为，至少在珍珠港事件以前，英国是日本的主要对手，而不是美国；另一些人认为，日美冲突的重要性远不及日本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所发动的战争。后一种看法在日本常常导致一种对使亚洲蒙受数百万人伤亡的战争深感自责的情绪，但是对于在 1941 年无缘无故地袭击美国和欧洲的领土却无类似的羞耻感。各种派别的作者，除了极少数人，都认为苏联于 1945 年 8 月这么晚的时候参战无论如何都是毫无理由的。换言之，日本人的看法是，这场战争包含着三个性质相当不同的现象：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冲突，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冲突，以及与苏联的冲突。

人们可以从以上的任何一个角度来撰写一部战争史。在这里，我要借用在战争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因为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概念看来可以为理解这场战争提供答案。这一概念就是“四强”。从 1941 年初开始，当美国、英国、中国以及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政权开始协调各自的对日战略时，东京的首脑们被迫地意识到，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国家被“包围”了。

---

[1]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正是他们竭力要避免的事。他们曾不顾一切地设法阻止美国或英国干预中国战争；有时他们曾希望某个西方国家或许甚至会愿意代表日本出来调停以结束战争；在他们的战争计划中也包括以下内容：他们曾设法测试，美国与英国是否确实无法离间，以及日本要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是否就无法不激怒美国；同时，他们还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根据该计划，日本、德国、苏联和美国将瓜分全球，而中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若不是完全灭绝的话，则将被降到次要地位。所有这些战略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它们建筑在这样一种满怀希望的假设上，即日本对东亚和西太平洋的统治，若不被接受的话，至少有几个大国会持容忍态度，而且他们也不会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

甚至到了 1941 年的春季，人们仍能发现，这种痴心妄想还在影响日本的政策。当日本继续在中国作战并且着手征服东南亚时，它同时与华盛顿和莫斯科进行谈判，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这些国家进行干涉。此战略获得了部分成功，至少是暂时的成功，因为苏联同意与日本签订一项中立条约。但是，俄国领导人从未把该条约看作是不进行干涉的神圣保证。在 1941 年至 1945 年期间，苏联官员同美国官员交换与日本有关的外交和战略情报，而美国则想当然地认为，两国将共同合作从西伯利亚对日本发起反攻。甚至在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仍不能清楚地看到，俄国几乎已经直接卷入了亚洲战事，这表明日本是多么不顾一切地相信阻止反日联盟的形成是有可能的。一个国家若被孤立便将失去一切的想法是一条信念，而这对于理解这场战争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是当俄国一参战，东京的首脑立即决定投降，这一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而日本的对手们则是竭尽全力来孤立日本。中国的各派领导人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开始就懂得了，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联盟才能拯救他们的国家。而这一联盟是采取人民战线的形式还是采取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同盟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要挫败日本将中国潜在的朋友隔离开来的政策，并且建立一个惩罚侵略者的全球性机构。 1941 年初，这样一个机构最终形成了。美国和英国已成为事实上的同盟国，并且为了制定出联合战略双方的参谋人员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当然，他们的合作远不是顺利的；它们之间的同盟带有分歧和勉强的性质，这一点给所有调查过有关战时英美关系的大量档案材料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英美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是这种关系决不会使日本有利可图。例如，在新加坡的防卫问题上，英美持不同观点，对此日本人是了解的，而且德国还怂恿日本进攻英国的基地。但是他们却犹豫不决，担心美国人会作出反应。换言之，伦敦和华盛顿成功地使东京感到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而当两国领导人于 8 月初在阿金夏湾会晤时，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日本政府和新闻界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如下结论：英美两国步调一致，无法离间。此外，那时日本在巴塔维亚的谈判人员已经发现，在英美两国官员的怂恿下，荷兰人拒绝给予日本开采油矿的特许权。在日本军队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南部时，英、美、荷三国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明显了。同时，当华盛顿的会谈毫无进展时，日本人不得不承认将美国和中国隔离开来是徒劳的。因此，四强包围日本的意象形成了，于是日本人就开始与所有的四个国家交战了。他们将同第五个大国——苏联，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和平状态。但是，正如沃尔多·海因里希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早已密切地注视着 1941 年夏季德苏之战的进程，

而且当他发现德国迅速取胜的机会越来越小时，便相应地强化了对日政策。从那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在美国、英国、荷属东印度群岛、中国以及苏联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协约性的联盟。日本对此熟视无睹，并且试图将苏联与其他四国隔离开来，而这些都决定了日本战时外交政策的特点。

四强对日本的包围其实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如若日本没有趁机利用 1939 年之后欧洲形势的发展，也没有竭力扩大其在东南亚的统治，那样的“ 联盟 ”是不会形成的。由于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和经济统治的范围，日本肯定英、美、荷三国的军队会给予中国以援助。

日本的发言人于 1941 年 12 月本末倒置地为自己辩护时说，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开战，并且宣称四强的包围已经威胁了日本的生存。相当令人吃惊的是，至今居然仍有人唱这种调门。尽管这些论断在理智上是浅薄和虚伪的，但是它们对于理解这场战争最重要的特点不无帮助，即这是一场日本与以四强为代表的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

那末，对于 1941 年至 1945 年间的战争，不论冠之以何种名称，只能在此框架下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最佳成果。对日本来说，在所有的战线上同时开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它的战略，必须在摧毁美国和欧洲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船只、基地和要塞时一开始就要速战速决。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排斥西方国家及其影响的日本统治区。这样，一个泛亚太领域将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得到加强，以防止美国及其盟国进行反攻。而对于该领域将扩展到何种程度，从未有过清楚的说明。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战争计划极为模糊，也没有如何管理占领区的蓝图。正如约翰 · 斯蒂芬所说的那样，有些人仍然希望将夏威夷并入日本帝国［2］。这似乎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在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岛屿可以用作反攻的基地，而日本若控制了夏威夷将有助于它在太平洋地区称霸。在西面，在印度开展的军事行动并结合筹划政治活动被看作是将大英帝国的这一堡垒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必要步骤。而若是能注意到当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即日本要求与德国合作。有人认为，由东京和柏林联合展开支持印度独立的宣传攻势将会镇住英国人。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日本人采用的灵活方案以保证他们的统治；在印度支那，他们允许法国人继续保持其名义上的政府；在缅甸和菲律宾，他们将鼓励当地的领导人建立一种不过分的自治政府；而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则将明目张胆地更加随心所欲。只是到了 1943 年以后，当战争的趋势变得明显地不利于他们时，日本人才开始注意民族主义情绪，目的在于利用这种情绪去反对正在成功地卷土重来的西方国家。

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框架下来理解日本战时的外交政策。在日本人看来，日本与四强之间的斗争，使日本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勉强联盟处于对立的地位，而这种联盟代表着华盛顿会议所制定的旧秩序。到底是否确实存在着一个有关亚洲事务的“ 华盛顿体系 ”——伊恩 · 尼希以及其他一些人坚决否认它的存在——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日本人认为它是存在的。他们把它视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础是日、英、美三国之间共同合作，以促进相互贸易，和制订共同对付中国民族主义挑战的方法。他们声称，这个体系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不仅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从未协调好它们的对华政策——在满洲危机时，英、美两国没有支持日本就是例证——而且他们为了控制世界市场的更大份额，已经开始各自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措施了。在这

种情况下，日本将抛弃华盛顿体系，另寻出路。被称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新计划将在全亚洲建立一种稳定而又有发展前途的统治，而这与英、美两国的利益和梦想无关。更有甚者，它将力图把英、美、荷三国永远驱逐出亚洲。

同时，日本将设法使中国与英、美、荷三国分离。由于它们代表着中国人接受过的华盛顿会议体系，日本人希望他们的新计划将会吸引中国人并且诱使他们与日本人合作以便实现此计划。日本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中国作出主动的表示正反映了这种想法。他们采用了许多形式，而大多数是带有宣传性质的，例如，1943 年初废除治外法权一事。这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姿态，但却经过精心设计，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深深感到日本十分看重自己的亚洲地位。日本希望中国人将会明白，与亚洲人合作要比信任欧洲人和美国人合作获利更多。这种泛亚主义影响了日本在整个战争时期的政策；直到最后，日本人仍坚持希望中国人将选择他们为伙伴，而不是西方人。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日本若要取得进展，就必须粉碎四强协约。

同样的思想也影响了对苏联的政策。如前所述，东京坚持认为，可以使俄国与英、美、荷三国分离。在日本看来，苏联与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日本外相重光葵曾经有一度甚至提出，俄国实质上是一个亚洲国家，因此与日本合作会比与英、美两国合作获利更大。当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更坚信，苏联迟早会发现自己将与那些国家发生冲突，而在斗争中苏联将会寻找日本的支持。这再次证明，那种有关体系的想法继续在影响着日本的政策；要么是让美国和英国确立的国际体系占上风，要么必须建立另一个体系取而代之。关于另一个体系，日本人希望由中国、俄国以及日本来作出选择。其设想是，在日本、中国和苏联之间签订一项协约，并以之与英、美、荷三国及它们的盟国相抗衡。

这项计划毫无进展，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人和俄国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且即使在日本，对于它的可行性也存在着怀疑。而官方意见中的一股支流，受到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暗中所表述的观点的支持，使人们回忆起在华盛顿会议的框架下与西方合作的旧秩序。从 1943 年起，政府发言人开始暗示，如果英、美两国始终忠实于华盛顿会议的精神的话，日本本来或许会留在华盛顿体系之中的。不论这种表示意味着什么，其中心思想是明白无误的；如果英、美、荷三国保证尊重日本的权利与抱负，日本可能会考虑返回旧的体系，这样，也就是重新与英、美、荷三国联合。这将意味着，不仅要放弃共荣圈计划，还要放弃转向德国和苏联以削弱英、美力量的战略。要这样做不容易，特别是因为陆军首领在战争期间已经执拗地抱着一种亲苏、反英美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要回过头来与英美为伍无异于要他们放弃 30 年代以来的奋斗所得。他们决不会不战而降，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军方和政府领导人更加倾向于私下谋求与英、美的和解，推翻陆军首领。陆军首领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权力，这一点甚至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还有所表现，即于 1945 年夏季，东京政府在压力下被迫请求苏联出来代日本调停，而不是直接向美国提出求和交涉。直至苏联参战，再加上美国投掷原子弹，才消除了残留的亲俄感情，并使返回华盛顿体系合法化了。

这意味着，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有些城市整个被抹去了，而这仅仅是为了证实日本毕竟是属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一类的。它侵略中国，目的在于控制其资源，并且想煽动中国人去反对西方，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日本与它们大家交战。日本求和等于是承认自己的努力是徒

劳的，也使自己认识到，赢得西方人的好感比无视这种需要会使日本获得更多的好处。换言之，首先，与英、美、荷三国开战确实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 1941 年战争范围扩大之前，日本毕竟已经在那里挑起了一场持续 10 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尽管如此，日本在中国干尽了坏事之后却只向美国，而不是向中国投降。十分明显，日本与中国人民（由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中国人民）正式和解要比与英、美、荷三国和解晚 20 年。虽然，如上所述，对于侵华战争在日本持续存在着一种比对其他战争更大的内疚感和自责之情。这可能是由这样一种思想造成的，正如松冈洋右于 1940 年任外相之前所表述的那样：美国与日本注定要共同决定“太平洋文明”的命运，但是在它们能够在这方面进行合作之前，必须消除彼此之间误解的根源［3］。换言之，这场战争是双方都应负责的暂时灾难；如今在日本的退伍军人、战争寡妇和其他一些人中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感情，即由于“英魂（指战死者）的牺牲”才使国家有可能享受当今的和平和繁荣。但是除非人们意识到，日本人并不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唯一有罪的一方，至少就 1941 年至 1945 年的战争而论，否则上述感情就无法理解了。另外还存在一个很普遍的观点，即日本人与他们过去的敌人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所谓受害者是从如下意义上来说的：他们被卷人了一场“历史必然”（松冈语）的戏剧，而这场戏剧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种想法会使外国观察者感到狭隘、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彻头彻尾的虚伪。毫无疑问，对于领土曾被日军侵占的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来说，占领军并不是“英灵”，而是一群野蛮人。最近关于日本学校教科书的争论表明，对于日本是否已经真正改造了自己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怀疑。若是能注意到争论涉及到例如下列一些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日本对朝鲜的统治、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以及对在港华人的大屠杀——换言之，争论涉及到日本违反一切国际法条例侵犯其他亚洲人的行为，而这是与日本要在该地区建立自由与和睦的新秩序的主张背道而驰的。

战时的中国政策对于日本要使亚洲各国亲如手足的声明也显示出了同样的怀疑。除了极少数人相信这样的口号以外，中国的舆论从未接受日本的下列建议，即它将领导亚洲各国进入一个解放和繁荣的新时代。中国人把这建议仅仅看作是离间四强的一种宣传战术。他们不会参与那种把戏，而将和同盟国合作，把日本人赶回日本去——正如《大公报》1943 年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那样，把日本人赶回 1853 年的日本去［4］。不能允许日本统治其他国家，同时，亚洲的和平只有通过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密合作才能得到维持。

在战时的中国，人们一再重复着这一主题，即上述四个国家“掌握着太平洋的命运”，这表明，中国人在深入地进行全面的思考。然而，他们并非一定愿意回到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秩序中去。华盛顿体系并未给予中国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正式地位，因此中国要维持主权国家的地位则基本上要依赖于日本不轻举妄动。而中国人将会接受上述四个大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他们发现这种合作是在开罗会议之后逐步形成的。当然，要实现与美国的继续合作是最容易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认为，美国的力量、资本和技术对于战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英国，虽然几十年来它是欧洲帝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尽管蒋介石因在战时支持印度的独立事业而激怒了英国人，重庆的发言人还是强调说，英国作为美国的一个同盟国，人们希望它与

美国紧密合作为战后的亚洲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体系。温斯顿·丘吉尔在开罗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同会见蒋介石这一事实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们三人宣布了要把“被日本攫得”的台湾、满洲和其他地区归还给其合法的所有者的意图，此举非同寻常。尽管俄国并未出席开罗会议，而中国政府却特地宣称，“同苏联的紧密合作对于解决远东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将坚持把库页岛南部归还俄国作为和平解决办法的一个部分。[5]

当时，中国人注意的是开罗会议所决定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被称为解决亚洲国际事务的开罗体系。它试图使四强同盟永久化，并且通过苏联的加入使得同盟更为坚强。它与华盛顿会议体系的不同在于，日本被贬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还被剥夺了一切海外领土，而苏联将成为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美国将在开发中国资源和使中国军队现代化方面起突出的作用，而英国将在中国市场上重新获得某些努力。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之未来命运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中国大概会促进它们的最终解放。可是，这不会采取日本当时正在推行的泛亚洲主义的方式。而更为可能的是，中国将作为殖民地人民的“托管国”之一，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能向一个更自主的实体平稳过渡。

不久，由雅尔塔会议拟定的另一个战时方案使开罗协议黯然失色，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很不幸的。造成此情况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开罗方案设想，现存的中国在统一、发达和强盛方面的程度足以使之能作为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伙伴而发挥作用，这一设想在 1944 年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一方面，重庆的中央政府连有效地管理非敌占区也有困难。它无法控制高额的通货膨胀、黄金的囤积、农业生产的下降和政府赤字的上升。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国民党人向美国寻求更多的贷款，但是被拒绝了。相反地，共产党地区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方面均有重大收获；50 万士兵和 220 万民兵被当作工人来生产肥皂、纺织品和其他物品。他们日益增强的实力使共产党领导信心十足，因此他们比以往更加坚决地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和根据租借法供给的货物。他们的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改革家、地方组织和报纸的支持，大家开始呼吁废止一党专制。他们提倡经济发展、人权、地方自治、言论自由和财务可靠性——他们把这些条件看作是在战后形成统一和现代化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组建于 1944 年 9 月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目标。

所有这些发展都意味着要动摇蒋介石的统治。他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象征，但是单凭这一点已经不足以使他继续成为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领袖了。美国曾经始终如一地支持蒋介石，但是到了 1944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官员拒绝了他的一项贷款要求，并且同延安的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同时还要求让自 1942 年起任驻华美军总司令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全权统帅中国军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这最后的一项措施，导致了国民党领导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严重不和，并且加深了中国的分裂，因为共产党人欣然同意此项计划，他们相信这将使他们能从根据租借法供给的物资中获得相当大的份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蒋介石不能接受此项计划，他强硬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相反提出要美国召回史迪威。罗斯福总统不想使形势恶化，便改变了初衷。但是这一插曲对于四强合作的想法是当头一棒，因为中国的分裂局面将会保持下去，一部分仍然由美国支持，而另一部分即共产党中国将日益与美国疏远。这一情况到 1945 年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当时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和新的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都变成了蒋介石的

坚决支持者，而共产党人多次力图越过这些官员直接与华盛顿联系却都遭挫。这样，在 8 月份获得胜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将处于如下地位，即承担根据开罗计划所分配给它的任务。

1945 年，苏联取代了中国，成了能左右亚洲事务的一支主要力量。在雅尔塔，约瑟夫·斯大林保证，俄国将加入四强同盟，并协力把日本赶回去，使它仍然处于 19 世纪中叶的地位。但是他清楚地讲明，战后苏联在东北亚要获得一定的势力范围，他要占领阿瑟港和大连，还要在满洲铁路中获得占优势的利益，对于斯大林的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同意。这些特许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但是在雅尔塔，斯大林同意与国民党政权谈判以便使他们之间的秘密协定正式化，就这样，苏联继续承认重庆方面是中国的政府。当然，斯大林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是他显然不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他情愿听任他们自行其是；斯大林甚至不坚持应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换言之，只要俄国能从满洲获得重大权利，它就不打算像它正在东欧所干的那样，把中国，无论局部还是整体，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至少其大部分，正在落人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如此，雅尔塔方案把中国的地位降得比苏联更低。以下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日本拼命想把最后一线希望押在维持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上，苏联还是解除了这一条约。尽管四强已经分裂了，苏联还是于 8 月份参战，并且开始占领满洲，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美国和英国欢迎苏联加入四强同盟，并且相信这将决定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当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可以争论的是，苏联的入盟起了冲击联盟的作用，并且使得战后亚洲的合作任务复杂化了。到了 1945 年，开罗方案的作用大大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雅尔塔计划，这是一个实现美、英、苏互相承认的势力范围得到新的平衡的计划。英国官员完全有理由对此协议表示满意。1944 年 10 月，中-缅-印战区已被划分成了中国部分和缅-印部分，后者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为了给重新占领亚洲国家作好准备，11 月，伦敦的战时内阁重新成立了一个远东委员会，并且为战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安全制订了战略。因此，1945 年初，英国准备返回东南亚和西太平洋。正如由联合计划参谋部于 1 月份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 英国在太平洋的主要利益在于我们的领地和殖民地及其所依赖的海上通讯的安全。我们第二位的利益则是与中国的贸易。 ”只要保住新加坡、香港、悉尼、埃斯奎莫尔特和北婆罗洲这样的基地，上述这些利益就可以得到保护，而这些基地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加在一起，应该足以“ 抑制 ”住日本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势力在库页岛、千岛群岛、满洲，甚至是在朝鲜的扩张，被认为是一种受欢迎的进展，因为这能起到遏制日本的作用，同时又“ 不像会对我们自己在太平洋的利益有不利的影响 ”。这种思想正是英国热烈赞同雅尔塔协议的基础。 [6]

然而，同时却存在着一种担忧，即苏联的势力可能不会局限于那些地区，而是会变得十分强大，从而“ 像以往日本那样成为巨大的威胁 ”。虽然正如一份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在 1955 年至 1960 年以前，这种威胁可能还不会成为事实，但是英国必须通过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为防止这种不测事件作好准备。而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与美国合作“ 使得中国的发展至少不亚于苏联 ” [7] ，以防止苏联在亚洲大陆进行扩张。英国于 1945 年至 1950 年之间坚持执行的、使中国发展成为苏联的潜在对手的政策，几乎没有得到美国的鼓励。

正如克里斯托弗·索恩根据大量文件所作的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中国问题，英美两国的看法分歧十分严重。英军驻东南亚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埃斯勒·丹宁是如此表述这一观点的：美国“今天在关闭门户方面已经取代了日本”。而这种看法表明伦敦和华盛顿在亚洲问题上的分歧正在扩大。［8］虽然如此，但是与其说问题在于英美的分歧，不如说是雅尔塔会议仅仅制订出了推行强权政治的措施，但却没有为制订战后的亚洲政策提出一致同意的方案。正当英国人普遍对此情况感到满意，并且最优先考虑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问题时，美国的官员们则对利用此情况来推行把日本重新统一到战后国际秩序中来的计划感兴趣。美国国务院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实行上述计划，它可

以被称为再生的华盛顿会议体系，因为它设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包括非军事化的日本，进行协作以保证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经济上的国际主义的概念，它强调贸易和投资的多边体制，而这种体制将有助于工业国家的繁荣，同时也将帮助欠发达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此项政策被埃米莉·罗森堡、罗伯特·帕肯汉姆及其他人称为自由发展主义，它是华盛顿体系的基础，在战争期间，国务院的国际主义者及他们的支持者使它再度受到重视。

正如我在别处听说过的那样，也正如其他人曾经指出的那样，此项政策意味着对日本采取一种使其复兴的态度。诚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将被消灭，而且日本战败之后将被限制在本土的四个岛屿上。但是，它的人民不会受到奴役，它的经济恢复也不会受到压制。相反，人们将劝告日本人再次把他们的国家发展成为热爱和平、相互通商的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战后计划委员会于 1944 年 11 月在它通过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抱有如下希望，即“日本认真履行它在和平国家的大家庭中的责任”以及“由日本人民建立一个将推进这些计划的政府。［9］这种设想完全是华盛顿的官员根据 20 年代的情况所制订的那种日美关系。例如，他们认为赞美军国主义的日本学校教科书应该由大正时期的读物所取代，因为那些读物“写于日本 20 年代的和平时期，它们对日本军队生活的荣耀几乎不加渲染。”此外，假如战胜国求助于“日本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教会学校或国外受过教育的人”［10］，要使日本重新改变方向，执行“国际合作的政策”就会更容易些。

有人认为，经改造后的日本将能适应经济上的开放和互相依存的国际新秩序。雅尔塔协议所制订的那种推行强权政治的协定无法保证将带来一个新世界。基于上述原因，国务院的官员们坚决要求提出一项改变其国际主义性质的补充政策。正如助理国务卿 A·A·伯利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强权政治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又有所表现，美国必须设法在战后运用其他方法而不是“火力”来重建一个稳定的世界。它应该运用自己的道义、外交和经济手段，通过实现“自由通讯权、飞机自由降落和通行权、船只停靠港口权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通行无阻。［11］另一位官员坚持认为，不承认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将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这一目标”。这些想法中的重要之处在于，“把日本纳入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和热爱和平的国际大家庭”已被当然地视作战后国际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12］。所有这些看法表明，至少就美国政府的某些重要官员而言，他们的指导原则还是属于 20 年代的，特别是华盛顿会

议条约的原则。

因此，如果美国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刻提倡华盛顿会议体系的精神，而且设法以这种精神来补充雅尔塔协定，日本人就能轻而易举地说服自己，即使与美国妥协也不算完全失败。尽管他们将失去本土岛屿以外的一切领土，30 年代的宏大目标也将毁于一旦，但是他们无需在其他方面回到现代化时代以前去。他们只要回到 20 年代的状况，然后重整旗鼓，再一次着重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简而言之，日本将购买一张回归华盛顿体系的车票，而其价格就是接受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决定的领土安排。

这就是威廉·鲍登所说的战后的“太平洋联盟”的开端，而日本历史学家喜欢称之为“旧金山体系”的开端，他们所指的是 1951 年的和平条约，而这项条约使美国与日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正如孔华润及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无论英国还是中国，更不用说苏联了，都对在旧金山签订的协定表示不快。［13］但是这种结果在 1945 年多少就能预见到了，因为日本投降时，美国的国际主义政策显然对日本远比对美国自己的盟国更为成功。苏联没有接受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制订的经济上的国际主义；英国人虽然接受了，但却没有放弃帝国特惠制，而且首先是对战后日本的恢复忧心忡忡，因而无法赞同在亚洲与日本合作的意见；至于中国，内战使它几乎不可能参加任何多国计划。中国要在 30 年之后，当出现了新的政权时才会采取“开放”政策，才会积极地将其经济事务纳入商业交易的国际体系。

冯·克劳斯卫兹在战争期间曾写到，最重要的是知道谁是敌人。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人在与四强作战时，似乎从来没有搞清楚谁是敌人。最明显的敌人——美国，结果是潜在的盟友，而被他们当作友好、中立的国家——苏联，却给予他们“致命的一击”，导致了他们的投降。尽管他们与中国打了 15 年的仗，但是他们甚至拒绝承认两国之间交过战。至于那些殖民地区域，日本人无法确定当地的土著人民究竟是敌人还是同盟者。因此怪不得当时——以及现在——对于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还存在着许多混淆的看法。

不管怎样，由于日本人决定与四强开战，他们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的状态，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状态。若是没有这场战争，美国和苏联的势力都不会在亚太地区扩张得像现在这么远，那些殖民地国家也不会被迫突然中断它们的长期统治。对于那些关于亚洲自由和共同繁荣的日本战时口号，尽管一再重复宣传，当地土著人民并没有真把它们当作一回事，特别是因为他们对日本占领的严酷性认识不一，他们确实曾与美国和俄国不断增长的势力和影响相配合，目的是想形成一种局面，使得欧洲的殖民地位站不住脚。最后，战争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尽管在战争结束时期，这更多的只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事实。不言而喻，如果不是日本发动战争，原子弹就不会扔在日本，但是，原子弹的爆炸还是起到了如下作用，即进一步确保日本在经济上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因为最终它们象征着军国主义和扩军备战的徒劳。

因而，1945 年以后的亚洲将大大不同于 1941 年以前的亚洲。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基本评价取决于他对 1941 年以前和 1945 年以后这两个时期的看法。只要他赞同在日本、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和平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结论必然是这样的：这场战争是为了重新获得过去存在的一切而付出的可怕代价。

注释

[1] 见索恩（Chris topher Thorne）：《一种联盟》（Allies of a kind），伦敦，1978 年版。雷诺滋（David Reynolds）：《英美联盟的产生》（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on Alliance），查佩尔山，1982 年版。哈萨维（Robent Ha the nag）；《暧昧的伙伴关系》（The Ambiguous Partner-ship），纽约，1983 年版。

[2] 斯蒂芬（John Stephan）：《太阳旗下的夏威夷》（Hanaii Under the RisingSun），檀香山，1983 年版。

[3] 《松冈洋右》，东京，1974 年版，第 730—736 页。

[4] 《大公报》，1943 年 12 月 3 日。

[5] 出处同上，1943 年 12 月 17 日。

[6] 日本（44）278 最新版，伦敦档案局。

[7] 菲律宾（44）6（0）最新版，出处同上。

[8] 归档外交部，1945 年 1 月 24 日，出处同上。

[9] 入江昭：《大国与文化》（Power and Calture），坎布里奇，1981 年版，第 226 页。

[10] PWC 287 a，1944 年 11 月 6 日，哈利·诺特文件（Harleg Notter Pa-pers）。

[11] 伯利回忆录（Berle memo），1944 年 9 月 26 日，诺特文件（Notter Pa-pers）。

[12] 洛卡特回忆录（Lockard memo），1945 年 1 月 6 日，诺特文件（NotterPapers）。

[13] 细谷千博和孔华润（Warren I. Cohen）未发表的文章，呈递“美国，日本和世界，1950—1980 年”讨论会（Conference on “The United Sates，Japan， and the World， 1950—1980”），1984 年 1 月。细谷《通往旧金山和平之路》，东京，1984 年版。

（张任译任孟赵校）

美国对东亚冷战的看法

罗伯特·L·麦瑟（Robert L. Messer）[1]

本文将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如何影响美国战后对东亚地区的政策。这里不准备就这一题目对有关国家逐一详加论述。重点将放在美国领导层，尤其是总统和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对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看法的变化上。这一方法将二次大战和随后的冷战所带来的全球性变化的影响落实到个人这一层次。各领导人的个人看法上的变化从微观上反映了从战时同盟外交到冷战竞争和敌对的较大幅度的政策转变。

就东亚而言，看法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像在冷战的第一战场——欧洲那样一目了然。直到 1949 年中国“陷落”，丘吉尔的“铁幕”一说才有了它的亚洲翻版“竹幕”。尽管美国在中国倾注了 20 多亿美元的援助来支撑其领导人私下承认是一桩眼看要失败的事业，但是美国在亚洲并没有马歇尔计划，有的只是注定要失败的马歇尔使命。美国占领的日本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完全在美国控制下的重建和恢复并没有遇到中国大陆上的那些政治和地缘问题。对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政策来说，在日本是成功的，而在中国却惨遭失败。朝鲜最终成为战后遏制政策的一次考验，即便那并非故意安排。

尽管东亚地区冷战爆发的时机和方式与欧洲相比有所不同，但在美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即便在对日本的热战结束之前，一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和另一个地区可能发生或应该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就已经成为他们对世界看法的一部分。

一开始就应当指出，东亚并非是美国最高决策者在战后初期关注的重点。如同战时的军事战略一样，美国战后外交政策是以“欧洲第一”的原则来确定轻重缓急的。罗斯福死后，东亚的相对重要性确实下降了。

罗斯福、杜鲁门和美国东亚政策

无论作为个人来说，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考虑，富兰克林 罗斯福对亚洲都有兴趣。他的家庭长期以来就参与了在中国的传教和商业活动。尽管他对三强伙伴心存疑虑，罗斯福在战时便单枪匹马地大力倡导中国作为一个战后大国的观念。总统宣称中国将成为“四警察”之一。它的管辖范围将是亚洲大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将被亚洲的新秩序所取代，中国在其中将起和平保障者的重大作用。

因为中国对击败日本所作的贡献和它的内部问题使得这种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难以使人接受，罗斯福至少在短期内修正了他关于中国将成为整个亚洲警察大国的乐观期待。其他大国，如东北亚的苏联，东南亚的欧洲殖民主义列强将不得不对这些地区的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直到中国能够控制内乱，从而更好地发挥罗斯福设想的作用。

这种用“区域国际主义”来维持和平的方法是以一种合作的均势为基础的；它是罗斯福把威尔逊集体安全构想和传统的划分势力范围拼凑起来的产物。罗斯福想把战后世界划分为开放的势力范围，即各大国对一部分地区分

---

[1] 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

别拥有优先利益，并对维持和平承担主要责任，但这些地区并不是排它的或封闭的帝国。这个战略性的维持和平体系并不排除对某个地区的经济渗入。在这个体系内，门户开放的自由资本主义可以与苏维埃共产主义或只是略加改头换面的欧洲帝国主义共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美国将掌管西半球、太平洋和日本；英法将照看西欧，并成为它们过去殖民领地的托管人；苏联将维持东欧及东北亚毗邻地区的秩序，这些地区过去曾经受沙俄统治，而当时暂时还处于尚未从抗日战争中完全恢复过来并受到内战威胁的中国的有效控制之外。这一构想希望中国最终能够在这一全球体系内起最大的作用。［1］

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希望。这种对于大国和平的乐观想象并没有为他的继任者所接受。

哈里·杜鲁门处理外交事务上更注重本国的利益。他所设想的战后世界即便不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也比罗斯福的要远为充满竞争而缺乏合作。他对战争和战后和平的看法出自于一种更为狭隘的、沙文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又一次将旧世界从其自我毁灭的战争倾向和无休止的争夺邻国的权力斗争中拯救出来。这回美国再也不能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种过分和天真的慷慨了。除了出于确实需要而提供短期紧急援助，杜鲁门铁了心只为一种利益服务，即美国的利益。杜鲁门对诸如国联或联合国这种关于世界政府的宏伟设想持怀疑态度，他只忠于一个国家。杜鲁门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三强同盟的一员，相反，他把战时关系视为竞争关系。对他来说，丘吉尔是“大不列颠先生”，斯大林是“俄罗斯先生”。而他自己，则是“美利坚先生”，尽管他不愿过分埋没自己而公开这样说。［2］

与罗斯福的改良威尔逊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杜鲁门当上总统后的外交政策思想和战前美国孤立主义者是一脉相承的。一旦美国似乎在世界上处于一种独往独来的地位，他们就会以新的热情改变初衷，信奉全球主义。杜鲁门在战前和战后都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但是他的世界观含有自私的现实主义的因素。这种现实主义是珍珠港事件之前孤立主义思想的力量源泉之一，经过战争之后，它以全球单边主义的新形式出现。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战前的孤立主义者常常厌恶卷入欧洲事务而愿意单方面干涉亚洲，杜鲁门则对欧洲更感兴趣，也对欧洲事务更为了解。

杜鲁门对东亚的看法和第二个世界大战结束时一般美国人的看法相似。在东亚的战争是一场道德较量，是一场以蒋介石和他的富有魅力、能说会道的夫人为象征的“自由中国”同“日本鬼子”的战争。虽然中国落后，但是农民的纯朴和高尚的“净土”。“日本鬼子”却是残忍无情，近乎野兽般的侵略者，由于他们的种种暴行诸如南京大屠杀、偷袭珍珠港、疯狂的巴旦岛死亡进军，必须受到惩罚。这种刻板的战时敌友观表明了新总统对东亚这片对他和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都是陌生土地的态度。

当然，杜鲁门在 1945 年 4 月执政以后，立刻开始执行一项涉及美国对外关系所有方面，包括东亚政策的应急计划。杜鲁门的周围突然出现一批迫不及待地想为他出谋献计的专家，所以他不需要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应变能力。在罗斯福手下经常遭到忽视的外交政策官僚机器抓住机会来增强它对制订政策的影响。杜鲁门宣誓就职后没几天，国务院向他提交了美国对世界各国政策的概要。正如附在这份概要前的信所指出的，“它是以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指示和声明为”基础的［3］，这种背景文件，连同一系列口头汇报使新总

统清楚地了解到，在理解甚或只是知情的情况下，下级是怎样解释罗斯福高度机密和私人色彩很浓的战时外交的。

但是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最初并不信任国务院那些他称之为“聪明鬼”们的意见［4］。在他任总统的初期，杜鲁门认为，在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只有他和他亲自挑选的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才真正懂得美国的利益。后来他改变了想法，开始依赖不断膨胀的国家安全机构。特别是在那些超出他专长或兴趣之外的领域，诸如东亚事务，杜鲁门授与贝尔纳斯和其继任乔治·马歇尔和迪安·艾奇逊广泛的决策权。但是在战争末期和冷战兴起的初期，影响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大决定来自决策机构的最高层。这些决定丝毫没有涉及在亚洲的战争将如何结束以及谁有资格来获取胜利果实的问题。

原子弹和亚洲战场的结束

杜鲁门担任总统后所面临的最紧急的任务是按照美国的条件尽快结束对日战争。甚至在日本战败之前，杜鲁门对和平所持的态度就是一个早期征兆，说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将受以后同苏联冷战的影响。

尽管那时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轻视国务院的职业官员，他至少认为有义务读读地区专家为他准备的背景材料和政策建议。1945 年 7 月，在去波茨坦参加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首脑会晤途中，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埋头阅读国务院准备的情况介绍，在舱室内和他们的顾问们一起度过整个整个的下午。会议日程主要集中在欧洲事务上。但是在杜鲁门看来，他自己会前确定的日程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要斯大林敲定苏联对日宣战和红军入侵满洲的确切时间。［5］

杜鲁门在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所得到的有关苏联参战问题的外交和军事意见是一致的。美国将负责预定于 11 月开始的对日两栖登陆。早在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胆寒的行动之前，苏联部队将和在蒙古、满洲和华北的关东军和日本的傀儡部队交战。虽然这并非美苏联合作战，但这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着内在联系，必须加以协调。美国迫切希望在苏联能在亚洲大陆上建立第二战线。

这些旨在结束对日战争的军事计划基本上重新肯定了六个月前在雅尔塔三大国首脑会议上盟国代表团所作出的安排，但是当三大国领导人在波茨坦再次会晤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改变了美国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东亚部分的解释。

应当指出，直到启程去波茨坦之前，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才知道罗斯福和斯大林有一个有关东亚地区的秘密协定。即便在这之后，他们也没有看到雅尔塔协定远东条款的原文，而只好依靠第二手资料，参考一些参与雅尔塔会谈这些最秘密部分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国务院顾问的回忆。情况介绍上有关雅尔塔协定的内容缺少原文本某些带约束性的语言，如签字国保证所有协定条款将“确定无疑”地加以实施［6］。不过国务院的概述忠实地重复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二月所缔结协定的基本内容。然而，杜鲁门的顾问们对协定的解释和文件的原意有实质性的不同，对此他们是清楚的。

作为斯大林同意对日作战的代价，罗斯福以书面形式同意苏联在外蒙古、满洲和华北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控制这些地区的交通和港口设施。西伯利亚沿海被日本占领的库叶岛和萨哈林群岛的南部战后也将“交给”苏

联。波茨坦情况介绍报告的作者们指出，按照雅尔塔协定中“正常的语法结构”的涵义，以上情况将是雅尔塔协定实施后的结果。但是，他们要求杜鲁门朝着“修正”雅尔塔协定的方向努力，提出事实上已经同意的事“并不是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理解”［7］。换言之，他们建议杜鲁门重新谈判罗斯福关于东亚的协定，其办法是用另一种实际上是事后追溯的说法来取代已故总统承担的义务。

为了支持他们的意见，国务院的顾问们指出美国在指定由苏联控制的地区“有着重要的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实际利益”。这种控制会“妨碍美国进入这些地区的平等机会”。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有例在先，曾默认在亚洲建立“最邪恶的帝国主义据点之一”［8］。在情况介绍中没有一处明确使用门户开放的提法或遏制的字眼，但是内含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为了保卫美国在亚洲的机会均等，决不能助长或宽恕邪恶的苏维埃帝国主义，只要有可能就应加以遏制。

在这件事情上，杜鲁门看来同意了国务院聪明鬼们的意见。在他和斯大林第一次面对面的会晤中，杜鲁门立刻按照情况介绍所

提出的建议要求对苏联在满洲的权利进行修正。杜鲁门感到喜出望外的是他相信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取得了首次外交上的成功。

杜鲁门在会议前还怀疑自己不是斯大林、丘吉尔等人的对手。但是这次有关东亚的会谈结束后回到美国代表团总部时，一度不太自信的总统却颇为得意地声称，“满洲的门户开放已经不成问题了”。［9］

但是随着会议谈判进入诸如德国赔偿、波兰边界等对苏联利益更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时，这种认为能够与斯大林共事的最初热情很快消逝了。杜鲁门私下十分厌恶地把俄国人称之为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土地攫夺者”。杜鲁门希望会议“失败”，然后打道回家［10］。他已经得到了他来这里想要得到的东西：斯大林保证苏联将于 8 月中旬之前对日作战。会议开始时杜鲁门还收到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承诺含义的那个消息。战争部的电文谈到了“小男孩”

发亮的眼睛和有力的啼叫，这就告诉杜鲁门美国拥有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想的在东亚分享责任的世界在被一个目击者描绘成“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耀眼闪光前似乎变得暗然失色。［11］

杜鲁门在读了新墨西哥的试爆报告后，认识到这颗人造太阳的诞生意味着有没有俄国人都可以早日结束战争。苏联参战仍然有着心理上和军事上的作用。但是，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在回答杜鲁门关于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况下苏联参战是否必要的询问时所说的“俄国人不再需要了”［12］。根据只是最近从他的私人文件中才发现的证据。现在看来在这同时，杜鲁门认为相反的说法也是成立的；俄国人是日本想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最后希望。如果俄国人参战了，原子弹也就不再需要。杜鲁门 7 月 17 日的日记有斯大林告诉他日本在莫斯科的和平试探和苏联参战时间的记载。杜鲁门对这一消息评论道：“当此发生时，日本人就完了。”

在第二天给他夫人的信中，他表示相信苏联的参战将使战争比预期的提早一年结束，或者在可怕的入侵日本前就结束。他声称：“想想那些将免遭杀戮的孩子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13］

结束战争是杜鲁门最优先的考虑。在波茨坦会议召开时，他认为战争的结束已为期不远。对他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何时而是如何结束战争。苏联宣

战和入侵满洲将使日本人完蛋，但是原子弹是实现同样目标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用原子弹结束战争将为美国赢得战胜日本的桂冠，同时限制苏联分享果实的要求。

最近新发现的日记和信件为研究当时杜鲁门私下的想法提供的新的认识，这对了解杜鲁门以道德上和军事上的理由使用原子武器摧毁日本城市具有深刻的含义。和我们的这一讨论更为有关的是揭示原子弹这一新的因素是怎样体现在结束战争和防止苏联在远东扩展影响这两个业已存在的问题上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在亚洲遏制苏联的考虑究竟对杜鲁门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有何种影响争论不休。马丁·舍温表明，当初罗斯福决定研制原子弹时就已经考虑到美国原子垄断在战后会带来的好处［14］。但如果罗斯福有他的看法的话，对他来说这种未来的潜在力量还只是一个“假设”。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会怎样谈论这个问题。对杜鲁门来说，原子弹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它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结论了。在这历史上又一次大赌博中，初战告捷使得原子弹似乎成了解决杜鲁门面临的大部分最紧迫问题的良方。

事后，贝尔纳斯和其他冷战斗士公开宣称促成就对日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是限制苏联在亚洲的得益。但是杜鲁门总是极力否认这一点，坚持说他认为这一决定纯粹是军事性质的。原子弹是避免流血入侵的唯一手段。它所拯救的生命要多于所牺牲的生命，因而是道德的。他的手迹所提供的新证据似乎与这一解释相冲突。贝尔纳斯当时说过，原子弹可以防止“俄国人在对日作战时劫取过多地盘，从而可以提出不利于中国的要求”［15］，杜鲁门的手迹表明他对此并非毫无所知。

当然不能根据这些迹象就下结论说反苏动机是使用原子弹的主要或充足理由。即使苏联没有参战和入侵满洲的计划，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同样会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但是俄国人即将参与击败日本这一事实使得不发出明确警告，就立即使用所有的原子弹变得更符合逻辑，更为紧迫。

遏制和无条件投降

杜鲁门及其幕僚们认识到，不管有没有原子弹，美国都不能完全排除俄国人在亚洲“动刀”。相反，问题是谁来分享狮子爪下的猎物。美国政府内部就日本投降的时机和条件进行的私下讨论表明了美苏在东亚开始形成的这种竞争。

如上所述，通过美国情报机关的报告，以及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杜鲁门得知日本企图通过有条件投降来结束战争。杜鲁门没有采纳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和其他人所提出的让他在波茨坦宣言中就天皇的命运作出某些暗示的意见，他拒绝在立即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中加入任何美国可能作出让步的暗示。甚至在对长崎和广岛实施原子轰炸和苏联对日宣战以后，日本政府仍坚持投降的最低条件：保证皇室的不可侵犯。杜鲁门的一些顾问要求他接受这一条件，另一些顾问则告诫他任何对无条件投降严格解释的偏离都会招致美国公众对他的“讨伐”。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公众要求监禁或处决天皇。关于谈判实现和平的过早流言招来了雪片般飞往白宫的信件，要求坚持最严厉的条件［16］。持强硬路线者可以用这些迹象来支持他们关于会引起不利的国内

反响的预言。

杜鲁门最终冒了在国内受到政治讨伐的风险，在给日本的答复中对天皇的地位问题含糊其词，只是说裕仁将受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的“管束”。在将这一信件送往东京之前，杜鲁门寻求盟国政府的事先同意，他还和其内阁讨论了信件草稿。这一讨论表明总统继续关注在东亚限制苏联的扩张。

在向内阁成员宣读给日本复信草稿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强调，在日本的“最高主宰”将是美国人。这次将不再有权力的分割和“在欧洲的那种误解”。当有人提到俄国人尚未批准美国的草案时，杜鲁门打断话头“口头激烈”地说：“没有他们我们也要干。”战争部长史汀生解释说俄国人可能会试图阻挠投降的过程，以便更深入满洲。对此，杜鲁门补充说防止苏联力量在满洲的扩张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杜鲁门抛弃了罗斯福在雅尔塔关于势力范围划分的最初交易，也抛弃了他在波茨坦就门户开放权利所进行的重新谈判，他向政府领导人保证，“在满洲问题上，与俄国人不存在任何协定。”［17］

不管遏制苏联在东亚的影响是杜鲁门决定接受日本有条件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因抑或只不过是这一决定合乎需要的结果，事实是他用这一点来为他的行动私下进行辩护，这是冷战对东亚政策早期影响的又一例证。和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一样，美国领导层对限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和向日本提出要求感兴趣对影响日本投降谈判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因素。苏联因素并不决定事件的进程，而只是使那些在任何情况下也许都会发生的事情更有可能，更合乎需要。但是这场考虑具有的任何一点影响证实了被入江昭称之为亚洲的雅尔塔体系很早就开始瓦解了。［18］

朝鲜的分裂

在日本投降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国也是同样单方面地决定沿三八线分割朝鲜。尽管罗斯福战时所作的四大国托管朝鲜的承诺仍然是官方的美国政策，一道作为既成事实的遏制线已经横贯半岛。杜鲁门后来否认这是出自他的意愿，认为苏美单独占领区的建立只是为了军事和行政管理上的便利而已。但是，正如约翰·加迪斯所指出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朝鲜将整个处于苏联控制之下［19］。事实上，美国领导人面临日本的即将崩溃，紧急调动部队进入原先认为不会去占领的地区。在这一控制亚洲大陆的争夺战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压倒了军事和行政管理上的考虑。［20］

杜鲁门抛弃罗斯福战时四大国托管朝鲜想法的动力来自国务院的顾问们，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徒劳无功地强调朝鲜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到 1945 年 8 月，这一论点终于引起最高层的注意。和东亚事务的其他领域一样，杜鲁门过问朝鲜政策并不多，但都是很关键的。在作出分割朝鲜的最初决定后，杜鲁门就把美国占领政策留给地区专家和战区司令官。因此“高层政策”落后于朝鲜内部事态的发展。如布鲁斯·卡明斯所形容的，1945 年以后往往是“小人物说了算”。［21］

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中，同样存在当地条件起决定性作用和下层决策者具有重大影响的情形［22］。最初所确定的单独占领也给当地占领官员相当大的自由来解释他们的职责。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杜鲁门以竞争性的敌我关系的冷战观念来划分对东亚的控制，为那些负责执行这一总战略的人确

定了基本的原则。

冷战和中国的内战

和平初年美国国内冷战舆论的形成有很多根源：对战争后果，特别是东欧的结局越来越感到不安：公众对战时签订的协定如雅尔塔协定一知半解，对由于苏联的“不妥协”而造成的和平进程的拖延感到不耐烦；在德国、意大利殖民地控制问题上持久不息的争吵和其他许多敏感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或根本与亚洲无关。但是这些互不关连的问题毒化了整个美苏关系的气氛。一个地区存在的猜疑、愤怒和沮丧在另一个地区和造成这些猜疑、愤怒和沮丧的对象打交道时很自然会再次显示出来。美国认为，苏联在东亚的意图和它在东欧一样，是又一次“布尔什维克攫夺领土的企图”。特别是在铁托与莫斯科决裂之前，关于欧洲共产党只是苏联的附庸的推测被用来支持杜鲁门政府周围人士的观点，他们怀疑俄国人利用他们占领满洲的机会，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边对中国加以干涉。

现在看来，这种关于苏联在亚洲扩张的铁板一块的观点并不像当时那么令人可信。我们现在知道斯大林似乎对掠夺被他的军队所践踏的地区比对从物质上支持他所不能控制的一场革命早日在中国取得胜利更感兴趣。中苏分裂，越战和其他随后发生的事件给了我们以教益，从而我们可以自命不凡地评判那些没有机会获得这些具有启发性的事后认识的人。

的确，当时有些“中国通”曾经徒劳地试图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在华盛顿的上级。他们的命运只是表明不断加强的冷战舆论压倒了专家的意见和客观事实。

1945 年末，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提出辞职以抗议他公开称为驻华外交部门官员中的“亲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竟敢提出改变无条件支持蒋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采取将共产党的力量也考虑在内的更为平衡的政策。杜鲁门政府的公开反应是无力地为这些官员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辩护，并保证美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但国务院私下开始了对这些可疑的顾问们的调查，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辞职或被调离东亚担任其他不太敏感的职务。赫尔利担任大使的资格是因他自始自终对蒋介石一往情深。他最终战胜了那些在中国度过大半生的人。知识并不能取代站在正在形成的冷战舆论“正确的”一边。[23]

这一舆论为解释东亚局势的发展提供了概念上的框架。早在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的，当时仍在进行的中国内战成为战后美苏全球冲突的一部分。罗斯福通过盟国之间的合作发展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目标很快被确保“我们的”中国人在控制日

占区的争夺战中取胜所取而代之。

日本刚刚投降，5 万美军赶赴中国，表面上是帮助解除日军武装，并将他们遣返，但也是为了确保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和撤出的地区能够移交给国民党而不是给共产党。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当然不是新鲜事，但是这种直接的军事和后勤支援则是前所未有的。那不是雅尔塔体系的组成部分。美国从已经在太平洋集结的大批美军中抽调部分人力和物力去中国也许并不算是承担了一项重大义务。但是美国以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把蒋介石的部队空运送往华北，已进一步深入地卷入了中国内战。就后来美国试图援助国民党对付共产党而言，战后初期美国的介入在数量上是不够的。但是从质量

上来看，它在政治和心理上的重要性是确实存在的，特别从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面对的是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配有美国顾问，由标着美国记号的飞机运送。

1946 年马歇尔使命之后，美国和将来在中国取胜一方的疏远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史蒂文·列文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的这一外交干预并不是一种真诚的，或者说是天真的努力来调解国共冲突，而是一次为了自身利益的尝试来防止共产党，从而苏联在中国取胜［24］。马歇尔在华时，苏联军队开始撤离满洲，但是在战争结束一年多以后，美国仍在中国保留了 2 万人。在回答关于美国在敌对行动结束后这么久，在离本土如此之远的地方为什么还要继续驻军的问题时，当时的代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其他内阁成员解释说，虽然我们无意告诉中国人他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把部队撤走将是‘非常错误的”。他们的撤离将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动乱和饥馑”。艾奇逊声称：“我们没有干预中国的事务，但是通过我们明确的存在，通过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存在，我们将防止其他一些国家令人遗憾地干涉中国”［25］。他并不需要点明如果美国撤出中国，哪一个“其他国家”可能取而代之。

到 1947 年马歇尔回国接任国务卿时，他对蒋介石拒绝合作已感到厌恶，对解决中国老大难的内部问题的前景也失去了信心。然而，那时关于任何地方的共产党的任何胜利都将自动地有利于苏联而损害美国的利益这一说法已经成为处于冷战中的美国的一个信条。总统在宣布杜鲁门主义时对此直言不讳。为了从吝啬的国会那里吓唬出 4 亿美元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反共斗争，杜鲁门使美国承担了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义务。

针锋相对的冷战利害关系被机械地搬用到战后东亚的复杂现实中来。被自己的言论束缚住手脚的杜鲁门政府，不顾马歇尔和后来艾奇逊较为正确的判断，继续要求花几亿美元来支持走向崩溃的蒋介石政权。这种经济和军事援助只是把不可避免的结局往后推迟了一点，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杜鲁门主义对希腊内战的解决办法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反对派要求加强援助，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政府辩白说，美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应付如此广大的一个区域，而且它又远离对美国有重大利益的地区。考虑到美国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保卫和重建欧洲的义务，美国只能以被占领的日本为支点，负担维持亚洲大陆以外的“战略防御圈”。［26］40 年代后期在东亚的这一紧缩、退却的态势突出了冷战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富有讽刺意味的关系。最初，用欧洲的情况加以类推，来为战后亚洲的冷战策略辩护。但是一旦推行这种全球遏制政策，在更为重要的欧洲地区所承担义务的代价和重要性又限制了冷战在东亚的实际推行。

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在 1949 年夏提出建议，主张美国接管台湾。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对这建议所作出的反应，具体表明了这种互相牵制的关系。美国对这一岛屿单方面的军事占领将以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外来势力，即来自大陆的国民党或共产党控制的名义加以实施。凯南提出放弃战时承诺的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义务，他反对通过联合国举行公民投票表决，也反对采取消极的不插手的办法。他主张由美国对当地台湾人实行菲律宾式的仁慈的同化。为了支持他的计划，凯南甚至主张采用本世纪初的老办法，声称这样的行动，如果以“西奥多·罗斯福会采取的那种无情和充满自信的手段”加以执行，不仅能为自由世界拯救这个岛屿，而且会在美国和整个远东带来“电击般的影响。”［27］

不管是不是电击般的，凯南的建议确实使政策咨询的其他有关方面感到震惊，并使他们开始考虑起对台湾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试图在国务院所提出的几种方案中加以选择，为此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和凯南入侵计划军事上可行性的意见。联席会议的消极反应扼杀了这一想法，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37／7 号文件中规定的美国政策提供了依据。在这一文件中，凯南的干涉主张被否定了，代之以“仔细权衡”的无所作为。虽然台湾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用直接军事手段来保住该岛的计划被排除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我们的全球义务不相称……这种不相称会由于预算的限制和根据北大西洋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而进一步加剧。”［28］

由于在其他地区承担的冷战义务，主要是欧洲的防务，和军事资源的不足，美国负担不起任何新的诸如占领台湾这样的“全球性义务”。在亚洲大陆的军事卷入自然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不到一年之后发生在朝鲜的军事卷入，部分原因是受了中国的“丢失”所造在的电击般的影响。

当蒋介石政府的最后崩溃在中国来临时，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责怪蒋介石自己招致失败，声言美国为拯救中国已尽了一切可能。艾奇逊私下承认共产党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并准备根据这一结果调整美国的政策，但是在呈交白皮书时给总统的信中，他不得不公开声称中国的共产主义胜利者不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为他们的苏联主子的利益服务。冷战的舆论要求把中国的内战说成是“外国控制”和“苏联帝国主义”的一个例子。”［29］

美国行为的根源

以上对美国领导人中的冷战恩想是如何影响美国在东亚政策的讨论并不意味冷战的观念或东亚政策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从总统和其顾问的头脑里蹦出来的。与欧洲的情况相比，在东亚实施一种前后一贯、互相协调的冷战政策要晚得多。虽然基本的哲学或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环境的不同，政策的实际执行是大相径庭的。和冷战的观念或目标相反，美国的行动是为了对付美国人认为对他们的利益所构成的威胁。正如拉塞尔·布海德所指出的。东亚对美国的利益是重要的，并非边缘地区［30］。但是除了日本以外，东亚的其他地区并没有重要到有必要采取可能危及到美国在其他地区更重要利益的行动。这一战略上的逻辑最终导致了提出防御圈的办法来守住在亚洲的防线。但是全球性的冷战言论和盟国外交，诸如北约，所内含的政治逻辑，也要求美国不要因为考虑到军事防御能力和经济负担能力等实现问题而使美国的威望或信誉受到损害。［31］

对政策的战略和政治方面相互冲突的要求进行最后仲裁的是总统，他自 1947 年以后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也一直得到他的顾问们的支持。这批顾问由他自己挑选，是他所信赖的，其中主要的有贝尔内斯、马歇尔和艾奇逊。杜鲁门除了在波茨坦和日本投降谈判时简短地过问了高层外交政策，他满足于让国务院或他所信任的使节如马歇尔来处理东亚事务。但是，就像他办公桌上的警句所说的，在重大问题上，责任由总统承担。艾奇逊可能会准备承认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合法政府。但是在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传教士和外交官之后，在他们和苏联签订条约之后，在他对满洲门户开放所抱的巨大希望破灭之后，杜鲁门不想和这些那

怕只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打交道。［32］

甚至在这些真实的和想象的挑衅发生之前，杜鲁门就已经告知他的第一个国务卿在对付世界性的苏联威胁方面他所持的态度。1946年初，杜鲁门私下就已经阐述了他的冷战宣言。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擅自行动，想恢复雅尔塔体系。他同意以承认苏联控制下的东欧政权来换取苏联对美国控制日本的默许。他还签署了一个联合托管朝鲜的协议，杜鲁门私下否定了贝尔纳斯在莫斯科所作的一切，把它们称之为“绥靖”。

在给贝尔纳斯的一个亲笔备忘录中，总统直截了当地表明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权威，详细阐明了他对将来政策进程的看法。这一政策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在欧洲、地中海、中东和亚洲毫不犹豫地抵制苏联的扩张意图。除了要用“铁拳”来支持强硬的谈判，不承认任何一个苏联式的“警察国家”，杜鲁门还提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来防止苏联任何进一步的征服。在亚洲，这一全球性的防疫线包括以下要求：“我们必须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我们必须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朝鲜我们也应当这样做。”［33］

这样说说是容易的。即便总统不在此列，毫无疑问他的高级顾问们，包括已经准备接替贝尔纳斯的马歇尔，都认为美国缺乏实力来做所有杜鲁门想做的事情。在这封和其他私人信件中，杜鲁门发泄了心中的积怨，吐露了他任总统后对战后世界没有按照他预期的方式发展的不满。那时他曾告诉一个顾问他估计美国在和苏联打交道时应该能够得到它想得到的百分之八十五［34］。但是他所预料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没有出现。甚至在他有了原子弹并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后，俄国人仍继续他们的侵略。

杜鲁门不承认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和随后的革命动荡是任何一个国家所难以控制的，而是喜欢把所遭到的挫败和他心目中战后世界的走样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他们是希腊PGN0241.TXT/PGN>的反叛者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但是简单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它动员了国会和公众去做那些在世界上需要做的事情。杜鲁门喜欢简单的答案，但麻烦在于问题却是错综复杂的。

着眼于美国领导人看法的改变并不能充分解释冷战在东亚地区的复杂性。一种较为全面的解释必须包括官僚和体系力量的作用［35］。但是人们从雅尔塔体系的衰落中，可以看到从罗斯福在战后亚洲和苏联打交道的一体化、同化方法到杜鲁门的富于竞争性的、好战的反苏反共遏制教条的转变过程。最近人们认为东亚关系研究的“新边疆”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为什么杜鲁门在与共产党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否决了他的顾问们的意见［36］。对美国领导人看法和行为的这一简单剖析，只是为将来的探讨指出一个方向。

注释

［1］罗斯福对战后规划的“地区国际主义”方法在罗伯特·达尔克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美国外交政策，1933—1945》（纽约，1979）一书中有权述。沃尔多·海因里希的“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的看法”讨论了两位总统处理东亚事务的两种不同方法。该文载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

所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 的中美关系》（纽约，1980）第 3—12 页。

[2] 1945 年 7 月 7 日日记，普通记录，总统私人档案，333 号箱，哈利 S·杜鲁门文件，杜鲁门图书馆，独立城密苏里（以下引作杜鲁门日记）。

[3] 1945 年 4 月 16 日给总统的备忘录，711．00／4—1545，国务院档案，第 59 组记录，国家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4] 杜鲁门日记，1945 年 7 月 7 日。

[5] 哈利·杜鲁门致贝斯·杜鲁门，1945 年 7 月 18 日，总统私人档案，杜鲁门文件。

[6] 《美国对外关系：克里米亚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55 年），第 894—895，984 页。

[7] 《美国对外关系：柏林会议》第 II 卷，第 864 页（以下引作美国对外关系，波茨坦）。

[8] 上引书，第 865—872 页。

[9] 1945 年 7 月 17 日日记，亨利·L·史汀生日记，耶鲁大学图书馆，纽黑文，康涅狄格。（以下引作史汀生日记）。

[10] 杜鲁门日记，1945 年 7 月 25 日。

[11] 美国对外关系，波茨坦，第III卷，第 1360—1361 页。

[12] 史汀生日记，1945 年 7 月 23 日。

[13] 杜鲁门日记，1945 年 7 月 17 日，和哈利·杜鲁门致贝斯·杜鲁门，1945 年 7 月 18 日，总统私人档案，杜鲁门文件。

[14] 马丁·J·舍温，《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原子弹和大同盟》（纽约，1975）。

[15] 1945 年 7 月 24 日日记，沃尔特·布朗日记，斯巴登伯格，南卡罗莱纳。（以下引作布朗日记）。

[16] 布朗日记，1945 年 8 月 10 日，史汀生日记，8 月 10 日。

[17]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记，引自约翰·M·布鲁姆所编，《远见的代价：亨利·A·华莱士日记，1942—1946》（波士顿，1973）第 474 页。

[18] 入江昭，《亚洲的冷战》（英格沃特·克利夫斯，新泽西，1974）第 98—99 页。

[19] 亨利·S·杜鲁门，《回忆录：决断之年》（加登城，1955），第 445 页。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朝鲜与美国政治、战略，以及外交，1945—1950，”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所编《亚洲冷战的根源》（纽约，1977）。

[20] 把分裂看作是“战后遏制的第一个行动”的包括布鲁斯·卡明斯，《朝鲜战争的根源》（普林斯顿，1981），第 117—131 页；詹姆斯 I．麦特瑞，“冷战的俘虏：沿三八线分割朝鲜的决定”《太平洋历史评论》1981 年 5 月号，第 145—168 页，和马克·保罗，“贻误了的外交，原子弹和朝鲜的分裂，1945”，载布鲁斯·卡明斯所编，《冲突的产物：朝美关系，1943—1953》（西雅图，1983）第 67—91 页。查尔斯·M·多布斯的《不必要的象征：美国外交政策，冷战和朝鲜，1949—1950》强调了美国对苏联扩张这一反应的合理性。（肯特·俄亥俄，1981）第 26—29 页。斯蒂芬·皮尔茨认为杜鲁门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粗心大意，而并非马基雅维里式的策划。他的文章“美国关于朝鲜政策的决定，1943—1950：一些假设”，载于卡明斯所编《冲突的产物》，第 93—132 页。威廉·斯塔克的比较研究，《走向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 1947—1950》（查波尔希尔，1981）所作的

分期表明，战后初期东亚政策相对来说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

［21］布鲁斯·卡明斯，“导言：朝美关系的进程 1943—1953”载卡明斯编《冲突的产物》，第 14 页。

［22］可参见：约翰·道威，“被占领的日本和美国湖，1945—1950”，载爱德华·弗里德曼和马克·赛尔登所编，《美国的亚洲：对亚美关系持不同观点的论文》（纽约，1971）第 142—206 页；赫伯特·P·比克思，“地区一体化：美国亚洲政策中的日本和南朝鲜”，载弗兰克·鲍德温所编，《没有先例：1945 年以后的美朝关系》（纽约，1974），第 219—233 页；和迈克尔·沙勒，“确保大新月形：被占领的日本和在东南亚遏制的起源”《美国历史杂志》（1982，9 月号）第 392—414 页。卡罗尔·格拉克的“错综复杂的幻觉：日本和美国对占领的看法”对英、日文的学术文献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载孔华润所编《东亚关系的新边疆》（1983，纽约），第 169—236 页。

［23］肯尼斯·S·陈的《在中国的困境：美国的政策辩论，1945》汉姆顿·康涅狄克，1980）分析了国内政治和战后初期对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24］史蒂文·A·列文，“对美国调解中国内战的重新估价，马竭尔使命和满洲”，《外交史》（1970，秋季号）第 349—375 页。

［25］内阁会议详录，1946 年 8 月 2 日，第 2 号箱，马修 J．康纳利文件，杜鲁门图书馆。

［26］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战略考虑：‘防御圈’设想的兴亡，19471951”，载博格和海因里希所编：《不确定的年代》，第 61—118 页。

［27］《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 9 卷，第 356—359 页。

［28］上引书，第 377—378 页。

［29］《中国白皮书》（斯坦福，加里福尼亚，1967）第 16—17 页。

［30］鲁塞尔·D·布海德，“‘重大利益’：美国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政策，1945—1950”《太平洋历史评论》（1978，8 月号），第 425—451 页。

［31］可参见约翰·H·费弗，“1948 年的对华援助法，作为冷战战略的有限援助，《外交史》（1981 年春季号）第 107—120 页；汤姆斯·G·派特森，“在欧洲可行，为何在中国行不通？遏制教条，1947—1949，”《序幕》（1981，春季号）第 19—38 页。

［32］孔华润的“艾奇逊，他的顾问们和中国，1949—1950，”令人信服地例举了艾奇逊的现实主义，载博格和海因里希所编《不确定的年代》，第 13—52 页。

［33］载有被多次引用的“我对哄苏联人已感厌倦”这句话的备忘录在杜鲁门的《回忆录，决断之年》里重新排印，第 604—606 页。关于这一备忘录的可靠性和它没有交给贝尔纳斯的有关情况在罗伯特·L·麦瑟的《一个联盟的终结：詹姆斯·F·贝尔纳斯，罗斯福，杜鲁门和冷战的起源》一书中进行了探讨。（查波尔希尔，北卡罗莱纳，1982）第 156—165 页。

［34］W·爱佛利尔·哈里曼和埃利厄·艾贝尔，《派往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纽约，1975）第 448 页。

［35］对最近有关美国战后对日本，中国和朝鲜政策的学术文献，包括许多没有发表的博士论文的精辟论述可见孔华润所编《新边疆》一书中孔华润，卡罗文·格拉克，布鲁斯·卡明斯的论文。［36］孔华润，“1945 年以

后的美国和中国 ”，载孔华润所编《新边疆》第 144 页。

（王建伟译 汪义明校）

美国在东亚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9）

罗 荣 渠[1]

从 1931 年日本人侵中国东北开始，到 1949 年伟大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为止，是本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时代。

在这些年代里，在东亚地区，历史的聚光镜一直集中于中、日、美三国的关系上。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早已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殖民地，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在这些国家中，东亚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此，治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们在研究东亚时必须牢记：第一，主权和独立——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当时对于中国只有纸面上的意义；第二，当时中国在东亚的国际权力政治结构中只扮演一个次等角色；它与列强之间的双边关系受列强之间的多边关系的制约；第三，当时外国不仅控制和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对中国的国内政策发生重大的影响。上述这些观点，是我们研究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中、日、美关系问题先应具备的基本认识。

一

对 1931—1949 年期间中美关系的方便的、但非精确的阶段划分大致如下：1931—1941 年；1941—1945 年；1945—1949 年。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东亚地区的三次军事冲突：日本入侵中国，太平洋战争和中国内战。美国对华政策在这三个阶段的目标、手段和战略，严格地说来是不相同的。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基本依据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则是始终保持不变的。

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实行门户开放主义，其目标是通过维持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来追求美国在中国以及东亚的基本利益，并夺取最终凌驾于其他列强之上的优势地位。在 19 世纪初，中国最先是受到欧洲列强的掠夺。美国作为一个后来者，一直无意于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因为在本世纪 40 年代以前，它在东亚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相结合的权力体系。

在东亚的强权政治体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只有有限的重要性。因此，夸夸其谈的门户开放政策只不过是空洞的、含糊其词的、教条的公式。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可是，中国人对门户开放政策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它是出于美国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好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就上了威尔逊的空洞的甜言的大当。在 20 年代中，美国没有给孙中山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以任何积极的支持。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实际上又一次被史汀生的所谓不承认主义愚弄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满洲是地球上的不为人知的地方。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期望变成了深深的失望。1938 年 10 月，著名的中国政治评论家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露了某种被抛弃和孤立无援的情绪：

---

[1]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亲美思想太根深蒂固了，差不多可以说中国人传统的害着亲美病。……我们当然期待美国道义的及实际的援助，但亦无意相强。不过有一点必须请求注意者，就是这一年多实际上美国是帮助了日本，至少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便利了日本。美国公众各界必须记着：日本今天正在执行着并吞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而这个战争，就美国而论，从条约上，从传统政策上，从在华利益上，最后从太平洋全局政略及战略的观点上，我们相信美国应当帮助中国，而不应当帮日本。然而这一年多的大势，美国在中立的姿势下，实在便利了日本。［1］

1931年是东亚地区面临的第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因为日本入侵东北只是其征服整个中国的不断膨胀的野心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得不到制止，下一步将是指向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日本作为一个侵略者有其内在的虚弱。如果没有从英国和荷兰在东亚的殖民地以及从美国不断进口的物资，日本是无法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为了克服这个致命的弱点，没有比“以战养战”更好的政策了，这就是通过把战争推向军事资源丰富的新区域来支持战争。日本入侵中国严重地威胁了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但是美国人对中日战争有其特殊的看法。按传统之见，凡是美国国界以外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都与美国不相干，何况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离美国又极其远。加之，在30年代初，由于正处于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界领袖深为困扰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事务，更不是当时的中国动乱。

美国人把亚洲的战争看成是相对说来并不重要的战争，即无关紧要的民族为无关紧要的争端而进行的一场无关紧要的战争［2］。1933年5月，中国公使施肇基先生前往美国，请求美国出面调解中日冲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K·项白克声称，此项调停任务应是国联或英法的事，或那些其物质利益受到比美国更尖锐的威胁的国家的事；即使美国的远东政策原则可能受到进一步的破坏，美国的贸易前景可能受到更多的损害。“但是，按照物质利益来看”，项白克认为，“那里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3］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当时甚至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都对美国大使进言，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个威胁。但美国仍继续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尽管罗斯福总统口头上表示“同情中国”，但他宣称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事而非我们的事；他们可以中止白银的外流，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还没有到仅仅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他们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的时候。”［4］当时这位大洋彼岸的可敬的“观火者”是否想到过战火会蔓延到美国的土地上，看来还是一个问题。

难道说美国人会认不出日本是侵略者么？当然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结构是权力政治结构，即把保持列强之间的均势作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就中、日、美三国关系而言，保持美日关系是首要的，保持美中关系是第二位的或次一层次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因此，美国的绥靖政策，即用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维持列强的共同利益，在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政府的确对日本提出过很多抗议，但这并不是针对日本侵略中国，而是针对日本侵犯中国使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受到侵犯。美国政府不仅不愿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而且竭力讨好日本。当约瑟夫·C·格鲁在东京执行其外交使命时，他一开始就表示他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他承认五年来（1932—1937年）他一直“试图建立一幢坚实的日美友谊

大厦。”当时日本报纸甚至经常攻击英国而却很少攻击美国，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美国对“美日友谊”就更加担忧了。1932年，史汀生对日本占领满洲宣布了他的著名的不承认主义。1937年，赫尔在他的备忘录中既不提日本的侵略行为，也不提关于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史汀生试图借助集体安全机器，而赫尔则竭尽全力避免卷入中日战争。结果，美国对中日冲突所采取的政策是以不承认之名行不卷入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变成了日本的最大的物资供应者，越来越多的战争物资出口到日本用于侵华战争，而中国却不能从美国购买武器和弹药。美国人勉强发生的禁运令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政治的和军事的原因。当时美国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而美国的更大利益是在欧洲。对于亚洲事务，它主要关心的是尽量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军事对抗，以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属地的安全。因此，在30年代中，罗斯福政府遵循的是一条中间路线。

我认为，美国对日本侵华所表现的低调姿态，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美国在东亚是日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又充当了日本战争物资的最大供应商，这两国之间的激烈的竞争有时压倒了美国充当的供应商角色。于是有时人们就认为日美之间可能要爆发一场战争。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是做出艰巨的努力去设法延缓日美之间的对抗，如果有可能就避免之。在这方面，美国人不仅要对付传统的孤立主义，而且还要对付某种恐日症。当美国政府将其政策从道义上的禁运修改为经济上的禁运之时，日本立刻大受震动，并采取种种威胁手段制止之。当1939年7月，罗斯福政府宣布将在6个月后废除1911年与日本签订的商约之后，中国大使胡适在一封电报中向重庆报告：

> “现距国会重开不过一个月，距商约失败不满两月，日人近日颇手忙脚乱，造成各种流言：或谓日美不久将订新约，或谓中国西北各省赤兆更深；或谓中国国共水火，不久将决裂；或谓美国若相逼太甚，日本将与苏联携手……。[5]

各种迹象表明，如果早在1937年7月就对日本实行禁运，其发展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6]，侵略战争的战火可能会早就被扑灭了。

与对日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要求援助却完全是另一副面孔。中国接受了苏联和欧洲国家的贷款，但从美国却得不到一美元。即使是商业信用形式的信贷也非常困难。中国银行家陈光甫被派往美国接洽贷款，他说中国人寻求美国贷款之成败难卜，“几如赌徒在赌场的掷注”。经过一年半的巨大努力，才得到了总计约4．5千万美元的商业贷款，还要以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做抵押。霍普金斯称这些“象征性的支付”是“安慰良心的钱”[7]。陈光甫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和胡适大使在美国的窘困处境：

> “（美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全个人地位为目标，其他概非所计，欲求其出力助华，殆如登天之难，能不从中阻挠己属万幸矣。因此又忆及美国务院之远东司长贺（项）白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胡）适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8]

直到1939年末，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情绪才开始明显改变。美日商约的废除，中立法的修改，以及禁止武器弹药出口，这些都是某种程度上对日本予

以警告。但这些并不等于制裁。随着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战争的逐步升级，特别是在法国投降后，在 1940 年底，美国对东亚战场和欧洲战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1940 年 10 月 12 日，即美国总统选举前夕，胡适致重庆的电报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政治立场的变化：如果拨款建立一支两洋舰队；对日本禁运废钢铁；延长军队服役期；宣布为中国提供两笔贷款等［9］。1941 年 1 月 10 日，胡适打电报给重庆，认为在罗斯福 1940 年大选赢得第二次连任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进入一个新阶段。［10］

从那时起，美国开始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支持中国抗日，当时日本军队正从华北向华东和华南进逼，美国在华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1939 年秋，日本军队在广州和武汉分别发动了进攻。国民党政府能否在敌人的军事压力下支撑住还难以预料。这时，罗斯福采取了等待和观望的态度，直到他得到国民党政府将继续作战的情报后才批准桐油信贷。与此同时，中国与外界的商业和外文联系已差不多全部中断，在苏日中立条约缔结后，苏联决定停止援华。这样，由于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中国面临一种严重的危险局面。

1940 年 9 月，东京、柏林和罗马缔结了秘密的三国同盟，它表明轴心国在西方和东方已联成一个世界侵略战线。随着日本军队和舰队移师东南亚，中国的命运开始同整个东亚地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像三国同盟的缔结把欧洲战争与亚洲战场连接在一起一样。从此，战争与美国在全球权力政治中的利益变得日益密切。1941 年初，罗斯福对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做了明确的表述。他在致格鲁的信中写道：

> “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全部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又必须承认，在欧洲和在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

这种形势迫使罗斯福从“五大洲和七大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11］这些思想反映出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一个具有成熟的全球战略眼光的伟大政治家。

虽然罗斯福认识到美国将被卷入战争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欧洲战场，他仍希望安抚日本。尽管当时日本的行动正越来越多地威胁着东南亚，他仍指望不惜一切手段使日本的战争行为局部化并稳住日本。罗斯福说，他对日本的政策是一种“又拖又挡”的政策［12］。为了这一目的，当务之急是支持中国并防止中国崩溃。这样就能把日本军队拴在亚洲大陆上。如果能制止日本进军东南亚，也就能削弱其德国盟友在欧洲的地位。按照这一观点，给予中国以积极支持就变得必要而且紧迫了［13］。 1940 年 11 月 30 日，日军刚刚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罗斯福就宣布他批准给中国政府一笔期待已久的 1 亿美元信贷，同时史汀生和马歇尔同意调拨 100 架歼击机帮助保卫缅甸公路。这些措施旨在使中国能继续战斗下去，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助于制止日本向南攻击法国、荷兰和英国的领地。显然，美国把它的对外政策重点从日本转向中国，就像美国和英国转变其对苏政策一样，表明在他们的政策考虑中，全球战略居于优先地位。而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表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改变了西方人对战争的悲观看法。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英勇斗争使美国人相信局势最终将转向有利于中国的一边。幸运的是，美国政府在长期奉行一种调和与退让的政策后，终于认识到对付日本侵略的唯一办法是做好战争准备。

1941 年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代。日本希望通过与美国谈

判来实现它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主要目标，即不战而征服之。当时整个东亚和东太平洋地区的命运都处于关键时刻。在此紧要关头，罗斯福和赫尔仍希望通过采取某种权宜之计来避免更多地卷入太平洋地区。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达成肮脏交易的危险在当时的确存在。但是美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不断增长，中国方面提出了强烈抗议［14］，以及来自英国的警告［15］，加上日本向印支派出增援部队，所有这些压力加在一起迫使罗斯福不得不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而这些措施形成与日本对抗之不可避免。最后，美国政府在尚未为时太晚之前，终于悬崖勒马，从而才避免了重演张伯伦在慕尼黑背信弃义那场可耻的悲剧。

二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那以后美国开始制定一个新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包括两个主要目标，在 40 年代初只有华盛顿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国务院把它制定的对华政策表述如下：

> “美国政府的主要的和直接的目标是使中国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并充分动员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力进行这场战争。“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长期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使中国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的需求，是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根本条件。”［16］

要想彻底地理解这些方针，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新考虑之下加以考察。这一全球战略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主要由军方人员制定的。当时美国所追求的那些与军事政策有关的主要的国家目标大致如下：保持美国和西半球的领土、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完整，防止英帝国的瓦解；防止日本领土版图的进一步扩大；在欧洲和亚洲最终建立势力均衡，从而将最接近于确保那些地区的政治稳定以及美国未来的安全，并且在就实际可行的限度内，建立有利于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政权。［17］

上述引自由马歇尔将军签署的一个文件的声明，霍普金斯认为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文献之一”，因为它在美国被卷入全球战争之前就制定了全球战争的基本战略［18］。在我看来，这个文件的特点是以极大的鲜明性阐述了美国在全世界的战略目标：1.确保西半球的安全是美国的最高利益之所在；2．在防卫计划上，英帝国重要性仅次于美洲，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处于比欧洲更次要的地位；3．美国在战后世界的目标是建立新的权力均衡和支持欧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政权或亲资本主义政权。

在战争期间，军事考虑占据首位是肯定的。1942 年 2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 62%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应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只有 25%的人主张首先打败希特勒。尽管如此，仍然确定了“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战略。罗斯福在 1942 年 7 月 16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对他的这一政策做了出色的辩护［19］。按照这个指导方针，美国的军事目标不过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当蒋介石在 1942 年抱怨没有把中国当成平等基础上的盟国时，罗斯福致电给蒋介石：“我重新向你保证，美国和我们的盟国确实把中国当作我们共同作战努力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把维持中国战区看作是击败我们共同敌人的一种必须完成的急迫事情。”［20］维持中国战区——这是维持中国继续作战的另一种说法——，其目的是鼓励中国把敌人牵制在中国战场上，防止中国政府退出战争后崩溃。中国的领土辽阔，人口众多，

这个国家的确不能被忽视，而蒋介石政权又只有靠美国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罗斯福在德黑兰曾对斯大林说，“维持中国继续作战，拖住日本军队”是“我们的一个伟大目标。”［21］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被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划为它的一个战区。在初期阶段，尽管罗斯福曾经对把中国战区当作反攻日本的一种巨大而必不可少的军事基地给予相当高的期望，当时中国人民的英勇和持久的抗战也赢得了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但是，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却相当有限。 1941 年 12 月，中、英、美三方联合军事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确定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并将泰国、越南、缅甸北部的战场包括在内。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和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美国的空军使用华东作为基地袭击日本。1942 年初，中国军队被派往缅甸。尽管当时给人的印象是“英国佬”对太平洋战争不感兴趣，在 1943 年 5 月华盛顿三方会议上，罗斯福表示在 1943 年和 1944 年期间将优先考虑援助中国。［22］

但是美国在中国战区奉行的军事原则与蒋介石政府奉行的原则大不相同。当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从消极转变为积极之时，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的政策却从积极转变为消极。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蒋介石摆脱了困境，并使他把美国当成靠山。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公开声称：“中国有什么力量打胜日本呢？只是把日本拖着，等到英、美、苏把它打垮，我们中国收复失地就是了。”［23］这段话无意中泄露了蒋介石对战争的想法。蒋的基本战略是：让盟国去打败日本，自己捞取更多的美援来保存和加强其实力，以便有朝一日同共PGN0255.TXT/PGN>产党最后摊牌［24］。蒋所考虑的战争目标与美国设想的目标大相径庭。这就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的根源。对于史迪威其人，蒋竟然在背后骂他是“共产党”。［25］

史迪威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诸如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建议彻底重新组建武装部队（这支军队是蒋用其毕生的精力建立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如果史迪威的军队改编计划得到罗斯福总统的非常强有力的支持是能够成功的。这是一厢情愿的假想。理由如下：第一，军队改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取得对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由于蒋介石视兵权如命，寸权必争，他决不会把兵权交给任何人，更不用说交给一个外国人了。关于兵权以及兵权与政权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有不同的意义。在中国，一向是枪杆子指挥政治，而不是政治指挥枪杆子。第二，蒋介石所憎恨并竭力反对的是，史迪威想把共产党的部队纳入他的军事计划。对他来说，用美式武器去装备共产党军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三，约塞夫·史迪威在美军中的众所周知的绰号叫“刁钻的老豹”，他有很大的权力欲，而且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大施主”或一个殖民地总督的姿态来发号施令。他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对中国人百般挖苦，以至于罗斯福都批评他“明显地厌恶中国人。”［26］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部队的做法之一，就是试图把营长以上的军官都换成美国人，并在各部队配备很多有特殊权限的联络官来控制中国军队。这很像美国军官在加勒比海国家训练殖民地军队时所使用的方法。因此，史迪威的一些军队改编措施遭到在抗日战争中大大加强了民族意识的中国官兵的抵制。中国驻印军的高级指挥官郑洞国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 “依我们的看法，史迪威到中国来，一方面是代表美国政府监督美援的运用，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打算。他以中国通自命，想

利用中国士兵和美国的装备，在远东创造他的英雄事业，他的作法：第一步希望能指挥中国军队，第二步以美国军官代替中国军官，企图建立一支殖民地式的军队，作为他代表美国在中国称王称霸的资本。而蒋介石是以抢夺兵权、并吞别人的军队起家的，两个野心家碰到一块，这就展开了尖锐的矛盾。”［27］

情况就是如此。在中国，政治和军事是密切不可分的。如果要把罗斯福的军事战略付诸实施，就必须坚持不断地对蒋的政府施加极大的压力。但这样一来就要冒与蒋的友好关系破裂的危险。果然，史迪威的指挥权危机使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战略陷入困境。虽然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 1944 年已经形成，但这个危机却被发生在其他地区的戏剧性变化缓解了，这就是美国军队用岛屿跨越战术在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快速推进；苏联保证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后将参加抗日战争，等等。于是美国联合总参谋部提出了一个在太平洋地区的新的作战计划，这样一来就把中国战场的重要性降低为主要是充当支援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的空军基地。因此，中国提出的种种需求就退居从属地位了。加之 1944 年华东的战局也没有给蒋介石争点脸面。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使蒋介石困扰太甚，因为中国在东亚的全球权力政治的舞台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美国除了继续支持和加强蒋政权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三

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外交结构一直是扶持日本以对抗苏联，到日本已羽毛丰满企图独霸东亚之时，美国又试图以妥协的方式达到日美在东亚的均势。这个政策注定了是要失败的。罗斯福对东亚的新的构想是以扶持中国来替代日本。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弱国，但不是殖民国家，中国过去和今后都非常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罗斯福认为中国是容易被控制的，他希望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第一，他希望中国能变成“在远东协助管制日本的十分有用的大国”［28］。其次，他把中国看作抗衡苏联的一种力量。他在 1943 年 5 月曾说过：“在与苏联之间的任何重大政策冲突中，中国毫无疑问地将站在我们一边。”［29］也许罗斯福对中国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预见到“中国至少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而且可能出现类似 19 世纪后期的日本那样的发展。因此，他警告说：“最好是把四亿中国人民当作朋友，而不使他们可能成为敌人。”［30］

中国人民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坚持反对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世界声望和国际地位。但是，从国际权力政治的观点来看，中国还是一个二等国甚至更低等级的国家。在反法西斯盟国中，只有罗斯福坚持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的政策，使之充当“四大警察”之一。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意味着对中国人民的象征性支持，但这种做法肯定是相当明智而有远见，而且与这场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气氛是融洽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当时中国仍被排除在莫斯科会议四大国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之外。如果排除中国，“美国的公众舆论将会大吵大嚷。”［31］只是在美国强硬支持下，中国政府首脑才得到参加开罗会议的机会。那次会议宣布所有过去丧失的领土都将归还给中国。但是，天助自助者。开罗会议标志中国在美国的声誉的顶点，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下跌。

在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政治目标逐渐变成最突出的目标。自美国参加战争之时，中国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已分裂成两部分——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战场。美国为了实现其军事目标，试图把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实现中国的军事统一。在这方面的所有努力最后都是徒劳的。由于放弃了把中国战场做为一个主要的进攻基地，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政治统一变得更为重要和更加紧迫，此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各项重要政治目标是否能获得成功，将依此而定。

1941 年，罗斯福政府决定采取国务院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全球战略（见上节）。当时由美苏两国支配的战后世界权力结构的设想尚未形成，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遭忽视。到 1944 年，苏联战场上取得的伟大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在亚洲，苏联正取代日本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特别是它即将参加远东的战争。在这些形势下，美国的决策人物认为，为了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统治体系，解决中国的内战危机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件事成为关系到美国在东亚的政治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政府和军方的“中国专家”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大致分成两大派：一派主张彻底消灭充当苏联傀儡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无条件地支持亲美的蒋介石政府；另一派主张，有限度地支持蒋的政府，以便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争端并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两种观点在国务院内外展开长期辩论之后，第二种观点看来在罗斯福政府中占了上风。从史迪威到华莱士，这一派的立场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1945 年 1 月 29 日，由国务院中国司发布的一份备忘录被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份权威性声明。这份文件对美国在中国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做了简要说明，其要点如下：

> “正如上面所指明的那样，运用我们的影响以促成中国的统一，既作为短期的目标也作为长期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主旨。这未必就是说中国应该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然而就短期目标来说，蒋看来是唯一的、现在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改变支持蒋介石完成我们的近期目标的政策，也许会造成混乱。就我们的长期目标来说，我们的主旨是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我们能够与最有希望促进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领导人PGN0259.TXT/PGN>合作。［32］

这份声明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战争期间将支持蒋介石，至于战争结束后是否继续支持他的腐败统治，则要取决于当时的形势以及如何对美国最有利而定。同样清楚的是，即使蒋作为“一种短期投资”是可行的，在战争结束后是否被替换将视需要而定，而替换者必须是一个美国老板能操纵的人。这样一来，中国的前景至多不过是同战后在欧洲出现的某些非共产党政府一样，即后来杜鲁门总统所梦想的那种情况［33］。

无论是从短期政策还是由长期政策的观点出发，华盛顿是既希望在中国避免内战，又希望避免革命。因为如果内战在战争期间爆发，就会增加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困难和增加苏联援助的重要性；如果内战在战后爆发，就会促进旧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早在 1943 年 10 月，美国驻重庆大使高斯先生就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做过推断：“如果内战得以制止，如果国民党迫于形势能容许改革的要求或在自由化的影响下扩大政府基础，中国既可以免遭共产主义之害，又可以从或许是更邪恶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

义中得救。”［34］这个例子说明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典型的美式如意算盘。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美国着手调解国共争端，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个新的关键时刻。所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说法，主要是指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必须研究这一时期的全部复杂情况。但是首先，他们应试图抓住这一历史趋势的本质。这一本质就在于美国政府实质上推行的是在改组蒋介石政府的基础上统一中国的政策，这就意味着要让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从表面上看，这对两党似乎都是公平的，况且还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幌子。从罗斯福到杜鲁门都一直奉行着这条政策路线。这有大量事实作为佐证。例如：

1944 年 12 月 24 日，赫尔利打电报给国务院，声称他在参加所有谈判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是：“（1）防止国民党政府垮台。（2）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等等。”［35］

1945 年 2 月，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曾交谈过国共两党谈判的问题，罗说他认为赫尔利和魏德迈在促使共产党人进入重庆政府的问题上已取得了进展。［36］

1945 年底，马歇尔代替赫尔利出使中国。12 月 7 日，贝尔纳斯在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各方分子以真诚和解的愿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37］。我们相信，正如我们长期以来就认为并一贯表明的那样，蒋介石委员长的政府为正在发展中的民主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基础。”［38］

1945 年 12 月，马歇尔启程前夕，声称他对杜鲁门的意愿有一个明确的理解，那就是：“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39］应该提到的是，马歇尔的这段重要的话并没有被收入 1976 年美国新出版的马歇尔使华的文件集中。

1945 年，据《杜鲁门回忆录》：当时人们认为“中国各种不同的势力是能够被说服使这个国家统一起来的。当然，争夺政权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正如在欧洲的非共产党政府那样。”［40］

上述这些有关对华政策的陈述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依据，据此，我们有可能了解赫尔利和马歇尔代表团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潜在意图。

从以巩固蒋介石统治为目的的调整政策中可以看出，罗斯福政府到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制定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两届政府的手段可能有所不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人确信，从长远看，美国一定会支持国民党政府去反对中国共产党。马歇尔时常感觉到国民政府是以美国的调停作为“军事行动的护符。”［41］另一方面，共产党已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许诺的是只支持蒋，尽管如此，共产党一直希望避免内战和建立联合政府。［42］

事实上，美国在日本投降后所起的作用的实际效果是剥夺共产党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力；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方的几个港口抢先登陆，帮助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华北和东北各省，以抢先控制这些地区；美国运送了大批军援和经援物品给蒋的政府，其中包括出售廉价的战争剩余物资。因此，按最后结果来分析，美国是受它的全球战略的长期目标的支配而卷入中国国内事务的，这一卷入造成的效果是在关键时刻加速中国的内战。在 1949 年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战

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43]

在美国舆论的压力面前，迪安·艾奇逊把美国政策的失败都归咎于中国国内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美国是无法控制的。但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企图逃避罪责的粉饰而已。

日本投降后，美国对华政策是明确地建立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基础之上。但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立刻爆发了全面内战，这也使美国陷入了困境。随着马歇尔使华的失败，华盛顿曾经有一个极短暂的犹豫不决时期。“等待和观望”——这种敷衍塞责的政策一直持续到 1947 年中。到那时，欧洲和东亚地区政治形势的逐步恶化终于迫使美国摊牌。3 月，杜鲁门主义问世。6 月，提出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这两个措施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的新局面，战略的重点集中于美苏在欧洲的抗争。7 月，魏德迈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中国，他率领了一个对中国当前形势进行实际调查的代表团。9 月，魏德迈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他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军事形势是严重的，共产党已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形势的继续恶化将导致在满洲建立一个苏联的卫星国政府。在他提出的最后建议中，他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综述如下：

> “美国对中国有条件的军事援助的目的应为促成国民党军队的改组；重新获得公众对军队的信任；确保国民党军能有效地抵抗共军向国民党中国的继续进攻；并帮助中国建立稳定的局面。这种援助将以扶植一个政权出现为条件，而该政权将沿着美国认为满意的方向发展，同时承担对黩武的共产主义进一步扩散进行牵制行动。这样一个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必须是我们对特定国家提供军援的世界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44]

美国近期内对华新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上述报告中交代得很清楚。虽然魏德迈的报告受到国防部长马歇尔的正式压制，但它的要旨——对蒋政府实行有条件的军事援助——却被杜鲁门政府作为一项“有限援助政策”采纳了。使用“有限”作定语是战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很有限的精确反映，同时也表明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按照美国的反共观点，美国从中国完全撤出会导致国民党政府立即垮台，而由受苏联控制的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然而，当时美国要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或进行军事干涉，而同时又要执行巨大的援欧计划，这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是负担不起的。因此而产生有限援助政策：在军事上，在特定的领域，在美国顾问的监督下给予有限的短期援助，而避免直接的军事干涉；在政治上，则阻止任何共产党人进入所谓的联合政府。这样一种有限援助计划可以给美国在近期内玩弄外交手腕留有余地，并且暗示美国具有把它的远东政策的重心重新从中国转向日本的意向。在这方面，1947 年标志着美国对欧洲政策和对东亚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援助国民党中国的新计划的提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修正，是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的翻版，这是就其政治目标而言，而不是就其规模与持续的时间而言。有限援助意味着有限卷入，它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思想中“欧洲第一”的传统观点；同时又表明美国从传统的不卷入到全面卷入的转变，那就是夺取战后世界的霸权。这最后一步终于在 1950 年的朝鲜战争中跨出了。

不管怎样，对蒋政权采取的有限援助政策已为时太迟。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支持一个已经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不可救药的政府，终于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彻底失败。美国的尴尬处境在于这一事实，即如司徒雷登所说，美国的

援助“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并在中国“唤起了对共产主义事业更大的同情和强烈的反美情绪”［45］。因此，归根结底它加速了而不是制止了人民革命在中国的胜利。

总而言之，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所谓灵活性，就像在 1945 年初人们所察觉到的那样，是建立在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的不灵活性即僵硬性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以及全世界追求霸权主义的长期目标的不灵活性即僵硬性之上的。这样，蒋政权作为一笔短期投资终于货而不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基本手段是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利坚帝国向全世界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转折点，但与此同时，它也标志着殖民主义的衰落和全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分歧以及该政策与现实的冲突，正好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深刻矛盾，即帝国主义同各民族与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正当愿望之间的深刻矛盾。美国的悲剧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决策人物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出现的民族革命运动勃兴这一彰明昭著的全球性现象视而不见。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和东亚的政策中出现了一些新东西，但美国政策制定的连续性仍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30 年代至 40 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其中有三个关键时刻。在第一个关键时刻（1931 年），美国站在错误的一边；在第二个关键时刻（1941 年），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1945 年），美国又转向错误的一边。第一次的过错主要是由于孤立主义，最后一次的过错是由于名义上的国际主义而实际上的霸权主义。在 30 年代，从政治上来说，美国对中国只有消极的影响；40 年代初，参与对日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迅速上升到顶峰，但很快就从积极影响转向自己的反面。中国人民还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到头来，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像美国人从未来过中国一样。”［46］这一历史过程生动地表明：一个大国应学会尊重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美国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超级大国，当它顺应时代的历史潮流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后来逆潮流而动时，并未能阻止住革命的潮流，只是自己走向历史潮流的反面。这个简单的小结也可以看作是在更广的意义上对本世纪前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评价。

美国并没有失掉过中国，因为它不能失掉从来就不属于它的东西。

美国失掉的是它自己的声誉和良知。

记得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前夕说过一段很明智的话，这段话今天仍然值得回味：

> “我们的政策是基于如下信念，那就是尽管中国暂时还贫弱，而且有可能发生革命和内战，但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总有一天会统一和现代化的，总会成为整个东方的最重要的因素。”［47］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话，又有多少人忘记了这些话？

注释

［1］《季鸾文存》，1945 年，大公报馆印，第二册，第 85 页。

［2］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to China），1980 年，第 150 页。

[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国，1933》（Foreign Relation，1933），第三册，第 260—261 页。

[4] 孔华润，前引书，第 140 页。

[5]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版，第一册，第 188 页。

[6] 大卫·陆：《从卢沟桥到珍珠港》（David J． Lu， From the Marco PoloBridge to Pearl Harbor），1961，第 245 页。

[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商务，1980 年，上册，第 552 页。

[8] 吴相湘，前引书，第一册，第 192 页。

[9]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北外交问题研究会编 1966 年，第 343—344 页。

[10] 《胡适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近代史研究所编，1973 年，第 92 页。

[11] 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商务，1983 年，第 362 页。

[12]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前引书，上册，第 565 页。

[13] 入江昭：《权力与文化，美日战争 1941—1945》（Akira Iriye，Power and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l941—1945），第 21 页。[1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1 年，中国》（Foreign Relations，1941，Chi-na），前引书，卷四，第 650—651，680—681，708—709，711—713 页。《赫尔回忆录》，（The Memoirs ofCordell Hull），1948 年，第 10721078 页。

[15]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紧缩包围圈》中译本，卷三，第 900 页。

[16]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l941—1950），1963 年，卷一，第 33 页。

[17]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前引书，上册，第 552—554 页。

[18] 同上书，上册，第 552 页。

[19] 同上书，下册，第 203 页。

[20] 同上书，下册，第 157—158 页。

[21] 塔克曼：《史迪威及其在华经验》（Barbara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Amerian in China，1941—1945），1972 年，第 401 页。

[22]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前引书，第四卷。

[23]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三期。

[24] 1940 年 7 月 25 日，蒋介石与著名华侨陈嘉庚谈话时指出：“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话我未尝向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 年，新加坡版，第 188 页。）

[25]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49 年香港版，第 138 页。

[26]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前引书，下册，第 435 页。

[27] 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文史资料选集》，第八期，第 91 页。

[28]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 348 页。

[29] 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中译本，1984

年，商务，下册，第 557 页。

[30]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 435 页。

[31] 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Herbert Feis，Churchill，Roosevelt， Si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Sought），1976 年，第 211 页。

[32] 谢伟恩：《美亚文件》（John S. Service，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 China Relations） ，1971 年，第 105 页。

[33]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1974 年，三联书店，第二卷，第 103 页。

[3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 年中国》，前引书，英文版，1957 年，第 358 页。

[35] 《美亚文件》，前引书，第 101 页。

[36]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1974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65 页。

[37]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1953 年，第 396 页。

[3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Foreisn Relations，1945）前引书，卷七，第 760—761 页。

[39] 同上，第 770 页。

[40] 同注（33）。

[41]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China），1949 年，第 217 页。

[42] 苏克士：《历史的见证——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三期。

[43]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上卷，1981 年，人民出版社，第 315 页。

[44]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 810—811 页。

[45] 同上，第 898 页。

[46] 塔克曼：《史迪威及其在华经验》，前引书，第 531 页。

[47]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前引书，第 714 页。

（罗晓译周颖如校）